

目录

[奧斯維辛： 8](#_Toc54606812)

[導讀 集中營：一個牲人和獸人的世界 10](#_Toc54606813)

[一、集中營的“累積式激進” 10](#_Toc54606814)

[二、對大屠殺的歷史學解釋 12](#_Toc54606815)

[三、制度、人性、罪責 14](#_Toc54606816)

[序言 20](#_Toc54606817)

[第一章 意想不到的開端 26](#_Toc54606818)

[第二章 服從命令與自主行動 50](#_Toc54606819)

[第三章 死亡工廠 81](#_Toc54606820)

[第四章 腐敗 104](#_Toc54606821)

[第五章 瘋狂的殺戮 126](#_Toc54606822)

[第六章 解放與報復 155](#_Toc54606823)

[致謝 174](#_Toc54606824)

[圖片出處說明 176](#_Toc54606825)





理想國譯叢序

“如果沒有翻譯，”批評家喬治·斯坦納（George Steiner）曾寫道，“我們無異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語不通的省份。”而作家安東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回應說，“翻譯不僅僅是言詞之事，它讓整個文化變得可以理解。”

這兩句話或許比任何復雜的闡述都更清晰地定義了理想國譯叢的初衷。

自從嚴復與林琴南締造中國近代翻譯傳統以來，譯介就被兩種趨勢支配。

它是開放的，中國必須向外部學習，它又有某種封閉性，被一種強烈的功利主義所影響。嚴復期望赫伯特·斯賓塞、孟德斯鳩的思想能幫助中國獲得富強之道，林琴南則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變國人的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與故事，必須以我們期待的視角來呈現。

在很大程度上，這套譯叢仍延續著這個傳統。此刻的中國與一個世紀前不同，但她仍面臨諸多嶄新的挑戰，我們迫切需要他人的經驗來幫助我們應對難題，保持思想的開放性是面對復雜與高速變化的時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們希望保持一種非功利的興趣：對世界的豐富性、復雜性本身充滿興趣，真誠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經驗。

理想國譯叢主編

梁文道 劉瑜 熊培云 許知遠

本譯叢獲理想國文化發展基金會贊助支持

[英] 勞倫斯·里斯 著　　劉爽 譯

# 奧斯維辛：

一部歷史

LAURENCE REES

AUSCHWITZ: THE NAZIS AND THE“FINAL SOLUTION”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桂林•

AUSCHWITZ: THE NAZIS AND THE“FINAL SOLUTION” 　　 by LAURENCE REES 　　 Copyright © : Laurence Rees 2005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Ebury Publishing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ALL RIGHTS RESERVED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奧斯維辛 : 一部歷史 / (英) 勞倫斯·里斯著 ; 劉爽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 9

書名原文: AUSCHWITZ:THE NAZIS AND THE“FINAL SOLUTION”

ISBN 978-7-5495-8548-9

Ⅰ. ①奧… Ⅱ. ①勞… ②劉… Ⅲ. ①第二次世界大戰－猶太人－集中營－史料

Ⅳ. ①K15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6)第175206號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桂林市中華路22號　郵政編碼：541001

網址：www.bbtpress.com

出 版 人：張藝兵

# 導讀 集中營：一個牲人和獸人的世界

徐賁

英國歷史學家和紀錄片導演勞倫斯·里斯（Laurence Rees）的《奧斯維辛：納粹與“最終解決”》（Auschwitz: The Nazis and the “Final Solution”）是為英國廣播公司BBC錄制的一部六集紀錄片，以對奧斯維辛集中營前囚犯和看管的訪談來呈現和還原相關的歷史真相。這部為紀念戰勝納粹德國60周年而制作的系列紀錄片，于2005年1月在BBC一臺首次在英國播出，同年年初又在美國播出，題目改為《奧斯維辛：納粹國家內幕》（Auschwitz: Inside the Nazi State）。《奧斯維辛：一部歷史》（下簡稱《奧斯維辛》）這本書就是基于此紀錄片。對史實求證，里斯采取的是“孤證不引”的方法，他說，這部紀錄片“沒有劇本作家（screenwriter），每一個說出來的字都出自兩個——有的地方是三個——歷史記錄”。[[1]](#_1___Hearts_of_Darkness___http)紀錄片里的奧斯維辛建筑圖屬電腦生成，所用的建筑圖樣來自1990年代前蘇聯檔案解密的材料。這些建筑圖紙在BBC Horizon 1994年的紀錄片《奧斯維辛：大屠殺的藍圖》中作了介紹。

歷史的回顧必須以揭示和再現真相為宗旨，但不能僅僅停留在歷史事實上，我們回顧歷史，是要從歷史中得到對我們今天有用的經驗和教訓。里斯在與美國公共廣播公司（PBS）的訪談中說，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是一樁“罪惡”，“歷史學應該致力于引導人們懂得為什么會發生這樣的罪惡，還有什么比這個目的更為重要呢？倘若不能懂得為什么發生這樣的罪惡，你就不能環視這個世界，思考為什么它還會再次發生”。里斯還特別強調，這部紀錄片不只是關于奧斯維辛的，“我們用奧斯維辛來講一個更大的故事，用奧斯維辛為棱鏡來認識滅絕屠殺的全過程，并對犯下這一罪惡的人們的心態有一些了解”。[[2]](#_2__Interview_with_Laurence_Rees)

里斯要揭示的犯罪者心態不是少數虐待狂或變態者的心智失常，而是無數心智正常者的心靈黑暗之地。他們是社會中普通的“好人”，他們當中不乏受過良好教育，擁有博士學位的社會精英。上個世紀60年代之后的許多社會心理學研究，如斯坦利·米爾格倫（Stanley Milgram）的“對權威的服從”實驗和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G. Zimbardo）的“斯坦福監獄”實驗，揭示的正是“好人”如何能在特定的環境下變成惡魔。津巴多稱之為人性中的“惡”，對此他寫道：“我們曾目睹透露人性殘酷面的各色癥狀，驚訝于善人如何輕易被環境改變，成為十分殘酷的人，而且改變程度可以多么劇烈……雖然邪惡存在與任何環境中，但我們更近距離地檢視了邪惡的繁殖地——監牢及戰場。它們總是成為人性的嚴峻考驗，在這兩個地方，權威、權力及支配彼此混雜，受到秘密的掩飾時，這股力量會讓我們擱置自己的人性，并從身上奪走人類最珍視的品質：關愛、仁慈、合作與愛。”[[3]](#_3__Fei_Li_Pu__Jin_Ba_Duo____Lu)奧斯維辛是一個被納粹既當作監獄又當作戰場的地方（當然還是一個供應奴工的地方），但事實上那既不是監獄也不是戰場，而是納粹統治下經由“累積式激進”形成，并作為永久“例外狀態”而存在的“集中營”。

## 一、集中營的“累積式激進”

《奧斯維辛》史學貢獻最著的部分是它所還原的關于奧斯維辛集中營的真相——讓人們了解奧斯維辛是什么和不是什么，在那里到底發生了什么，又是怎么一步一步演變、發展而成。這個規模龐大的集中營從1940年開始正式運作，1945年被蘇聯紅軍解放，期間被殺害的遇難者達100萬以上，百分之九十是猶太人。然而，建立這個集中營的最初目的卻并不是要在那里屠殺猶太人。奧斯維辛的第一批囚犯并非猶太人，“而是德國人——準確地說，是30名從薩克森豪森集中營轉來的刑事犯”。奧斯維辛后來成為關押納粹認為有危險的波蘭人和蘇聯戰俘的地方。納粹用它來“威嚇當地人”，囤積奴工，“按照最初的設想，奧斯維辛只是在犯人被送往帝國其他集中營之前暫時關押他們的場所，用納粹的術語來說，一座‘隔離’營。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奧斯維辛的功能明顯發生了變化，這里將成為有進無出的人間煉獄”。

通過揭示奧斯維辛的演變過程，里斯要告訴讀者的是，納粹并不是從一開始就精心設計，并按部就班地要把奧斯維辛建成一個殺人魔窟。這個現在惡名昭著的集中營乃是納粹在不斷出現新問題的過程中，一次次臨時調適和改變所累積的結果。它的演變成為納粹極權統治“累積式激進”（cumulative radicalization）的一個縮影。累積式激進指的是，滅絕屠殺猶太人并不是希特勒一個人下達的命令，而是“許多納粹分子都為此盡心盡力。下層的主動性和推波助瀾，是滅絕朝著越來越激進的方向發展的重要原因”。戰爭結束之后，那些以各種方式參與滅猶的納粹“試圖讓這個世界相信做出決定的只有一個人，那就是阿道夫·希特勒”，不少歷史學家作出的也是這樣的解釋。

《奧斯維辛》的目的和重要意義就在于，它用揭示累積激進的過程來糾正一個歷史解釋的常見錯誤。里斯指出，“戰爭讓一切都朝著激進化的方向發展，集中營也不例外”。猶太人隔離區也是一樣，它后來成為納粹迫害波蘭猶太人的一個顯著特點，也成為把猶太人送進集中營的先導，但是，里斯同樣也指出，“它建立之初的用意并非如此。與奧斯維辛和納粹‘最終解決’發展歷史上的很多事情一樣，它們都朝著最初沒有預料到的方向演變”。

里斯詳細敘述奧斯維辛集中營和波蘭猶太人隔離區，都是為了說明，納粹一開始并沒有屠殺猶太人的計劃，更不用說消滅所有猶太人的“最終解決”了，大屠殺本身也是一個“累積式激進”的結果。里斯指出，即使是納粹的首腦人物——如希姆萊和海德里希——開始也沒有大屠殺的計劃。他們甚至不同意“從肉體上消滅整個民族的做法——因為那從根本上很不德國（un-German），也不可能實現”。但是，納粹面臨的許多具體問題——從解決因德意志人遷移而造成的住房短缺，到戰時的糧食短缺——使得他們在制定應對政策時越來越極端，越來越殘酷，也越來越邪惡。這種“累積式激進”是納粹極權制度的暴力統治邏輯所無法避免的，也只有在這個制度中才會如此迅速地加劇和惡化，奧斯維辛就是納粹制度的一個產物。

奧斯維辛是納粹集中營的縮影，那么什么是“集中營”呢？意大利政治哲學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在《無目的的手段：政治學筆記》一書里對集中營（camp，中譯作“收容所”）的存在做了本質的分析。他指出，收容所中所發生的事件超出了關于犯罪的司法概念，收容所是一個例外的空間，它被置于監獄法以及刑法的權限范圍之外，是被置于正常法律秩序之外的一片領地。收容所與這些法律無關，“達豪以及后來很快增設的其他收容所（薩克森豪森、布痕瓦爾德、利希滕貝格）實際上一直在運作……這類收容所已經在德國成為了永久現實”。[[4]](#_4__Gu_Ao_Qiao__A_Gan_Ben____Wu)在這樣的地方，合法的居民“已經被剝奪了所有政治身份，并被完全還原為赤裸生命”，他們也因此成為“牲人”，“人類被完全剝奪他們的權利和特征，以至于達到對他們做任何行為都不算是犯罪的程度”。[[5]](#_5__Gu_Ao_Qiao__A_Gan_Ben____Wu)

集中營并不是納粹的發明，但是集中營在“累積式激進”過程中變成死亡營和滅絕營，卻是史無前例的納粹邪惡罪行。阿甘本指出，歷史學家一直在爭論，到底是1896年古巴的西班牙人為鎮壓殖民地人民反抗而創設的campos de concentraciones， 還是20世紀英國人用于集中管理南非布爾人的concentration camps，才應該被確認為最初出現的集中營。但是，關鍵問題是，這兩個事實都是“與殖民戰爭相聯系的例外狀態向平民人口的擴展”。換言之，“收容所既非誕生于普通法律，也非……監獄法的某種改造和發展產物；毋寧說，它們誕生于例外狀態和軍事管制。這在納粹集中營（Lager）的例子中表現的甚至更為明顯……法律制度能出于使國家安全免于威脅的目的，對個人進行‘拘留’，所以納粹法學家常常視此法律制度為預防性的管制制度”。[[6]](#_6__Gu_Ao_Qiao__A_Gan_Ben____Wu)

納粹統治時期，最早的達豪集中營建于1933年3月（即阿道夫·希特勒成為德國元首后不到兩個月），從概念上便與特雷布林卡這種在戰爭期間才建成的滅絕營不同。被關進達豪集中營的第一批囚犯大部分是納粹的政敵，他們被視為對納粹國家安全的威脅，而猶太人還不是。當時的德國民眾也為此而支持建立集中營。里斯指出，“在所有接受我們拍攝的德國人當中，沒有一個（包括當年狂熱的納粹分子）公開表示他們對滅絕營的存在‘滿懷熱情’，但很多人在20世紀30年代對于集中營的存在感到相當滿意”。他們將集中營視為一種防衛性的，正當的例外措施。正如里斯指出的那樣，他們所不清楚的是這樣的集中營可能多么暴力和殘酷，“達豪集中營的管理制度不僅殘酷無情，更能摧毀囚犯的意志”。盡管肉體虐待已經十分殘酷和恐怖，“但更可怕的是精神折磨”，這是為了徹底摧毀反納粹人士的抵抗意志。

當猶太人被關入集中營的時候，納粹也以猶太人威脅德國國家安全為借口，這使得例外狀態成為納粹迫害的常態。對此阿甘本說：“阿倫特曾經指出，收容所暴露出來的是支撐著極權主義統治，而常識又頑固地拒絕承認的一條原則，也就是說，是那條使一切都成可能的原則……僅此一條原因，就使得在收容所里一切都能真的成為可能。如果不理解收容所（的本質）……那么收容所中發生的那些難以置信的事情就永遠是難以理解的了。”[[7]](#_7____Wu_Mu_De_De_Shou_Duan__Zhe)《奧斯維辛》中黨衛隊看守和“卡波”對猶太人的酷刑殘害會讓讀者毛骨悚然，難以置信——人怎么能這樣殘害他人。如果不是因為里斯為我們提供了詳細的證據，讀者一定難以想象，怎么短短的幾個月間奧斯維辛就能從一個集中營累積激進為一個死亡營，而在那里執行殺戮任務的看守們又是如何在心理上迅速適應這一劇烈轉變的。《奧斯維辛》一書中講述得最多的魯道夫·霍斯（Rudolf Höss）——那位黨衛隊中的模范和奧斯維辛的指揮官——本來是一個農民的兒子，他在家里是一個慈愛的父親，在集中營里卻如魔鬼般冷酷和殘忍。這樣的人格分裂也會讓人覺得難以置信。里斯指出：“最重要的或許是，奧斯維辛和納粹的‘最終解決’證實了一個事實：人的處境（situation）對個人行為的影響遠遠超出我們的想象。”集中營正是這樣一個可以發生難以置信的變化的非人化境地。

在集中營這個特殊的非人境地里，囚犯變成了阿甘本所說的“牲人”，而看守則變成了“獸人”。極權統治把人要么變成牲口，要么變成野獸，或者既是牲口又是野獸。這就是制度性的去人性，它逼著人變成動物，而集中營更是一個濃縮的牲人和獸人世界。這個地方濃縮了阿倫特所說的“惡”——那種人不再是人，人不被當人的“惡”。阿倫特在致哲學家雅斯貝爾斯的一封信里，把惡簡潔地定義為“把人變為多余”。[[8]](#_8__Hannah_Arendt_and_Karl_Jaspe)1945年，隨著納粹集中營被解放，大量發生在那里的恐怖事件開始被披露，阿倫特的強烈反應是，“惡的問題將是戰后歐洲知識分子生活的基本問題”。[[9]](#_9__Hannah_Arendt___Nightmare_an)當有人問她對滅絕營的看法時（她第一次聽說是在1942年），她說，就像打開了一道深淵，“對過去發生的某些事件，我們不可能與之達成和解。任何人都不能”。[[10]](#_10__Hannah_Arendt____What_Remai)

對此，美國政治學家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J. Bernstein）寫道：“阿倫特感到，集中營所發生的事件是最極端的，最根本的惡的形式。‘奧斯維辛’變成了集中體現這場浩劫的名詞，并變成了20世紀爆發的其他惡的象征。我們還可以談到柬埔寨、烏干達、波斯尼亞——這些名稱和地點是如此不同，但所呈現的都是可怕的事件，我們將盡全力去理解這些事件，但我們不可能與之達成和解。”[[11]](#_11__Li_Cha_De__Bo_En_Si_Tan)也就是說，無論這樣的事件如何被某些人說成具有“正當”“合理”的原因，我們都永遠不能原諒和寬恕這樣的事件。對這樣的事件，我們必須在道義上永遠關閉所謂的“歷史合理性”和“歷史正當性”的大門。

20世紀之后，惡已經不再只是一個神學的概念，也不只是撒旦的別名，而是現實生活中一種至今尚未被充分認識的殘害性暴力。我們所遭遇到的惡和我們對惡的認識之間存在著很大的距離。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安德魯·戴爾班科（Andrew Delbanco）在《撒旦之死》一書里就此寫道：“我們的文化在惡的可見性與可以獲得的對付它的知識資源之間已經裂開了一道鴻溝。恐怖的景象從來不曾如此廣泛地散播，也從來不曾如此駭人聽聞——從組織化的死亡集中營，到兒童在饑荒中餓死，而這些本來是可以避免的。”[[12]](#_12__Andrew_Delbanco__The_Death)20世紀，這個世界上發生了許多本來可以避免的大規模人道災難，千百萬無辜者死于非命，惡造成的罪孽從未如此之多，但我們對惡的反應和認知卻長期停滯不前。

惡普遍存在于20世紀的專制和極權制度中，大屠殺只不過是極權之惡的一個顯例而已。極權之惡不只是少數虐待狂和瘋子的事，而且更與眾多以各種方式參與其中的普通人都有關聯，對此里斯警告道，不要忽視了納粹統治環境對千千萬萬普通德國人的人性改變效應，正是這種環境效應生產了無數心甘情愿跟隨希特勒作惡的普通納粹，他們有的甚至一輩子都無悔意。

## 二、對大屠殺的歷史學解釋

里斯是一位歷史學家，他的《奧斯維辛》是一部歷史研究著作，從學術的角度來說，歷史研究有兩個著重點，一個是發掘“史實”材料，一個提出“論述”觀點，前一個著重于歷史局部和細節，后一個著重于對整體特征和格局的把握。《奧斯維辛》提供許多檔案資料和第一手訪談材料，其“史實”價值自不待言。它用這些歷史細節對大屠殺所做的歷史整體闡述也許更值得我們重視。尤其是，當今我國學界尚缺乏對納粹德國史研究新發展和新成果的翻譯和整體介紹，《奧斯維辛》正好可以成為一個切入點，以期引發學界和讀者對納粹德國更大的興趣和更周全的認識，并思考這些新方法和新觀點對研究我們自己的歷史可能有怎樣的借鑒意義。

史學界有不少關于猶太人大屠殺肇端的辯論，并由此涉及納粹德國（第三帝國） 的統治制度、政策、權力運作等相關問題，歷史學家們不同的整體論述觀點形成了“功能主義”（functionalism，又稱“結構主義”）和“蓄意主義”（intentionalism）的分歧。分歧集中于兩個基本問題上：第一， 究竟希特勒有沒有大舉屠殺猶太人的整體藍圖？ 蓄意主義認為他有計劃，功能主義則認為沒有。第二， 猶太人大屠殺是基于希特勒的命令，還是德國納粹官僚的創造發明？蓄意主義認為是基于希特勒的命令，功能主義認為，這主要是因為許多具體負責的納粹先是領會上意，然后為了效忠輸誠、邀功爭寵而不擇手段、走火入魔。里斯的觀點是功能主義的，但同時又有所修正。這清楚地反映在他對“累積式激進”觀點的運用上，在本書“序言”結尾處他只是提到了這個觀點，而沒有加以強調和引申（在與PBS的訪談中也是這樣），是有原因的。

“累積式激進”由德國歷史學家漢斯·蒙森（Hans Mommsen）首先提出，標志著納粹德國研究的一個新視野。在這之前，對納粹德國和希特勒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從思想和文化因素來分析納粹的極權統治和對猶太人的大屠殺，如德國特定的歷史文化、傳統的激進民族主義、反猶淵源，并將納粹的政策歸因于希特勒的世界觀和對德國人有吸引力的納粹意識形態（我國學界的這方面研究至今仍然是這個路數）。新的歷史研究視野更關注的是納粹制度中社會的力量、因素和條件的作用，以及普通民眾的參與所給予納粹統治的多種多樣的支持——沉默、順從、妥協，合作、積極配合、出謀劃策。從新的歷史研究角度來看，納粹體制并非一部一絲不茍地貫徹元首意志的精密有效機器，而是一個政出多門、相互制肘、自我內耗的政權。納粹政權依靠國家的一些支柱部門（武裝部隊、黨、公務員、黨衛軍、工業界）的隨機應變和自我運作能力。因此，社會中普通民眾的自洽和自我調節也就成為納粹政權存在的重要條件。納粹統治所依靠的遠遠不只是負面的恐懼、暴力、威脅，而且更是正面的普通人配合和協助機制。蒙森的“累積式激進”觀點另一部分是主張希特勒是一個“弱獨裁者”（Weak Dictator）。蒙森認為大屠殺和“最終解決”是“累積激進”的結果，而不是希特勒一人的長期規劃。希特勒確實狂熱反猶，但大屠殺并不能用希特勒本人的決定和命令來解釋。事實上，從1939年開戰之后，希特勒就是一個高高在上的獨裁者，他不愿意也沒有能力詳細過問具體的要務，他是統帥，但統帥的卻是一個組織分散、內斗激烈的統治集團。這也是導致納粹自我毀滅和失敗的一個主要原因。[[13]](#_13__Hans_Mommsen___Cumulative_R)

在大屠殺問題上，新的歷史研究發現，最終解決方案的產生原因難以證明是來自希特勒的最高命令，因為即使在私密小圈子里，希特勒本人也從未提過“最終解決”這個說法，至今也沒有發現這方面的文字或口頭命令記錄。希特勒確實于1941年發布過“政委法令”（Kommissarbefehl），命令槍斃俘虜中所有“徹底布爾什維克化或積極代表布爾什維克意識形態的人員”。這個命令可以說是最后導致了大屠殺，但它畢竟不是大屠殺的一部分。希特勒只是大屠殺的“意識形態和政治起源”，為實現他的“烏托邦”而競相效力的是納粹黨徒。正是這些普通的納粹分子計劃和實行了一系列的屠殺行動，他們揣摩上意、邀功爭寵，自作主張，對猶太人寧可錯殺，不可放過，越來越激進和極端，這才有了全面屠殺猶太人的“最終解決”方案。這時候的德國實際上已經是一個“元首缺席的元首國”。[[14]](#_14__Ian_Kershaw__Hitler__1889_1)

里斯在《奧斯維辛》中清楚地展現了大屠殺的“累積式激進”過程，他強調的是普通納粹在大屠殺中積極發揮的“創造力”和“自主主張”。但是，里斯并沒有接受蒙森關于希特勒是“弱獨裁者”的觀點。在這一點上，《奧斯維辛》與英國歷史學家伊恩·克肖（Ian Kershaw） 享譽學界的《希特勒傳》是頗為一致的。

1941年，希特勒下達“政委法令”，這在普通德國人看來是合理的事情，因為他們把共產黨和猶太人看成同一回事，正如一位被采訪的前納粹分子所說，“馬克思不就是猶太人嗎？”“政委”也就是蘇聯“黨內或政府內的猶太人”。也許當時誰也無法預料，“政委法令”后來成為大屠殺“累積式激進”的開端。一開始，處死的對象是猶太成年男子。但是，在納粹國家里，命令都是最低限度必須執行的任務。所以有的執行單位就這樣看待這道命令，“好吧，……不管看到什么猶太男子，全都殺掉，這樣就不必操心他是不是共產黨了”。這種寧可錯殺，不可放過的心態是“人之常情”，許多別的國家里發生的屠殺事件（肅反、鎮反、清查和消滅階級敵人）也都曾經如此。里斯指出，納粹累積激進的大屠殺就是從開始有章程、有命令，發展到后來沒章程、沒命令，但卻照樣能自我激化和自我發明。由于處死成年猶太男子，納粹碰到一個新問題，殺了一家生活的來源，那女人和孩子怎么辦？1941年夏，他們作出了一個重大的改變決定：把女人和兒童也都殺掉。里斯認為，“希姆萊做了這個決定，我想是得到希特勒首肯的，通過特別行動隊向下擴散”。[[15]](#_15__Interview_with_Laurence_Ree)

然而，事情并沒有到此為止，而是繼續變得更加邪惡，因為納粹有了一個更大的問題。近距離用槍射殺婦女和兒童，這種殘酷行徑對大約百分之二十的納粹殺手造成了嚴重的心理創傷。《奧斯維辛》中對此有生動的描述：“目睹屠殺過程的黨衛隊全國副總指揮，巴赫-澤勒維斯基對希姆萊說：‘這還只是區區一百人……看看這個分隊士兵的眼睛，有多驚恐！這些人下半輩子都完了。我們在這里培養的是什么樣的追隨者？要么就是瘋子，要么就是野蠻人！’后來，巴赫-澤勒維斯基自己也深受精神疾病的困擾，眼前一再出現他所參與的行刑場景‘幻象’。”因為“受到這些抗議以及自己親身經歷的影響，希姆萊下令開辟一種新的屠殺方法，以減少部下的心理問題”。于是，幾個星期后，一些下層的納粹分子，他們是學科學的知識分子，便出來獻計獻策，提出了富有創意的殺人主意——用毒氣進行工業化的大規模屠殺，這就把種族滅絕的殺戮之惡推到了一個史無前例的程度。

里斯對知識分子參與納粹邪惡表示了極度的憤怒和鄙視，因為他們本是“絕頂聰明的人”，這些坐在（1942年1月20日于柏林郊外舉行的）“萬湖會議”（Wannsee Conference，討論解決猶太人的“最終方案”）會議桌前的許多人都擁有博士學位，不少還是法學博士，“許多負責特別行動隊的都不是沒有頭腦的惡棍，有一位擁有兩個博士頭銜，非要別人稱呼他 “博士-博士”（Reinhard Heydrich）……這些很有文化的人士，他們以異乎尋常的平靜和冷靜來做殺人的決定……簡直太容易把他們當作神智失常者或瘋子，但是，令人恐懼的是，他們并不是瘋子。當時，他們認為自己是在做一件正確的事情。倘若我們不知道為什么這樣的人在當時會把（屠殺無辜）視為正確的事情，我們就沒有辦法防止未來還會發生這樣的事情”。[[16]](#_16__Interview_with_Laurence_Ree)

在大屠殺研究中，里斯把目光更多地放在普通納粹的創造性和盡心盡力的作惡行為上。在這個問題上他同意蒙森的“累積型激進”論，但是，在希特勒是否為“弱獨裁者”的問題上，他持與蒙森不同的看法。里斯對希特勒和納粹領導層該承擔怎樣的罪責提出更明確的政治定罪和道德譴責，為此他提供了多種新發現的檔案證據，包括希姆萊完整的工作日志。他的結論是，“希特勒一連串環環相扣的決定最終導致猶太人的滅絕”，“盡管目前尚未發現任何希特勒寫下的文字，可以證明‘最終解決’是他直接下令執行的，但上述證據讓人們不僅有理由懷疑，甚至確定，那年（1941年）12月，希特勒正積極煽動和引導更激進的反猶行動。他親自下令將帝國猶太人遣送東部，就算沒有美國參戰所產生的催化作用，這次驅逐最終仍可能通向死亡。12月5日，蘇聯紅軍在莫斯科城下向德軍發起反攻，希特勒的憤怒和沮喪可能已經預示了拿猶太人發泄的傾向。珍珠港事件的爆發則將他明確引向謀殺。納粹領導層不再假裝他們僅僅是要把猶太人遣送到東部關進集中營。無論采用哪種方式，他們現在要做的是‘滅絕’”。對希特勒的歸罪具有重要的先例意義，因為無論在世界上哪個地方，只要發生了人道災難，以“不知情”“不直接過問”“下面的人辦壞了事”這類借口來為最高領導人開脫責任，都是不能接受的。

## 三、制度、人性、罪責

許多現有的大屠殺研究都廣泛引述幸存者和受害人的證詞，相比之下，加害者的證詞要少得多，主要的原因就是很難取得這類證詞。《奧斯維辛》的一個重要特點和成功之處即在于收集了相當數量的第一手加害者證詞。是什么原因使得加害者愿意提供證詞的呢？這首先需要研究者付出極大努力去說服他們，“我們通常要花上幾個月甚至長達數年的時間，說服他們接受采訪并同意錄像”。而且，還需要被說服者正好有想說的意愿，這往往是可遇不可求的，書中的那位前黨衛軍奧斯卡·格倫寧就是因為與一位否認大屠殺的集郵愛好者的爭論才打破沉默的。

里斯承認，“促使他們最終說出一切的決定性因素究竟為何，我們永遠無法確切知道。但在許多案例中，受訪者明顯感覺到自己的生命已走到盡頭，因此想把自己在那些重大歷史時刻的經歷毫無保留地記錄下來。此外，他們相信BBC不會歪曲他們的觀點”。但是，里斯在訪談中說，還有一個“可怕”的原因，那就是這些加害者“希望人們了解他們當初為何做這樣（殘害別人）的事情，他們并不是瘋子。他們當中有的要別人知道，他們并不一定認為自己所做的是壞事”。[[17]](#_17__Interview_with_Laurence_Ree)這就讓對加害者的采訪人處于一種道德困境之中，“我們提問的方式和我們所用的材料都清楚表明，我們在善與惡之間并不持中立的立場。另一方面，如果你采訪某個人，他承認槍決過猶太人，而且表示并不為此感到后悔，你問他，‘你為什么不后悔？’他說，‘因為我確實憎恨猶太人’，那么，你就會讓觀眾看到一種完全是不同尋常的有深度的東西。他們可以從中吸取深刻的教訓。五十年、一百年以后，有人看這個紀錄片，這個有深度的東西還是在那里”。[[18]](#_18__Interview_with_Laurence_Ree)這個有深度的東西就是人性的黑暗和復雜，以及生存情境能夠如何對人性發生長期難以發覺的塑造和改變作用。

加害者的證詞和有些加害者對自己所做所為的“無怨無悔”或“有限認錯”（如奧斯卡·格倫寧）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為關乎大屠殺的兩個關鍵問題——它們同樣是《奧斯維辛》要回答的關鍵問題。第一個問題是，人怎么可能做出這樣邪惡的事情，心安理得地殘害或殺戮與自己無怨無仇的無辜者？第二個問題是，殺害的決定是由誰做出的？第一個是人性的問題，涉及人自身的善和惡。第二個則是政治責任和法律罪責的問題，涉及應該如何為受害者伸張正義。

如果說，屠殺的決定是由極少數人——希特勒和他的核心人物——所做出，而大多數人只不過是“執行命令”的話，那么，我們可以把這些極少數人視為“沒有人性”的惡魔和虐待狂。但是，如果殺人是許許多多普通人自己所決定的行為（雖然是因為處于某種外力的情景之中），而且事后并不后悔，那么，我們便不能輕易將這些數量眾多的人全都排除在人類群體之外。他們的問題不是“非人性”，恰恰相反，這正是“人性”。里斯關注的顯然是后一種情形， “所有認為只有納粹分子甚至只有希特勒才持有極其惡毒的反猶主義觀念的人，也應當認真反思。最危險的想法之一，就是認為歐洲人是在少數瘋子的強迫下心不甘情不愿地犯下了滅絕猶太人的罪行”。[[19]](#_19__James_Madison___Government)

參與作惡的普通人，對他們的道德審視需要我們超越對人性惡或人性善的簡單信念或認知習慣，需要我們思考人性中的那些普遍的局限和陰暗面。二百多年前，人性的局限和陰暗已經使不少啟蒙時代的思想者們憂心忡忡，也讓他們把政府與人性結合在了一起。“政府本身又是什么，”麥迪遜問，“不正是人性的集大成者？” [[20]](#_20__James_Madison___Government)在美國之父們的遠見中，民主，就是要設計成對人性弱點的制約，特別是對領導濫用權力的制約。對人性的認知，可能是美國革命與法國美國之間最大的不同，后者有著浪漫的情懷，堅信自己即將擺脫人性的局限，把人變成“新人”。1794年，馬克西米連·羅伯斯庇爾（Maximilien Robespierre），“恐怖統治”的總設計師，這樣寫道：“法國人民似乎已經超越世界上其他人類2000年；身居其間，你很想將他們看作另外一個物種。”[[21]](#_21___French_People_as_a_Differe)

對人性的理解存在著兩種極端看法：“悲劇觀”（導致對人性的缺陷逆來順受和無條件接受）和“烏托邦觀”（拒絕承認人性自身中存在恒久的弱點，否認對待人性弱點只能靠遏制而不能靠改造）。社會心理學家斯蒂芬·平克認為，“根據現代科學，對人性更深刻的理解表明，處理政治問題中的人性遠比上述兩種極端的觀點更復雜和深奧。人的頭腦不是白板，沒有一種人道的政治制度應該允許蔑視領導人或者重塑公民。即使有這樣或那樣的局限性，人性中還有一個具有遞歸、開放性和組合能力的系統進行推理，因此人能認識到自身的局限性。啟蒙人道主義的引擎——理性主義，永遠也不會被特定時代下人們推理中出現的缺陷和錯誤所擊敗。理性總是能夠退后一步，記錄缺陷，修正規則，避免下一次再犯錯誤”。[[22]](#_22__Si_Di_Fen__Ping_Ke____Ren_X)

這恰恰是身處極權統治下的人們所無法做到的。極權統治誘發、利用和加強人性中的陰暗和殘酷，而人性中的陰暗和殘酷又在這樣一種統治秩序中極度放大了極權的制度之惡，不只是集中營里那些特別殘暴的看守和“卡波”，身處這個制度中的每一個人，沒有一個人可以帶著完整的、未被殘害的人性離開這個體制環境。極權體制是人類的批評理性光芒照不進去，也不被允許照進去的一片黑暗之地。

納粹統治在政治、社會、文化的各個領域中形成了一種對每個人的行為都發生毒化影響的環境，統治者全方位、徹底地控制這個環境——這就是極權主義。里斯指出“人的處境對個人行為的影響遠遠超出我們的想象”，這在書中人物托伊·布拉特身上有所體現。作為死亡集中營里最堅強、最勇敢的幸存者之一（曾參加索比堡起義），他被納粹強迫在索比堡滅絕營工作，隨后冒著生命危險逃了出來。“人們問我，”他說，“‘你學到了什么？’我想我只能確定一件事：沒人真正了解自己。你在大街上遇見一個和善的人，你問他：‘北街怎么走？’他陪你走了半個街區，給你指路，態度親切。可是在另一種環境下，同一個人可能變成最可怕的虐待狂。沒人了解自己。每個人都可能在這些（不同的）處境之下變成好人或壞人。有的時候，碰上對我特別和善的人，我忍不住會想：要是把他放在索比堡，他會變成什么樣呢？”

極權制度把人放置在要么害人要么被人害的兩難選擇中，不管有沒有內疚，幾乎沒有人會選擇讓自己受害。尤其是在物質匱乏的情況下，同情、憐憫、惻隱之心——亞當·斯密視之為人之為人的情感——都是奢侈而多余的，人性問題成為非常現實的生存可能和需要問題。1939年12月，伊爾瑪·艾吉這個來自愛沙尼亞的17歲德意志女孩，與她的家人一起被安置在波茲南的臨時住所。圣誕節前夕，一位負責住房的納粹官員給了她父親幾把公寓鑰匙，“這套公寓就在幾小時前還屬于一個波蘭家庭”。艾吉一家意識到自己強占了別人的房子：“在那之前，我們完全沒想到會發生這樣的事情……你沒法帶著這種負罪感過日子。但另一方面，每個人都有自我保護的本能。我們還能做什么呢？我們能去哪里呢？”

德意志人是這樣，波蘭人也是這樣，為了賺錢，約瑟芬和朋友們到比克瑙的焚尸場附近“淘金”。“他們翻動土地，挖出埋在地下的人骨碎片，把這些碎片放在一個碗里，裝上水以后從中找金子。‘大家都覺得很不舒服’，約瑟芬說，‘無論自己有沒有親人死在集中營里，大家都覺得不自在，因為這些畢竟是人的骨頭。沒人樂意干這種事，可是貧窮逼著我們不得不這么做。’”波蘭人揚·皮夫奇克承認他也曾在焚尸場附近搜尋貴重物品。“我記得我找到一顆金牙，一枚猶太硬幣，還有一個金手鐲。我現在肯定不會這么干了，對不對？我不會再從人骨堆里刨東西，因為我知道干這種事的都該遭天譴。但那個時候我們沒別的辦法，只能這么做。”里斯關注的是人性，而不僅僅是德意志人的人性，這使得他敘述的故事也可以成為每個讀者自己的故事。

里斯從幸存者和納粹罪犯那些學到的是，“人類的行為是如此易變和不可預知，常會被他們身處的環境所左右。當然，人們可以自行決定采取什么樣的行為，但對很多人來說，個人處境是影響這些決定的關鍵因素”。這樣的結論可以被用來解釋人在什么特殊環境會作怎樣的惡——人在仇恨和暴力環境促成和加強的許多心理因素作用下（服從威權和命令、從眾和害怕、將殘害對象妖魔化和非人化、對自己惡行辯護與合理化），會誘發出“好人作惡”的行為結果，極少會有例外。

但是，同樣的結論也可以被作惡者用作對自己主觀意愿的推諉和脫罪之詞。格倫寧有一次與父親及岳父母共進晚餐，“他們對奧斯維辛發表了一句特別愚蠢的評論”，暗示他是“潛在的甚或是真正的兇手”，氣得格倫寧大聲咆哮。他對采訪者辯解道，他在奧斯維辛當看守，只不過是在執行命令而已，是環境讓他扮演了一個服從威權的角色。甚至連身為奧斯維辛最高指揮官的霍斯，也是用軍人服從命令來為自己辯護。對此里斯問道：“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是：霍斯真的能‘明白’他都干了什么嗎？在他被處決前剛剛寫就的自傳中，所有的線索都指向同一個結論，那就是……他不會發自內心地認為他所做的一切從根本上是錯誤的。當然，他確實在自傳里寫道，他‘此時此刻’認為滅絕猶太人是一個錯誤，但這只是一個策略上的失誤，因為它讓德國成為全世界仇視的對象。”不只是霍斯，還有許多別的納粹（如格倫寧），他們一輩子都堅持認為，滅猶的大政方針并沒有什么錯，只不過“實施的具體方式”出了問題。

“服從命令”讓許多對自己罪行沒有悔意的納粹不僅逃脫了1945年的“紐倫堡審判”，而且也逃脫了1947年和1963年第一和第二次“奧斯維辛審判”的法律追究。奧斯維辛審判（也稱“法蘭克福審判”）更是被一些法學家視為受難者正義的失敗。法蘭克福審判的總檢察官弗里茲·鮑爾（Fritz Bauer）雖然接受審判的結果，但多次對審判原則提出批評，他堅決要求揭露參與龐大奧斯維辛系統的所有納粹，包括直接屠殺和為之提供各種輔助和支持的人。他說：“參與的人有幾十萬……他們執行最終解決計劃，不僅僅是因為有人命令他們這么做，而且是出于他們自覺自愿接受的世界觀。”[[23]](#_23__Robert_Fulford___How_the_Au)對紐倫堡審判，里斯寫道：“在紐倫堡審判中，黨衛隊作為一個整體已經被定義為一個‘犯罪組織’，但沒有人進一步強調，每個在奧斯維辛工作過的黨衛隊成員都犯有戰爭罪……如果能夠給他們每個人都定罪，那么無論判罰有多輕，它都是向后人表達的一個明確態度。”不僅如此，對納粹罪行的定罪（不管最后是否予以法律懲罰）對評判發生在世界其他地方的人道災難的參與者責任，也會是一個有用的先例參照。可惜紐倫堡審判和奧斯維辛審判錯過了人類歷史上這樣一個重要的機會。這也正是為什么里斯說——

人類從內心深處需要這個世界有公道存在，需要無辜的人最終得到補償，有罪的人最終受到懲罰。但奧斯維辛的歷史沒有給我們這樣的慰藉。

[[1]](#filepos6231) “Hearts of Darkness”. http://www.smh.com.au/news/tv--radio/hearts-of-darkness/2005/09/24/1126982268912.html .

[[2]](#filepos7400) Interview with Laurence Rees. http://www.pbs.org/auschwitz/about/.

[[3]](#filepos8678) 菲利普·津巴多，《路西法效應：好人是如何變成惡魔的》，孫佩妏、 陳雅馨譯，三聯書店，2010年，第499頁。

[[4]](#filepos13628) 古奧喬·阿甘本，《無目的的手段：政治學筆記》，趙文譯，河南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50—51頁。

[[5]](#filepos13988) 古奧喬·阿甘本，《無目的的手段：政治學筆記》，趙文譯，河南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52，53頁。

[[6]](#filepos15091) 古奧喬·阿甘本，《無目的的手段：政治學筆記》，趙文譯，河南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48—49頁。

[[7]](#filepos16923) 《無目的的手段：政治學筆記》，第52頁。

[[8]](#filepos18644) Hannah Arendt and Karl Jaspers, Hannah Arendt/Karl Jaspers: Correspondence 1926-1969, eds. Lotte Kohler and Hans Saner, trans. Robert and Rita Kimber.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92, p. 166.

[[9]](#filepos18927) Hannah Arendt, “Nightmare and Flight.” In Hannah Arendt: Essays in Understanding, 1930-1954. Ed. Jerome Koh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 1994, p. 134.

[[10]](#filepos19225) Hannah Arendt, “‘What Remains? The Language Remains’: A Conversation with Günter Gaus.” In Essays in Understanding, p. 14.

[[11]](#filepos19874) 理查德·伯恩斯坦，《根本惡》，王欽、朱康譯，譯林出版社，2015年，第1頁。

[[12]](#filepos20959) Andrew Delbanco, The Death of Satan.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95, p. 3.

[[13]](#filepos25950) Hans Mommsen, “Cumulative Radicalization and Self-Destruction of the Nazi Regime.” In Neil Gregor, ed., Naz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Hans Mommsen, “Cumulative Radicalization and Progressive Self-destruction as Structural Determinants of the Nazi Dictatorship.” In Ian Kershaw and Moshe Lewin, eds., Stalinism and Nazism: Dictatorships in Compari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See also, “Functionalism and the ‘Weak Dictator’ Thesis” http://www.liquisearch.com/hans\_mommsen/biography/functionalism\_and\_the\_weak\_dictator\_thesis.

[[14]](#filepos27122) Ian Kershaw, Hitler, 1889-1936: Hubris.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1998, p. 420.

[[15]](#filepos29110) Interview with Laurence Rees.

[[16]](#filepos31398) Interview with Laurence Rees.

[[17]](#filepos34684) Interview with Laurence Rees.

[[18]](#filepos35381) Interview with Laurence Rees.

[[19]](#filepos37197) James Madison, “Government and Human Nature: Federalist Papers No. 51.” In C. Rossiter, ed. The Federalist Papers.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61, p. 322.

[[20]](#filepos37760) James Madison, “Government and Human Nature: Federalist Papers No. 51.” In C. Rossiter, ed. The Federalist Papers.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61, p. 322.

[[21]](#filepos38405) “French People as a Different Species.” Quoted in D. A. Bell, The First Total War: Napoleon’s Europe and the Birth of Warfare as We Know It.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2007, p. 77.

[[22]](#filepos39488) 斯蒂芬·平克，《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安雯譯，中信出版集團，2014年，第223頁。

[[23]](#filepos46067) Robert Fulford, “How the Auschwitz Trial Failed .” The National Post, 4 June 2005. 參見，徐賁《奧斯維辛審判中的罪與罰》，收入《人以什么理由來記憶》，中央編譯出版社，2016年，第120—132頁。

獻給110萬個男人、女人和孩子，

他們死于奧斯維辛。

# 序言

這本書包含很多令人心情沉重的內容，但我仍然認為我們需要這樣一部作品：一方面是因為調查表明，大多數人對奧斯維辛的真實歷史仍一知半解[[1]](#_1__BBCZai_2004Nian_Zuo_Le_Yi_Ge)；另一方面，我希望這本書能提供一些獨特的見解。

我圍繞納粹題材進行文字和電視節目創作已有十五年時間，這本書力圖在這些年的積累之上，以一個具體場所為切入點，對人類歷史上最深重的罪行進行最透徹的詮釋，這個場所就是奧斯維辛。不同于反猶主義，奧斯維辛有確定的開始日期（第一批波蘭囚犯到達，是1940年6月14日）；也不同于種族屠殺，奧斯維辛有確定的結束日期（1945年1月27日，集中營獲得解放）。在這兩個日期之間，奧斯維辛那段復雜的歷史從許多方面反映出納粹種族和民族政策的復雜性。奧斯維辛并不是專門用于殺害猶太人的滅絕營，也不僅僅與“最終解決”有關——盡管它后來成為奧斯維辛的主題。奧斯維辛營地的結構和設施一直在變，而這些變化常常與德國人在各個戰場上的戰況密切相關。奧斯維辛，通過其毀滅性的動態發展，成為納粹國家核心價值觀的有形體現。

對奧斯維辛的研究，不僅是讓我們更深刻地洞悉納粹，還可以讓我們了解在歷史最極端的情況下，人類會做出什么。這里所涉及的故事，有不少可以讓我們更好地認識我們自己。

這本書的寫作離不開一些特別的調研，也就是對近百名集中營幸存者和納粹行兇者的訪談。此外，我也參考了此前為另外幾個關于第三帝國的節目所進行的數百場訪談，其中不少受訪對象曾是納粹黨員。[[2]](#_2__Wo_You_Xing_Yu_Wo_De_Zhi_Zuo)與幸存者和行兇者的會面和對談讓我們收獲頗多，他們提供了單憑文字材料很難獲得的更深入的觀點。盡管自學生時代起我就一直對這一時期的歷史感興趣，但真正的深入研究源于1990年與一位前納粹黨員的談話。當時為了編寫和制作一部關于約瑟夫·戈培爾博士的影片，我訪問了威爾弗雷德·馮·奧芬（Wilfred von Oven），他是戈培爾的專屬秘書，是這位臭名昭著的納粹宣傳部長的得力助手。在正式訪談結束后，我們喝著茶，我問這個頭腦聰明而又極富魅力的人：“如果用一個詞來概括你在第三帝國的經歷，你會選哪個詞？”馮·奧芬先生思考著問題的答案，我以為他會提及這個政權犯下的恐怖罪行——對這些罪行他供認不諱——以及納粹主義對世界造成的傷害。“這個嘛，”他最后說道，“如果要用一個詞來總結我在第三帝國的經歷，我會說——天堂。”

“天堂”？在我讀過的歷史書里，沒有任何一本是這么形容納粹時期的。這個詞也不像是出自這位坐在我面前、優雅且通情達理的男人之口。說起來，他的言談舉止根本就不像個納粹黨員。這樣的人怎么會選擇這么一個詞？任何一個有頭腦的人怎么可能這樣評價第三帝國？而20世紀的德國人又為何犯下這樣的罪行？他們畢竟是歐洲文化的核心、一個有著良好教養的民族。多年前的那個午后，這些問題縈繞在我的腦海中，直到今天仍揮之不去。

在我尋找答案的過程中，歷史的兩次偶然幫了大忙。第一，那些曾是納粹一分子的受訪者，在我向他們提問的時候，恰好處在即使公開表達也不會有什么損失的人生階段。早上十五年，作為社會中流砥柱的他們什么也不會透漏。而今天，包括迷人的馮·奧芬先生在內，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都已過世。

我們通常要花上幾個月甚至長達數年的時間，說服他們接受采訪并同意錄像。促使他們最終說出一切的決定性因素為何，我們永遠無法確切知道。但在許多案例中，受訪者明顯感覺到自己的生命已走到盡頭，因此想把自己在那些重大歷史時刻的經歷毫無保留地記錄下來。此外，他們相信BBC不會歪曲他們的觀點。對此我會說，只有BBC才能提供必要的支持，幫我們完成這項事業。這些調研曠日持久，只有一個公共廣播電臺才能做出這樣的承諾。

第二個機緣在于，這項研究恰巧趕上了柏林墻倒塌和東歐劇變。突然之間，我們能接觸到的不僅有調研所需的檔案，還有人。我曾在1989年共產主義時期的蘇聯進行拍攝，那時談及國家歷史，人們基本只能喊喊政治口號。而到了20世紀90年代，壓抑已久的回憶和觀點，一時之間如決堤的洪水般傾瀉而出。在波羅的海諸國，我聽到人們回憶他們如何將納粹視為解放者而夾道歡迎；在卡爾梅克人[[3]](#_3__Kalmyks_Meng_Gu_Wei_La_Te_Re)的大草原上，我獲得了斯大林對整個民族進行報復性驅逐的一手資料；在西伯利亞，我遇見了兩度陷于囹圄的老兵們——一次拜希特勒所賜，另一次則是蘇聯；在明斯克附近的一個小村莊，我偶遇一位女士，她曾參與了現代歷史上最殘酷的游擊戰，回首過去，她認為，紅軍更為可怕，如果不是共產主義的傾塌，所有這些深埋的過去將隨著當事人的離世，最終從這個世界被抹去。

更可怕的，是反猶主義。當我輾轉行走于這些才獲得獨立的國家——從立陶宛到烏克蘭，從塞爾維亞到白俄羅斯，我以為人們會告訴我，他們有多痛恨蘇聯共產主義——這才是他們該有的情緒。而恨猶太人？簡直荒唐可笑，特別是沒有幾個猶太人還住在那兒。看來，希特勒和納粹的工作相當“成功”。然而，波羅的海的一位老人在1941年曾幫助納粹射殺猶太人，而六十年后他仍認為當年的所作所為是正確的。甚至一些曾反對納粹的人也持有狂熱的反猶主義觀點。我仍記得一位烏克蘭老兵在一次午餐時向我提出的問題。他曾作為烏克蘭民族主義者與納粹和蘇軍浴血奮戰，并因此遭到迫害。他問我：“我聽說紐約有個由各國猶太金融家組成的秘密團體，他們打算干掉所有非猶太人政府。你怎么看？”我愣住了。每逢意料之外且毫不掩飾的反猶主義，不是猶太人的我總會陷入震驚。“我怎么看？”我最終答道，“我覺得那純粹是胡扯。”這個老兵抿了一口伏特加。“是么，”他說，“你是這么想的啊。有意思……”

最令我震驚的是，持有這種反猶主義觀點的不僅限于老一輩人。我還記得立陶宛航空柜臺的那位女士。她得知我們正在拍攝的影片主題后說：“你們對猶太人感興趣是不是？記住一點就行了：馬克思是個猶太人。”同樣在立陶宛，一位二十五六歲的年輕軍官帶我參觀了位于考納斯（Kaunas）的一個軍事要塞，1941年，一大批猶太人在這里慘遭屠殺。他對我說：“知道嗎，你漏了更重要的內容，該講的不是我們對猶太人做了什么，而是猶太人對我們做了什么。”我并不是說在我去過的東歐國家中，所有人都持這種態度，認同這些觀點的人甚至都不占多數，然而，這種公然的歧視實在令人不安。

所有認為本書所涉及的歷史與當下無關的人，都應該記住前面寫到的一切。所有認為只有納粹分子甚至只有希特勒才持有極其惡毒的反猶主義觀念的人，也應當認真反思。最危險的想法之一，就是認為歐洲人是在少數瘋子的強迫下心不甘情不愿地犯下了滅絕猶太人的罪行。納粹上臺前，德國社會并不存在所謂的“獨一無二的滅絕傾向”（“uniquely exterminatory”，引自時下最流行的專業術語），否則在20世紀20年代，怎么會有大批猶太人從反猶的東歐逃亡到德國尋求庇護呢？

然而，納粹分子與其他許多極權主義國家的行兇者確實有不同之處，這正是我完成了關于二戰的三個獨立項目后得出的結論。這三個項目各包括一本書及一部電視劇：第一個是《納粹：歷史的警示》（Nazis: The Warning from History）；之后是《世紀之戰》（War of the Century），講述的是斯大林和希特勒之間的戰爭；最后一個是《東方恐怖》（Horror in the East），力圖揭示20世紀30年代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人的精神世界。參與這些項目的經歷帶來了一個意想不到的結果：就我所知，我算是唯一一個與來自德國、日本和蘇聯的大量戰犯都會過面并進行過訪談的人。基于此，我確信我遇見的納粹戰犯與其他戰犯有所不同。

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恐懼感彌漫著整個社會，而希特勒的德國直到戰爭最后階段才發展到這種程度。一位前蘇聯空軍軍官曾向我描述過20世紀30年代的公開會議，那時任何人都可能被指控為“人民的敵人”。他的話我至今難忘。人人都可能在夜半時分被敲門聲驚醒。無論表現得多么順從，無論口號喊得多么響亮，在斯大林時期的蘇聯，一旦你被扔在聚光燈下，你做什么、說什么或想什么全都是徒勞。但在納粹德國，除非身為某個遭受威脅群體中的一員，也就是猶太人、共產主義者、吉卜賽人、同性戀、“不愿工作者”（work-shy），或任何反對現有政權的人，德國人基本可以過著無需憂懼的生活。近期所有學術研究都強調，蓋世太保主要是依靠民眾的告發來執行任務的。[[4]](#_4__Te_Bie_Zhi_De_Yi_Kan_De_Shi)這個結論無可厚非，但更重要的事實是，大部分德國人直到德國快要輸掉戰爭之前，都感到安全和幸福；如果有一場自由和公開的選舉，他們一定會投票給希特勒讓他繼續執政。相比之下，在蘇聯，即使是斯大林最親近、最忠誠的同僚都無法睡上一個安穩覺。

因此，那些遵從斯大林的指示犯下罪行的人，常常干著迫害他人的事，卻不知為何要這樣做。例如，我遇到的一個前蘇聯秘密警察曾把卡爾梅克人五花大綁扔上火車，把他們驅逐到西伯利亞，但他至今不知道政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被問及為什么參與這項行動時，他給出的答案我們并不陌生：這只是“執行命令”。諷刺的是，大家普遍認為這是納粹分子最愛用的借口。這名秘密警察之所以手染鮮血，只因他被要求這樣做，只因他知道如果做不到便會被槍斃，而且他相信領袖做出這樣的決定自有他的理由。當然，這也就意味著，蘇聯解體后，他能夠輕松地忘記過去，讓生活繼續。當然，歷史上不乏斯大林這樣的人物。

我還見過一些日本戰犯，他們曾犯下現代歷史上最駭人聽聞的暴行。在中國，日本士兵剖開孕婦的肚皮，將刺刀刺向她們腹中的胎兒；他們將農民捆起來當練習刺殺的活靶。日本人對成千上萬無辜百姓的凌虐，毫不遜于蓋世太保最殘忍的行為，而日本人的致命醫學實驗遠遠早于門格勒[[5]](#_5__Josef_Mengele_1911__1979__Ao)在奧斯維辛所做的研究。人們可能會以為這些人具有某些“常人無法理解”的特質，但經過調查便會發現，事實并非如此。他們在一個高度軍事化的社會中長大，接受過最嚴酷的軍事訓練，自孩童時代起就一直被灌輸崇拜天皇的思想（天皇也是軍隊最高統帥）。準宗教性本是人之常情，而日本文化在歷史上又不斷強化著這種傾向。我見過的一名日本老兵就很典型，他提到，當自己被命令參與對中國婦女的輪奸時，重點不在于性行為本身，而是他終于被同伴們認可接納，要知道，他們此前可是盡情地欺侮他。與我遇到的那位蘇聯秘密警察一樣，這些日本老兵幾乎毫無例外地會用外部原因為自己的行為辯護，也就是政權本身。

然而，很多納粹戰犯卻不同。書中一位名叫漢斯·弗里德里希的受訪者，他的話可以很好地概括這些納粹分子的想法。弗里德里希曾是帝國東部一支黨衛軍部隊的成員，他承認自己親手射殺過猶太人。直到納粹政權倒臺多年后的今天，他仍不后悔當初的所作所為。他完全可以用“執行命令”或“被政治宣傳洗腦”來為自己辯護，但他內心的信念是如此堅定，以至于拒絕使用這些借口。當年他發自內心地認為槍斃猶太人是正確的，現在也毫不掩飾地表示這一信念從未改變。這無疑是一種可憎的立場，但同時也發人深思。當代研究成果表明，這樣的人并非個例。在奧斯維辛，沒有任何記錄顯示有哪個黨衛隊士兵因拒絕參與屠殺而遭到處罰，卻有大量資料表明，在黨衛隊領導眼中，營地里真正的違規問題是偷盜行為。也就是說，這顯得在屠殺猶太人一事上，普通士兵與領導者是意見一致的，只不過對希姆萊不允許個人從中獲利的做法頗不以為然。一旦被發現手腳不干凈，他們面臨的處罰可能頗為嚴厲——幾乎可以肯定，那要比他們拒絕積極參與屠殺所受的處罰還要重。

與效忠斯大林和裕仁天皇的戰犯相比，納粹行兇者對他們的個人行為負有更大的責任。這份結論不僅基于訪談，也是經過一系列檔案研究，以及與相關學者探討之后所得出的。[[6]](#_6__Ling_Wo_Xin_Xi_Wan_Fen_De_Sh)當然，這只是一個概論，這三個極權政體各自都有非典型的個體，而且彼此也有很多相似之處，比如在進行政治宣傳時，都自上而下地將某種意識形態強加于民眾。但作為概括它是站得住腳的；考慮到黨衛隊接受的嚴格訓練，以及“德國士兵只會機械服從”這一刻板印象，它也能激發人們更進一步的了解。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納粹行兇者對他們的個人行為擁有更大的決定權，他們不僅促成了奧斯維辛的發展，也促成了“最終解決”方案的制定和實施。

在我過去十五年所遇到的納粹行兇者當中，有如此多的人將他們的罪行歸結于內因（“我覺得應該這樣做”）而不是外因（“我被命令這樣做”），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現象。一個不難想到的解釋是，納粹分子精心利用了一些既存觀念，早在阿道夫·希特勒這個人出現以前，反猶主義思想就已經見諸德國社會，許多人有失公允地將德國在一戰中的失敗歸罪于猶太人。實際上，納粹在20世紀20年代初的早期政治運動，與其他民族主義右翼黨派不計其數的政治活動并沒有本質區別。希特勒的首創不是政治思想，而是領導權。20世紀30年代初，大蕭條席卷德國，數百萬德國人自愿投靠納粹黨，以求解救國家之道。1932年大選，投票支持納粹的人沒有一個是被迫的，納粹在完全符合當時法律程序的情況下取得政權。

另一方面，納粹主義的整體信念被如此多的納粹分子內化于心，這與約瑟夫·戈培爾博士的工作密不可分。[[7]](#_7__Can_Jian_Ben_Shu_Zuo_Zhe_Lin)戈培爾大概是20世紀最有影響力的政治宣傳家，人們常以為他不過是個粗淺的好辯者，以《永遠的猶太人》（Der ewige Jude）而臭名昭著——這部納粹宣傳電影將猶太人與老鼠的鏡頭交叉剪輯。但實際上，他的大部分工作要精致得多，也隱蔽得多。只有希特勒才熱衷于像《永遠的猶太人》這種憎惡分明的電影，而戈培爾本人并不喜歡這種小兒科的方式，他更欣賞《猶太人蘇斯》（Jud Süß），這部影片不動聲色地表現了猶太人如何糟蹋一個美麗的“雅利安”女孩。戈培爾所主持的受眾分析（他對這一研究極其癡迷）證明他是對的：更受觀眾喜愛的宣傳電影，用他的話來說，是那些“煽動于無形之間”的影片。

戈培爾堅信，強化觀眾已有的偏見永遠勝過試圖扭轉他們的思想。當迫于形勢需要，不得不嘗試改變德國人的看法時，戈培爾的策略是“像護航隊一樣前行——永遠與最慢的船艦保持一致”。[[8]](#_8__Laurence_Rees___Tui_Xiao_Zhe)他采取不同的隱蔽手段，反復重申他希望受眾接受的觀點。在此過程中，他很少直白地表達思想，而是通過圖像的展示和故事的講述，引導德國民眾得出他想要的結論，并讓他們以為這些結論完全是他們自己的想法。

20世紀30年代，希特勒并不經常違背人民大眾的意愿，強制推行他的政治政策，這一點深得戈培爾贊許。納粹無疑是個激進的政權，但它更看重民眾的共識，而它最需要的行動力，很大程度上來自人們自下而上的主動合作。所有這些都意味著，在屠殺猶太問題上，納粹黨每一步都走得十分謹慎。雖然仇視猶太人是希特勒的一個核心思想，但他在20世紀30年代初的選舉中并沒有公開推行這一政策。他從未掩飾過自己的反猶主義傾向，但他和其他納粹高層有意強調了其他政策，例如他們希望“糾正”《凡爾賽條約》，讓失業者重返工作崗位，重建德國人的民族自豪感。希特勒當選總理不久，針對德國猶太人的暴力源源不斷地出現，納粹沖鋒隊員精心利用這些事件，推波助瀾，使其發展到更大規模。這期間還出現了對猶太人商店的聯合抵制（它得到戈培爾這位熱情的反猶主義者的支持），但抵制運動只持續了一天時間。納粹領導人對國內外的社會輿論都格外關注，尤其不希望他們的反猶主義態度使德國成為一個被排斥的國家。此后的兩次反猶高潮，標志著戰前納粹迫害猶太人的兩個重要歷史時刻：一是1936年《紐倫堡法案》的實施，它剝奪了德國猶太人的公民權；另一個是1938年的“水晶之夜”，這一晚猶太會堂遭到焚毀，成千上萬的猶太人被逮捕。但總體看來，納粹推行反猶政策的步伐是平緩而漸進的，20世紀30年代，許多猶太人仍試圖留在希特勒統治下的德國生活。納粹的反猶宣傳按照戈培爾所謂的“護航隊最慢船艦的速度”進行（尤利烏斯·施特萊歇爾[Julius Streicher]這樣的極端狂熱分子和他的激進反猶刊物《先鋒報》[Der Stürmer]是個例外），那兩部公開反猶的電影《永遠的猶太人》和《猶太人蘇斯》，都是戰爭爆發以后才上映的。

逐步升級的反猶行動，這種觀點與一般人的看法相悖。通常認為，納粹在某個特殊時刻，做出了“最終解決”和建造奧斯維辛毒氣室這樣的重大歷史決定。這種想法可以理解，但分析這段歷史遠非這么簡單。在距焚尸爐僅數米遠的地方修建軌道，通過火車把一個個猶太家庭載向死亡，這種復雜的屠殺手段經過數年的精心設計才成熟。納粹政權實踐了一位歷史學家提出的著名概念：“累積式激進主義”（cumulative radicalisation）[[9]](#_9__Zhe_Ge_Gai_Nian_Zui_Zao_You)，也就是說，每一個決定通常會導致之后更激進的決定。1941年夏發生在羅茲（Łódź）猶太人隔離區的食物危機便是一個典型例子，可以說明歷史事件如何相互影響，最終促成災難。這一危機使得一位納粹官員提出：“用一些簡便快捷的辦法解決那些不再適合工作的猶太人，或許還算人道。”[[10]](#_10__Jian_Ben_Shu)因此，滅絕猶太人的方案出于“人道主義”被提上日程。不要忘了，恰恰是此前納粹領導層制定的政策，才造成了羅茲猶太人隔離區的食物危機。

這并不意味著希特勒可以不為他犯下的罪行負責——無疑他逃脫不了責任，而且，比起簡單地在某天召集下屬，強迫他們執行命令，希特勒的做法更加陰險。所有納粹將領都知道，他們的元首在制定政策時最看重的一點便是：激進。希特勒曾經說過，他希望他的軍官都能像“被皮帶緊緊拴住的狗”一樣（可惜他的軍官常常辜負這種期望）。他對激進的狂熱，加上他喜歡任命兩個人完成大致相同的任務、從而在納粹領導層中間激起激烈競爭的做法，導致這一政治和行政體系中充滿斗志，同時具有高度的內在不穩定性。所有人都知道希特勒有多痛恨猶太人，所有人都聽過他1939年在德國國會大廈進行的演講，在此次演講中，他預言如果歐洲的猶太人“引發”一場世界大戰，那么他們將面臨被“滅絕”的命運。因此，納粹領導層的每個人都很清楚，對待猶太人他們該提出什么樣的政策，那就是越激進的越好。

二戰期間，希特勒絕大部分精力和心思都放在了一件事上：努力贏得戰爭。他花在猶太人問題上的時間遠遠少于制定復雜的軍事策略。希特勒對猶太人的態度，或許可以體現在他向但澤（Danzig）、西普魯士（West Prussia）和瓦爾特（Warthegau）三個地區的大區長官（Gauleiter）下達的指示中。他告訴他們希望這些地區日耳曼化，并說只要他們完成這個任務，他保證“不過問”他們是如何做到的。不難想象，1941年12月希特勒以同樣的口吻對希姆萊說，他希望猶太人“滅絕”，且“不過問”希姆萊如何實現這一目標。當然，我們無法確知他們之間的對話是否真的如此，因為戰爭時期希特勒一直謹慎地通過希姆萊這個中間人來執行“最終解決”。希特勒十分清楚納粹將要犯下的罪行的嚴重性，因此不希望留下任何記錄，證明自己與這些罪行有關。然而，證據無處不在，比如希特勒公開發表的仇視言論，還比如每當希姆萊與希特勒在其位于東普魯士的總指揮部會面后，對猶太人的迫害和謀殺便會愈發激進。

我很難準確地描述，納粹領導層對效忠于一個敢于追求宏大夢想的人有多么興奮：希特勒的夢想是在幾周之內擊敗法國，而一戰期間德國曾與法國周旋了數年時間。這個夢想希特勒實現了。他還夢想著戰勝蘇聯，在1941年夏秋之際，看形勢他幾乎一定會贏。他也夢想著消滅猶太人，而在某種程度上，這是最容易完成的一件任務。

希特勒的目標都十分宏遠，同時從本質上來說，它們也都是破壞性的，而“最終解決”是最具毀滅性的構想。值得注意的是，1940年，有兩位納粹人士分別承認大規模屠殺不符合他們所認同的“文明”價值觀，但后來他們卻成為制定和執行“最終解決”策略的關鍵人物。海因里希·希姆萊寫道：“‘從肉體上消滅一個民族’‘本質上來說非常不德國’。”而萊因哈德·海德里希也表示過：“生物滅絕對德國這樣一個文明國家來說，是很不體面的行為。”[[11]](#_11__Yin_Zi_Gotz_AlyDe_Zhu_Zuo)但在之后的十八個月內，“從肉體上消滅一個民族”卻一步步地變成他們擁護的政策。

追溯希特勒、希姆萊、海德里希和其他納粹領導人如何逐步決定建造奧斯維辛并執行“最終解決”，有助于我們了解一個不斷變化、激進且極其復雜的決策過程是如何展開的。在這過程中并沒有一個自上而下強制執行的計劃，也不存在一個自下而上提出、最終得到批準的方案。沒有哪個納粹分子是遭到威脅被迫進行屠殺的。不，這是一項由成千上萬的人共同經營的事業，決定是他們自己做出的，不僅參與而且積極主動地尋找辦法，以解決如何殺戮人類同胞、如何處理他們尸體的問題——因為殺害人數之多、規模之大，是史無前例的。

審視納粹和納粹的迫害對象如何走上各自命運的歷程，我們更深刻地了解到人的境況。而我們所看到的大多并非善事。在這段歷史中，苦難從未得到補償。盡管在極少數情況下，個別高尚之士做出了正義的選擇，但大多數人的做法為人所不齒。我們無法不同意埃爾澤·巴克（她八歲時就被送往奧斯維辛）的結論：“人類的墮落沒有底線。”如果說還有一線希望，它來自家庭賦予人們的堅持下去的力量。一些被送往集中營的人之所以敢于做出英勇的舉動，為的是他們的父母、兄弟、姐妹和子女。

然而，最重要的或許是，奧斯維辛和納粹的“最終解決”證實了一個事實：人的處境（situation）對個人行為的影響遠遠超出我們的想象。這在托伊·布拉特身上有所體現。作為死亡集中營里最堅強、最勇敢的幸存者之一，他被納粹強迫在索比堡滅絕營工作，隨后冒著生命危險逃了出來。“人們問我，”他說，“‘你學到了什么？’我想我只能確定一件事：沒人真正了解自己。你在大街上遇見一個和善的人，你問他：‘北街怎么走？’他陪你走了半個街區，給你指路，態度親切。可是在另一種環境下，同一個人可能變成最可怕的虐待狂。沒人了解自己。每個人都可能在這些（不同的）處境之下變成好人或壞人。有的時候，碰上對我特別和善的人，我忍不住會想：要是把他放在索比堡，他會變成什么樣呢？”[[12]](#_12__Jian_Ben_Shu)

我從幸存者（老實說，還有納粹戰犯）那里學到的是，人類的行為是如此易變和不可預知，常會被他們身處的環境所左右。當然，人們可以自行決定采取什么樣的行為，但對很多人來說，個人處境是影響這些決定的關鍵因素。甚至一些不同尋常的人——比如阿道夫·希特勒，看似能掌控自己的命運，實際很大程度上也是在對之前的處境做出回應。希特勒在一戰前只是個無足輕重的流浪漢，經過一戰這場完全不受他掌控的世界性沖突，他才轉變成我們所熟悉、歷史上的那個希特勒。所有相關領域我認識的專家學者，無一不認為若沒有一戰的經歷，以及德國戰敗帶給希特勒的強烈痛苦，他根本不可能成為后來的風云人物。因此，我們的結論不是“沒有一戰，希特勒就當不上德國元首”，而是“沒有一戰，就沒有人會變成歷史上的那個希特勒”。當然，希特勒自己決定了他會采取哪些行動（正因他的這些個人選擇，后人對他的批評譴責毫不過分），但若沒有那個特定的歷史情境，也就沒有后來的他。

這段歷史還告訴我們，如果說個人的行為會受到環境影響，那么一群人的共同努力可以創造出更好的文化，反過來提升個體的道德。丹麥人救助猶太人，并在戰爭結束、猶太人返回時給予他們最熱烈的歡迎，便是一個極好的例證。丹麥文化尊重人權，這一廣為接受的文化觀念幫助絕大多數丹麥人做出了高尚的選擇。但我們也不能對丹麥人抱有過于浪漫的想象，不受他們控制的情境因素同樣起了很大作用。這些因素包括納粹抓捕丹麥猶太人的時間（當時德國人明顯已經快要輸掉戰爭），以及這個國家的地理位置（逃跑相對容易，可以穿過比較狹窄的水域，逃到中立的瑞典）。此外，納粹并沒有盡全力驅逐這里的猶太人。盡管如此，我們仍有理由相信，為防止再有與奧斯維辛類似的慘劇出現，一個方法是匯聚個體的力量，促使社會的文化觀念抵制此類暴行。納粹公開宣揚的達爾文主義思想，教導每個“雅利安”德國人說他們的人種更加優越，卻顯然造成了完全相反的效果。

最后，不得不說，談起這個話題，我們永遠都無法回避那股強烈的悲傷。在整個項目進行過程中，最響亮的呼聲來自那些我們無法訪問的人，也就是110萬名死在奧斯維辛的受害者。特別是20多萬名兒童，他們幼小的生命在那里枯萎，被剝奪了長大成人、體驗人生的機會。有一個場景在我腦海中揮之不去，那是關于“嬰兒車隊列”的描述：空空的嬰兒車每五個排成一排，被推出奧斯維辛，朝火車站方向而去——它們都是從死去的猶太人那里掠奪來的財產。目睹這一幕的囚犯說，他們用了足足一小時才走過這一隊列。[[13]](#_13__Yin_Zi_Qian_Na_Cui_Qiu_Fan)

這些坐在嬰兒車里被推進奧斯維辛，與他們的父親、母親、兄弟、姐妹、叔叔、嬸嬸一同死去的孩子，是我們應該永遠記住的人。謹以此書紀念他們。

[[1]](#filepos55388) BBC在2004年做了一個受眾調查，考查人們對奧斯維辛了解多少、如何評價。調查結果顯示，絕大多數聽說過集中營的人認為，集中營是為了滅絕猶太人而建的。

[[2]](#filepos57178) 我有幸與我的制作團隊一起完成了過去的這些項目，我對他們感激不盡。特別要感謝Tilman Remm，Detlef Siebert，Martina Balazova和Sally Ann Kleibal非常出色的研究。

[[3]](#filepos60539) Kalmyks，蒙古衛拉特人的后裔，主要居住在伏爾加河下游里海西北沿岸、卡爾梅克自治共和國境內（除特別標明，本文頁下注均為譯注）。—譯注

[[4]](#filepos65723) 特別值得一看的是Robert Galletely的著作《蓋世太保和德國社會》（The Gestapo and German Society, Clarendon Press 1990）。

[[5]](#filepos67442) Josef Mengele（1911—1979），奧斯維辛集中營臭名昭著的醫生，負責對新來囚犯進行生死篩選，并利用犯人進行人體實驗。

[[6]](#filepos69973) 令我欣喜萬分的是，閱讀喬納森·格洛佛（Jonathan Glover）的巨著《人性——一部二十世紀道德史》（Humanity : a Moral Histor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Pimlico 2000）時我發現，在這個問題上，這位杰出的哲學家曾在進行文本研究后得到大體相同的結論。

[[7]](#filepos71834) 參見本書作者另一本著作《推銷政治》（Selling Politics, BBC Books 1992），該書詳細剖析了戈培爾的做法。

[[8]](#filepos73037) Laurence Rees，《推銷政治》；尤其應注意對Wilfred von Oven的訪談。

[[9]](#filepos76117) 這個概念最早由德國歷史學家Martin Broszart提出。

[[10]](#filepos76587) 見本書。

[[11]](#filepos80354) 引自Götz Aly的著作《最終解決：納粹人口政策與對歐洲猶太人的屠殺》（Final Solution: Nazi Population Policy and the Murder of the European Jews, Hodder Arnold 1999）， 第3頁。

[[12]](#filepos83005) 見本書。

[[13]](#filepos86277) 引自前納粹囚犯Wanda Szaynok和Edward Blotnicki的證詞，見Andrzej Strzelecki“對受害者財物的掠奪”（Plundering the Victims’ Property），載于《奧斯維辛1940—1945，集中營歷史的核心問題》（Auschwitz1940—1945, Central Issu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Camp）第二卷，奧斯維辛-比克瑙國立博物館2000年，第164頁。

# 第一章 意想不到的開端

1940年4月30日，黨衛隊高級小隊領袖魯道夫·霍斯（Rudolf Höss）實現了一個宏大的抱負。時年39歲的他，為黨衛隊工作了六年之后，被任命為新帝國首批集中營的指揮官之一。在這個春光明媚的日子里，他來到一個小鎮就職。八個月前，這里還屬于波蘭西南部，現在它已歸屬德國上西里西亞地區。在波蘭語中，這個小鎮的名字是“Oświęcim”，而在德語里，它叫“Auschwitz”，即奧斯維辛。

盡管霍斯被提拔為指揮官，但他轄下的這個集中營其實尚不存在。它將由數個破敗不堪、蛀蝕嚴重的前波蘭軍隊營房改建而成，而霍斯需要親自監督施工過程。這些營房位于小鎮邊緣地帶，散布在一個馴馬場四周，周圍環境極其壓抑。平坦的褐色土地位于索拉河和維斯瓦河之間，這里氣候潮濕，不利于健康。

沒有人在那一天能預見到，魯道夫·霍斯當然也不例外，短短五年之內，這個集中營將成為史上最大規模集體屠殺的發生地。奧斯維辛的轉變是由一系列決定促成的，講述這一人類歷史上最令人震驚的決策過程，可以幫助我們更深入地洞悉納粹國家的運作。

誠然，阿道夫·希特勒、海因里希·希姆萊、萊因哈德·海德里希和赫爾曼·戈林等納粹領導人做出的決定，最終導致100多萬人在奧斯維辛慘遭滅絕，但這一罪行得以實施有一個重要前提，那就是更多像霍斯這樣的次級官員他們所持有的態度。沒有霍斯對這塊至今未在地圖上標出之地的領導，沒有他對規模如此巨大的屠殺行動的組織，奧斯維辛就永遠不會發揮它后來所發揮的作用。

從外表看，魯道夫·霍斯幾乎沒有任何特別之處。他中等身材，相貌平平，有著深色的頭發。他不丑，也算不上特別英俊，美國律師惠特尼·哈里斯（Whitney Harris）曾在紐倫堡審判中盤問過霍斯，用他的話來說，霍斯是“一個普通人，就像一家雜貨店的店員”。[[1]](#_1__BBCFang_Tan)一些曾關押在奧斯維辛的波蘭囚犯也同意這個描述，據他們回憶，霍斯話不多，很少情緒失控，是那種你每天走在街上都會碰到、根本不會多看一眼的家伙。也就是說，霍斯與人們心目中面紅耳赤、口沫橫飛的黨衛隊惡魔形象相去甚遠。然而這恰恰意味著，他是一個更可怕的人。

奧斯維辛火車站對面有家賓館，在黨衛隊官員被安排搬進集中營內合適的住處之前，這里就是他們的落腳之處。霍斯在這里放下他的行李，同時也做好了將自己的一生奉獻給民族事業的思想準備。與大多數忠誠的納粹分子一樣，德國過去25年來的歷史形塑了霍斯的性格和信念，那也是這個國家最動蕩不安的一段時期。霍斯1900年生于黑森林一個天主教家庭，父親嚴厲專制、強調服從，童年的經歷對他產生了深遠影響。他在一戰期間參軍，成為德國軍隊中最年輕的士官之一，后來的戰敗讓他有種強烈的被出賣的感覺。20世紀20年代初，他加入了半軍事組織自由兵團（Freikorps），在德國邊境抵抗“共產主義威脅”。1923年，他因參與了右翼暴力政治運動被捕入獄。

許多納粹分子都有著類似的人生軌跡，其中就包括阿道夫·希特勒。他也有一位專制的父親[[2]](#_2__Wo_Men_Dang_Ran_You_Quan_Zhi)，也參加了一戰（而且與霍斯一樣，也被授予鐵十字勛章），對那些在他看來導致德國戰敗的人，他同樣懷有強烈的恨意。就在霍斯參與一起政治謀殺的同一年，希特勒試圖通過啤酒館暴動奪取政權。

對希特勒、霍斯和其他右翼民族主義者來說，當務之急是弄清楚德國為什么戰敗，又為什么簽署如此喪權辱國的和解協議。在戰爭剛結束的那幾年，他們自認為找到了答案：猶太人顯然應該對此負責。他們指出，瓦爾特·拉特瑙這個猶太人出任了戰后新成立的魏瑪共和國的外交部長。此外，1919年春，一個短命的蘇維埃共和國在慕尼黑成立，其領導層大多是猶太人，在他們看來，這證實了猶太人和人們所懼怕的共產主義之間存在著確鑿的聯系。

雖然大批忠誠的德國猶太人在戰爭中浴血奮戰（且許多人犧牲），但這不重要；雖然成千上萬德國猶太人既不是左翼分子也不是共產黨員，但這也不重要。希特勒和他的追隨者毫不費力地就把德國的猶太人打成替罪羊，讓他們為德國的困境負責。在此過程中，剛剛組建的納粹黨利用了德國人多年來的反猶情緒。從一開始其追隨者就聲稱，他們對猶太人的仇視并不是出于無知的偏見，而是基于科學的事實：“我們之所以要打擊他們（指猶太人），是因為他們為各個族裔的人群帶去了‘種族結核’（a racial tuberculosis of nations）”，這段話出現在1920年印制的最早那批納粹宣傳海報上，“我們確信，只有這些病菌被徹底消除，民族的復興才能夠實現”。[[3]](#_3__Yin_Zi___Da_Hao_Ji_Zhong_Yin)對猶太人的這種偽科學攻擊對霍斯等人產生了巨大影響，他們聲稱自己對粗淺、暴力、近乎色情的反猶主義觀點頗不以為然，后者正是另一位納粹分子尤利烏斯·施特萊歇爾在其刊物《先鋒報》中所宣揚的觀念。“《先鋒報》的狂熱給反猶主義的發展造成了不利影響”，納粹倒臺后，霍斯在獄中這樣寫道。[[4]](#_4__Lu_Dao_Fu__Huo_Si____Ao_Si_W)在他看來，他自己的方法總是更冷靜，也更“理性”。霍斯說他幾乎從沒與哪個猶太人發生過爭執，對他來說問題在于“猶太人的國際陰謀集團”——他認為各國猶太人秘密地執掌大權，他們不顧國家立場為彼此提供幫助。在霍斯看來，這就是德國在一戰中失敗的原因，也是他必須摧毀的：“作為一名充滿熱情的民族社會主義者，我堅信我們的理念會逐步被接受，并傳播到世界各地……猶太人霸權也將因此被摧毀。”[[5]](#_5__Huo_Si____Zhi_Hui_Guan_____C)

霍斯在1928年獲釋后，又接受了另一個右翼民族主義者普遍持有的觀念，即對土地的熱愛，這點與反猶主義一樣都是納粹運動的特點。猶太人之所以遭到憎恨，一個原因是他們大多居住在城市（用戈培爾的話來說，猶太人因他們的“柏油文化”[asphalt culture]而遭到鄙視），而“真正的”德國人永遠不會喪失對自然的熱愛。希姆萊本人學的是農業，奧斯維辛曾一度被用作農業研究基地，這些都并非偶然。

霍斯曾加入“阿塔曼那”（Artamans），這是當時在德國十分活躍的農業公社組織。在那里，他遇見了他后來的妻子并安頓下來，打算當一名農民。隨后，改變他一生的時刻到了：1934年6月，希特勒的警察頭子希姆萊邀請他放棄務農，做一名全職的黨衛隊隊員。由精英分子組成的黨衛隊（SS，全稱Shutzstaffel）在成立之初本是元首的私人衛戍部隊，現在，他們的眾多職責又多了一項，即管理集中營。[[6]](#_6__Zai_Ci_Qian_Yi_Nian__Ye_Jiu)希姆萊與霍斯相識已有一段時間，對他頗為賞識。霍斯是一名老黨員，他在1922年11月就加入了納粹黨，黨員編號是3240。

霍斯可以做出選擇，沒人強迫他，實際上沒有任何人是被強迫加入納粹黨衛隊的。而他選擇加入。他在自傳中為這一決定給出了以下原因：“因為我有可能迅速升職并得到相應加薪，所以我覺得自己必須邁出這一步。”[[7]](#_7__Huo_Si____Zhi_Hui_Guan_____D)其實這不是全部真相。不難想象，在這部寫于納粹倒臺后的自傳中，霍斯省略了對他來說最重要的決定因素，也就是他當時的心情。1934年的霍斯，應感到自己正在見證一個美好新世界的誕生。希特勒當權已有一年時間，納粹黨正在積極打壓內部敵人，包括左翼政治家、不愿工作者、反社會人士和猶太人。在整個國家，不屬于這幾個危險群體的德國人對身邊發生的變化持歡迎態度。曼弗雷德·馮·施羅德的感受非常有代表性，他是漢堡一位銀行家的兒子，1933年加入納粹黨，他說：“周圍一切都重新恢復了秩序，變得干凈整潔。我有一種民族解放的感覺，這是一個新的開始……人們都說：‘這是場革命，雖然它是一場人們沒有想到的、和平的革命，但畢竟是一場革命。’”[[8]](#_8__BBCFang_Tan)霍斯此時有機會參與這場革命，這是一場他在一戰結束后就一直祈禱能夠發生的革命。選擇加入納粹黨衛隊，意味著獲得地位、特權、興奮感以及一次影響新德國發展進程的機會。而選擇當個農民，就意味著一生都是農民。霍斯做出這樣的決定難道令人驚訝嗎？因此，他接受了希姆萊的邀請，于1934年11月抵達位于巴伐利亞的達豪，以集中營守衛的身份開始了他的黨衛隊生涯。

今天，人們對納粹國家不同集中營的用途經常混淆，至少在美國和英國是這樣。達豪這樣的集中營（達豪建于1933年3月，即阿道夫·希特勒成為德國元首后不到兩個月）從概念上便與特雷布林卡這種在戰爭期間才建成的滅絕營不同。而聲名狼藉的奧斯維辛有著極其復雜的歷史，既是集中營又是滅絕營，這讓許多人更加迷惑。只有弄清兩者之間的重要區別，才能理解20世紀30年代的德國人為何認為達豪等集中營的存在是合理的。在所有接受我們拍攝的德國人當中，沒有一個（包括當年狂熱的納粹分子）公開表示他們對滅絕營的存在“滿懷熱情”，但很多人在20世紀30年代對于集中營的存在感到相當滿意。他們剛剛熬過了大蕭條這場噩夢，并且自認為見證了民主沒能拯救德國、反而讓德國陷入低谷的歷史。共產主義幽靈仍然存在。在20世紀30年代初的大選中，德國似乎分裂成兩個極端，一方面，有相當數量的人投票支持共產黨，另一方面，對曼弗雷德·馮·施羅德這些支持納粹1933年“和平革命”的人來說，歷史上類似的情況可以證明集中營存在的必要性：“做個巴士底獄里關著的法國貴族可不是件讓人高興的事，不是嗎？是有很多集中營，但那個時候每個人都說：‘哦，這是英國佬在南非為對付布爾人發明的。’”

1933年3月被關進達豪集中營的第一批囚犯大部分是納粹的政敵。雖然早在那時猶太人就已經開始遭到嘲諷、侮辱和痛打，但曾服務于前一個政權的左翼政治家對納粹來說是更直接的威脅。[[9]](#_9__Dang_Ran__Yi_Bu_Fen_Zheng_Zh)霍斯抵達達豪后，堅定地認為“國家真正的敵人必須嚴加看管”[[10]](#_10__Huo_Si____Zhi_Hui_Guan)，接下來在達豪度過的三年半時間對他的性格塑造起到了決定性作用。在集中營首任指揮官西奧多·艾克（Theodor Eicke）的精心設計下，達豪集中營的管理制度不僅殘酷無情，更能摧毀囚犯的意志。艾克將納粹對其敵人的暴力和恨意融進了體系和秩序之中。達豪因身體虐待而出名，鞭笞和其他形式的毆打是家常便飯。囚犯有可能被活活打死，而他們的死會被說成“試圖越獄時被擊斃”而不予追究。送往達豪的不少犯人（雖然不到半數）沒能活著出來，然而，達豪真正的殺傷力還不在肉體虐待，盡管這已經非常恐怖，但更可怕的是精神折磨。

與普通監獄不同，達豪集中營首創的一個做法是，犯人完全不知道自己要被關押多長時間。20世紀30年代達豪的大部分囚犯約在一年后獲釋，但每個犯人刑期具體有多長完全由管理者拍腦袋決定。對囚犯來說，他們沒有一個結束日期可以用來盼望，只有無盡的不確定感，不知自由會在明天到來，還是下個月或下一年。作為一個忍受過數年牢獄之苦的人，霍斯馬上就明白了這一政策的可怕之處：“不知道刑期的長短讓他們難以忍受眼下的生活。”他寫道：“它可以讓最堅定的意志也一點點被消磨和摧毀……僅這一點就足以讓他們在營中的日子生不如死。”[[11]](#_11__Huo_Si____Zhi_Hui_Guan)

守衛玩弄囚犯的做法加劇了這種不確定感。約瑟夫·弗爾德（Josef Felder）是魏瑪時期國民議會的社會民主黨黨員，曾是達豪首批囚犯之一。他回憶道，在自己情緒最低落的時候，他的看守拿來一條繩子，向他演示如何把繩子結成最結實的套索來吊死自己。[[12]](#_12__BBCFang_Tan)靠著極強的自制力以及不斷告訴自己“我還有家人”，他才戰勝了采納這一建議的沖動。囚犯被要求保持房間和衣物高度整潔，而黨衛隊看守的定期檢查提供了一個不斷挑毛病的機會。他們還可以隨心所欲地編造違規行為，借此處罰整個營房的囚犯。每個囚犯都可能被“關禁閉”，并被要求平躺在床鋪上，在數天時間里不能發出聲音也不能動。

達豪還實行“卡波”制度，這一制度后來被各個集中營采用，并在奧斯維辛的運作中扮演了重要角色。（“Kapo”這個詞似乎源于意大利語中的“capo”，意思是“頭兒”。）集中營的管理者從每個片區或每個“工作小分隊”中選出一名囚犯擔任“卡波”，卡波對他的獄友們有極大的控制權。毫無疑問，權力常被濫用。由于卡波與其他囚犯朝夕共處，因此，他們幾乎比黨衛隊守衛有更多的機會肆意妄為，把營中的生活變得讓人無法忍受。然而，如果這些卡波不能讓他們的黨衛隊主子滿意，他們自己也面臨著危險。如希姆萊所說：“他（卡波）的工作是確保該完成的都完成了……所以他需要給他手下的人施加壓力。一旦我們對他不再滿意，他就當不了卡波，要回到其他囚犯中去。他知道回去的頭一個晚上，其他人就會把他揍死。”[[13]](#_13__Yin_Zi_Danuta_CzechDe_Wen_Z)

在納粹分子看來，營中的生活是外面世界的一個縮影。“斗爭是跟生命一樣古老的話題，”希特勒早在1928年的一次演講中就說過，“在斗爭中，強者和有能力者生存，弱者和無能之輩淘汰。斗爭是萬物之父……人類能活下來、能保護自己免遭其他動物的侵害，靠的不是人道主義原則，而是最嚴酷的斗爭。”[[14]](#_14__Laurence_Rees___Na_Cui__Li)這種“類達爾文主義”態度是納粹主義的核心思想，在集中營的管理中體現得十分明顯。例如，卡波對受他管控的囚犯“虐待有理”，只因為他在人生的“斗爭”中證明了自己強于其他獄友。

霍斯在達豪學到的最重要一課，就是納粹黨衛隊的基本哲學。西奧多·艾克從一開始就一直在宣揚一個原則——冷酷：“如果有人對他們（指囚犯）表現出哪怕只有一丁點兒的同情，那請你馬上從我們的隊伍中消失。我需要的是強硬的、全身心投入工作的黨衛隊成員，我們不需要心軟的人。”[[15]](#_15__Yin_Zi_Franciszek_Piper__Da)因此，任何一種形式的同情和悲憫都是弱者的表現。如果有哪個黨衛隊隊員感到自己正被這種情緒影響，那就意味著他的敵人成功地蒙騙了他。納粹的政治宣傳給人們灌輸的思想是，敵人常會潛伏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當時有很多人都讀過一本名為《毒蘑菇》（Der Giftpilz）的反猶主義兒童讀物，這本書用那些表面美麗、實際有劇毒的蘑菇來進行比喻，警告讀者提防猶太人內在的危險性。因此，在很多時候，比如看到一名囚犯遭到毒打，即使產生了惻隱之心，他們也會鄙視自己的這種感情。他們接受的教育是，任何憐憫都是中了犯人詭計的表現。作為“國家的敵人”，這些狡詐的家伙會用盡各種方法實現自己邪惡的目標，其中就包括誘使關押他們的人對他們投以同情。人們對“背后一刀”的故事（傳說猶太人和共產黨在后方密謀合作，從而讓德國輸掉了一戰）記憶猶新，而且它與敵人危險而隱蔽的形象完全相符。

對納粹黨衛隊來說，唯一毋庸置疑的就是上級下達給他們的指令。如果上級要求囚禁某人或處決某人，那么即便執行者無法理解這一命令，它也一定是正確的。面對無法馬上理解的指令，唯一可以避免自我懷疑的方法便是保持冷酷，因此這個特質被黨衛隊奉為圭臬。“我們必須像花崗巖一樣冷酷，否則我們元首的心血就白費了。”[[16]](#_16__Yin_Zi_Jonathan_Glover___Re)萊因哈德·海德里希，這個除希姆萊之外在納粹黨衛隊中最有權力的人這樣說道。

在學著消除同情和憐憫這類情感的同時，霍斯還逐漸被黨衛隊隊伍中強烈的兄弟情誼感染。一名黨衛隊隊員知道，自己被派去完成的某項任務是“弱者”無法勝任的，他必須依賴其他伙伴的支持，由此，一種強有力的團隊精神（esprit de corps）得以形成。無條件的忠誠、冷酷無情、保衛帝國免遭內部敵人攻擊——納粹黨衛隊這些基本的價值觀幾乎成了宗教信仰的替代品，變成一種獨特而易于接受的世界觀。“我對黨衛隊給我的指導充滿了感激，”約翰尼斯·哈瑟布克說道，他是另一個納粹集中營的指揮官，“我們都很感激。在我們加入組織之前，很多人都特別困惑。我們不明白周圍發生了什么，一切都顯得那么混亂。黨衛隊給我們提供了一系列簡明易懂的觀點，我們也篤信不疑。”[[17]](#_17__Yin_Zi_Glover___Ren_Xing)

霍斯在達豪學到的另外一點后來也用在了奧斯維辛：他發現，由于黨衛隊給囚犯們安排了工作，這些犯人更容易忍受他們的牢獄生活。他回想起自己在萊比錫坐牢的日子，記得正是因為有工作可做（他的工作是用膠水粘紙袋子），他才能夠用一種相對比較積極的心態面對每一天。在達豪，他看到工作發揮了同樣的作用，它讓犯人“更加自律，從而能夠更好地抵抗牢獄生活帶給他們的沮喪感”。[[18]](#_18__Huo_Si____Zhi_Hui_Guan)霍斯對工作在集中營里起到的緩解作用是如此深信不疑，以至于他把原本在達豪使用的標語“Arbeit macht frei”（勞動使人自由）刻在了奧斯維辛入口處的大鐵門上方。

霍斯是納粹黨衛隊中的模范，他在達豪平步青云，1936年4月被選為指揮官助理；接著，1936年9月，他被升為中尉，并調至薩克森豪森集中營任職；1940年春前往波蘭西南部，成為新集中營奧斯維辛的指揮官。造就霍斯的，當然有父母給他的基因，但那個時代和六年集中營守衛的經歷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他。他感到自己準備好了，可以迎接更大的挑戰，也就是為新成立的納粹帝國建造一個模范集中營。他自認為很清楚自己該做什么，也清楚建造這個集中營的目的為何。達豪和薩克森豪森為他提供了很好的榜樣進行參照。然而，他的上級另有打算。在接下來的幾個月乃至幾年時間里，霍斯在奧斯維辛建造的這個集中營將沿著非常不同的道路發展。

就在霍斯著手開始他在奧斯維辛的工作時，西北方向250英里以外，他的上級正在進行一項極不尋常的任務：為元首撰寫一部備忘錄。海因里希·希姆萊坐在柏林，謹慎地寫下這樣一個標題：“關于如何處理東部外來人口的一點思考”。希姆萊作為納粹國家最狡詐的權力掮客，深知將想法付諸筆頭往往是不明智的做法。納粹高層經常口頭傳達各種政策。希姆萊知道，一旦他的觀點變成書面文字，就有可能被他的對手拿去仔細剖析。與所有納粹領導人一樣，希姆萊有許多敵人，他們總伺機從他手中奪取部分權力為己所用。然而1939年秋天以來，一直被德國占領的波蘭出現了一些新的狀況，希姆萊感到，這次需要破例為希特勒準備一份書面文件。在所有關于納粹種族政策的文件中，他所寫就的這份文檔是最為關鍵的一份，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希姆萊白紙黑字地解釋了奧斯維辛這個新建成的集中營是在什么樣的歷史語境下發揮其作用。

彼時，作為“德意志民族強化委員會”帝國專員（Reichs-kommisar für die Festigung des deutschen Volkstums），希姆萊參與了種族重組行動，其規模之大、速度之快超出了任何一個國家的想象。問題也接踵而來。希姆萊和他的同僚并沒能給波蘭——這個在納粹眼中一無所是不屑一顧的國家——帶去秩序，反而只增添了暴力和混亂。

納粹內部對波蘭人的基本態度并無分歧：嫌惡。存在爭議的是如何處置他們，其中最重要的“問題”是，要如何處置波蘭的猶太人。德國的猶太人還不到總人口的1%（1940年大約是30萬人），而且大部分已經被德國社會同化；而波蘭有300萬猶太人，大部分居住在猶太人社區，大胡子，穿著打扮、一舉一動都帶有猶太教的味道，這使得他們非常容易辨認。戰爭爆發后，波蘭旋即被德國和蘇聯占領（基于納粹和蘇聯于1939年8月秘密簽訂的《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其中的一個后果便是，超過200萬波蘭猶太人現在生活在納粹占領的區域。該如何處置這些人？

納粹所面臨的另一個自找的麻煩，就是為成千上萬正在前往波蘭的德意志人尋找住所。根據德國和蘇聯簽訂的協議，波羅的海國家、比薩拉比亞（羅馬尼亞北部）和其他現為斯大林所占有地區的德意志人獲準移居德國，按照當時的說法，也就是“回到帝國的懷抱”。對于希姆萊等癡迷于純正“德意志血統”的人來說，為所有想要回到祖國的德意志人找到住所是他們的信念。困難在于，該讓這些德意志人住到哪兒去？第三個、也是最后一個納粹需要解決的問題：該如何處理現在受德國管轄的1800萬非猶太裔波蘭人？要如何管理波蘭這個國家，才能保證它永遠不會構成威脅？

希特勒在1939年10月發表了一次演說，為因上述問題而苦惱的人們提供了政策指導。他明確表示：“首要任務是建立種族新秩序，也就是重新安置不同種族的人，最終形成更清晰的界線。”[[19]](#_19__Yin_Zi_Aly___Zui_Zhong_Jie)付諸實踐，這意味著德國占領下的波蘭將被劃分為不同區域，其中一個供大部分波蘭人居住，剩下的將并入德國。于是，即將到來的德意志人的落腳之處不在“舊帝國”，而是這個“新帝國”。他們確實是要“回到帝國的懷抱”，只不過不是他們所想的那個帝國。

懸而未決的只剩波蘭猶太人。在戰爭開始前，納粹對居住在他們管轄區域內的猶太人所實施的政策可以概括為：越來越多的官方迫害（通過種種限制和禁令實現），加上偶爾發生的非官方（但卻得到縱容的）暴力行為。20世紀20年代中期，希特勒曾在《我的奮斗》一書中表示，假使一戰期間就用“毒氣”除掉那“1萬到1.2萬個危害國家的猶太人”，對德國來說是件好事。自那時起，希特勒對猶太人的態度就沒有發生過太大變化。盡管希特勒明顯非常痛恨猶太人，且在一戰結束后從沒掩飾過他的仇恨，盡管他私下確實表示過希望他們全都死光，但此時納粹還沒有制定出滅絕猶太人的詳細計劃。

露西爾·艾森格林[[20]](#_20__BBCFang_Tan)生長于20世紀30年代漢堡的一個猶太人家庭。對于德國猶太人的生存環境，她再清楚不過了。“1933年之前，生活都還很美好很舒適，”她說，“但希特勒上臺后，住在同一棟公寓樓里的小孩就不再跟我們說話了。他們朝我們扔石子，辱罵我們。我們不明白自己做了什么被這樣對待，所以老是在問：為什么？大人的回答總是‘這只是暫時性的，會過去的’。”20世紀30年代中期，艾森格林一家被告知，猶太人必須搬離現住的公寓，到分配給他們的“猶太人住房”去，那些房子的房東部分也是猶太人。他們搬進的第一個公寓跟他們原來的家差不多大，但在之后的幾年里，他們被迫一次次搬進越來越小的住處，直到全家擠進一間帶家具的小房間。“我想我們或多或少接受了一切，”露西爾說，“這些是法律，是規定，你也無能為力。”

1938年11月9日晚的“水晶之夜”，讓那些以為納粹的反猶政策有一天會“過去”的人幻想破滅。一個名叫赫舍·格林斯潘的猶太學生殺死了駐巴黎的德國外交人員恩斯特·馮·拉特，出于報復，納粹沖鋒隊員破壞了猶太人的店鋪和住宅，圍捕了數千名德國猶太人。“去學校的路上，我們看見猶太教堂在熊熊燃燒，”露西爾·艾森格林說，“凡是猶太人開的店，玻璃都被砸碎了，滿街都是散落的貨品，德國人在大笑……我們害怕極了，覺得他們把我們抓走，天知道會怎么折磨我們。”

到了1939年戰爭爆發前夕，猶太人已經不再享有德國公民權，他們不能與非猶太人通婚，不能做生意，也不能從事特定行業的工作，甚至不能持有駕駛證。由于這些歧視性規定的出臺，也由于水晶之夜暴行造成的后果——1000多座猶太教堂被毀、400多名猶太人被殺害、3萬多名男性猶太人被關在集中營里長達數月，大批德國猶太人開始逃亡。到1939年為止，大約45萬人離開了新成立的“大德意志帝國”（包括德國、奧地利和捷克的德意志人居住區），占該區域猶太人總數的一半以上。納粹對此非常滿意，更讓他們得意的是，通過納粹猶太問題“專家”阿道夫·艾希曼在1938年德奧合并后別出心裁的規定，猶太人在被允許離開德國之前不得不交出大部分錢財。

然而如何把他們為解決自己制造出來的德國猶太人“問題”而采取的這一做法套用在波蘭身上，對此納粹大傷腦筋。他們此時需要管理的猶太人不再是幾十萬，而是數百萬，而且大多數人都貧困潦倒，在戰爭時期，能把他們趕到哪里去呢？到了1939年秋，阿道夫·艾希曼有了主意：猶太人要去的不是其他國家，而是帝國內部那些最不適宜人類生活的地方。他自認為已為他們找到了最理想的去處，那就是波蘭尼斯科（Nisko）鎮附近的盧布林地區。這片蠻荒之地位于納粹領土的最東端，對艾希曼來說，它是用作“猶太人保留地”的絕佳地點。就這樣，德國占領下的波蘭被分成了三個部分：德國人聚居區、波蘭人聚居區和猶太人隔離區，三個區域自西向東一字排開。艾希曼的宏偉計劃得到批準，數千名奧地利猶太人開始被運往盧布林地區。當地幾乎沒做任何準備工作迎接猶太人的到來，條件差得驚人，許多人死去。但納粹對此并不在意，實際上他們還鼓勵這種做法。漢斯·弗蘭克當時是波蘭級別最高的納粹官員之一，他在1939年11月對他的手下說：“不要在猶太人身上浪費時間。終于能著手解決猶太人，這是件讓人高興的事。他們死得越多越好。”[[21]](#_21__Aly___Zui_Zhong_Jie_Jue)

然而，希姆萊于1940年5月撰寫他的備忘錄時清楚地知道，把猶太人轉移到波蘭最東邊是個失敗的決定，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納粹試圖同時轉移三批不同的人群：源源而來的德意志人被送往波蘭，并需要在當地找到住所，這意味著波蘭人要被逐出自己的家園，并被送往別處。同時，猶太人被運往東部，那里的波蘭人也要被趕走。這一切造成了空前的大混亂。

至1940年春，艾希曼的尼斯科計劃被棄用。波蘭最終被分成數個獨立的區域，這些區域分為兩類：一類正式劃歸德國，成為“新帝國”的組成部分，其中，但澤一帶劃歸西普魯士，原波蘭西部的波茲南和羅茲劃歸瓦爾特大區，卡托維茲（也就是奧斯維辛所在地）劃歸西里西亞地區；另一類包含面積最大的一個獨立分區，被稱為“總督轄區”，包括華沙、克拉科夫和盧布林等市，該區域被指定為大部分波蘭人的居住地。

希姆萊面臨的最急迫問題，是為幾十萬遷移過來的德意志人提供合適的住房，這個問題反過來也影響到他對波蘭人和猶太人的處置。伊爾瑪·艾吉[[22]](#_22__BBCFang_Tan)及其家人的經歷可以反映出納粹在試圖擺脫他們親手給自己造成的窘境時是多么殘酷無情，還反映出人口問題如何逐漸惡化，最終演變成一場危機。1939年12月，伊爾瑪·艾吉這個來自愛沙尼亞的17歲德意志女孩，與她的家人一起被安置在波茲南的臨時住所。這里曾是波蘭的領土，現在屬于德國的瓦爾特大區。當他們同意被安全“送往帝國”時，還以為自己要去的是德國：“當我們被告知要去的地方是瓦爾特大區，哎，我可以告訴你，這真的很令人失望。”圣誕節前夕，一位負責住房的納粹官員給了她父親幾把公寓鑰匙，這套公寓就在幾小時前還屬于一個波蘭家庭。幾天后，一家原本由波蘭人開的餐廳被沒收，以便讓新來的人有生意可做。艾吉一家吃驚不已：“在那之前，我們完全沒想到會發生這樣的事情……你沒法帶著這種負罪感過日子。但另一方面，每個人都有自我保護的本能。我們還能做什么呢？我們能去哪里呢？”

只有知道類似的財產侵占事件超過10萬件，才能想象那個時期的波蘭所發生的一切。搬遷和安置工作的規模極大，在一年半的時間里，大約有50萬德意志人到達幾個新并入帝國的地區等待安置，數十萬波蘭人遭到驅逐，以便為前者騰出空間。很多人被塞進運牲畜的卡車，送往南邊的總督轄區，在那里他們被扔下，沒得吃也沒得住。難怪1940年1月，戈培爾會在他的日記里寫道：“希姆萊正在轉移人口，并非處處都順利。”[[23]](#_23__Ge_Pei_Er_Ri_Ji__1940Nian_1)

這一切還是沒有解決波蘭猶太人的問題。希姆萊已經意識到，同時轉移猶太人、波蘭人和德意志人是不現實的，于是他想出了另一個辦法：如果德意志人需要更多空間——事實上他們確實非常需要——那么猶太人的生存空間必須大大壓縮。因此就有了猶太人隔離區（ghetto）。

猶太人隔離區后來成為納粹迫害波蘭猶太人的一個顯著特點，但它建立之初的用意并非如此。與奧斯維辛和納粹“最終解決”發展歷史上的很多事情一樣，它們都朝著最初沒有預料到的方向演變。早在1938年11月，在討論將德國猶太人逐出家園后該如何安置他們時，黨衛隊軍官萊因哈德·海德里希便說過：“對于猶太人隔離區問題，我想立刻澄清我的態度。從警察的立場來說，我不認為應該建立一個與外界完全隔絕的、只有猶太人居住的隔都。我們沒辦法控制一個猶太人大量聚集的單一猶太區域，它會變成罪犯的藏身之地，變成滋生瘟疫的溫床。”[[24]](#_24__Yin_Zi_Raul_Hilberg___Ou_Zh)

盡管如此，由于其他方法看起來都行不通（雖然可能只是暫時行不通），納粹最終還是建立了波蘭猶太人隔離區。這一舉措絕不僅僅是為了騰出更多住房那么簡單（雖然希特勒在1940年3月曾說過：“猶太問題是一個空間問題。”[[25]](#_25__Yin_Zi_Aly___Zui_Zhong_Jie)），它實際上反映出納粹對猶太人根深蒂固的仇恨和恐懼，而這些仇恨和恐懼從一開始就是納粹主義的核心思想。納粹認為，理想狀態是讓所有猶太人都“離開”，如果不能馬上實現，那么至少應該把這些攜帶著病菌的猶太人（特別是東歐猶太人）與其他人隔離開來。埃斯特拉·弗倫凱爾[[26]](#_26__BBCFang_Tan)當時是個十幾歲的猶太女孩，住在羅茲地區，她從小就感覺到納粹對波蘭猶太人強烈的厭惡之情。“我們已經習慣反猶主義了……波蘭人的反猶可能更多跟金錢有關，而納粹的反猶主義卻是：‘你們為什么活在這世界上？不應該這樣！你們都該消失！’”

1940年2月，就在波蘭人被運往總督轄區的同時，納粹宣布，羅茲的猶太人要被“重新安置”到市內的一個聚居區。按照最初的設想，猶太人隔離區的設立只是暫時性的，為的是在把猶太人驅逐到其他地方之前臨時收容他們。1940年4月，羅茲猶太人隔離區被封鎖，沒有德國當局的許可，猶太人不能離開該區域。同月，帝國中央安全局宣布，將減少向總督轄區輸送猶太人。在這之前，希特勒曾經的律師、也是總督轄區的負責人漢斯·弗蘭克已經呼吁了數個月，要求停止所有“未經批準的”強制遷移，因為總督轄區已無法再接納更多的人。正如人口事務部負責人弗里茨·阿爾特博士[[27]](#_27__BBCFang_Tan)后來所描述的：“人們被扔出列車——市區也好、火車站臺或其他隨便一個地方都行，沒人在意……我們接到地區官員打來的電話，他說：‘我不知道還能怎么辦。數以百計的人一批批涌來，沒住的地方，也沒吃的東西，什么都沒有。’”跟希姆萊毫無交情的弗蘭克向赫爾曼·戈林（時任四年計劃總負責人的他對波蘭非常感興趣）抱怨驅逐政策以及把總督轄區當成“種族垃圾桶”的做法，終于，遷移暫時中止，希姆萊和弗蘭克可以借此機會“就未來的轉移方案達成共識”。

在他1940年5月的備忘錄中，希姆萊所要說明的正是這一混亂局面。為解決這個問題，希姆萊打算把波蘭分隔成德意志人區和非德意志人區兩部分，并明確了該如何對待波蘭人及猶太人。希姆萊的種族主義立場在此暴露無遺，他想把波蘭人變成一個教育程度不高的、供奴役的民族，而總督轄區應該作為“沒有自主意志的奴工”的家園。“東部的非德意志人絕不能接受小學以上的教育，”希姆萊寫道，“小學只需教給他們最多五百以內的算術，怎么寫自己的名字，以及明白服從德國人，做個誠實、勤勞和聽話的人是上帝的旨意。我認為沒必要教他們閱讀。”[[28]](#_28__Yin_Zi_J__NoakesHe_G__Pridh)

除了要把波蘭人變成一個文盲的民族，希姆萊還極力主張“區分血統的優劣”。他提出對6到10歲的波蘭兒童進行檢查，那些被認定血統純正的孩子必須離開自己的家庭，由德國人撫養，并且不可以再與親生父母見面。納粹掠奪波蘭兒童的政策遠沒有他們滅絕猶太人的政策那么廣為人知，但二者遵循的其實是相同的邏輯，都說明像希姆萊這樣的人是如何堅定地相信，通過種族身份可以判定一個人的價值。今天看來，這種綁架孩子的做法無疑非常罪惡且怪異，但希姆萊這么做不是為了他自己，它是他扭曲世界觀的重要組成部分。他認為，如果讓他們留在原來的家庭，波蘭人將會“依靠這些有著優良血統的人發展自身的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談起這些孩子時，希姆萊寫道：“無論這樣做對一個人來說有多么殘酷和不幸，但如果我們不想采用布爾什維克從肉體上消滅整個民族的做法——因為那從根本上很不德國（un-German），也不可能實現——那么這個方法就是最溫和的，也是最好的。”盡管希姆萊談論的是波蘭兒童，但鑒于他指出“從肉體上消滅整個民族”“從根本上很不德國”，他這番勸告顯然也適用于包括猶太人在內的其他“人群”。（海德里希1940年夏發表的聲明進一步證實了這個推論，該聲明的直接對象就是猶太人：“生物滅絕對德國人這個文明的民族而言是不體面的行為。”）[[29]](#_29__Yin_Zi_Aly___Zui_Zhong_Jie)

在其議題頗為廣泛的備忘錄中，希姆萊還為猶太人的命運做出了安排：“我希望‘猶太人’這個稱謂從此徹底消失，我們可以通過大規模驅逐把所有猶太人趕到非洲或其他殖民地去。”這又回到納粹一開始確立的轉移政策，因為戰爭的爆發，這個政策重新被考慮。希姆萊指望法國會很快輸掉戰爭，同時也希望英國人因此迅速投降并提出單方和解。戰爭一旦結束，波蘭的猶太人就可以被塞進輪船里運走，到原屬于法國、現歸德國的某個非洲殖民地去。

盡管在今天看來，把幾百萬人裝進輪船運到非洲的設想未免太不現實，但在當時，納粹無疑認真地考慮過這個方案。一些激進的反猶主義者早在幾年前就開始建議把猶太人運到非洲去，眼下的戰爭形勢似乎讓納粹這個解決猶太人“問題”的方案有望落實。希姆萊寫就備忘錄的六周之后，德國外事辦公室的弗朗茨·拉德馬赫撰寫了一份文件，宣布非洲島國馬達加斯加被指定為猶太人接收地。[[30]](#_30__De_Guo_Wai_Shi_Ban_Gong_Shi)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對猶太人來說，這個方案很可能與戰爭時期所有針對“猶太問題”的解決方案一樣，意味著大量的死亡和無限的痛苦。馬達加斯加的納粹官員會按部就班，在一兩代人的時間里消滅猶太人。我們所知道的那個納粹“最終解決”可能不會發生，但其他形式的種族滅絕幾乎一定會出現。

希姆萊將他的備忘錄交給了希特勒，希特勒看完后告訴他，這份報告寫得“不錯、準確”（gut und richtig）。不要忘了，希特勒從來沒有把他對備忘錄的態度付諸文字。希姆萊只需要元首的口頭肯定就足以推進工作。在納粹治下，重大決策就是通過這樣的方式做出的。

因此，在納粹的宏偉大計里，魯道夫·霍斯和奧斯維辛那座剛建立起來的集中營不過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奧斯維辛屬于波蘭境內將被“德國化”的區域，在很大程度上，地理位置決定了這個營地接下來的發展。此前，上西里西亞地區在波蘭人和德國人之間幾經轉手，在一戰爆發前它屬于德國，隨后德國人又在《凡爾賽條約》中失去了它。現在，納粹想要為帝國重新收回這個地方。然而，與其他將被“德國化”的地區不同，上西里西亞工業化程度很高，且大多數地區不適合用來安置德意志人。這意味著它需要保留一定數量的波蘭人充作奴工，因此一個用來威嚇當地人的集中營就很有必要。按照最初的設想，奧斯維辛只是在犯人被送往帝國其他集中營之前暫時關押他們的場所，用納粹的術語來說，一座“隔離”營。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奧斯維辛的功能明顯發生了變化，這里將成為有進無出的人間煉獄。

霍斯很清楚，戰爭讓一切都朝著激進化的方向發展，集中營也不例外。盡管達豪為奧斯維辛提供了一個范例，但比起“舊帝國”的同類機構，后者所要處理的問題卻棘手得多。當時，納粹在實行種族洗牌，波蘭整個民族的知識階層和政治精英都被摧毀。奧斯維辛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成為囚禁和恐嚇波蘭人的工具。因此，盡管一開始只是作為一般的集中營，奧斯維辛犯人的死亡率還是高于帝國任何一個“常規”集中營。早期送往奧斯維辛的2萬名波蘭人，一半以上在1942年初便已喪命。

然而，奧斯維辛的第一批犯人并不是波蘭人，而是德國人——準確地說，是30名從薩克森豪森集中營轉來的刑事犯。1940年6月，他們抵達奧斯維辛，后來成為第一批卡波，為黨衛隊充當打手管教波蘭犯人。對首批來到奧斯維辛的波蘭人來說，許多人難以磨滅的第一印象正是這些卡波。“我們還以為他們是水手呢，”羅曼·特羅揚諾維斯基[[31]](#_31__BBCFang_Tan)說，1940年夏天他被送到奧斯維辛，當時19歲，“他們都戴著水手的貝雷帽。后來我們才知道，原來他們都是罪犯，全都是刑事犯。”“我們到了以后，德國卡波沖我們大喊大叫，還用棍子打我們，”威廉·布拉塞[[32]](#_32__BBCFang_Tan)說道，他也在差不多的時間來到奧斯維辛，“如果有誰從牲畜卡車上下來的動作慢了，他就會挨打，還有人甚至當場被打死了。我嚇壞了，所有人都嚇壞了。”

最早來到奧斯維辛的波蘭人被抓捕的原因各不相同，或被懷疑是波蘭地下反對組織成員，或隸屬納粹所憎恨的群體之一，比如神父或知識分子，有的僅僅是冒犯過某個德國人。實際上，1940年6月14日到達奧斯維辛的第一批波蘭囚犯是從塔諾夫（Tarnow）監獄轉過來的，他們中的很多人都是大學生。

這些初來乍到的新人，當務之急就是建起關押自己的集中營。威廉·布拉塞回憶道：“我們用的是非常原始的工具，而且犯人必須自己背石頭。這可是非常繁重的體力活，我們還老是挨打。”然而建筑原材料是如此匱乏，因此納粹分子慣用的伎倆——偷，在此大行其道。“我負責拆除原先波蘭人住的那些房子，”布拉塞繼續說，“我們接到命令，要把包括磚、厚木板和各種各樣的木料都拿走。這些德國佬又要快，又不提供原材料，這種做法讓人莫名其妙。”

偷盜之風在集中營里猖獗一時，偷竊的對象不僅包括當地居民，還包括營里的“自己人”。布拉塞說：“德國卡波會把我們叫去，說：‘去其他分隊那里弄點水泥回來，他們的工作可不是我們要操心的事。’我們照辦。木板、水泥都是從別的工作分隊偷回來的。在營地里我們管這個叫‘順手牽羊’（organizing）。但是得特別當心不要被逮到。”“順手牽羊”的文化并不限于囚犯。早期青黃不接的時候，霍斯也會順手摸來他需要的東西：“既然不可能指望從上級那里得到什么幫助，我只能盡量將就，自力更生。我不得不到處找小汽車、卡車和必需的汽油；我要開到100公里以外的扎科帕內和拉布卡，只為了給犯人的廚房找幾個開水壺；床架和秸稈床墊還得一路開到蘇臺德去弄……每當我發現有哪個倉庫屯著我們急需的物品，我馬上把它們全都運走。根本顧不上什么禮節……我甚至不知道上哪兒去找一百米長帶刺的鐵絲網，所以只能去偷，因為我們特別需要它們。”[[33]](#_33__Huo_Si____Zhi_Hui_Guan)

就在霍斯忙著“順手牽來”必需品，以把奧斯維辛變成一個“能派上用場”的集中營時，身陷那些偷來的帶刺鐵絲網之內的波蘭人已經明白，他們活命的關鍵在于一點——自己為哪個卡波工作。“我很快就發現，在‘好的’工作分隊，犯人的臉通常看起來比較飽滿和圓潤，”威廉·布拉塞說，“他們的狀態跟那些干著重活兒、枯瘦憔悴的人很不同，后者就跟穿著制服的骷髏一樣。我馬上就注意到，跟著這個卡波是上策，因為他手下的犯人狀態更好。”

羅曼·特羅揚諾維斯基的卡波是集中營里最殘忍的卡波之一，因此他的生活苦不堪言。他的卡波曾因他一次小小的違規扇他的臉，然后命令他扶著板凳蹲了兩個小時。在這個工作分隊的殘酷生活幾乎擊垮了他。“我沒有力氣每天推著手推車跑來跑去，”他說，“只要干一個小時手推車就不聽你的使喚了，你會栽倒在手推車上，弄傷自己的腿。我得從這里逃出去。”跟許多在他之前和之后來到奧斯維辛的犯人一樣，特羅揚諾維斯基知道自己必須想辦法擺脫這個工作分隊，否則他就只有死路一條。

一天早上點名時，犯人被告知黨衛隊要招募熟練的木工。盡管特羅揚諾維斯基這輩子從來沒當過木匠，但他謊稱自己“有七年經驗”，自愿應征。但是紙包不住火，他到了木工房，剛開始干活就露了餡。“卡波叫住我，把我帶到他的房間。他手里拿著一根大棍子站在那里，一看到棍子我就癱了。他說因為我弄壞了木料，要挨二十五下。他讓我彎下腰，開始打我。他故意打得特別慢，好讓我領受每一下的滋味。他人高馬大，手勁也很大，而且棍子特別沉。我很想大喊，可還是咬住嘴唇不讓自己叫出聲來，一聲都沒有。這幫了我，因為打到第十五下時他停了。‘你表現不錯，’他說，‘所以最后十下我給你免了。’我只挨了十五棍，但這十五棍也夠我受的了。兩個星期里我的屁股上都是青一塊紫一塊，有很長時間都沒法坐著。”

雖然特羅揚諾維斯基被人從木工房里趕了出來，但他還是想找一份室內的工作。“這個特別關鍵，要想活下來，必須待在屋子里。”他找到一位朋友，這個朋友認識一位相對比較和善的卡波，名叫奧托·屈澤爾。他跟朋友一起去見了屈澤爾，吹噓自己的德語水平，最后找到一份在廚房為德國人準備食物的工作。“我就這樣保住了我的命。”他說。

在人人想盡辦法力求保命的集中營里，有兩類人，從他們剛到集中營的那一刻起就會被挑出來百般凌辱，那就是神父和猶太人。這個階段的奧斯維辛還沒有開始大規模接收猶太人，因為當時設立猶太人隔離區的政策正如火如荼地進行著，但被送往集中營的知識分子、抵抗組織成員和政治犯當中也有猶太人。他們同波蘭的天主教神父一樣，比其他犯人更可能被分配到懲戒分隊（penal commando），該分隊的管理者是所有卡波中最惡名昭著的一個——恩斯特·克蘭克曼。

1940年8月29日，第二批德國犯人從薩克森豪森集中營被轉移到奧斯維辛，其中就包括克蘭克曼。很多黨衛隊隊員不喜歡他，但他有足夠強大的靠山——卡爾·弗里奇（集中營領導，霍斯的副手）和格哈德·帕利奇（指揮官助理）。克蘭克曼極胖，經常坐在一個巨大石碾的挽具上，石碾用來平整營地點名的中央廣場。奧斯維辛的首批囚徒之一，耶日·別萊茨基說：“我第一次見到他時，犯人們正在碾軋兩棟樓之間的空地。那個碾子非常非常重，整個分隊二十或二十五個人都拉不動。克蘭克曼就用手里的鞭子抽他們，沖他們喊：‘動作快點兒！你們這群狗！’”[[34]](#_34__BBCFang_Tan)

別萊茨基看到，這些囚犯被迫從早到晚平整地面，中間沒有任何休息。夜幕降臨時，他們中的一個人跪倒在地，站不起來。這時，克蘭克曼命令分隊的其他人拉著石碾，從他們這位倒下的獄友身上碾過。“我已經看慣了死亡和毒打，”別萊茨基說，“但親眼目睹這一幕，我還是從頭涼到腳，徹底呆住。”

對于這類暴行，黨衛隊的態度甚至都不是冷眼旁觀，而是積極鼓勵。如威廉·布拉塞以及所有奧斯維辛幸存者所證實，正是黨衛隊創造了集中營里這種殘忍的文化（而且他們經常自己動手）。布拉塞說：“那些特別殘暴的卡波會得到黨衛隊的獎賞，比如多得到一碗湯、一個面包或一根煙。我親眼看見的。黨衛隊鼓勵他們這樣做。我常聽見黨衛隊看守吩咐他們：‘往死里打。’”

盡管集中營里到處都在發生令人瞠目的暴行，但在納粹眼中，比起重組波蘭的血雨腥風，奧斯維辛只能算得上一潭靜水。徹底扭轉這一切的第一個信號發生于1940年的秋天。9月，黨衛隊行政和經濟總辦公室負責人奧斯瓦爾德·波爾（Oswald Pohl）到奧斯維辛視察。波爾看到集中營附近有沙土和礫石坑，便要求霍斯擴建營地，他認為它可以為黨衛隊經營的德國土石制造有限公司（German Earth and Stone Works, DEST）所用。1937年，當時德國集中營關押的犯人已從1933年的2萬多減少到只剩一半，經濟因素的考量對希姆萊和黨衛隊益發重要，于是，希姆萊想出了一個新的辦法為集中營的未來提供保障，那就是讓黨衛隊開辦自己的公司。

從一開始，納粹經營的就不是普通業務。希姆萊不想成立一個資本主義性質的企業，而是想建立多個公司，讓它們全都按照納粹的哲學思想運作，為國家服務。集中營將為新德國提供原材料，比如為希特勒在柏林規模龐大的帝國總理府提供巨量花崗巖。為實現這個目標，1938年德奧合并后，黨衛隊在毛特豪森新開設了集中營，就在一個花崗巖采石場附近。他們認為，讓國家的敵人來為國家的發展做出貢獻，這再合適不過了。如希特勒最鐘愛的建筑師——阿爾伯特·施佩爾所說：“畢竟，猶太人在法老時代就開始造磚了。”[[35]](#_35__Albert_SpeerDe_Yuan_Hua__Zh)

希姆萊對工業生產的熱情并沒有止步于為帝國提供建筑材料，他對其他許多項目也極力支持。比如，納粹成立了一個實驗室，專門研究天然藥物和農業生產新形式（這兩個都是希姆萊非常關心的課題）。很快納粹就開始生產衣物、維生素飲品甚至瓷器（牧羊人和其他“種族正確”的人物雕塑）。近來研究表明[[36]](#_36__Allen___Sheng_Yi_____Te_Bie)，這些黨衛隊的企業管理者很多并不能勝任他們的工作，但諷刺的是，這樁生意的前景卻是一片大好。

波爾才剛剛下令讓奧斯維辛為國家生產沙土和礫石，這個集中營馬上又被安排了新的任務。1940年11月，魯道夫·霍斯與希姆萊會面，會上他為奧斯維辛制定的計劃讓他的上司浮想聯翩。對農業的共同興趣迅速拉近了兩人的距離。霍斯回憶起希姆萊對集中營的新設想：“我們要在這里進行所有必要的農業實驗，要成立大量的實驗室和植物栽培部門。對各類牲畜的飼養都很重要……沼澤地需要排干和開墾……他滔滔不絕地談著農業規劃，巨細靡遺，直到他的助手提醒他，一位非常重要的人正等著與他會面，已經等了很久，他才停了下來。”[[37]](#_37__Huo_Si____Zhi_Hui_Guan)

霍斯與希姆萊的這次會面長久以來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因為人們更關注奧斯維辛后來發生的那些更恐怖的事。然而，這次會議可以幫我們更好地了解集中營演變過程中，兩位關鍵人物的思想狀態。如果把他們看成受非理性情感驅動、我們永遠無法理解的“瘋子”，不僅太過輕率，而且根本是錯誤的。在這次會議中，我們可以看到，這兩個人雖然狂熱到近乎古怪的程度，但在戰爭大背景下，那些在和平時期只可能是白日夢的設想是有可能實現的。與霍斯就著桌子探討奧斯維辛建設方案的希姆萊，憑借納粹的侵略行動，已經有過將自己的夢想變為現實的經驗。他用手在地圖上隨便一劃，就改變了成千上萬德意志人和波蘭人的命運。他一直在用最煽動人心的辭藻宣傳自己的看法，使它成為人們可以想象的事實。

關鍵是，我們要明白，希姆萊從來是以一套合理的思維邏輯，來談論他把奧斯維辛打造為農業研究中心的愿望。這一愿景無疑令人作嘔，但它確實清晰明確。1940年11月的這次會議上，他對西里西亞地區的前景十分看好，認為它將成為德國的農業烏托邦，一個天堂般的地方。南邊波蘭人的粗鄙農莊將永遠消失，取而代之的將是團結一致、管理有序的德國農場。霍斯和希姆萊自己都當過農民，對土地都懷有深厚的、近乎神秘的感情。因此，利用奧斯維辛進一步深化農業知識的設想，對他們兩人一定都極具吸引力。

正在興頭上的希姆萊絲毫不顧及一個事實：奧斯維辛集中營所在的地方恰恰不適合完成這項事業。它位于索拉河和維斯瓦河交匯處，該地區因常發洪水而聞名。盡管如此，直到奧斯維辛被解放的那一天，集中營里的犯人日日夜夜在為實現希姆萊的夢想勞動。他們挖溝、給池塘排水、加固河堤，只因對于這位黨衛隊全國領袖（Reichsführer SS）來說，對夢想的夢想要比討論它的具體可行性更讓人興奮。希姆萊根本沒有意識到，在他激情澎湃地向忠誠的下屬魯道夫·霍斯大談特談自己的夢想時，數千人將為此付出生命的代價。

到1940年底，霍斯已為集中營建立起基本的制度和準則，它們在接下來的四年里指導著集中營的運作，包括能時時刻刻有效監管囚犯的卡波，極其殘忍、允許隨心所欲處罰犯人的管理，以及集中營里無所不在的潛規則：如果一名囚徒不能迅速掌握避開危險的工作分隊的伎倆，那他很可能活不了多長時間。不過，在早期的種種建制中最能代表集中營文化的，是“11號樓”。

從外表看，11號樓（原為13號樓，1941年重新編號）與營里的其他地方沒有區別，都是紅色屋頂的磚房，但每個人都知道，11號樓的作用獨一無二。“我很怕經過11號樓，”約瑟夫·帕欽斯基[[38]](#_38__BBCFang_Tan)說，“真的特別害怕。”犯人之所以有這種感受，是因為11號樓乃獄中之獄，是一個充滿酷刑和殺戮的地方。

耶日·別萊茨基是為數不多能活著離開11號樓，并講述他在里面經歷的人。他之所以被送去那里，是因為一天早晨醒來后，他病得很厲害，疲憊不堪，實在無法上工。在奧斯維辛，犯人是不可能請病假休息的，因此他想藏在營里，希望沒人發現他曠工。一開始他躲在廁所，但后來他意識到假如一整天都待在里面，很有可能被抓到，于是他走出來，假裝打掃營地衛生。不幸的是，他被一個守衛逮個正著，送到11號樓接受處罰。

他被帶上樓梯，來到閣樓。“我走進去，（屋頂的）瓦片很燙，那是8月的一天，是個好天氣。但這里一股惡臭，還聽見有人呻吟的聲音——‘耶穌，哦耶穌！’里面很黑，只有從瓦片縫隙透進來的一點光。”他抬起頭，看見一個人雙手反綁在背后，被吊掛在屋頂的大梁上。“士兵拿來一個凳子，對我說：‘踩上去。’我把雙手背在身后，他拿出一條鏈子捆住了我的手。”守衛把鏈子系在大梁上，突然踢開凳子。“我就覺得，老天爺啊，簡直太疼了！我哀嚎著，他就沖我喊：‘你給我閉嘴！你這條狗！你活該遭罪！’”隨后，士兵就離開了。

他的雙手和胳膊向后拉扯著，承受全身的重量，這種疼痛令他難以忍受。“不用說，汗水順著我的鼻子淌下來。那天非常熱，我一直喊著‘媽媽呀！’一個小時后，我兩個肩膀都脫臼了，而另一個人早已沒聲音。接著來了另一個黨衛隊士兵，他走到那個人跟前，把他放了下來。我的眼睛是閉著的。我被吊得沒了精神，也沒了魂。然后，士兵說的一句話傳進我的耳朵。他說：‘就剩十五分鐘了。’”

到他再回來之間發生了什么，別萊茨基不太記得了。“‘抬腿。’他說。但我動不了。他抓住我的腿，把一條腿放在板凳上，然后又把另一條也放上去。他一松開鏈條我就從板凳上摔下去，跪倒在地。他扶了我一把，舉起我的右手，說：‘舉著別動。’但我的胳膊毫無知覺。他說：‘過一小時就好了。’我艱難地跟著這個黨衛隊士兵下了樓。他是個非常有同情心的守衛。”

別萊茨基的故事從很多方面來看都很特別，比如他在折磨之下表現出的勇氣。而更令我們驚訝的，或許是兩個黨衛隊守衛的強烈反差，一個在他毫無防備時殘忍地踢開他腳下的凳子，另一個“有同情心的”守衛在受刑結束后幫助他。這也提醒我們，就像不同卡波可能有著千差萬別的性格，黨衛隊看守也同樣如此。很多集中營幸存者在回憶過去時都會提到，他們的管理者并不都屬于同一種類型。要想在集中營里活下來，至關重要的一個能力是識別不同人的不同性格，這不僅包括卡波，也包括黨衛隊士兵。一個人能否保住性命就仰賴這種能力。

耶日·別萊茨基從11號樓出來時已然一瘸一拐，但命運好歹仍眷顧他，當一個人走上那些水泥臺階、邁進那道大門以后，他很有可能再也無法活著出來。在審訊時，納粹用盡各種恐怖的方法折磨11號樓的犯人，不僅包括別萊茨基所遭受的雙手反綁吊掛，還包括鞭刑、水刑、針扎指甲、烙鐵燙皮膚、用汽油澆透全身后點火，等等。奧斯維辛的黨衛隊挖空心思發明新的虐待花招，囚徒之一，博萊斯瓦夫·茲博齊恩有一次看到一個從11號樓被送進醫院的犯人：“他們特別愛用的一招，尤其在冬天，就是抓住犯人的頭靠近焦炭爐，好讓他們招供。犯人的臉會被徹底燒傷……那個男人臉部完全灼傷，眼睛都燒壞了，可他還不能死……政治部的人還需要他……那個犯人幾天以后才死去，自始至終都意識清醒。”[[39]](#_39__Yin_Zi_Irena_Strzelecka__Xi)

那段時間，11號樓的主管為黨衛隊小隊領袖（少尉軍銜）馬克斯·格拉布納，他是集中營最惡名昭彰的工作人員之一。在加入納粹黨衛隊之前，格拉布納不過是個牛倌，而現在他卻對他手下的犯人有著生殺予奪大權。每周他都要“清理存貨”，也就是由他和他的同僚決定11號樓中每個犯人的命運。一些人繼續留在牢里，另一些人則會接到“1號懲罰”或“2號懲罰”。“1號懲罰”意味著鞭刑或其他酷刑，而“2號懲罰”則意味著立即處死。那些被判了死刑的首先會被帶到11號樓一層的盥洗室，在這里脫去衣服，然后被領著從側門走進一個隱蔽的天井。這個天井位于10號樓和11號樓之間，營里只有這兩棟樓之間立起了圍墻，與集中營其他地方隔開。犯人就在這里被殺害：他們的兩只手臂被一名卡波死死按著，走向離入口最遠的那面墻（用集中營里的黑話來說，那叫“帷幕”）。等來到磚墻前，一名黨衛隊行刑官會用一把小口徑手槍（以便最大程度減小聲響）近距離對準腦袋，一槍斃命。

然而，在11號樓里遭罪的不只是奧斯維辛的犯人。這里也是德國卡托維茲（原波蘭卡托維茲）地區的簡易治安法庭，因此，被蓋世太保抓捕的波蘭人有可能不經過集中營其他區域，直接被帶進11號樓。負責審判他們的法官當中，有位米爾德納博士，他是黨衛隊上級突擊隊大隊領袖（上校軍銜），也是國會議員。佩里·布羅德曾是奧斯維辛的一名黨衛隊士兵，他講述了米爾德納在工作中的施虐傾向：“一個16歲的年輕人被帶進房間。由于實在餓得受不了，他從商店里偷了一些吃的，就成了‘罪犯’。米爾德納判他死刑。他慢條斯理地把判決書放在桌上，刻薄地看著那個站在門口，衣不蔽體、臉色蒼白的男孩。‘你有媽媽嗎？’男孩低著眼睛，小聲說：‘有。’‘你怕死嗎？’脖子粗短的劊子手絲毫不帶感情地問，就像能從受害者的痛苦中得到快感似的。那個年輕人沒有聲音，身體卻微微發抖。‘你今天就會被槍斃，’米爾德納有意讓他的話帶著上帝判決的味道，‘或者他們會吊死你。一個小時以后，你就是死人一個。’”[[40]](#_40____Na_Cui_Dang_Wei_Dui_Yan_Z)

根據記錄，對于女犯，米爾德納特別享受在判她們死刑后的對話：“他會用最夸張的方式向她們描述她們馬上面臨的槍決。”

盡管有恐怖至極的11號樓，但這個階段的奧斯維辛依然保留著傳統集中營（如達豪）的一些特點。在這一點上最好的證明就是，與人們通常所認為的不同，事實上在早期，奧斯維辛的犯人是有可能在服刑一段時間后被釋放的。

1941年復活節前夕，兩個黨衛隊士兵找到了波蘭政治犯瓦迪斯瓦夫·巴托謝夫斯基[[41]](#_41__BBCFang_Tan)，他當時正在20號樓的醫院。“他們對我說：‘出來！’沒人給我任何解釋，我不知道發生了什么。這不是好事，因為我的處境突然發生變化，而身邊的獄友都不知道接下來會如何。我嚇壞了。”他很快得知，他將要去面見一組德國醫生。在路上，一個波蘭醫生——同時也是一名犯人——悄聲對他說：“如果他們問你，你就說你很健康，感覺很好。要是你說你病了，他們不會放你走的。”巴托謝夫斯基大吃一驚。“他們會放了我嗎？”他又驚又喜地問那些波蘭醫生，但他們只答道：“閉嘴！”

問題是，瓦迪斯瓦夫·巴托謝夫斯基的健康狀況并不樂觀。“我的背上、屁股上、后腦勺和后脖頸長滿了大癤子。那些波蘭醫生給我涂了很多藥膏，還往癤子上拍了很多粉，讓我看起來好一些。他們對我說：‘別怕，他們不會特別仔細地檢查你的，但你什么也不要說，那樣就違反規定了，因為這里沒有誰是病人，知道嗎？’然后他們把我帶到了德國醫生面前，我甚至看都沒看他一眼。波蘭醫生們急切地說：‘都挺好的。’那個德國醫生就只點了點頭。”

通過這個敷衍了事的體檢后，巴托謝夫斯基被帶到管理辦公室，那里的人把他剛進集中營時穿在身上的衣服還給了他。“他們沒把我的鍍金十字架還給我，”他說，“他們留作紀念了。”接著，不無滑稽的是，如同常規的囚犯釋放流程，黨衛隊問他對囚禁生活有沒有什么要投訴的。他說：“我很狡猾，我回答：‘沒有。’他們又問：‘你對集中營里的生活還滿意嗎？’我回答：‘滿意。’然后我在一張表格上簽字，表明我沒有要投訴的，也不會觸犯法律——我不知道他們是怎么想的，我可是個波蘭人，對德國人的法律不感興趣。我們的法律是由流亡在倫敦的政府規定的。不過當然了，我是不會跟那些家伙講這個的。”

巴托謝夫斯基和另外三個同天被釋放的波蘭人一起，在德國衛兵的陪同下來到奧斯維辛火車站。當列車駛離車站的時候，他真切地感受到“最初那幾分鐘的自由”。他將要踏上漫長的回家之路，回到波蘭的母親身邊。在火車上，“人們搖著頭，一些女人流下同情的眼淚。你看得出來，他們很受震動。他們問：‘你們從哪兒來？’我們說：‘奧斯維辛。’沒人說話，他們只是看看我們，眼里透著恐懼”。那天深夜他到了波蘭，到了母親的公寓。“她看見我大吃一驚，撲過來抱住我。我第一個注意到的變化，是她頭上有了一縷白發。她臉色不太好，那時候大家看起來都不大健康。”

總共有幾百名犯人以類似的方式離開了奧斯維辛。沒人確切知道為什么他們會被選中，但就巴托謝夫斯基來說，輿論壓力似乎起到一定作用，因為紅十字會和其他機構一直在積極開展各種活動要求釋放巴托謝夫斯基。當時國際上的壓力確實影響了納粹對犯人的處置，這也可由一批1939年11月被捕的波蘭學者的經歷得到證實。在納粹對波蘭知識分子進行整肅的過程中，克拉科夫雅蓋隆大學（Jagiellonian University）的教授們從講臺上被帶走，關押于包括達豪在內的不同集中營。14個月后，還活著的教授得到釋放，幾乎可以肯定是外界壓力起到的作用，其中包括教宗提出的請求。

與此同時，奧斯維辛進入一個至關重要的新階段，另一個德國人提出了一個將大大影響它未來發展方向的“愿景”：工業巨頭IG法本公司的奧托·安布羅斯博士（Dr. Otto Ambros）打算在東部尋找一個合適的地點來生產合成橡膠，因為戰爭沒有按照納粹預期的那樣發展。希姆萊在1940年5月還幻想著戰爭會很快結束，猶太人可以被送往非洲。與他一樣，IG法本公司那時也認為，沒必要費錢費力地生產合成橡膠和燃料，等到戰爭一結束——最遲也就在1940年秋天——大量原材料就可以從帝國以外的地方獲得，比如德國從敵人手上搶過來的那些新殖民地。

但到了11月，戰爭顯然還沒有要結束的意思。丘吉爾拒絕講和，英國皇家空軍在不列顛之戰中擊退了德軍的空襲。再一次地，德國這些紙上談兵的諸公需要處理意料之外的情況。說實話，在納粹統治期間類似的情形屢屢出現，領導層疲于應付與他們的構想出現落差的局面。這些人經常被巨大的野心和樂觀主義情緒沖昏了頭腦，以為僅靠“意志”的力量就可以戰勝一切，結果碰一鼻子灰——不是自己缺乏規劃和遠見，就是對手比自信心膨脹的他們所想象的要強大得多。

在IG法本公司，曾因預計戰爭會很快結束而被擱置的擴建方案，此時又匆匆地重新提上日程并付諸實施。盡管IG法本公司并不是一個國有企業，但它卻極其重視納粹領導層的需求和愿望。按照納粹的四年計劃，東部需要設立一個生產丁納橡膠（一種合成橡膠）的工廠。現在，經過多次討論，IG法本公司同意將工廠建在西里西亞。[[42]](#_42__Peter_Hayes___Gong_Ye_Yu_Yi)生產合成橡膠需要用到煤，并對煤進行加氫處理，也就是在高溫下讓氫氣通過煤。沒有石灰、水以及最重要的原料煤，丁納橡膠就無法生產。因此，任何一個丁納橡膠工廠都應具備的前提條件之一，便是擁有獲取這些原材料的便捷渠道。此外，IG法本公司堅持，工廠周邊應該有發達的交通網絡和完善的基礎設施。

在仔細研究過地圖和計劃書后，奧托·安布羅斯認為他為IG法本公司的新丁納橡膠工廠找到了一個理想地點，那就是奧斯維辛集中營東邊三英里處的那片地區。不過，離集中營近并不是IG法本公司最初決定將工廠設在奧斯維辛的主要原因，他們更愿意讓即將到來的德意志人為他們工作，而不是完全依靠苦役犯。

得知IG法本公司有意去奧斯維辛后，希姆萊的態度準確來說是非常矛盾的。站在黨衛隊全國領袖的立場，希姆萊對這一舉措疑慮重重。到目前為止，他一直確保集中營的囚犯只為黨衛隊的自營企業工作。一旦為私有企業開綠燈，從而使這些奴工的利潤最終成為國家的收入，而不是完全進入黨衛隊自己的腰包，這可不是希姆萊會熱心提倡的事。盡管黨衛隊也能通過倒賣礫石給IG法本公司賺得盆滿缽滿，但希姆萊對黨衛隊自己的企業顯然有更宏偉的規劃，不容阻撓。

然而，作為“德意志民族強化委員會”的帝國專員，希姆萊的態度卻要積極得多。他知道IG法本公司需要德意志人，并且樂于滿足他們的這一需求。為這些即將到來的勞動力找到住處不是什么大問題，奧斯維辛的管理者很愿意“攆走”住在城里的猶太人和波蘭人，以便為他們騰出空間。[[43]](#_43__An_Bu_Luo_Si_De_Dang_An__Yi)最終，作為四年經濟計劃總負責人的戈林做出了決定：IG法本公司將在奧斯維辛集中營附近建造工廠，希姆萊和納粹黨衛隊應與他們開展合作。[[44]](#_44__Franciszek_Piper__Dui_Ku_Yi)

由于IG法本公司的關注，奧斯維辛，這個在黨衛隊系統中原本不太重要的集中營，此時卻有可能一躍成為最重要的一個。1941年3月1日，希姆萊決定對奧斯維辛進行首次視察，這也反映出這個集中營地位的轉變。在回憶錄以及戰后的審訊中，霍斯都對這次視察進行了詳細描述。在訪問過程中，希姆萊狂妄自大的一面展露無遺。如果說11月時他要把奧斯維辛打造成農業研究站的愿望已屬野心勃勃，那么他3月時的構思算得上異想天開了。此前對IG法本的顧慮已經徹底拋在腦后，現在希姆萊輕松地宣布，集中營關押的犯人將由1萬增加到3萬。當時陪同希姆萊的上西里西亞大區長官弗里茨·布拉赫特對這一冒進方案提出了異議，另一位當地官員也插進來說，集中營的排水問題還沒有解決，這是公認的事實。但希姆萊對他們說，他們應該咨詢專家，應該自己解決這個問題。他用下面的話作為總結：“先生們，集中營必須擴建。我的理由比你們反對的理由重要得多。”[[45]](#_45__Huo_Si____Zhi_Hui_Guan)

盡管霍斯對希姆萊向來俯首帖耳，但他也強烈感到領導的這一新計劃執行起來困難重重。等到自己和希姆萊、埃里希·馮·登·巴赫-澤勒維斯基（Erich von dem Bach-Zelewski，納粹德國東南大區的黨衛隊和警察最高首腦）一起坐進轎車后，霍斯便喋喋不休地抱怨起來。他缺建筑材料、缺人手、缺時間——基本上什么都缺。希姆萊的回答不出所料：“我不想再聽你提困難二字！”他說，“對一個黨衛隊軍官來說，困難根本不存在！如果碰到麻煩，你的任務就是解決它。至于怎么解決，那是你的事，我不管。”

令人印象深刻的，還不是希姆萊如何回應霍斯的抱怨，而是霍斯居然能對黨衛隊最高負責人這樣講話。在蘇聯，要是有人敢這樣對斯大林或貝利亞（蘇聯秘密警察[NKDV，即蘇聯內務人民委員會]頭子，莫斯科與希姆萊角色最接近的人）說話，那他簡直是在拿生命開玩笑。雖然乍聽起來有些不可思議，但對于來自內部支持者的批評，納粹領導層確實要比斯大林體制寬容得多，這也是第三帝國比斯大林政權更有活力的原因之一，因為下級官員可以發揮主觀能動性，自由表達他們的觀點。與斯大林體制中大多數犯下罪行的人不同，霍斯的所作所為，從來不是因為害怕質疑上級的命令會遭到可怕的報復。他之所以加入納粹黨衛隊，是因為他全心全意地認同納粹的整體構想，這讓他能夠就執行的細節放開提意見。他服從上級，但他擁有百分百的權力。一個人履行自己的職責，并非因為自己被要求這樣做，而是因為他相信自己做的是正確的。

當然了，就小事與上級抗辯的自由與它能達到什么效果，完全是兩回事。霍斯向希姆萊的抱怨無濟于事，黨衛隊全國領袖要擴大奧斯維辛集中營的計劃無論如何都要付諸實施。正如霍斯沮喪地總結道：“黨衛隊全國領袖永遠只想聽好消息。”

IG法本公司決定在奧斯維辛建造橡膠工廠，這刺激了希姆萊，他的宏圖不再局限于集中營，而是把整個小鎮和周邊地區都囊括進來。在4月7日于卡托維茲召開的一次策劃會上，希姆萊的代表宣布：“黨衛隊全國領袖的目標，是在這里建立東部移民的示范定居點，尤其是對那些品質優秀的德意志人的安置。”[[46]](#_46___IGFa_Ben__Ao_Si_Wei_Xin_Ch)按照計劃，奧斯維辛將變成一個容納4萬人的全新德國小鎮，這一計劃的實施將與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擴建同步進行。

在此期間，霍斯逐漸意識到，與IG法本公司建立關系可能對集中營大有好處。1941年3月27日，奧斯維辛的管理者和公司代表會面，會議紀要記錄了霍斯如何為集中營爭取利益。[[47]](#_47__IGFa_Ben_Gong_Si__Yu_Ji_Zho)IG法本公司的一位工程師問，在接下來的幾年里能夠提供多少名囚犯，“霍斯少校指出，主要問題在于集中營營房的建設無法以最快速度進行，因此很難提供足夠多的床位”。霍斯又提到，這里的障礙是原材料的匱乏，這也是他不久前費盡唇舌向希姆萊抱怨的問題。而此時霍斯提出，如果IG法本公司能協助“加速集中營的擴建”，那么“最終受益的是他們自己，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為他們提供足夠多的囚犯”。看來，霍斯終于找到了同情他困境的聽眾，最后，IG法本公司的幾位先生同意“負責確認能否為集中營提供幫助”。

在同一次會議上，IG法本公司同意，為每個非技術工人支付每天3馬克的“統包工資”，技術工人則是4馬克，并且“（每個集中營囚犯的）工作成果將按照一個普通德國工人的75%計算”。雙方還協定了集中營為IG法本公司在附近的索拉河開采礫石的單位價碼。總的來說，“整個談判過程都是在親切友好的氛圍中進行的，雙方都強調會盡一切努力為對方提供協助”。

不過，盡管希姆萊和IG法本公司為奧斯維辛做出了宏偉的規劃，還是無法與納粹高層此時在柏林所制定的策略相提并論，后者造成了極其深遠的影響。幾個月來，國防軍陸軍總司令部的官員們一直忙著為入侵蘇聯制定計劃，此次行動的代號為“巴巴羅薩行動”。1940年7月，希特勒在他巴伐利亞的伯格霍夫別墅（Berghof）寓所召開了一次會議，會上他向他的軍事指揮官們宣布，迅速結束戰爭的最好方法便是摧毀蘇聯。希特勒認為英國人之所以能堅持，是因為還寄希望于斯大林最終能打破1939年8月與納粹簽署的《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如果德國人能摧毀蘇聯，英國人就會同意講和，那么納粹將成為歐洲無可爭議的統治者。這個決定發揮了獨一無二的影響，它不只改變了戰爭的進程，事實上，也決定了歐洲接下來大半個世紀的歷史。2700萬蘇聯公民為此喪生，是歷史上一個國家在單次戰役中犧牲最慘重的一次。同時，這場戰役為納粹執行“最終解決”——滅絕猶太人——提供了歷史背景，因此，不考慮到“巴巴羅薩行動”以及1941年夏秋的戰爭形勢，我們就無法理解奧斯維辛集中營隨后的一系列變化。實際上，從此時開始，直到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自殺，東線戰爭的進展（或者毋寧說是倒退）對納粹的思維產生了決定性影響。

在納粹分子看來，這不是一場對抗西方“文明”國家的戰爭，而是與猶太—布爾什維克“劣等人”的殊死戰斗。因此，時任陸軍總參謀長的弗朗茨·哈爾德（Franz Halder）在他1941年3月17日的日記里寫道，在蘇聯“必須毫不留情地采取最暴力的行動”，“斯大林手下的知識分子必須全部處決”。正是在這種態度的指引下，經濟部門才會提出一項令人震驚的方案來解決德國軍隊向蘇聯推進過程中的食物補給問題。國防軍中央經濟部門1941年5月2日的一份文檔表明，“全體德國軍隊”的食物將“由俄國人來承擔”。其結果可想而知：“如果我們從這個國家拿走一切我們需要的，那么無疑將有幾千萬人餓死。”[[48]](#_48__1941Nian_5Yue_2Ri_Hui_Yi_Ji)三周后的5月23日，這個機構撰寫了一篇更激進的文章，標題為“給東部經濟組織的政治經濟指導方針”。文章聲明，當前的目標不僅是用蘇聯的食物喂飽德國軍隊，還要用這些食物供應納粹統治下的歐洲。這意味著蘇聯北部可能會有3000萬人死于饑餓。[[49]](#_49___Zheng_Zhi_Jing_Ji_Zhi_Dao)

近期有研究指出，這些文檔里令人震驚的構想并不是草率提出的應急方案，納粹分子的舉措背后有著非常理性的考量，他們認為削減人口具有經濟上的正當性。根據“適度人口”理論，納粹的經濟規劃專家單憑居住于某個區域的人口數量，就可以計算出這個地區是會帶來利潤還是會造成虧損。舉例來說，赫爾穆特·邁因霍爾德是一位任職于德意志東部發展事務研究所的德國經濟學家，按照他的計算，1941年有583萬“多余的”波蘭人（包括老人和兒童），他們的存在意味著“對資源的損耗”。這些多余的人口被稱為“累贅的存在”（Ballastexistenzen），是對“空間的浪費”。[[50]](#_50__Gotz_AlyHe_Susanne_Heim___Z)在這個階段，這些經濟學家尚未把這套邏輯推演到最后一步——他們沒有要求趕盡殺絕波蘭的Ballastexistenzen，但他們寫到了斯大林是如何處理蘇聯類似的人口過剩問題：20世紀30年代，烏克蘭下令驅逐“富農”（kulak），對其余的人實行農業集體化，這一政策造成約900萬人死亡。

這種想法也為德國入侵蘇聯可預見的大量平民死亡提供了理論支持——對納粹專家來說，“3000萬人”有可能死于饑餓，這不僅對當前德軍的突破有好處，也有利于德國人民的長遠福祉。需要喂飽的蘇聯人越少，就有越多的食物可以向西運送到慕尼黑或漢堡居民的手中。不僅如此，它還可以促使被占領的區域迅速德國化。希姆萊已經注意到，大部分波蘭農場的規模太小，不足以供養一個德國家庭，而現在他堅信，大饑荒將推進在蘇聯建立大規模德意志農莊的進程。在入侵開始前的一次周末聚會上，希姆萊坦率地對他的同事說：“蘇聯戰役的目的是把斯拉夫人口減少3000萬。”[[51]](#_51__Yin_Zi_AlyHe_Heim___Zhong_Z)

即將打響的蘇聯之戰顯然讓許多納粹領導人產生了最為激進的念頭。希特勒寫信告知墨索里尼入侵蘇聯的決定時，他坦認自己感到一種“精神上的解脫”，這賦予他在這場斗爭中放開手腳大干一場的自由。正如宣傳部長戈培爾在1941年6月16日的日記中寫到的：“元首說，無論我們做的是對是錯，我們都必須取得勝利。不管怎么說，我們已經有太多需要解決的問題了……”

毫無疑問，從戰爭的策劃階段就可以預見到，蘇聯的猶太人將遭受深重的苦難。1939年1月30日，希特勒向國會發表演講時，明確地將下一次世界大戰與猶太人的滅絕聯系起來：“今天我想再當一次預言家，如果國際金融形勢和歐洲內外的猶太人讓各國再次陷入一場世界大戰，那它的結果不會是全世界的布爾什維克化——也就是猶太人的勝利——而是歐洲猶太民族的滅絕。”[[52]](#_52__Yin_Zi_Kershaw___Xi_Te_Le)希特勒特別用到“布爾什維克化”一詞，強調在納粹種族理論中共產主義與猶太人之間的聯系。在他看來，蘇聯是布爾什維克和猶太人秘密進行共謀的大本營。雖然斯大林本人表現出明顯的反猶主義傾向，但這并不妨礙納粹想象猶太人在幕后對斯大林帝國的操縱。

為了對付蘇聯猶太人，納粹組建了四個特別行動隊（Einsatz-gruppen）。此前，在德奧合并和納粹入侵波蘭之后，保安部（黨衛隊下屬部門）和保安警察都成立過類似的行動小分隊。他們在大后方工作，任務是根除“國家的敵人”。在波蘭，特別行動隊發動的恐怖行動造成約1.5萬名波蘭人（大部分是猶太人或知識分子）被害，而他們在蘇聯殺害的人數則遠遠超過這個數字。

一開始，特別行動隊的殺傷力就遠遠超過自身規模。A分隊隸屬于北方集團軍，是特別行動隊最大的分隊，配有1000名士兵。剩下的三個分隊（B、C和D）隸屬于其他集團軍，每個部隊約有600至700人。入侵前，海德里希向這些特別行動隊的負責人簡要概括了他們的任務。他的命令后來被記錄在1941年7月2日的官方指示中：特別行動隊的任務是殺死共產主義政治人物、政治委員和“為黨和國家服務的猶太人”。這里可以看到，納粹是多么執意要把猶太民族和共產主義聯系在一起。

入侵開始，特別行動隊跟在國防軍身后進入蘇聯。他們的推進速度非常快。6月23日，也就是發動襲擊的第二天，在黨衛隊旅隊長兼警察少將瓦爾特·斯塔赫萊克博士（Dr. Walter Stahlecker）的指揮下，A分隊已經到達立陶宛的考納斯。他們隨即開始煽動當地人對城中猶太人進行迫害。值得注意的是，海德里希的指示中有這樣的文字：“在新占領的土地上，不要干預任何有反共或反猶太主義傾向的大清洗行動，相反，應秘密地對它們加以鼓勵。”這段文字表明，直接殺害“為黨和國家服務的猶太人”只占特別行動隊所有工作中很小的一部分。斯塔赫萊克后來在報告中寫道：“保安警察的任務是推動這些清洗行動，并按照正確的方向對它們進行引導，以確保在最短時間內實現原定的屠殺目標。”[[53]](#_53__Yin_Zi_Ernst_Klee__Willi_Dr)在考納斯，剛從監獄釋放出來的立陶宛人在德國人鼓勵的目光下，用棍棒將猶太人當街打死。在屠殺過程中，圍觀的人群里有人大喊“打死猶太佬！”以此來鼓勵行兇者。屠殺結束后，其中一名兇手踩在尸體上，拿出手風琴彈奏立陶宛國歌。毫無疑問，這些都是海德里希讓他的手下“秘密地鼓勵”的行為。

在遠離主要城鎮的地方，特別行動隊挑出那些“為黨或國家服務的猶太人”并將他們殺害。這常常意味著整個村莊的猶太人男性被集體射殺。畢竟，按照納粹的理論，蘇聯有哪個猶太男人不是暗中“為黨和國家服務”呢？

就在特別行動隊和黨衛隊相關部門屠戮蘇聯猶太人的同時，國防軍也在戰爭中犯下種種罪行。在臭名昭著的《巴巴羅薩法令》和《政委法令》[[54]](#_54____Zheng_Wei_Fa_Ling____Yu_1)的授意下，德軍可以不受任何約束地射殺游擊隊員，并以一個村莊為單位進行集體報復；即使成為戰俘，蘇聯政委也難逃一死。正是納粹對蘇聯政委的態度使得奧斯維辛卷入這場戰爭。根據國防軍與黨衛隊達成的協定，海德里希的手下可以進入戰俘營，帶走那些逃過前線首輪囚犯篩查的政委。接下來的問題便是：這些政委要被帶到哪里去？在納粹看來，當著蘇聯士兵的面殺死他們顯然不是一個理想方案，于是，1941年7月，從普通戰俘營抓出來的幾百名蘇聯政委被送往奧斯維辛。

從到達集中營的那一刻起，這些囚犯便被區別對待。集中營里的生活苦不堪言，但這群人卻遭受更殘酷的虐待。“我聽到可怕的叫喊聲、呻吟聲和咆哮聲。”在通往集中營一隅礫石坑的路上，耶日·別萊茨基和一個獄友看見了這些蘇聯犯人。“他們推著裝滿沙土和礫石的獨輪車一路小跑，那是很痛苦的，手推車的木板總是左搖右晃。這不是常規的出工，是黨衛隊特意布置給那些蘇聯人的煉獄。”他們一邊干活，一邊被卡波用木棍毒打，在旁邊圍觀的黨衛隊看守還大聲鼓勵卡波：“好好修理他們，伙計！”而接下來的一幕真正讓耶日·別萊茨基目瞪口呆：“有四五個黨衛隊士兵拿著槍，他們不時給槍上膛，低頭看看，選一個目標，然后就朝礫石坑里開槍。我朋友說：‘看看那些雜種干了什么！’我們看見一個卡波用棍子打一個快要咽氣的人。我的朋友受過軍訓，他說：‘那些人是戰俘，他們是有自己的權利的！’但他們卻在干活的時候被打死了。”就這樣，1941年夏，東線這場沒有約束的戰爭把奧斯維辛也卷了進來。

當然，殺害蘇聯政委只是這個時期奧斯維辛的一小部分工作，它最重要的用途仍是鎮壓和威懾波蘭人。為全力保證集中營滿足國家在這方面的要求，霍斯一直在努力減少越獄事件的發生。1940年，只有兩人試圖逃跑，但到了1941年，這個數字上升到17人（之后數字繼續增加，1942年迅速增至173人，1943年增至295人，1944年增至312人）。[[55]](#_55__Yin_Zi_Henryk_Swiebocki__Ta)由于早期絕大部分犯人都是波蘭人，且當地居民對他們充滿同情，因此只要這些囚犯能夠突破集中營的防護設施，就有可能混進因種族重組而大批遷徙的人潮中，從此銷聲匿跡。白天很多囚犯在遠離營地的地方勞作，他們甚至都不需要翻越環繞集中營的帶電鐵絲網，只要翻越外圍的警戒籬墻（Grosse Postenkette）即可。

霍斯防止越獄的方法很簡單，那就是采用殘酷的懲罰措施：如果納粹抓不到越獄者，就把他的親戚關起來，還會從他所屬的分隊里挑出10名犯人，故意用特別殘忍的方式將他們處死。1941年，羅曼 ·特羅揚諾維斯基曾三次因自己身邊有人逃跑而被叫去參加篩選。“集中營長官和其他人會盯著犯人的眼睛看，”他說，“當然，那些看起來不太好的、特別虛弱的人往往最可能被選中。我也不知道在篩選的時候我都在想些什么，我就是不想看他的眼睛，但其實這樣很危險。你要努力站得很直，這樣就沒人注意到你。當弗里奇在某個人面前停下來，伸出他的手指的時候，你并不知道他在指哪里，但你的心跳都要停止了。”特羅揚諾維斯基記得，有一次篩選特別能反映出集中營長官卡爾·弗里奇的個性：“在這次篩選中，弗里奇注意到離我不遠的一個人站在那里瑟瑟發抖。他問：‘你為什么發抖？’翻譯轉述了他的回答：‘我發抖是因為我害怕。我家里還有好幾個小孩，我想把他們養大。我不想死。’然后弗里奇說：‘當心點，別再有第二次。如果再讓我看見，我就把你送去那里。’他指了指焚化爐的煙囪。那個人沒聽懂，看到弗里奇的手勢，他往前邁了一步。翻譯說：‘長官沒選你，回去。’但弗里奇說：‘別管他，既然他站出來了，這就是他的命。’”

被選中的犯人會被帶到11號樓，鎖在房間里活活餓死。這是一個漫長而痛苦的過程。羅曼 ·特羅揚諾維斯基得知，他認識的一個人在餓了一個多星期后，竟然吃自己的鞋子。不過，在1941年的那個夏天，11號樓的禁食牢房中也發生過在這段黑暗的歷史中實屬罕見的事，讓那些愿意相信犯人有獲救可能的人感到慰藉。馬克西米利安·科爾貝是華沙的一位羅馬天主教神父。由于他所在的營房有一位犯人逃跑，他被迫參加篩選。站在他身邊的弗朗齊歇克·加文澤科被弗里奇選中，但是他哭喊著說自己妻兒還在等他回去。科爾貝主動要求替他。弗里奇同意了。兩星期后，還活著的四個人（包括科爾貝在內）被注射毒劑處死。1982年，科爾貝被波蘭籍教宗約翰·保羅二世封圣。他的事跡引起不小的爭議，原因之一是他在被捕前出版的一份雜志中，有反猶主義內容。然而，對他犧牲自己生命去拯救別人的勇氣，沒人對此有過質疑。

同樣是在1941年7月，納粹頭子在數千英里外做出的一系列決定，讓奧斯維辛日后的罪孽無以復加。這是第一次，奧斯維辛的犯人將面臨毒氣處決，不過不是以最終讓奧斯維辛聲名狼藉的那種方式。這些即將被殺害的犯人是納粹“成年人安樂死”項目的犧牲品。其源頭可追溯到1939年10月，當時元首下達了一項指示，允許醫生挑出患有慢性精神疾病或身體有殘疾的病人將他們殺死。一開始醫生們給殘疾人注射化學藥劑，但后來他們更愛使用瓶裝的一氧化碳。一些精神病院被改造成特殊的屠殺中心，在里面修建外觀如淋浴室的毒氣室。此前的幾個月，希特勒已經批準了對殘疾兒童的殺害。這是在貫徹他那套極端達爾文主義的冷酷世界觀。這些孩子被剝奪了生命，因為他們身體的劣勢將對德國社會造成負擔。同時，作為種族理論的堅定擁護者，希特勒擔心這些孩子一旦長大成人，極有可能會繁衍自己的后代。

9月1日，隨著戰爭的打響，安樂死項目的受害者擴大到成年人，戰爭又一次成為激化納粹思想的催化劑。在狂熱的民族社會主義者看來，殘疾人也是“Ballastexistenzen”，對處在交戰狀態中的國家更是一個累贅。普凡繆勒博士（Dr. Pfannmüller）是成年人安樂死項目中最惡名昭彰的人物之一，他如此表達自己的感受：“我們最優秀、最精英的年輕人跑去前線送死，好讓那些低能的白癡和不負責任的反社會分子安全地躲在精神病院里，想到這些真讓我難以忍受。”[[56]](#_56__Yin_Zi_Robert_Jay_Lifton)行兇者如此思維，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為何篩選的標準不僅包括病人生理或心理疾病的嚴重程度，也涉及他們的宗教信仰和種族背景。結果，精神病院里的猶太人不經篩選便全數送去毒死；而東部波蘭精神病院里的病人也以同樣的方式被殘忍殺害。1939年10月至1940年5月間，約1萬名精神病患者在西普魯士和瓦爾特大區遇害，其中很多是通過一種新的裝置——四輪毒氣室。受害者被塞進一輛經過改裝的貨車后部的密封車廂內，裝在瓶子里的一氧化碳使他們窒息而死。由此，“生存空間”得以釋出給即將到來的德意志人。

1941年初，成年人安樂死項目推廣到各個集中營，這一行動被稱為“14f13”。奧斯維辛從7月28日開始執行。“晚點名時他們宣布，所有病人都可以離開這里接受治療。”卡齊米日·什莫倫[[57]](#_57__BBCFang_Tan)說，他當時是營中的一名政治犯，“有些犯人信以為真。大家都燃起了希望。但我不太相信黨衛隊會這么好心。” 威廉·布拉塞也不信，他的卡波是一個德國共產黨人，從后者那里他揣測這些病人后來的下場：“他跟我們說，在薩克森豪森集中營有傳言，那些從醫院被帶走的人后來都消失了。”

大約有500名或自愿或被挑中的犯人離開了集中營，等待列車的到來。“他們都病懨懨的，”卡齊米日·什莫倫說，“沒有一個健康的人，他們就像一群幽靈一樣。護士們走在隊尾，用擔架抬著病人。那個場景讓人毛骨悚然。沒人沖他們嚷嚷，也沒有人笑。那些病號倒是興高采烈：‘告訴我的老婆孩子關于我的消息。’”讓犯人高興的是，兩個最惡劣的卡波也在隊伍之中，其中一個是很多人憎恨的克蘭克曼。營里有傳言說他跟他的保護人，即營地長官弗里奇鬧翻了。正如希姆萊所說——當卡波回到普通犯人中會發生什么——幾乎可以肯定在火車到達目的地之前這兩個卡波就已經被打死了。那天離開集中營的所有犯人都被送到但澤附近的宗嫩斯坦（Sonnenstein），死于一所經過改造的精神病院里的毒氣室。也就是說，第一批被毒氣殺害的奧斯維辛囚犯并沒有死在集中營，而是被轉運到德國；他們也不是出于猶太人身份而遭到殺害，而是因為他們無法勞動。

1941年的夏天不僅是奧斯維辛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時間節點，也是對蘇戰爭中的決定性時刻，納粹對蘇聯猶太人的政策即將發生轉變。從表面上看，整個7月的戰爭形勢對德國非常有利，德國國防軍對蘇聯紅軍的戰斗取得了巨大勝利。7月3日，陸軍總司令部的弗朗茨·哈爾德在他的日記中寫道：“現在看來大概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對蘇戰爭在兩個星期的時間里就取得了勝利。”戈培爾7月8日的日記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我們將擊潰蘇聯——沒人對此再有疑問。”7月中旬，德軍裝甲部隊已經深入蘇聯達350英里，到了月底，一名蘇聯情報官員奉貝利亞之命，找到駐莫斯科的保加利亞大使，詢問他是否愿意作為德蘇之間的調解人向德國請求講和。[[58]](#_58__Ruo_Xiang_Le_Jie_Guan_Yu_Pa)

然而，實際情況要更為復雜。饑餓政策一直是入侵策略的重要組成部分。舉例來說，立陶宛的首都維爾紐斯在7月初的糧食儲備只夠維持兩周。戈林在申明納粹的政策時曾說過，作為占領者的德軍只會給那些“為德國執行重要任務的人”提供食物。[[59]](#_59__Yin_Zi_Ulrich_HerbertBian_Z)另外，死在特別行動隊槍下的猶太男人所留下的家眷也有待解決。這些女人和孩子大多數失去了家里的頂梁柱，很快就陷入饑饉；畢竟他們絕不會是“為德國執行重要任務的人”。

與此同時，食物短缺的危機已經有所預見——不僅是東部戰場，還包括波蘭羅茲的猶太人隔離區。當時掌管羅茲的是帝國保安總部負責處理猶太人事務的阿道夫·艾希曼，7月，黨衛隊的羅爾夫—海因茨·赫普納給艾希曼的信中提到：“我們無法再養活所有的猶太人，這會是今年冬天的麻煩事之一。應該認真權衡一下，用一些簡便快捷的辦法解決那些不再適合工作的猶太人，或許還算人道。不管怎么說，總比讓他們活活餓死要好。”（值得注意的是，赫普納信中寫到的可能需要殺死的是那些“不再適合工作”的猶太人，而不是所有猶太人。從1941年春天開始，納粹越來越多地將“有用的”和“無用的”猶太人區別開來，這種區分后來在奧斯維辛著名的“篩選”中體現得更為明顯。）

7月底，希姆萊下令解決被納粹判定為“沒有利用價值、純粹浪費口糧”的猶太人，尤其是針對東部戰線。他將黨衛隊騎兵營和警察營的部分兵力調到特別行動隊，最終大約有4萬人參與屠殺行動，是特別行動隊成立之初人數的十倍。大幅增加人手的原因在于，在東部，屠殺的對象擴展至猶太婦女和兒童。在接下來的幾周，這一命令先后傳到各個特別行動隊指揮官那里，大多是由希姆萊本人在巡視行刑的過程中親自下達的。到了8月中旬，這些特別行動隊的指揮官已全部獲悉他們的新任務。

這是整個屠殺進程的一個轉折。槍殺婦女和兒童，意味著納粹對猶太人的迫害進入到一個概念完全不同的階段。盡管到目前為止，納粹在戰爭中的所有反猶政策幾乎都有潛在的種族滅絕性質，且已有不少猶太婦女和兒童死在猶太人隔離區或失敗的尼斯科計劃中，但這次不一樣。現在，納粹決定把猶太婦女兒童集中在一起，讓他們脫光衣服，在一個大坑前站成一排，然后開槍把他們打死。一個猶太嬰兒絕無可能對德國的戰爭形勢構成威脅，然而一個德國士兵卻以此為借口朝幼小的孩童扣動扳機。

許多因素在這個關鍵時期共同促成了這一政策變化，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前提條件是，蘇聯的猶太婦女兒童現在成了納粹德國的“燙手山芋”，當然這也是后者一手造成的，他們射殺猶太男人并在東部實行饑餓政策。但這不是導致殺戮目標擴大的唯一原因。7月，希特勒宣布將在東部建立一個德意志人的“伊甸園”，言外之意是，在納粹的這片新樂園上不會再有猶太人的生存空間。（這一年7月希姆萊曾多次與希特勒進行一對一的密談，此后他便下令將屠殺的對象擴大到婦女和兒童，這絕非出于偶然；若不是元首本人有意如此，這一舉措很可能不會發生。）由于相關負責隊伍已經忙于槍決猶太男人，按照納粹的邏輯，擴大特別行動隊隊伍自是順理成章，以便徹底“凈化”這個新的“伊甸園”。

1941年夏，黨衛隊派出數支步兵團前往東部增援特別行動隊，漢斯·弗里德里希[[60]](#_60__BBCFang_Tan)是其中一員，他所在的分隊主要負責烏克蘭地區。據他所言，遭到迫害的猶太人沒有絲毫反抗。“他們（猶太人）極度震驚，完全嚇傻了，你可以為所欲為。反正他們已經聽天由命。”黨衛隊和他們的烏克蘭合作者強行把猶太人趕出村子，讓他們站在一個“又大又深的坑旁邊，以特定的姿勢，好保證被擊斃后會掉進坑里。這樣的場景一次又一次地出現。有人負責跳進坑里仔細查看是否還有活口，因為不可能第一輪開槍就解決所有人。那些躺在那里只是受了傷的，會被用手槍補上一槍”。

弗里德里希承認，他自己也參與了深坑旁的屠殺。[[61]](#_61__20Shi_Ji_60Nian_Dai__Jing_C)他說，當受害者站在離他僅幾米遠的地方時，他“什么也沒想”。“我只想著‘仔細瞄準，一定打中’。我想的就是這個。當你已經站在那兒，拿著槍準備射擊……要做的就是，拿穩手里的槍，打得準一些。沒別的了。”他從沒有因自己殺死這么多人而遭到良心譴責，從沒有做過與此相關的噩夢，也不曾在半夜醒來質問自己到底做了什么。

檔案證實，弗里德里希是黨衛軍第一步兵旅的士兵，這支部隊7月23日進入烏克蘭。或許是因為年代久遠，或許是不愿更多地談及自己的罪行，弗里德里希沒有具體說明他行兇的確切地點，然而，有記錄顯示，他所在的分隊在不同地點都參與了屠戮猶太人的行動，包括1941年8月4日在烏克蘭西部。在那次行動中，周邊村莊里的1萬多名猶太人被迫離開自己的家，聚集到奧斯特羅格鎮（Ostrog）。“（8月4日）一大早，小汽車和大卡車都開來了，”瓦西里·瓦爾德曼[[62]](#_62__BBCFang_Tan)那時是個12歲的猶太小男孩，“他們都帶著槍，還牽著狗。”黨衛隊包圍了整個鎮子，把數千名猶太人都趕出來，讓他們朝附近的一個小村子走去，那里有一大片沙地。“大家都知道自己要挨槍子兒，”瓦爾德曼說，“但黨衛隊不可能一下開槍打死這么多人。我們是（早上）10點鐘到的，他們命令我們所有人都坐下。那天非常熱。我們沒吃沒喝，人們隨地小便。那段時間很難熬。有人說他寧愿被槍打死也不愿意這么熱的天坐在那里。有人暈倒，還有人純粹因為害怕給嚇死了。”

奧萊克西·穆萊維奇[[63]](#_63__BBCFang_Tan)是當地的非猶太裔村民，他目睹了后來發生的一切。爬上附近一個谷倉的屋頂后，他看見50個或100個猶太人一組組被帶走，又被命令脫光衣服。“他們讓猶太人站在一個大坑邊上，然后長官讓士兵各自找一個猶太人準備開槍……猶太人大哭大叫，他們知道自己就要死了。接著所有人都開了槍，猶太人都倒下了。長官找來幾個強壯的猶太人把這些尸體扔進坑里。”

槍殺持續了一整天。幾千名猶太人死去，包括男人、女人和小孩。然而，這次行動中的猶太人實在太多了，黨衛隊一次忙不過來，所以到了傍晚，剩下的人，包括瓦西里·瓦爾德曼和他的家人在內又回到了奧斯特羅格。在這次和后來的幾次行動中，瓦西里失去了他的父親、祖母、祖父、兩個兄弟和兩個叔叔，但他和母親成功逃離了猶太人隔離區，在接下來的三年里藏在當地村民家里，直到紅軍解放烏克蘭。“我不知道其他村子是什么樣的，”他說，“但我們村的人對猶太人很仗義。”幾天后，奧萊克西·穆萊維奇來到屠殺現場，眼前的景象讓他毛骨悚然：“填埋坑洞的沙面在動。我想有受傷的人正在下面掙扎。我覺得很抱歉。我是想幫忙，但很快就意識到就算我能把誰挖出來，也沒法治好他們的傷。”

“我們家養過狗，”瓦西里·瓦爾德曼說，“但我們對它們從沒有像法西斯對待我們這么殘忍……我一直在想：‘是什么讓這些人如此殘暴？’”瓦西里·瓦爾德曼的這個問題，漢斯·弗里德里希可以回答——仇恨。“坦白講，我一點都不同情（猶太人）。因為猶太人深深地傷害了我和我的父母，對此我終生難忘。”因此，對所有被自己射殺的猶太人，弗里德里希“并不感到抱歉”。“我對猶太人的仇恨太深了。”在不斷追問下，他承認，他曾經認為、且現在依然認為，為了“復仇”殺死猶太人是完全正當的。

了解弗里德里希的過去，可以幫我們更好地理解他為何愿意參與屠殺，為何直到今天還在為自己的行為辯護。1921年，弗里德里希生于羅馬尼亞一個德意志人占絕大多數的地區。他自小就耳濡目染家人對身邊猶太人的痛恨。他的父親是農民，當地的猶太人是貿易商，購買農產品然后在市場上出售。弗里德里希的父母告訴他，猶太人做生意賺取了過分的利潤，而且經常欺騙他和他的家人。“我倒想看看，”他補充道，“如果你經歷我們的遭遇，你會怎么做。如果你是一個農民，想要出售東西，比如說賣豬，但你卻辦不到。你只能通過一個猶太商人來賣。你設身處地地想一下，不再是自己生活的主人是什么滋味。”

20世紀30年代，還是少年的弗里德里希和他的朋友自己繪制海報，寫上“不要從猶太人那里買東西”、“猶太人是我們的災難”，并把它們貼在一家猶太商店門口。他為自己的行為感到“自豪”，認為它起到“提醒人們提防猶太人”的作用。他讀到納粹德國的宣傳口號、特別是極端反猶主義刊物《先鋒報》時，發現這與他自己的世界觀非常契合。1940年，他加入黨衛隊，“因為德意志帝國正在打仗”，而他“想要參與其中”。他相信“猶太人與布爾什維克主義之間有密切關系，有足夠的證據可以證明這一點”。1941年夏黨衛隊來到烏克蘭時，作為其中的一員，他認為自己進入的并不是一個“像法國那樣的”“文明”國家，頂多只是個“半開化”、“遠遠落后于歐洲的”地方。因此，接到屠殺猶太人的命令，他心甘情愿地執行，并且一直想著自己是在報復那些“欺騙”了他家人的猶太商人。雖然此猶太人非彼猶太人——他殺的根本是另一個國家的人，但這對弗里德里希來說毫不重要。他說：“反正都是猶太人。”

對于曾經參與滅絕猶太人，漢斯·弗里德里希毫無歉意，也從未后悔。雖然沒有明說，但其一舉一動都表明，他為自己和戰友所做的一切感到自豪。在他看來，他的行為有著明確和充分的理由，那就是猶太人給他和他的家人造成傷害，沒有猶太人的世界會更加美好。阿道夫·艾希曼曾在不經意間表露，一想到自己參與過對數百萬猶太人的屠殺，他就感到極大的滿足，以至于可以“大笑著進墳墓”了。不難看出，漢斯·弗里德里希很可能也有同樣的感受。

我們仍無法確定，是否就在1941年這個夏天——與東部戰線屠戮升級同時——納粹最終定下了針對德國、波蘭和整個西歐數百萬猶太人的“最終解決”方案。有一份檔案也許能說明，這兩者之間確實存在關聯。7月31日，海德里希拿到一張有戈林簽名的文件，上面寫著：“1939年1月24日你曾接到一項任務，要求你以最合適的方式對猶太人進行轉移和疏散，以解決猶太問題。作為對該任務的補充，我在此要求你提交一份全面的規劃書，為正在計劃中的猶太人最終解決方案提出有組織、有調研、可付諸實行的初步措施。”表面看來，這份文件的時間點是關鍵：戈林給海德里希簽字、授意他策劃“最終解決”方案的時間，恰恰也是特別行動隊受命在東部戰線射殺猶太婦女和兒童的時間。

然而，近來莫斯科特別檔案館（Moscow Special Archive）的新發現對7月31日授權的確切意義提出了質疑。這包括海德里希1941年3月26日的一張便箋，上面寫著：“我就猶太問題向帝國元帥（戈林）做了簡單匯報，交給他我的新計劃。他批準了，只做了一處關于羅森堡管轄范圍的修改，然后讓我重新提交。”[[64]](#_64__Yin_Zi_Gotz_Aly__You_Tai_Re)海德里希之所以制定“新計劃”，很可能是納粹的反猶政策在入侵蘇聯前夕發生了變化，為此他也做出相應調整。將猶太人運往非洲的設想已被放棄，1941年初，希特勒曾經命令海德里希準備一份日程表，就如何將猶太人驅逐到德國控制范圍內的某地做出規劃。按照納粹的預期，對蘇戰爭應該只會持續幾周時間，并在蘇聯的寒冬到來之前結束，因此海德里希和希特勒一定認為，在那年秋天將猶太人趕往更靠東的地方，以此內部消化他們自己制造出來的猶太問題，是順理成章的事。蘇聯東部的不毛之地是折磨猶太人的最好去處。

正如7月31日授權書里清楚寫到的，海德里希在1939年初就接到任務，策劃如何“通過轉移和疏散解決猶太問題”，因此，關于海德里希的管轄范圍，以及在納粹體制內為此目的所允許的資源調用空間，相關討論一定從那時起就沒有停止過。1941年7月17日，阿爾弗雷德·羅森堡（Alfred Rosenberg，3月26日的文檔上曾提到他）被希特勒正式任命為帝國東部占領區事務部長，他對海德里希在東部的權力構成潛在威脅。因此，7月31日的授權書很可能只是為了明確海德里希的職權而做出的。

因此，總的來說，新證據并不支持一個曾經非常流行的觀點，即希特勒在1941年春天或夏天做出最終決定，要消滅全歐洲的猶太人，且7月31日的授權是這個決定的重要組成部分。更可能的情況是，由于當時所有納粹領導人關注的焦點都在對蘇戰爭上，他們認為在東部戰線屠殺猶太婦女兒童，可以成為解決眼下具體問題的好辦法。

然而，這個“解決方案”后來反而制造出更多問題，這才導致開發新的屠殺手段，以便更大規模地解決猶太人和其他處決對象。在這一轉變過程中，一個關鍵的時間點是8月15日。那天，海因里希·希姆萊來到明斯克，親眼目睹他的特別行動隊執行任務的過程。與他同行的人當中，瓦爾特·弗倫茨[[65]](#_65__BBCFang_Tan)是一名空軍軍官，在希特勒的總部做攝影師。處決現場讓弗倫茨本人驚恐不已，難以平復，他明顯看出處決者隊伍中也有人是同樣感受。弗倫茨說：“我到了處決現場不久，輔助部隊的長官走過來，因為我是空軍。他說：‘中尉，我實在受不了了。你能讓我離開這兒嗎？’我說：‘在警察那邊我怕是說不上話，畢竟我屬于空軍，能怎么辦呢？’他說：‘我實在受不了。太可怕了！’”

對明斯克屠殺留下心理創傷的不僅僅有這位長官，同樣目睹屠殺過程的黨衛隊全國副總指揮，巴赫-澤勒維斯基對希姆萊說：“這還只是區區一百人……看看這個分隊士兵的眼睛，有多驚恐！這些人下半輩子都完了。我們在這里培養的是什么樣的追隨者？要么就是瘋子，要么就是野蠻人！”[[66]](#_66__Yin_Zi_Glover___Ren_Xing)后來，巴赫-澤勒維斯基自己也深受精神疾病的困擾，眼前一再出現他所參與的行刑場景“幻象”。

受到這些抗議以及自己親身經歷的影響，希姆萊下令開辟一種新的屠殺方法，以減少部下的心理問題。于是，幾個星期后，刑事警察局技術研究所的黨衛隊少尉阿爾伯特·威德曼博士來到東部，在特別行動隊B分隊指揮官阿圖爾·納貝位于明斯克的總部與他會面。威德曼曾參與設計用毒氣殺害精神病人，現在，他將把他的專業知識帶到東部。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威德曼在蘇聯最先嘗試的幾個“改良版”屠殺方法，其中之一竟是將受害者炸死。一個地洞中放進幾個精神病人和幾包炸藥，特別行動隊第八分隊隊長威廉·雅施克目睹了接下來發生的一幕：“當時的場面太可怕了。炸藥的威力不夠強，有些傷者嚎叫著從地洞里爬出來……[[67]](#_67__Dui_WidmannShen_Pan_Guo_Che)地洞完全塌了……肢體殘片散落在地上，有的還掛在樹上。第二天，我們去收拾斷肢，把它們都扔回地洞里。有些掛在樹上的太高了，只好留在上面。”[[68]](#_68__Wilhelm_JaschkeDe_Zheng_Ci)

威德曼從這個可怕的實驗中得到的結論是，炸彈顯然不是希姆萊想要的殺人工具，所以他另尋他法。在成年人安樂死項目中，瓶裝一氧化碳的應用非常成功，但要把大量這樣的瓶子從幾千英里以外運到東部很不現實。威德曼和他的同僚想到，或許可以用另一種方式來利用一氧化碳進行殺戮。幾個星期之前，威德曼和他的上司瓦爾特·霍斯博士坐在柏林地鐵的車廂中，聊到差點降臨在阿圖爾·納貝身上的厄運：派對結束后他開車回家，由于喝了太多酒，他把車停在車庫里，沒有關掉發動機就睡著了，結果汽車尾氣幾乎讓他死于一氧化碳中毒。納貝的經歷提醒了威德曼，他決定進行一次毒氣試驗。在明斯克東部的莫吉列夫，他把管子的一頭接在小轎車的排氣管上，另一頭伸進一家精神病院磚砌的地下室里，然后把幾名病人鎖在里面，發動汽車。最初的試驗在納粹看來并不成功，因為小轎車排放出來的一氧化碳不足以置人于死地。在他們用卡車替代小轎車后，這一問題得到了解決。再一次，納粹以為找到了解決眼前問題的辦法。威德曼發明的方法便宜又高效，可以把殺戮對屠殺者造成的負面心理影響降到最低。

于是，1941年秋天，威德曼在東部促成了納粹屠殺手段的一個重大轉變——關于這點，我們是可以確定的，然而，納粹如何以及何時決定讓奧斯維辛在猶太人大屠殺中扮演重要角色，這些仍存在爭議。問題的棘手一部分源于霍斯提供的證詞。一方面，他總是把自己偽裝成受希姆萊的命令所迫，受下屬的無能所累；另一方面，他提供的日期常常是不可靠的。霍斯聲稱：“1941年夏天，希姆萊把我叫去，向我解釋道：‘元首已經下令對猶太問題進行最終解決，我們必須要完成這項任務。出于交通和封閉性的考慮，我選了奧斯維辛。’”[[69]](#_69__GilbertZheng_Ren_Chen_Shu_S)霍斯確實在1941年6月拜訪過希姆萊，向這位黨衛隊全國領袖展示，他們正按照IG法本公司提出的擴張方案對奧斯維辛進行規劃。但如果說這個時候他就被告知奧斯維辛將在“最終解決”中發揮作用，這其實不太可信。首先，沒有其他證據表明，在這個階段“最終解決”——即對滅絕營中的猶太人進行工業化滅絕的方案已經被確定下來。在時間上，這次會議早于最初特別行動隊在東部針對猶太男性的屠戮，以及7月底屠殺對象的擴大。其次，霍斯后來補充的話與他自己說的日期相互矛盾。他說：“那個時候在總督轄區已經有其他三個滅絕營了——貝爾賽克、特雷布林卡和索比堡。”然而實際上1941年夏天這三個集中營都沒有建成，它們都是在1942年才投入使用的。

盡管霍斯的陳述自相矛盾，一些學者認為，1941年6月他可能被要求在奧斯維辛建造一些滅絕設施。然而，1941年夏秋之交，奧斯維辛殺人效率的提高并不足以證明霍斯6月與希姆萊的會面帶來了實質性改變。最好的解釋就是他自己記錯了日期。霍斯所描述的他與希姆萊之間的對話很可能確實發生過，但應該是在接下來的一年，而不是1941年。

當然，這并不是說奧斯維辛在那個夏天沒有卷入屠殺。奧斯維辛的行兇者在14f13項目中除掉了生病的犯人，在礫石坑旁射殺過蘇聯政委，因此它的管理者與東部特別行動隊面臨相同的問題——尋找一種更有效的屠殺手段。奧斯維辛的決定性時刻似乎出現在霍斯離開集中營的這段時間，也就是8月底或9月初。霍斯的副手弗里奇想到，一種為防止營地附近昆蟲侵擾而使用的化學制劑——結晶氫氰酸可以用作他途。這種制劑裝在鐵罐中出售，被定名為齊克隆氫氰酸，更廣為人知的名稱是齊克隆B（Zyklon B）。與威德曼在東部的做法類似，弗里奇此時也做出一個合乎邏輯的思維跳躍——如果齊克隆B可以殺死虱子，誰說不能用它來殺死人類中的害蟲？既然11號樓已經是營中執行死刑的地方，而且它的地下室可以密封，可不就是進行這種實驗最適合的地方嗎？

此時的奧斯維辛沒有不透風的墻，大樓之間僅相隔數米，小道消息不脛而走。因此，從一開始，弗里奇的實驗就人盡皆知。“我可以看到他們用手推車運來泥土，好把窗戶封嚴，”威廉·布拉塞說，“我還看見，有一天他們從醫院里用擔架抬出幾個病得特別重的人，把他們抬進了11號樓。”被帶進11號樓的不只是病人，不難想象，還有奧斯維辛管理者曾聲明要處死的另一個目標群體——蘇聯政委。“他們帶了一群蘇聯戰俘去地下室，”奧古斯特·科瓦爾奇克說，“結果毒氣的效果不夠好，很多人到了第二天還活著。所以他們加大了劑量，放進更多晶體顆粒。”

霍斯回到集中營后，弗里奇向他匯報了實驗的情況。霍斯參加了11號樓接下來的一次毒氣試驗：“我戴著防毒面具親自觀看了屠殺過程。在擁擠的牢房里，齊克隆B剛被扔進去，里面的人就被毒死了。他們只來得及發出短促的、憋悶的喊叫，一切就已結束。”雖然證據表明，11號樓發生的死亡遠非“瞬間結束”，但對奧斯維辛的納粹分子來說，使用齊克隆B顯然大大減輕了屠殺過程帶來的痛苦，屠殺者不用再在行刑過程中注視受害人的眼睛。霍斯寫道，這種新的屠殺方法出現讓他“如釋重負”，因為他終于可以“不再看到”“血流成河的場面”。

然而他錯了，真正的血洗才剛剛開始。

[[1]](#filepos93213) BBC訪談。

[[2]](#filepos94756) 我們當然有權質疑這種用寬泛心理學原因解釋納粹分子行為的做法，但Alice Miller在《為你自己好：兒童養育中的暴力根源》（For Your Own Good: the Roots of Violence in Child-rearing, Virago Press, 1987）一書中指出，所有納粹領導人都有著與霍斯和希特勒相似的嚴厲教養過程。然而，即便如此，還是有很多有著類似童年經歷的人沒有成為納粹。

[[3]](#filepos96649) 引自《達豪集中營：1933—1945》（Comité International de Dachau, Brussels Lipp GmbH, Munich 1978），第20頁。

[[4]](#filepos97137) 魯道夫·霍斯，《奧斯維辛指揮官》（Commandant of Auschwitz, Phoenix Press 2000），第131頁。

[[5]](#filepos97776) 霍斯，《指揮官》（Commandant），第131頁（為便于參閱，我在這里給出了成書頁碼，但所引用的文字大部分翻譯自奧斯維辛-比克瑙國立博物館保存的手稿原文）。

[[6]](#filepos99009) 在此前一年，也就是1933年，霍斯曾在波美拉尼亞的Sallentin estate組建了一支黨衛隊騎兵隊，當時還是農民的他就已經積極地參與到“后備力量”當中了。

[[7]](#filepos99586) 霍斯，《指揮官》，第64頁。

[[8]](#filepos100564) BBC訪談。

[[9]](#filepos102969) 當然，一部分政治家是猶太人，但猶太人身份并不是他們被捕的原因。

[[10]](#filepos103137) 霍斯，《指揮官》，第81頁。

[[11]](#filepos104723) 霍斯，《指揮官》，第70—71頁。

[[12]](#filepos105191) BBC訪談。

[[13]](#filepos106751) 引自Danuta Czech的文章“奧斯維辛的囚犯管理”（The Auschwitz Prisoner Administration），載于Yisreal Gutman Michael Berenbaum編著，《奧斯維辛滅絕營剖析》（The Anatomy of the Auschwitz Death Camp,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8）。

[[14]](#filepos107290) Laurence Rees，《納粹：歷史的警告》（The Nazis: a Warning from History, BBC Books 1997），第36頁。

[[15]](#filepos108061) 引自Franciszek Piper，“大屠殺的方法”（The Methods of Mass Murder），載于《奧斯維辛：1940—1945》，第三卷，第71頁。

[[16]](#filepos109725) 引自Jonathan Glover，《人性》，第344頁。

[[17]](#filepos110873) 引自Glover，《人性》，第361—362頁。

[[18]](#filepos111528) 霍斯，《指揮官》，第77頁。

[[19]](#filepos116240) 引自Aly，《最終解決》，第19頁。

[[20]](#filepos117577) BBC訪談。

[[21]](#filepos121671) Aly，《最終解決》，第17頁。

[[22]](#filepos123117) BBC訪談。

[[23]](#filepos124904) 戈培爾日記，1940年1月24日。

[[24]](#filepos126176) 引自Raul Hilberg，《歐洲猶太人的毀滅》，（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Jews, Holmes and Meier 1986），第50頁。

[[25]](#filepos126608) 引自Aly，《最終解決》，第70頁。

[[26]](#filepos127073) BBC訪談。

[[27]](#filepos128306) BBC訪談。

[[28]](#filepos129805) 引自J. Noakes和G. Pridham編著，《納粹主義：1919—1945》（Nazism 1919—1945, Vol. 3, Exeter University Press 1988），第三卷，第933頁。

[[29]](#filepos131571) 引自Aly，《最終解決》，第3頁。

[[30]](#filepos132864) 德國外事辦公室備忘錄，1940年7月3日。

[[31]](#filepos136043) BBC訪談。

[[32]](#filepos136406) BBC訪談。

[[33]](#filepos138991) 霍斯，《指揮官》，第116頁。

[[34]](#filepos143398) BBC訪談。

[[35]](#filepos146090) Albert Speer的原話，轉述自他的兄弟Hermann，引自Michael Thad Allen著，《種族滅絕的生意——納粹黨衛隊、苦役與集中營》（The Business of Genocide-the SS, Slave Labor, and the Concentration Camps,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2），第59頁。

[[36]](#filepos146631) Allen，《生意》，特別見第二章（A Political Economy of Misery）。

[[37]](#filepos147612) 霍斯，《指揮官》，第283頁。

[[38]](#filepos150984) BBC訪談。

[[39]](#filepos155453) 引自Irena Strzelecka,“刑罰與折磨”（Punishments and Torture），載于《奧斯維辛 1940—1945》，第二卷，第389頁。

[[40]](#filepos158037) 《納粹黨衛隊眼中的奧斯維辛集中營》（KL Auschwitz as Seen by the SS，奧斯維辛-比克瑙國立博物館1998年），第117頁。

[[41]](#filepos158832) BBC訪談。

[[42]](#filepos164636) Peter Hayes，《工業與意識形態——納粹時期的IG法本》（Industry and Ideology-I. G. Farben in the Nazi Er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第347—364頁。

[[43]](#filepos166676) 安布羅斯的檔案，引自Hayes，《工業》，第349頁。

[[44]](#filepos166949) Franciszek Piper，“對苦役犯的剝削”（The Exploitation of Prison Labour），載于《奧斯維辛：1940—1945》第二卷，第104頁。

[[45]](#filepos168221) 霍斯，《指揮官》，第390頁。另見Jan Sehn對霍斯的審訊，1946年11月7—8日于克拉科夫，波蘭國家記憶研究院（Instytut Pamięci Narodowej），華沙，NTN 103。

[[46]](#filepos170990) “IG法本-奧斯維辛創立大會”會議紀要，1941年4月7日。引自Deborah Dwork and Robert Jan van Pelt，《奧斯維辛：從1270年到今天》（Auschwitz 1270 to the Present，Norton 1996），第211頁。

[[47]](#filepos171502) IG法本公司“與集中營指揮官的會議報告，奧斯維辛附近，1941年3月27日下午3點”，紐倫堡審訊檔案 15148。另見納粹黨衛隊對同一會議的記錄。

[[48]](#filepos175194) 1941年5月2日會議紀要，紐倫堡審訊檔案第三十一卷，第84頁，文件編號2718-PS。

[[49]](#filepos175610) “政治經濟指導方針”，紐倫堡審訊檔案第三十六卷，第135—137頁。

[[50]](#filepos176501) Götz Aly和Susanne Heim,《種族滅絕締造者》（Architects of Annihilati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2002），第63—64頁。

[[51]](#filepos177763) 引自Aly和Heim，《種族滅絕締造者》，第237頁。

[[52]](#filepos178927) 引自Kershaw，《希特勒》第二卷（Penguin Press 2000），第127頁。

[[53]](#filepos181534) 引自Ernst Klee, Willi Dressen和Volker Riess，《那時歲月》（Those Were the Days, Hamish Hamilton 1991），第179頁。

[[54]](#filepos182597) 《政委法令》于1941年頒布，該法令規定，被俘的蘇軍政委可以直接處死。

[[55]](#filepos185069) 引自Henryk Swiebocki，“逃離集中營”，載于《奧斯維辛：1940—1945》，第四卷，第233頁。

[[56]](#filepos190059) 引自Robert Jay Lifton，《納粹醫生》（The Nazi Doctors , Basic Books 1986)， 第63頁。

[[57]](#filepos191121) BBC訪談。

[[58]](#filepos193679) 若想了解關于Pavel Sudoplatov這次拜訪的最新證據，可參閱Laurence Rees, 《世紀之戰》（War of the Century, BBC Books 1999），第53—55頁。

[[59]](#filepos194137) 引自Ulrich Herbert編著，《民族社會主義者的滅絕政策》，（National Socialist Extermination Policies, Berghahn Books 2000），第257頁。

[[60]](#filepos197932) BBC訪談。

[[61]](#filepos198779) 20世紀60年代，警察對弗里德里希進行了調查，了解他在戰爭時的所作所為，但沒有對他進行起訴。在我們的訪談中，他盡管承認參與了射殺猶太人的行動，但沒有說出他所犯下這些罪行的確切地點。在過了這么長時間以后，且在沒有目擊者親自辨認的前提下，要想“排除合理懷疑”，對他的罪行提起刑事訴訟似乎不太可能成功。

[[62]](#filepos199967) BBC訪談。

[[63]](#filepos200760) BBC訪談。

[[64]](#filepos207201) 引自Götz Aly，“猶太人的重新安置”（Jewish Resettlement），載于Herbert編著，《滅絕政策》（Extermination Policies），第71頁。

[[65]](#filepos209580) BBC訪談。

[[66]](#filepos210605) 引自Glover，《人性》，第345頁。

[[67]](#filepos211751) 對Widmann審判過程中Wilhelm Jaschke的證詞，斯圖加特陪審法庭 （Schwurgericht-Stuttgart）1967年，第62—63頁，路德維希堡國家檔案館（Staatsarchiv Ludwigsburg） EL317 III, Bu 53.

[[68]](#filepos212037) Wilhelm Jaschke的證詞，菲爾斯比堡，1960年4月5日，路德維希堡聯邦檔案館202AR-Z 152/159。

[[69]](#filepos214267) Gilbert證人陳述書，參見Dwork和van Pelt，《奧斯維辛：1270年至今》，第278頁。

# 第二章 服從命令與自主行動

1946年4月7日，美國心理學家古斯塔夫·吉爾伯特（Gustave Gilbert）博士在紐倫堡審判中質問魯道夫·霍斯：“希姆萊向你下達所謂的‘最終解決’命令后，難道你從沒想過拒絕嗎？”“沒有，”霍斯答道，“我們所接受的訓練讓我們不可能產生拒絕命令的念頭，不管是什么樣的命令……我想你沒法理解我們的世界。服從是我們與生俱來的要求。”[[1]](#_1__Yin_Zi_Gu_Si_Ta_Fu__Ji_Er_Bo)

霍斯和其他很多德國士兵一樣，戰敗后想讓全世界都以為他們是一群機器人，不管自己的真實想法是什么，永遠只能機械地服從上面給他們的各種命令。而事實上，霍斯跟機器人有著天壤之別。1941年下半年和1942年上半年，霍斯的創造力得到了最大程度的發揮，他并不是簡單地服從命令，而是積極主動地改造奧斯維辛，好消滅更多的囚犯。在這個關鍵時期，有類似想法和行動的并不只是霍斯一人，許多納粹分子都為此盡心盡力。下層的主動性和推波助瀾，是滅絕朝著越來越激進的方向發展的重要原因。戰爭結束后，霍斯與數百名納粹同伙一樣，試圖讓這個世界相信做出決定的只有一個人，那就是阿道夫·希特勒。其實，是許多人的集體意志促成了“最終解決”，證明這一結論的最好方法，便是深入了解1941年秋驅逐德國猶太人的決定是如何做出的。

那一年6月對蘇聯的侵略，促成了對蘇聯猶太人的徹底毀滅。槍斃猶太人——不分男女老少，這也是截至目前，納粹為解決自己制造出來的“猶太問題”所采取的種種方案中最激進的做法。但最初西歐和德意志帝國的猶太人并沒有被卷入這場殺戮。納粹依然認為，戰爭結束后他們將被“送往東部”，且按照希特勒、希姆萊和海德里希的樂觀估計，這在1941年秋天便能實現。我們無法想象，那些猶太人一旦“在戰爭結束后”被送到東部，等待他們的會是什么樣的命運，畢竟當時還沒有滅絕營。納粹很可能在占領的俄羅斯土地上找一個條件最惡劣的勞工營來接收他們。在這樣的地方，種族滅絕還是會發生，只是與后來在波蘭毒氣室里進行的流水線殺戮相比，過程會更加漫長。

可到了8月，一些納粹領導人開始失去耐心。他們知道，東線的蘇聯猶太人正在以人們所能想象到的最殘忍的方式被“處理”。開始有人提出，何不馬上把德國猶太人也送到那兒去？那個夏天，以宣傳部長兼柏林大區長官約瑟夫·戈培爾為首，一眾納粹分子強烈要求將柏林的猶太人驅逐到東部。在8月15日的一次會議上，戈培爾的國務秘書利奧波德·古特爾指出，柏林的7萬名猶太人中只有1.9萬人在工作。（當然，這是納粹自己造成的，他們制定了一系列針對德國猶太人的限制法令。）古特爾說，那些剩下的人都應該“被送到蘇聯……最好把他們都殺死”。[[2]](#_2__Yin_Zi_Christopher_Browning)戈培爾本人在8月19日與希特勒會面時也表示過類似的想法，希望盡快把柏林的猶太人遣走。

在納粹的意識形態構建里，德國猶太人在一戰中扮演了背叛者的角色。人們認為，德意志士兵在前線浴血奮戰，猶太人卻躲在大城市里享受著前者的流血犧牲換來的安穩。（事實上，在前線犧牲的德國猶太人比例與他們的德意志戰友不相上下。）而1941年夏天，當國防軍在東線卷入慘烈的戰爭，猶太人確實都留在了柏林——鑒于納粹禁止德國猶太人參軍，他們還能做什么呢？一如既往，最能印證納粹偏見的，往往是他們自己一手造成的結果。然而，盡管戈培爾多次提出，希特勒仍不愿意驅逐柏林的猶太人。他堅持認為贏得戰爭是當務之急，猶太問題需要再等等。不過，希特勒還是批準了戈培爾的一個請求——讓德國猶太人佩戴黃色星章，這是納粹反猶舉措的一個重要發展。在戰爭的頭幾個月，波蘭隔離區里的猶太人已經戴上了這種袖章，但到目前為止，德國的猶太人暫且得以免遭這種羞辱。

整個夏天和初秋，戈培爾并不是唯一試圖說服希特勒驅逐德國猶太人的納粹高官。9月15日，英國空襲漢堡，隨后，漢堡大區長官卡爾·考夫曼寫信給希特勒，請他準許驅逐漢堡市的猶太人，以便把他們的房屋騰出來提供給那些住宅被炸毀的非猶太市民。現在，把猶太人遣送到東部的請求源源不斷地來到希特勒面前，其中還包括阿爾弗雷德·羅森堡，他指出，由于斯大林最近把伏爾加的德意志人驅逐到西伯利亞，作為報復，納粹也應該驅逐中歐的猶太人。一下子，幾周前還說驅逐帝國猶太人不著急的希特勒改變了主意，那年9月，他決定，將這些猶太人遣往東部的行動可以開始了。

很重要的一點是，我們不該把這種政策轉變看成舉棋不定的希特勒向下屬屈服的結果。至少戰爭進展對他的影響不亞于下屬的請求所產生的效果。希特勒一直說，戰爭結束后就可以開始驅逐猶太人；而1941年9月，在納粹領導人看來，現在開始與“戰爭結束后”再做不過就差了幾周時間。基輔眼看就要淪陷，德軍馬上就可以長驅直入攻占莫斯科，希特勒仍希望能在冬天到來之前擊敗蘇聯。

接下來的問題便是：該把猶太人送往何處？希姆萊隨即給出了答案——何不把帝國的猶太人也送去波蘭的猶太人隔離區呢？9月18日，希姆萊寫信給波蘭瓦爾特的納粹大區長官亞瑟·格賴澤爾，要求他做好準備，讓羅茲隔離區接收6萬名來自“舊帝國”的猶太人。然而，希姆萊也知道這只是權宜之計，正如隔離區當局很快指出的，羅茲猶太人區的人口已經嚴重飽和。

17歲的露西爾·艾興格林[[3]](#_3__BBCFang_Tan)是希特勒改變政策后首批遭到驅逐的德國猶太人之一。1941年10月，她的母親接到一封掛號信，要求他們全家在24小時內做好離開漢堡的準備。此時，包括那些希望趕走他們的納粹分子，沒人能預見他們去往奧斯維辛的路途有多么漫長和痛苦。艾興格林一家此前已經吃了不少苦頭。露西爾的父親是波蘭人，在戰爭剛一開始就被抓去達豪。18個月過后，也就是1941年2月，家人終于得到他的消息。“蓋世太保來到我家門口，他們戴著帽子、穿著皮衣和皮靴，這是他們的標準裝扮，”露西爾·艾興格林說，“他們把一個雪茄盒扔到廚房的桌子上，說：‘這是本杰明·蘭道（她父親）的骨灰。’那究竟真是我父親的，還是從達豪的焚尸爐里隨便抓的一捧骨灰，我們永遠都無法知道。父親的死對我們是很大的打擊——我們所有人，特別是母親，還有妹妹，這給她留下了深深的心理創傷。”時隔8個月，露西爾同她的妹妹及母親也永遠地離開了自己的家園，在漢堡市民的注視下朝火車站走去。她們發現街上的人對她們的處境毫無同情心。“他們（非猶太人）一個個板著臉，”露西爾說，“要么說些難聽的話，要么就把頭別過去。我并不感到生氣，只是覺得害怕。”

烏韋·斯托約翰[[4]](#_4__BBCFang_Tan)是漢堡市民，當時16歲的他就站在街邊看著猶太人走過。他說：“大概有20%的人對此欣喜若狂，他們說：‘感謝上帝，這些一無是處的糧食浪費者終于消失了。’還說：‘他們不過是些寄生蟲。’這些人一直在鼓掌。但大部分人一聲不吭地看著眼前發生的一切，也正是這些人在戰爭結束后說：‘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們什么也沒看見。’他們回答問題的時候眼睛都看著別處。”斯托約翰的一個猶太朋友不得不以“令人心碎的方式”向他最愛的姑姑和祖母道別。他這個朋友只有四分之一猶太血統，可以留下，但他的姑姑和祖母是純種猶太人，所以不得不離開。烏韋·斯托約翰看著這令人心痛的一幕幕，一種感覺“揮之不去”：“那是一種感謝上帝你生下來不是猶太人的感覺。感謝上帝你不是他們中的一員。你本來很可能生在猶太人的家里，因為沒人能選擇誰是自己的父母，那么被趕去別處的就是你了，你走到哪兒都得戴著那顆星星。我到今天還能想起那種感受……”他繼續說道：“隨即我就想，這些人接下來會怎么樣？當然，聽過那么多傳言以后，其實我也知道他們不會有什么好下場的。他們會被送去一個特別可怕的地方。”

“普通”德國人對猶太人的命運究竟知道多少，這是個存在廣泛爭議的問題，而烏韋·斯托約翰所言大概最接近當時大多數德國人的了解程度。他們知道這些猶太人不會再回來了。漢堡出現了好幾個集市，售賣猶太家庭留下的家什雜物。同樣，不少“普通德國人”也知道，在東部，“不好的事情”正發生在猶太人身上。德國南部弗蘭肯（Franken）地區帝國保安部（SD，黨衛隊的情報部門，由萊因哈德·海德里希領導）的納粹官員撰寫的一份報告表明，納粹很關心德國人知道東部發生的屠殺后會有什么反應：“這些虔誠的教徒、樸實的村民之所以深感不安，最主要是他們聽到從蘇聯那邊傳來的消息，描述了對猶太人的槍殺和滅絕。這些傳言常常引起強烈的關注、焦慮和擔憂。鄉民們普遍認為，我們根本沒有十足的把握打贏戰爭，如果猶太人回到德國，將會對我們展開可怕的報復。”[[5]](#_5__Yin_Zi_Ian_Kershaw__Di_San_D)

雖然德國普通民眾對猶太人的命運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但很少有人對驅逐他們提出抗議。在驅逐行動開始之初的1941年10月，漢堡更是沒有一個人站出來反對。就這樣，艾興格林家的三個女人穿過街道，一起登上了木頭座椅的三等車廂。當列車啟動時，露西爾意識到這將是“沒有目的地的一段旅程，我們不知道列車會駛向哪兒，也不知道會發生什么”。

她們會到達奧斯維辛。眼下，大規模的擴建計劃正在制定中。按照規劃，一個全新的集中營將建在距離現有營地2英里遠的地方，那里是一片沼澤地，波蘭人管它叫布熱津卡（Brzezinka），德國人稱其為比克瑙。盡管奧斯維辛-比克瑙最終變成納粹大規模屠殺猶太人的場所，但這卻不是納粹最初決定建造比克瑙集中營的原因，它一開始想要關押的不是猶太人，而是戰俘。

今天人們普遍認為，比克瑙的建造要追溯到1941年3月，當時希姆萊視察奧斯維辛主營地，命令霍斯建造一個巨大的、可以容納10萬人的全新戰俘營。但這個結論僅僅是根據霍斯的回憶得出的，正如前文所指出，這個日期很可能并不準確。如果希姆萊是在1941年3月下達建造戰俘營的命令，為何關于戰俘營地點的建議卻直到那一年10月才首次被提出？通過對蘇聯檔案的研究，新發掘的證據可以解開這個謎團。奧斯維辛建筑部門有一份日期標示為1941年9月12日的文件，標題為“對建設和擴大奧斯維辛集中營草案的說明”[[6]](#_6__Su_Lian_Guo_Jia_Jun_Shi_Dang)，該文檔詳細描述了奧斯維辛1號營（主營）的現狀，以及將它擴建成一個可容納3萬名犯人的集中營的具體方案。然而，在這份文檔及其各種附錄中，沒有一處提到將在比克瑙建造一個戰俘營。因此我們有充分理由推斷，在1941年9月12日的時候，關于比克瑙的詳細方案尚未成形。

近期發現的另外一份檔案也可以證明，修建新營地的決定至少在9月第二周還沒有做出。20世紀90年代，希姆萊工作日志缺失的部分出現在蘇聯的一份檔案中，他在這個關鍵時期的行動和電話記錄得到了詳細的研究。[[7]](#_7__Peter_WitteDeng_Bian_Zhu__Hi)研究表明，9月15日，希姆萊與萊因哈德·海德里希、黨衛隊經濟管理部負責人奧斯瓦爾德·波爾討論到“Kriegsgefangene”（戰俘）問題。根據希姆萊日志中的一條記錄，第二天，他又與波爾通了電話，談到了將由KZ（集中營）系統“接管”的“10萬名俄羅斯人”。9月25日，OKW（國防軍最高統帥部）主管戰俘的部門下令，至多“將有10萬名戰俘被送往黨衛隊全國領袖那里”。26日，黨衛隊中央技術管理局房管處的負責人漢斯·卡姆勒，指示在奧斯維辛建造新的戰俘營。

所有這些新證據都表明，建造比克瑙的最終決定是在1941年9月做出的，而不是3月。當然，也有可能希姆萊在那年春天視察奧斯維辛時就看到了在附近建造新營地的可能性，甚至向霍斯提到，這里有一天會是進行擴建的合適地點。1941年7月，黨衛隊清空了比克瑙地區的小村莊，把村民都送到別處，這意味著奧斯維辛的管理者意識到該地區的潛在用途（不過，他們也在清空附近的其他區域，以建立“奧斯維辛利益區”[Auschwitz Zone of Interest]）。然而，正如新證據所表明，極有可能直到9月才有建造比克瑙的確切決定。

設計和建造新集中營的任務，落在了黨衛隊高級小隊領袖、剛剛被任命為奧斯維辛建筑辦公室負責人的卡爾·比朔夫，以及三級小隊副兼建筑師弗里茨·埃特爾的身上。一項對新集中營規劃方案的研究表明，從一開始他們設計的居住環境就太過擁擠，根本無法滿足犯人的基本生活所需。最初，他們打算一個營房關押550名犯人，這意味著每個犯人的空間僅是“舊帝國”集中營（如達豪）的三分之一。然而，即使是這樣的密度，對納粹規劃者來說還是不夠，方案中有一處手寫的修改痕跡：“550”這個數字被劃掉，改成了“744”。也就是說，比克瑙每個犯人的生存空間是德國集中營里的四分之一。在納粹眼里，這種冷酷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因為他們知道比克瑙會是一個特殊的戰俘營，要關押的不是英國或法國的戰俘，而是他們眼中的劣等人蘇聯的戰俘。

在對蘇戰爭的頭7個月，德軍共俘獲300萬名紅軍戰士，到戰爭結束，共有570萬人被俘，其中竟有330萬死于獄中。戰后，德國聲稱，死亡人數之所以如此駭人聽聞，是因為德國人沒有預料到會在這么短的時間內俘虜這么多人，因此沒有做好充分的準備安頓他們。這當然是一個借口，為的是掩蓋一個更黑暗的事實。本書第一章所提到的經濟規劃會議紀要表明，德軍在戰爭中想要用蘇聯人的糧食來填飽自己的肚子，他們知道這會導致蘇聯發生大規模的饑荒。而奧斯維辛-比克瑙新集中營之所以按照這樣的方案進行擴建，顯然是想把蘇聯戰俘置于一個極其艱難的環境中，故意造成大量犯人不可避免地死亡。

比克瑙的建造參照了修建奧斯維辛主營地的做法，也是由犯人自己完成。為此，1萬名蘇聯戰俘于1941年秋被送到奧斯維辛。波蘭犯人卡奇米日·什莫倫[[8]](#_8__BBCFang_Tan_1)目睹了他們到達時的場景：“那個時候已經開始下雪——10月份就下雪還是挺少見的——他們（蘇聯戰俘）在距離營地3公里的地方下了車。他們被迫脫光衣服，跳進裝著消毒劑的大桶里，然后光著身體跑進奧斯維辛（主營地）。大多數人都特別瘦。”到了主營地后，這些蘇聯戰俘成了第一批身上刺有囚犯編號的犯人，這是奧斯維辛又一自創的“改良”措施，在納粹德國所有集中營里，只有奧斯維辛通過這種方式辨認囚犯。似乎是因為營中的死亡率極高，而辨認一具有編號的尸體比辨認掛在犯人脖子上、極易脫落的名牌要容易一些。最開始，編號不是刺在犯人手臂上，而是用長針刺在犯人胸口，隨后用墨水給傷口上色。如什莫倫所見，許多蘇聯犯人無法忍受這一痛苦的過程：“他們不停扭動身體，當刺字的工具在身上敲打時，他們會摔倒，不得不讓他們靠著墻挨刺。”

那年秋天參與建造比克瑙的1萬名蘇聯戰俘，到第二年春天還活著的只剩下幾百人。帕維爾·斯滕金[[9]](#_9__BBCFang_Tan)便是其中一個幸存者。1941年6月22日，戰爭打響還不到兩個小時，他就被德軍俘虜。起初他被帶到德國戰線后方一個巨大的戰俘營，在那里與幾千名蘇聯戰俘一起像動物一樣被關起來，每天只能以稀湯充饑。他的戰友們相繼餓死，可他卻因為習慣饑餓而活了下來——20世紀30年代他在蘇聯集體農莊長大，“從小就挨餓”。1941年10月，斯滕金作為最早一批被送到奧斯維辛的蘇聯犯人，剛一到達就馬上開始在新地點建造營房。“在比克瑙，（蘇聯）犯人平均只能活兩個星期，”他說，“如果你找到什么能吃的，必須馬上吞下肚，不管是生土豆還是什么，都無所謂。臟不臟都一樣，沒地方洗。到了早上起床時間，還活著的人就會起來，在他們身邊總有兩三個死去的人。你上床睡覺的時候還活著，第二天早上就沒氣了。到處都是死亡、死亡、死亡。晚上有人死，早上有人死，下午有人死。死亡時時刻刻都在發生。”

由于這些蘇聯戰俘都登記在案，每人都有一個囚犯編號，奧斯維辛管理者便面臨一個問題：如何在死亡登記表（Totenbuch）中解釋成千上萬起死亡？他們的解決之道是編造出五花八門的疾病來搪塞蘇聯戰俘的死亡，例如，光是因“心臟病”去世的就有600人。[[10]](#_10__Irena_StrzeleckaHe_Piotr_Se)（之后接收猶太人時，他們想出了新的辦法，即對剛到就被處死的大部分人不再進行登記。）

卡奇米日·什莫倫曾與蘇聯戰俘共同在比克瑙勞動，他說：“他們被當成最低等的人，挨打的頻率更高，日子比我們更不好過。他們最后都會被殺死，就像蒼蠅一樣死掉。”蘇聯犯人的生活條件惡劣到開始吃人肉的地步，而魯道夫·霍斯親眼目睹這一景象：“我自己看見一個蘇聯人倒在一堆磚塊中間，他被開了膛，肝被摘走了。他們為了搶吃的會把對方往死里打。”[[11]](#_11__Lu_Dao_Fu__Huo_Si____Ao_Si)霍斯在回憶錄中舉了很多類似的例子，卻從沒說過蘇聯戰俘為什么淪落到這般境地。他似乎忘記，在6個月的時間里，他和他的黨衛隊同僚造成9000至1萬名蘇聯戰俘死亡。顯然霍斯毫無愧疚之情，因為蘇聯戰俘像“動物”一樣的舉止恰恰符合納粹所宣傳的形象。納粹再一次造就了自我證實的預言。

在比克瑙，帕維爾·斯滕金忍受著病痛和饑餓日夜勞作，眼看戰友一個個死去，他心中只有一個愿望：自己終究會沒命，這他知道，但“自由地死，那是我的夢想。隨便他們開槍打死我，但要作為一個自由的人死去”。因此，他雖然清楚地知道成功逃脫的概率很小，可和他的一幫戰友仍打算越獄。計劃再簡單不過了。1942年一個春日，他們被派去運回一具蘇聯戰俘的尸體，尸體在集中營的外圍。他們走到環繞集中營的鐵絲網外后，大叫一聲便朝不同方向四散而逃。瞭望塔里的守衛一時愣住了，直到這些俄國佬跑到附近森林里的安全地帶才反應過來開槍。在數月時間里，帕維爾·斯滕金經歷了重重險阻，最后終于來到了蘇占區。可正如我們將在第六章中看到的，他的苦難遠未結束。

1941年10月，奧斯維辛的建筑師除了計劃在比克瑙建造一個新的戰俘營，還設計了一個取代主營地現有焚尸爐的焚尸場。近期有研究表明，新焚尸場多了一個管道內嵌、能排出室內氣體引入室外空氣的通風系統，這意味著建筑師有意將它同時用作毒氣室。[[12]](#_12__Michael_Thad_Allen__Xie_E_D)但這一觀點遭到另一些學者的反對，他們指出，規劃方案仍沒有提及關于輸送齊克隆B的設備。直到幾周前，原有的焚尸爐才使用劑量有限的齊克隆B進行試驗，規模與11號樓進行的實驗類似。即便納粹確實考慮到新焚尸場應該具有原設備的功能，也沒有證據能證明奧斯維辛在這個階段就打算建造大型的新殺戮設施。

這一年10月，就在黨衛隊建筑師積極進行籌劃、蘇聯犯人開始建造比克瑙的同時，露西爾·艾森格林和其他來自漢堡的猶太人抵達波蘭中部的羅茲猶太人隔離區，這是他們前往奧斯維辛長途跋涉的第一站。在隔離區第一天的所見所聞就嚇壞了他們。露西爾說：“我們看見排水溝里流著污水，看見破敗不堪的房子，看見一個類似貧民窟的地方——當然，我們誰也沒見過貧民窟，只是猜想這里就是。住在隔離區里的人看起來很疲憊、很憔悴，完全沒有注意到我們。這個地方無法用言辭形容，這里的生活毫無意義。”

露西爾到達羅茲猶太人區時，這個地方已經與外界隔絕了18個月之久。疾病和饑餓折磨著這里的居民。從隔離區開始使用到它被清空，超過20%的人死在里面。16.4萬名猶太人被迫擠在1.5平方英里的區域內，生活條件極其艱苦。[[13]](#_13____Da_Tu_Sha_Bai_Ke_Quan_Shu)

一開始，納粹把羅茲的猶太人關在隔離區，不允許他們通過任何方式賺得購買食物的錢。大區負責人亞瑟·格賴澤爾想要迫使猶太人在饑餓的威脅下交出他們的貴重物品。要想在這樣的環境中活下去，需要想出些巧妙的對策。雅各布·茲伯斯坦[[14]](#_14__BBCFang_Tan)是最早被困在羅茲隔離區的猶太人之一，他隔著鐵絲網與住在外面不遠處的波蘭人討價還價。有一個和雅各布達成交易：他用紙包好一個面包扔進鐵絲網里，雅各布吃掉半個面包，把剩下的半個賣給別人，掙到的錢隔著鐵絲網遞給他。通過這種方式那個波蘭人賺了不少錢。“他幫了我們兩個月……后來他被發現了，為此丟了性命。但兩個月是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另外一些猶太人通過變賣鉆戒或其他珠寶來換取食物。于是，住在鐵絲網另一端的波蘭人和德意志人都發了大財。“如果一個值5000馬克的東西只賣100馬克，那誰不買誰就是傻子。”埃貢·齊爾克[[15]](#_15__BBCFang_Tan)是住在羅茲的德意志人，他承認自己通過與隔離區內居民的交易賺了很多錢。“他們（指猶太人）不能靠一枚戒指填飽肚子，但要能用戒指換來一個面包，那他們就能多活一兩天。你用不著是個商人，這是生活教會你的道理。”

到了1940年8月，納粹明顯感覺到羅茲隔離區的猶太人不再有什么“囤貨”了，因為他們開始挨餓。納粹慣有的短淺思維也同樣體現在當地的德國負責人身上，他們并沒有做好準備應對這一遲早會出現的危機。現在需要作出決定，到底是讓猶太人繼續挨餓，還是允許他們工作。隔離區最高行政長官漢斯·比博傾向于雇傭猶太人，而他的副手亞歷山大·帕爾菲格卻無視身邊所有證據，堅持認為猶太人還藏有現金，不同意給他們提供食物；他還指出，即使他判斷錯誤，猶太人已經被榨干了，“我們也完全沒必要在意他們的死活”。[[16]](#_16__Christopher_Browning___Tong)

比博的意見勝出，最終在隔離區里建起了近一百座工廠，大部分生產紡織品。有工作的人可以得到更多食物。德國人眼中“有工作能力”和“沒用的、浪費糧食的”猶太人，隨后被嚴格區分，成為納粹管理者廣泛應用的原則。羅茲猶太人隔離區的猶太居民委員會（被稱為Ältestenrat，即長老理事會）被納粹賦予了相當大的自主權來管理這個地區，領導人是莫得哈伊·哈伊姆·魯姆科夫斯基（Mordechai Chaim Rumkowski）。理事會的職責包括管理工廠、分發食物、組建隔離區的警察隊伍，以及提供其他各種服務，但他們的工作并沒有得到隔離區其他猶太人的擁護。“他們有特定的糧食配給，”雅各布·茲伯斯坦說，“他們去專門的商店購物，那里的食物非常好，完全可以生活得很滋潤。隔離區一小撮人獲得（那樣的）待遇，其他人卻完全被忽視，這讓我很氣憤。”

這就是露西爾·艾森格林和她的妹妹及母親在1941年10月到達的地方——一個人滿為患、疾病肆虐的世界，一個大部分居民都在挨餓、少數人卻過得比其他人都好的世界。作為后來的不速之客，這些德國猶太人只得在他們所能找到的任何一塊空地落腳。“我們不得不睡在一間教室的地板上，”露西爾說，“沒有床、沒有稻草，什么都沒有。每天會有人給我們送一次湯和一小片面包。”回憶起這些初來乍到的德國猶太人，雅各布·茲伯斯坦說：“他們肯定特別沮喪。我想這是因為他們（德國猶太人）通常看不起波蘭猶太人，覺得我們當然比他們還低一等。突然一夕之間自己淪落到跟我們一樣了，甚至可能比我們還差，因為他們的生活條件還趕不上我們。”

德國猶太人開始向波蘭猶太人售賣家產，以獲得更多食物，或改善生活條件。露西爾·艾森格林很幸運，因為她們家有波蘭血統，換起東西來更加容易。“我媽媽用一件真絲襯衫換來一些黃油和面包。她很擅長做買賣，因為她會說他們的語言。幾個星期之后，我用一個皮包從一個年輕女人那里換來面包。如果你看看賣家，再看看買家，就會覺得很可悲。買家都穿著破衣爛衫，相比之下，我們看起來仍然很富裕，衣著體面，也不像當地人面露饑色。他們會走進校舍，說：‘我有一間空房，如果你想躺在床上睡一夜，只要給我一片面包或者一些德國馬克，你就可以離開這個學校，在別的地方過夜。’賣什么的都有。”

德國猶太人很快意識到，為了盡最大可能爭取活下來的機會，他們必須在隔離區內找到工作。當然，這不是件容易的事，特別是德國猶太人和波蘭猶太人之間存在隔膜。“最早一批到隔離區的（德國）人對當地的一切都看不慣，”露西爾說，“他們會說：‘不應該這樣……這樣做不對……讓我們教教他們。’你不能走進別人家里，給人家重新擺家具，可他們當時就想這么干。”但德國猶太人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在隔離區內缺少“關系”。“那基本上是個非常腐敗的體系，”露西爾說，“你幫我，我幫你。外人根本進不去。我一開始想把我妹妹送去制帽廠，但這幾乎就是妄想，那些工廠的領導給我的答復是：‘你能給我什么好處？’在隔離區里，你想辦成任何一件事都要付出代價，無論以哪種形式，而且代價通常很高——什么都不便宜。但這是隔離區的生活造就的。他們在戰前也是這樣的人嗎？我很懷疑。我當時只有17歲，這一切讓我非常吃驚。”

如果說猶太隔離區的原居民對德國猶太人的到來心懷不滿，那么瓦爾特大區的納粹領導對此也是怨氣沖天。希姆萊剛提出把6萬名猶太人從“舊帝國”遣送到羅茲，就有抗議的聲音。于是縮減為2萬名猶太人加5000名吉卜賽人。可即便如此，這些人的涌入還是給當地大區長官亞瑟·格賴澤爾造成了諸多困難，他與負責這一地區的黨衛隊全國副總指揮兼警察上將威廉·科佩，想出一個辦法來解決隔離區過度擁擠的問題。鑒于1941年夏天以來，屠殺一直是東部解決類似危機的首選答案，因此他們此時開始琢磨屠殺方法也就不足為奇了。他們叫來黨衛隊高級小隊領袖赫伯特·朗格，他一直擔任一個特殊小分隊的指揮，該分隊專門負責殺害東普魯士及周邊地區的殘疾人。朗格和他的手下曾多次使用一輛 “毒氣貨車”，該貨車的后車廂被密封起來，灌入瓶裝一氧化碳。如今，在羅茲的納粹領導人看來，這種貨車是解決隔離區突然出現的人口過剩問題最合適的工具。

據朗格的黨衛隊司機瓦爾特·布爾邁斯特回憶，那年晚秋，朗格在瓦爾特大區偶然發現了放置毒氣貨車的合適地點。朗格對他的司機說：“首先我要強調，這件事必須完全保密。我接到命令，要在海烏姆諾（Chełmno）組建一個特殊部隊，波茲南的同事和利茲曼市（羅茲的德語名字）警察部隊的其他人也將加入我們。我們有一個艱巨但重要的任務要完成。”[[17]](#_17__Yin_Zi_Burmeister_1961Nian)海烏姆諾這個小村莊位于羅茲的西北方，距羅茲大約50英里，朗格和他的手下在這里搭建了一棟“別墅”（the Schloss），以完成大屠殺這個“艱巨但重要的任務”。于是，海烏姆諾——而不是奧斯維辛——成為首個屠殺中心，處決從羅茲隔離區篩選出的猶太人。

但1941年年底，在建的屠殺中心不只有海烏姆諾。11月1日，波蘭東部盧布林地區的貝爾賽克集中營開始動工。貝爾賽克大部分工作人員都參與過成年人安樂死項目，包括首任指揮官、黨衛隊高級小隊領袖克里斯蒂安·維爾特。與海烏姆諾相同，位于總督轄區隱蔽地帶的貝爾賽克也將用來屠殺當地“沒有生產力的”猶太人，但與海烏姆諾不同的是，它是首個在最初的設計方案里就含有固定毒氣室的集中營，每間毒氣室都配有生產一氧化碳的發動機。這樣的毒氣室正是1941年9月，威德曼在東部的毒氣試驗得出的產物。

與此同時，對舊帝國猶太人的驅逐仍在繼續。1941年10月至1942年2月間，共有5.8萬名猶太人被送到東部不同地點，其中也包括羅茲隔離區。這些猶太人所到之處，當地的納粹管理者都不得不臨時想辦法應對，他們有時會遵照柏林的指示，有時也自作主張。例如，大約有7000名猶太人從漢堡被送到明斯克，在他們到達之前，當地1.2萬名蘇聯猶太人被槍殺，好為他們騰出空間。來自慕尼黑、柏林、法蘭克福和其他德國城市的猶太人被送到立陶宛的考納斯，有5000人死在特別行動隊第三分隊的槍下。這是第一批剛送到東部就被殺害的德國猶太人。另一批來自柏林的猶太人于11月30日到達拉脫維亞的里加，他們也是在剛到達后就全部被殺害。然而，這其實與希姆萊的想法相悖，他曾致電海德里希，表示：“柏林猶太人，無需消滅。” 下屠殺令的指揮官弗里德里希·耶克爾恩后來還遭到希姆萊的訓斥。

由此可以看出，1941年秋，對于如何處置來自帝國的猶太人并沒有統一的政策：希姆萊反對里加的屠殺，但卻不反對在考納斯進行的滅絕。盡管有著這些互相矛盾的態度，但有充分的證據表明，將帝國猶太人送往東部的決定標志著歷史在此急轉直下。10月的一天，希特勒在晚餐后說道：“誰也不許跟我說我們不能把他們（猶太人）送到沼澤地去！又有誰在乎我們的人？人們害怕我們滅絕猶太人，那正好，讓恐懼為咱們開路！”[[18]](#_18____Xi_Te_Le_Xi_Jian_Tan_Hua)那年秋天，納粹領導層也在討論是否把德國統治區內所有猶太人都驅逐到東部。在法國，萊因哈德·海德里希為燒毀巴黎猶太會堂的行為辯解道，他之所以批準這一行動，“只不過是因為當時最高當局確鑿地認定猶太人要為歐洲卷入戰火負責，必須從歐洲徹底消失”。[[19]](#_19__Yin_Zi_Peter_Longerich___We)同樣是在1941年11月，希特勒在與流亡到柏林的耶路撒冷大穆夫提（the Grand Mufti of Jerusalem）會談時說到，他希望所有猶太人、甚至包括那些不在德國統治之下的，全都“被摧毀”。[[20]](#_20__Gerhard_Weinberg__Meng_Jun)

從驅逐帝國猶太人開始，希特勒一連串環環相扣的決定最終導致猶太人的滅絕。在蘇聯，特別行動隊的槍口已經無分男女老少，這么多的帝國猶太人被送到那里，難道希特勒以為他們還會有什么別的下場嗎？是屠殺當地猶太人來為新來的帝國猶太人騰出空間，還是直接屠殺后者，從一開始這兩種做法就沒有多大差別——如耶克爾恩在里加的行動。隨著戰爭的推進，等到波蘭東部的加利西亞（Galicia）落入德國人手中，對總督轄區的納粹領導來說，兩種做法的界線就更加模糊了。加利西亞毗鄰蘇聯，這里的猶太人數周前就受到特別行動隊的圍剿，再說當地政府也很難去細分該槍決的總督轄區猶太人為何是這一批而不是那一批。

然而，這一切并不意味希特勒和納粹領導層在1941年秋就做出明確決定，要把德國控制境內的所有猶太人全數殺死。首先，納粹當時尚不具備實現這一目標的能力。1941年11月，在建的屠殺設施只有海烏姆諾的毒氣貨車以及貝爾賽克的小型毒氣室。大約同時，一家德國公司接到命令建造擁有32個隔間的大型焚尸場，地點定在白俄羅斯的莫吉廖夫（Mogilev），不過這個焚尸場最終并沒有建成。有人認為這表明納粹有意在東邊建造一個新的屠殺中心。然而，這種種舉措也可以解釋為地方當局的一些企圖：殺死當地猶太人以便為新來的帝國猶太人騰出空間，或者除掉他們手中那些不能工作的猶太人，也就是對他們不再有“利用價值”的人。最重要的是，1941年秋，奧斯維辛并沒有增建營內屠殺設施的計劃。新的焚尸場確實在規劃中，但這是為了淘汰主營相應的舊設備。

地球另一端的事件終結了這種混亂的局面，卻給猶太人帶來災難性的后果。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12月11日，作為日本的盟友，德國向美國宣戰。在希特勒看來，這一切都是國際猶太人組織精心策劃出世界大戰的“證據”。德國剛一宣戰，希特勒便通過廣播向德國民眾明確宣布，羅斯福總統正受到“猶太人”的操縱，同樣受“猶太人”擺布的還有他的另一個勁敵——約瑟夫·斯大林。

第二天，希特勒對納粹領導層（包括大區長官和全國領袖）發表了一番演說，把自己的觀點又推進了一步。他把這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與1939年1月30日他在國會大廈演講的預言相聯系，當時希特勒曾威脅，“如果猶太人成功地引發一場世界大戰”，其后果將是“歐洲整個猶太民族被滅絕”。12月13日，納粹宣傳部長約瑟夫·戈培爾在他的日記中寫道：“就猶太問題而言，元首已下定決心對他們進行迅速而徹底的清除。他曾警告過猶太人，如果他們再次引發一場世界大戰，他們自己將遭到滅絕。這并不是一句空話。現在，世界大戰爆發了，猶太人的滅絕是必然的結果。在這個問題上決不能心軟。”

那一周，關于“滅絕”的討論不絕于耳，可茲證明的另一個例子是12月16日漢斯·弗蘭克的講話。作為總督轄區負責人，他對克拉科夫的納粹高級官員說：“作為一個資深的民族社會主義者，我必須要說，如果我們最優秀的戰士為了保衛歐洲獻出自己的生命，猶太民族卻得以從歐洲這場戰爭中存活，那么這場戰爭只取得了部分勝利。因此，在猶太問題上，我將孜孜不倦為一個目標奮斗，那就是他們有一天必須全部消失……無論在什么情況下，猶太人都格殺勿論。”[[21]](#_21__J__NoakesHe_G__PridhamBian)親聆希特勒12月12日訓話的弗蘭克還補充道，他“在柏林”就接到命令，告訴他以及跟他一樣的人應該“親自……清算猶太人”。

20世紀90年代，希姆萊完整的工作日志被發現，從而又多了一個證據表明，希特勒與這個關鍵時期耐人尋味的聯系。12月18日，在與希特勒進行了一對一的會面后，希姆萊寫道：“猶太問題——比照游擊隊進行滅絕（auszurotten）。”[[22]](#_22__Yin_Zi_Longerich___Wei_Xie)使用“游擊隊”這個稱謂，是為了把對猶太人的屠殺偽裝成東部的必要安全工作。

盡管目前尚未發現任何希特勒寫下的文字，可以證明“最終解決”是他直接下令執行的，但上述證據讓人們不僅有理由懷疑，甚至確定，那年12月，希特勒正積極煽動和引導更激進的反猶行動。他親自下令將帝國猶太人遣送東部，就算沒有美國參戰所產生的催化作用，這次驅逐最終仍可能通向死亡。12月5日，蘇聯紅軍在莫斯科城下向德軍發起反攻，希特勒的憤怒和沮喪可能已經預示了拿猶太人發泄的傾向。珍珠港事件的爆發則將他明確引向謀殺。納粹領導層不再假裝他們僅僅是要把猶太人遣送到東部關進集中營。無論采用哪種方式，他們現在要做的是“滅絕”。

珍珠港事件爆發第二天，12月8日，是“最終解決”執行過程中的又一個分水嶺。這一天，首批來到海烏姆諾的犯人將面臨毒氣處決。這些來自附近科羅（Koło）、達比（Dąbie）和科羅達瓦（Kłodawa）等城鎮和村莊的猶太人，坐著卡車來到營地（后來，猶太人都是用火車運到附近的波維爾奇［Powiercie］站）。他們被帶到村子中心的大房子——“別墅”內，脫光衣服進行“消毒”。隨后，他們被帶進地下室，經過通道走上木制的斜坡，最終來到一間密閉的暗室。這里實際是貨車的后車廂。

一開始，海烏姆諾的毒氣貨車與一年前成年人安樂死項目使用的一樣，都是通過瓶裝一氧化碳毒死被鎖在密閉后車廂里的人。但海烏姆諾的殺戮剛進行了幾周，便有新的毒氣貨車投入使用，這些貨車用自身排出的氣體讓車內的人致命。由于屠殺是在村莊內進行的，貨車就停在“別墅”的庭院中，因此這一行動并不是什么秘密。佐菲婭·紹爾克[[23]](#_23__BBCFang_Tan)當時是個11歲的小女孩，就在離屠殺場所幾米遠的地方做事和玩耍。她曾看到過這批犯人：“他們（猶太人）被打得很慘。他們到的時候是冬天，可還穿著木拖鞋……他們一般就在這兒脫衣服，脫下來的有好大一堆……已經脫光衣服的人被趕進貨車里。叫聲大得啊，那么慘，讓人根本無法忍受。有一次他們帶來了一群孩子，這些小孩也都大叫。那次我母親聽到了，她說孩子們叫著：‘媽媽，救救我！’”

在“別墅”毒死猶太人后，貨車開到附近的茹霍夫斯基（Rzuchowski）森林，距離不到兩英里。佐菲婭·紹爾克說：“車開動的時候，我說：‘地獄開走了！’我就在路邊放牛，怎么可能看不見它開過去呢？”在森林里，被叫來掩埋尸體的猶太人負責清空車廂。每天晚上這些猶太人被運回“別墅”關押。過不了幾周，他們自己也被殺害，新來的猶太人中又會有人被選出來做他們的工作。

森林里的狀況很快就讓人觸目驚心，這是佐菲婭從一位德國士兵那里得知的，他所在的森林分隊（Waldkommando）負責監督尸體的處理過程：“他借住在我家，老是把我叫過去說：‘給我擦鞋！’接著他會問：‘臭嗎？’我會說‘臭’，因為氣味很大。人體開始腐爛，相當難聞。他們把尸體都埋在坑里，但是天太熱，都開始發酵了。”

庫爾特·默比烏斯當時是海烏姆諾的一名德國守衛，后來因在戰爭中犯下的罪行受審。在1961年11月的亞琛審判中，他向人們揭示了納粹行兇者在屠殺過程中的心理狀態：“朗格中尉對我們說，滅絕猶太人的命令來自希特勒和希姆萊。作為警察，我們接受的訓練要求我們將政府下達的所有命令都視為合法的、正確的……那時我相信猶太人并不是無辜的，他們都有罪。這樣的宣傳一遍遍向我們灌輸，所有猶太人都是罪犯，都是低等人，是猶太人造成了德國在一戰后的衰落。”[[24]](#_24__1961Nian_11Yue_8Ri__pp__5_6)

前面說過，建造海烏姆諾的主要目的，是屠殺羅茲隔離區里那些在納粹看來沒有生產力的猶太人。第一批于1942年1月16日離開羅茲，前往這個新的滅絕中心。此時，露西爾·艾森格林已在羅茲隔離區待了三個月，她當時的心情是：“我們不想走，我們覺得看得見的苦難總比看不見的好。”多了被驅逐的“篩選”壓力，羅茲隔離區原本就很糟糕的生活變得更可怕了。

海烏姆諾對納粹“最終解決”發展歷程意義重大，它是納粹德國第一個專為滅絕猶太人所興建的場所。但是它之所以能在這么短的時間就投入使用，完全是因為納粹對一座大房子的匆忙改造使其成為屠殺基地，并使用了毒氣貨車這個已有的技術。在納粹行兇者們看來，海烏姆諾是非常低效的，它不能秘密地進行屠殺，也不能有效地處理尸體。所有這些“缺點”都將在興建中的新滅絕營——貝爾賽克——得到改正。

1月20日，也就是羅茲隔離區的第一批猶太人動身前往海烏姆諾四天之后，柏林郊區萬湖（Wannsee）湖畔的一幢黨衛隊別墅中召開了一場會議。它作為納粹“最終解決”方案發展歷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會議而聞名于世，然而，它其實配不上這樣的惡名。萊因哈德·海德里希作為發起人，邀請了相關的政務秘書前來討論猶太問題。每份邀請函都附上了戈林1941年7月31日準許海德里希執行“最終解決”的授權書復印件（然而，如第一章所述，“最終解決”在1941年7月的含義不大可能與1942年1月的相同）。眾所周知，會議原定于中午開始，因此邀請函上提到將提供“茶點”。會議地址是大萬湖56-58號，這個別墅曾被負責協調國與國之間警察活動的國際刑事警察組織征用。有必要提醒的是，在萬湖會議上，桌前圍坐的與會者都來自德國這個歐洲大國，都是從政府支薪的官員，而不是出沒于街頭巷尾的恐怖分子，可他們的罪行卻比整個世界歷史上任何傳統意義上的“罪犯”還惡劣。同樣值得注意的是，雖然今天仍有人認為這是一群教育程度不高的“流氓無賴”，可實際上在座的15人當中，有8人擁有博士頭銜。

邀請函是在1941年11月寄出的，會議原定在12月9日，但因珍珠港事件延期。于是歷史上又多了一個沒有答案的問題：如果太平洋上的事件沒有造成會議推遲，那么萬湖會議的內容本該是什么呢？當然，會議的目的肯定還是為解決納粹的“猶太問題”找出某個種族滅絕性質的“方案”，但或許更多的討論會圍繞制定一個戰后才實施的解決方案，或真正嘗試為那些被遣送至東部的猶太人建立一個工作營。對此我們只能猜測，但可以肯定的是，無論美國是否參戰，萬湖會議都是一次對希姆萊和海德里希非常重要的會議。1941年秋，納粹德國內不同地方出現了各種自創的屠殺方式。對希姆萊和海德里希來說，萬湖會議最重要的意義就在于整合這些做法，并且明確黨衛隊才是掌控整個驅逐進程的人。

萬湖會議上討論的內容之所以為世人所知，主要得益于一份會議紀要的復印件。記錄者是黨衛隊上級突擊隊大隊領袖（中校），阿道夫·艾希曼，也就是海德里希的“猶太問題專家”，他活到了戰后。艾希曼的會議紀要有著極其重要的歷史意義，因為它能幫我們直接了解“最終解決”方案背后的思想過程，這樣的材料少之又少。

會議剛開始，海德里希提到由于戈林的行政授權，將由他來全權負責，隨后便宣布了官方政策的正式調整。毫無疑問，此時此地所有與會代表對其內容都心知肚明。現在，他們不再把猶太人“轉移”到不受納粹控制的國家，而是要讓他們在納粹勢力范圍內“清理……至東部”。最終共有1100萬猶太人受到“清理”政策影響，其中包括愛爾蘭、英國等此時尚未被納粹占領國家中的幾百萬人。猶太人抵達東部后，被按性別分開，適合勞動的將派去修路（幾乎可以肯定，海德里希想要讓他們投入的是四號干道工程[Durchgangsstrasse IV]，這一工程當時正在進行中，準備用公路和鐵路將帝國與東部前線連接起來）。沒被選中的猶太人——這里的意圖很明確——將被立即處死，而得到工作的猶太人不過是判了死緩，因為大量的人將死于繁重的體力勞動。海德里希接著特別提到，那些沒有按照納粹的設想被工作累垮的猶太人，就是通過自然選擇、對納粹來說最危險的部分。海德里希說，他們必須得到“相應的對待”，其他代表自然明白這里海德里希指的是什么。

重要的是，與會者對于屠殺猶太人這一大原則沒有提出任何異議，爭論的焦點在于“猶太人”的確切法律定義為何，這將影響到具體有哪些人被驅逐，哪些人不受影響。如何處置“有一半猶太血統的人”引起了廣泛討論。有人提議應對這些人做絕育手術，或者讓他們在絕育和驅逐之間做選擇。還有人提議把他們送去一個特殊的猶太人隔離區，即捷克小鎮特萊西恩施塔特（Theresienstadt，捷克名為Terezin），那里還住著一些年長和享有特權的知名猶太人，把這些人直接送去東部將在普通德國大眾中造成不安。

與會者隨后討論了更迫在眉睫的“問題”——如何處理總督轄區和納粹占領下蘇聯境內的猶太人。后者正遭到大規模的槍決，而對付前者的貝爾賽克滅絕營正在建設中。但這兩個地區目前仍生活著數百萬猶太人，因此，艾希曼在他的會議紀要里寫道，此時“很多個可能的解決方案”被提出，這個看似無傷大雅的用詞掩飾了對具體屠殺方法的討論。

萬湖會議的會議紀要有意語焉不詳，海德里希和蓋世太保頭目海因里希·繆勒對艾希曼的記錄做了數次修改，以確保達到這一效果。他們本打算將紀要大規模分發，因此用暗語書寫十分必要，赤裸裸的原始用語修飾后，了解背景的人自然明白其確切含義，而不知情的人也不致被嚇到。盡管如此，他們還是留下了證明納粹“最終解決”背后策劃過程的確鑿證據，有力地證明了后來的屠殺行為是這個國家許多人共同謀劃的結果。

這是否意味著萬湖會議如人們普遍認為的那樣，是納粹屠猶歷史上最重要的會議呢？答案是否定的。這樣的誤解是因為人們認為正是在這次會議上，納粹決定開始執行他們的“最終解決”方案。事實并非如此。萬湖會議固然重要，但它只是一個討論具體執行方案的次等會議，與會者所做的，是對在別處已經確定的滅絕過程進行更深入的討論。希特勒在1941年12月的談話遠比萬湖會議上的討論重要得多。如果這個時期元首與希姆萊會面時的談話內容能有一份準確的記錄，我們就能看到，是何種冷酷思想把后來的所有苦難帶到這個世界。

萬湖會議上進行的討論對奧斯維辛并沒有產生直接影響，比克瑙沒有突然改變方案增建新的毒氣室，那年1月集中營的整體運作也沒有明顯變化。不過，1941年初秋，集中營用齊克隆B進行毒氣試驗的地點發生了改變，不再在11號樓進行，而是換到了離霍斯的辦公室和黨衛隊辦公區僅數米遠的集中營焚尸場內。集中營當局不需要再用手推車把尸體從11號樓運到集中營另一端的焚尸場進行處理；但同時這也帶來了新的問題，因為現在的屠殺地點更加暴露，從牢房隱蔽的地下室，換成了地上焚化爐旁邊的停尸間。

1942年初，耶日·別萊茨基目睹了蘇聯戰俘到達后在新地點被毒害的過程：“到了晚上（當時他正在自己的營房中），我聽見外面有動靜。我說：‘伙計們，怎么回事？咱們看看去。’我們走到窗前，聽見嚎叫和呻吟聲，能看見一群人一絲不掛地朝焚尸場跑過去。黨衛隊也在跑，還帶著他們的機關槍。因為鐵絲網旁邊有路燈，所以一切都看得一清二楚。當時正下著雪，冷極了，大概零下15或20度。所有人都因為寒冷在哀嚎。那是一種不可思議的叫聲，我以前從沒聽到過。他們光著身體進了毒氣室。那個場面既邪惡又可怕。”

以這種恐怖方式被處死的不僅僅是蘇聯戰俘和營中無法再工作的猶太人，上西里西亞地區附近地方少數不能再做重體力勞動的猶太人也被送進集中營的焚尸場。這些屠殺發生的確切日期沒有記錄，但目擊證人的證詞表明，其中一些有可能是在1941年秋天進行的。漢斯·施塔克曾是奧斯維辛的一名黨衛隊士兵，他提供了以下證詞：“后來進行另一次毒氣試驗時，也是在1941年秋天，格拉布納（馬克西米利安·格拉布納，奧斯維辛政治部負責人）命令我把齊克隆B從開口處倒進去，因為只來了一名衛生員，需要兩個人從毒氣室的兩個開口同時往里倒齊克隆B……齊克隆B是顆粒狀的，大量投入后會（變成氣體）從人群的頭頂擴散開來。接著人們就開始慘叫，這時他們終于知道發生了什么。我沒有從開口往里看過，它必須在齊克隆B倒進去后馬上關起來。幾分鐘以后，毒氣室被打開，尸體橫七豎八地堆滿整個房間，場面極其駭人。”[[25]](#_25__Yin_Zi_Ernst_Klee__Willi_Dr)

萬湖會議后幾周內，奧斯維辛周邊地區“沒有價值的”猶太人繼續被送進這里的毒氣室。約瑟夫·帕欽斯基[[26]](#_26__BBCFang_Tan_1)是奧斯維辛的一名囚犯，在焚尸場附近的黨衛隊辦公大樓里工作的他，曾目睹一群猶太男人的到來，他們被送進集中營等待處決。他爬上黨衛隊大樓的閣樓，掀開屋頂的一片瓦，外面的場景一覽無遺。“他們（黨衛隊）對這些人非常客氣，”帕欽斯基說，“‘請脫掉您的衣服，整理好您的物品。’這些人脫去衣服后，黨衛隊讓他們走進（焚尸場）去，門就在他們身后鎖上了。接著一個黨衛隊士兵爬到焚尸場的屋頂平臺上。他戴上防毒面具，他打開（屋頂上的）蓋子，他把粉末倒進去然后他關上蓋子。他做這些事情時，雖然墻壁很厚，但你還是可以聽見很大聲的尖叫。”在集中營里挨了兩年苦，帕欽斯基看到這些人走向死亡時已波瀾不驚。“人們變得冷漠。今天你進去，明天就是我進去。你漠不關心。人類可以習慣任何事情。”

新的屠殺方式不可少的是用安撫的話哄騙猶太人。集中營當局意識到，對于來自奧斯維辛以外的囚犯，不需要拳打腳踢地把他們趕進毒氣室。現在的做法是讓新到的人相信，走進焚尸場內的臨時毒氣室是進入集中營的常規流程，他們不會被殺死，只是洗個澡來“消毒”。這是納粹的一個突破，解決了早前特別行動隊曾面臨的不少難題。依靠哄騙讓人們進入毒氣室比完全依靠武力來得更容易，此外，這種方法也能減輕屠殺者自身的壓力。它還解決了納粹在掠奪受害者財物過程中的另一個現實問題：之前很多次毒氣謀殺都是在囚犯穿著衣服的情況下進行的，在他們死后扒下衣服非常困難。現在，這些將死之人會自己脫下衣服，甚至還整齊地疊好，把鞋帶系上。

奧斯維辛的黨衛隊士兵佩里·布羅德[[27]](#_27__Zhu__Perry_BroadYu_1942Nian)，詳細描述了如何為屠殺營造出和諧的氣氛。他提到馬克西米利安·格拉布納站在焚尸場屋頂上，沖著下面的猶太人說：“你們現在要去洗澡和消毒。我們不希望集中營里出現任何傳染病。然后你們就會被帶去自己的營房，有人會給你們送去熱湯。我們會根據你們的條件為你們安排工作。現在，脫掉衣服，把它們放在你面前的地上。”[[28]](#_28____Na_Cui_Dang_Wei_Dui_Yan_Z)隨后，黨衛隊士兵溫柔地鼓勵新來的犯人走進焚尸場，“一邊講著笑話或者跟他們寒暄”。據布羅德說，一次在大門被鎖上后，某位黨衛隊士兵曾隔著門大喊：“洗澡的時候別燙著了！”[[29]](#_29____Na_Cui_Dang_Wei_Dui_Yan_Z)

盡管這種陰險的欺騙事半功倍，但霍斯及其同僚很快意識到，在焚尸場進行屠殺也給他們制造難題。其中最大的問題就是屠殺過程中的巨大聲響。“他們想用發動機聲蓋過尖叫聲，”約瑟夫·帕欽斯基回憶道，“他們發動了兩臺摩托車，好讓人們聽不到尖叫。里面的人在喊，可聲音越來越弱、越來越弱。他們想用摩托車的聲音掩蓋，但是失敗了。他們嘗試了但不管用。”引擎發動的聲音不足以蓋過臨時毒氣室內傳出的尖叫，而焚尸場離集中營其他營房的距離很近，其他犯人不可能不知道發生了屠殺。因此，1942年春，霍斯和其他黨衛隊高級將領試圖考慮另一種屠殺方法。又一次，他們遠不是在“服從命令”，而是打算自主行動。

奧斯維辛開始演化成納粹德國內一個非常獨特的機構。一方面，一部分囚犯成為集中營的正式成員，編號然后工作；另一方面，現在有一群人在到達集中營后的幾個小時甚至幾分鐘內就被殺害。納粹其他的集中營沒有一個以這種方式運作。有海烏姆諾這樣的滅絕營，也有達豪這樣的集中營，但只有一個奧斯維辛。[[30]](#_30__Ma_Yi_Da_Nei_Ke__Majdanek_J)

奧斯維辛的雙重功能意味著，許多囚犯在這里生活和工作，有時長達數年，而另一些人卻還來不及熟悉環境就被殺害。對附近地區那些不適合工作的猶太人來說，到奧斯維辛不啻判處死刑、立即執行；而對那些自集中營建立之初一路撐過來的波蘭人來說，奧斯維辛已成為某種程度上扭曲的家園。到現在為止，目睹焚尸場屠殺過程的約瑟夫·帕欽斯基已經在奧斯維辛待了20個月。1940年夏天到達集中營的那批犯人中，很少有人能活這么長時間，除非能找到一份室內的工作，“頭上有屋頂”，帕欽斯基也不例外。他找到了一份理發店里的工作，為黨衛隊職員理發。這份工作有一定特權，因為他是為數不多能與指揮官本人有直接接觸的囚犯之一。“霍斯的屬下把我帶到他的別墅前，他的妻子就站在門口。我特別害怕。我走上樓梯，來到浴室，里面有一把椅子。霍斯走了進來，坐在椅子上。我立正站著。他嘴里叼著煙，看著報紙。我按照他原來的發型給他理了發。沒有什么難度。霍斯沒有對我說一個字，我也沒吭聲。我很害怕，而他看不起犯人。我手里有把剃刀，我本可以割斷他的喉嚨，這是有可能發生的。但我是一個有理性的人。你知道會發生什么嗎？我全家都會死，半個集中營的人都會沒命，然后會來個新人頂替他的位置。”

約瑟夫·帕欽斯基知道，謀殺霍斯會給他和他的家人帶來災難性的后果，他也知道，要想活命，偷竊也就是“順手牽羊”是十分必要的。帕欽斯基的鋪位與斯坦尼斯瓦夫·杜比爾（斯塔塞克）相鄰，他是霍斯的園丁。“我躺在斯塔塞克旁邊說：‘我們不能從他（霍斯）的花園里搞點番茄嗎？’他說：‘或許可以。’”霍斯的花園背對著焚尸場，花園的柵欄上有一塊木板松動了。斯塔塞克對帕欽斯基說：“從那里走進花園，你就能看到洋蔥和番茄。”

謀劃好一切，那天帕欽斯基溜進霍斯的花園，果不其然，一桶桶洋蔥和番茄就擺在他面前。“我拿了一些，正要離開，霍斯的妻子跟另一位女士走了進來。我先是藏在樹叢里，后來以為她們離開了，就走了出來，結果她們還站在小路上聊天。我朝她們鞠了一躬，帶著番茄和洋蔥從她們身邊走過。我渾身濕透（被汗水浸透），心想：‘我死定了。被抓到偷番茄，這下死定了。’那天晚上，我等著他們把我帶去11號樓，但沒人來叫我。斯塔塞克下班回來后對我說：‘別擔心。霍斯的妻子都告訴我了，我跟她說是我讓你拿的。’”

約瑟夫·帕欽斯基和他的朋友在霍斯家花園的冒險經歷有著重要的意義，它起碼說明了德國人與受優待的波蘭犯人之間逐漸建立起來的關系。當斯塔塞克向霍斯的妻子解釋說，是他讓帕欽斯基拿走番茄和洋蔥時，他自己也面臨因偷竊而遭到處罰的危險。畢竟，如果像他這樣的園丁可以隨便拿蔬菜，他又何必幫朋友設計秘密潛入霍斯花園的計劃？但斯塔塞克知道霍斯的妻子很可能會原諒他，因為他們之間有一種工作關系。當然，納粹會把這種關系定義為高等的“雅利安人”與低等的“斯拉夫人”，但這畢竟也是一種聯系。如果告發斯塔塞克，霍斯的妻子并不是讓一個被她撞見正在行竊的無名囚犯遭到處罰——那樣的話對她來說會簡單很多——而是給一個密切為她服務了一段時間的人帶來災難。

在集中營的生活中，這種互動屢見不鮮。囚犯說，（在獲得了“有屋頂的”工作之后）確保自己能活下來的最好方法，是成為對某個德國人有用的人。如果那個德國人開始依賴你，你就能得到關照，甚至有可能免遭懲罰，或在某些情況下逃過死亡。這主要不是出于真心的情感（雖然也不排除這種可能），更多是由于重新尋找和訓練一名犯人會給德國人造成諸多不便。

與有權勢的人建立關系以求活命的做法并不限于奧斯維辛，它也是猶太人隔離區的一條生存法則。只不過在隔離區，掌握生死大權的不光有德國人，也可能有猶太人。隨著在羅茲隔離區生活的時間越來越長，露西爾· 艾森格林發現她自己以及母親、妹妹的生活條件正逐步惡化。“吃的東西不夠維持體力，”她說，“沒有牛奶，沒有肉，也沒有水果——什么都沒有。”對她來說，改善她們境況的唯一出路就是找到一份工作，因為那樣就可以“在午餐時多領一碗湯”。于是，她步履沉重地走遍隔離區大街小巷的每一家工廠，試圖尋找工作機會。

到了1942年5月，露西爾還是沒能找到工作，她和她的家人被列入了驅逐名單。“（名單上）都是沒有工作的人，大概有90%是新來的。”不過，露西爾知道，自己有著名單上其他德國猶太人沒有的一個優勢，那就是因父親的關系，她和家人與波蘭有著血緣上的關聯。“我拿著我們的波蘭護照，逐個詢問各個辦公室的人，讓他們把我們的名字從名單上劃掉。最后，我成功了。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做到的，但我們留了下來。”露西爾很確定，是她的波蘭血統拯救了全家。“他們想把所有的德國猶太人都趕出聚居區，”，她說，“而我可以證明，雖然我們從德國來，但我們不是德國人。其實這本來并不重要，我們都是猶太人，本來不應該有什么區別，但現實并不是如此。”1942年1月至5月，共有5.5萬名猶太人從羅茲隔離區被送到海烏姆諾殺害。下達驅逐命令的是德國人，但隔離區的猶太人管理層被迫參與決定對哪些人進行驅逐——又一個納粹發明、造成猶太人內部分裂的諷刺舉措。

隔離區的生活壓力對露西爾的母親產生了嚴重影響：“她對所有事情都失去了興趣，基本上什么都做不了。她變得浮腫，因為饑餓使得水分都聚積起來。她無法再正常走路。1942年7月13日，她在隔離區去世。每天早上，隔離區都有一輛由一匹灰馬拉著的黑色馬車來收尸體，他們帶走了我的母親。大概一個星期之后——其實按照猶太人的傳統，應該第二天就下葬——我和妹妹找到一片空地，挖了墳，然后把她搬了過來。沒有棺材，只有一條繩子捆住兩塊木板。這還是我們在緊挨著墓地的一座大房子里找到的，墓地里都是沒有下葬的尸體。我們把她埋好，在墳頭插了一個小木塊，當然沒過多久木塊就不見了。五十年后，我試過去找墓的位置，但一無所獲。”

于是，只剩露西爾與妹妹在隔離區里相依為命。這兩個孤兒竭盡所能地應付一切。“我們感受不到生活，”她說，“我們不再祈禱，也沒有眼淚，我們都麻木了，沒有任何感情。我們回到房間，那個帶有家具、還有別人合住的房間，我妹妹基本上不再說話，她一聲也不吭。她很聰明，長得又高又漂亮，但現在還有什么好說的呢。她完全自暴自棄。我母親曾讓我保證會好好照顧她，但我什么也做不了。我試了，但沒有用。”

兩個月后，德國人來隔離區親自進行篩選，挑出那些不適合工作的老人、病人和小孩。隔離區領導魯姆科夫斯基要求母親們合作，把自己的孩子交給德國人。“（他說：）‘把你們的孩子交出來，剩下的人才能活命。’”露西爾說，“當時我十七歲，無法理解怎么能有人讓做父母的交出自己的孩子。現在的我還是不能理解。人們都在喊：‘你怎么能提出這樣的要求？我們怎么能這么做？’但他說：‘不這樣做只會更糟。’”

露西爾想盡一切辦法不讓她的妹妹被選中，她給她化妝，鼓勵她裝出健康的樣子。露西爾是抱著一線希望，覺得妹妹有可能逃過一劫，因為她已經12歲，而篩選的年齡是11歲以下。可是德國人到了之后還是把她妹妹帶走了。“他們抓了我妹妹，他們不該這么做。我本想要跟她一起上卡車，但有人用槍托捅我的胳膊，我上不去。那些人就消失了。”即使是露西爾絕望地注視妹妹被帶走的那一刻，她也沒有想到，他們是直接被送去處決。“我們一直都不明白他們會怎么處置小孩子或老人，他們都是不能工作的人。我們從來沒有足夠理性地去推斷真正的原因。我們只會想象他們都還活著。”

現在的露西爾孤身一人，近乎崩潰，但她還是強迫自己繼續在隔離區里尋找工作。最后，依靠自己為數不多的“關系”、一位同樣來自漢堡的德國猶太人，她找到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這個德國猶太人說服了魯姆科夫斯基對聚居區進行“完善”，比如修建一些公園和公共場所，露西爾與他共同設計建造方案。幾個月后，魯姆科夫斯基撤掉了這個部門，但露西爾已經認識了一些有用的人。一個維也納人在同一棟大樓的行政部門工作，通過她露西爾又得到了另一份工作——為冬天用的煤炭填寫申請表給德國人。到目前為止，隔離區的生活已經讓露西爾得到了沉痛的教訓：“你真的不能相信任何人，如果我告訴一個同事某件事，她就會利用這件事為自己謀利。你必須特別小心。背后捅刀子的事經常發生，其實也能理解，畢竟事關生死。”

一天，魯姆科夫斯基來到辦公室，為隔離區里一家新工廠挑選工人。一想到要見到他，露西爾就覺得“恐懼至極”，因為這個66歲、看起來跟任何人的祖父沒什么差別的老頭有著非常壞的名聲。“我聽過那些傳聞，知道他脾氣極差，發起火來會拿他的手杖打人。他在德國人允許的范圍內，是個十足的獨裁者。我想大部分人都怕他。”她藏在過道上，希望盡量不引起注意，但由于名單上有她的名字，最終她還是被叫去見魯姆科夫斯基。“他坐在椅子上，一頭白發，戴著深色眼鏡。他右手拿著手杖，我一度覺得他看起來像坐在寶座上的國王。他問我是哪里人，會講什么語言，我父親是做什么的，我的家人在哪兒，還有沒有任何親人。我回答了所有問題，他最后說：‘好吧，我會通知你的。’當時我沒太在意。”

魯姆科夫斯基來過之后，露西爾的上司將她調到了統計部門。“我不知道他們為什么給我調崗，可能是為了把我藏起來，因為那是一個非常安靜和隱蔽的辦公室。”但隨后魯姆科夫斯基的秘書打來電話說他想要錄取露西爾。她去辦公樓報到時，發現其他一些與她年紀相仿的女性已經在那里了。魯姆科夫斯基讓所有人都去一個廚房工作，這個廚房是他為那些“值得嘉獎的員工”開設的。一些年輕女性被安排在餐廳做服務員，另一些（包括露西爾在內）則在旁邊的辦公室工作。“他說他會錄用我，讓我計算如果我們有50公斤甜菜，能做出多少人份的菜。”作為在這個新廚房工作的報酬，露西爾每天可以多領一頓飯。她說：“這對我來說意義重大，就像你們今天會說的，是一件大事。”當她準備離開上一份工作改去廚房時，上司給了她關于魯姆科夫斯基的最后警告：“我想他用的是波蘭語中‘豬玀’這個詞。”她的上司沒說錯。在納粹建立的所有猶太隔離區當中，幾乎每個猶太人領導都忠于職守，但羅茲是個例外。魯姆科夫斯基臭名遠播，因為他往往把自己想除掉的人加進驅逐名單，而他的罪行還不止這點，露西爾很快就會發現。

在廚房工作的露西爾不久就意識到，魯姆科夫斯基對這里情有獨鐘。他幾乎每天晚上都來視察一次，而露西爾開始畏懼他的到來。“你可以聽見他的馬車到達的聲音。他會走進廚房檢查服務員，如果誰的圍裙沒系好，他就用手杖打她。他會檢查食物，但不會吃，因為這樣做有損他的尊嚴。然后他就會到辦公室來，你能聽見樓道里傳來他不規則的腳步聲，他有一點跛。辦公室只有我一個人，他會拉來一把椅子，跟我聊天。他講話，我聽著，他開始騷擾我。他把我的手放在他那話兒上，對我說：‘讓它高興一下。’……我努力躲開他，可他一直湊上來。那是一種可怕的關系，我嚇壞了。他想讓我搬進一間只有他能進的私人公寓，我哭了起來，我不想搬去那里。我不能理解怎么會有任何人愿意那樣做……但在隔離區里，性是非常寶貴的商品，人們拿它來交換東西，就像其他任何商品一樣。”在這項“交易”中，露西爾絕非自愿的參與者，但她明白如果不讓魯姆科夫斯基玷污，她會有“生命危險”。“如果我逃走，他肯定會驅逐我，這點毫無疑問。”

“魯姆科夫斯基確實經常占年輕女孩的便宜。”雅各布·茲伯斯坦證實道。他目睹過這位隔離區領導發現自己喜歡的年輕女孩后的行為。“我們都在餐廳，他走進來，用一只胳膊摟著她，然后跟她一起出去。我看見了。不是別人告訴，是我親眼看見的。”茲伯斯坦也相信，如果哪個女性不滿足魯姆科夫斯基的愿望，那么她的性命很可能不保。“我自己很不喜歡那個人，”他補充道，“我不喜歡他所代表的東西。”

幾周后廚房被關閉，露西爾被送去隔離區里的一家皮革廠，為德軍縫制腰帶。她再沒見過魯姆科夫斯基，而他給她留下的只有無盡的傷害：“我感到很惡心，很氣憤，覺得自己被侮辱了。”1944年，羅茲隔離區被關閉，露西爾和魯姆科夫斯基都被送往奧斯維辛。魯姆科夫斯基和他的家人死在比克瑙的毒氣室。身為年輕女性，露西爾被選去工作，她在1945年5月納粹戰敗后獲救。

露西爾 ·艾森格林到達奧斯維辛時，距她最初被驅出德國已經過去了將近三年，而早在1942年春，奧斯維辛就迎來了第一批來自波蘭以外地區的猶太人。這些人如何踏上開往集中營的列車，是納粹“最終解決”這段歷史最令人震撼的故事之一。他們來自斯洛伐克，這個國家的北部邊境距奧斯維辛不到50英里。斯洛伐克有著一段坎坷的過去，此時它作為一個獨立國家才剛滿三年時間——在納粹吞并了與之相鄰的捷克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兩地后，斯洛伐克于1939年3月宣布獨立。之前，斯洛伐克是捷克斯洛伐克的一部分；1918年以前屬于匈牙利。時任斯洛伐克總統的是約瑟夫·蒂索（Josef Tiso），他是一位羅馬天主教神父，也是赫林卡[[31]](#_31__An_De_Lie__He_Lin_Qia__Andr)所創立、有極端民族主義傾向的斯洛伐克人民黨領袖。蒂索領導下的斯洛伐克與納粹德國結盟，簽訂了附庸協議，允許德國控制斯洛伐克的外交政策。斯洛伐克政府滿腔熱情地制定針對9萬名斯洛伐克猶太人的反猶舉措，剝奪猶太人的生意、推動猶太人流亡、把猶太人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強迫佩戴黃色星章等規定接連不斷地頒布，突如其來的打擊給斯洛伐克的猶太人社區造成了殘酷后果。

埃娃·沃塔沃娃[[32]](#_32__BBCFang_Tan_1)當時是14歲的女學生，她說：“我意識到自己被社會遺棄，不再是‘體面人’了。學校把我開除。猶太人不能再購買某些物品，我們不能再擁有財產。這之前，在我住的小村莊里，大家都是一起長大的、彼此平等。”對斯洛伐克猶太人的迫害有一個特點，那就是朋友以驚人的速度變成敵人——不存在轉變的過程，好像一個開關突然被打開了一樣。奧托·普雷斯布格爾[[33]](#_33__BBCFang_Tan)，斯洛伐克猶太人，1939年的時候15歲。他說：“德國男孩（居住在斯洛伐克的德意志人）變得跟納粹分子一個樣，之前我們還一直是朋友。原本我們之間沒什么區別——猶太少年和基督徒男孩，小的時候我們老是在一起玩。后來標識牌掛了出來，上面寫著‘猶太人和狗不得入內’。我們不能走上人行道。多么令人發指。我們不能上學，不能看電影或看球賽。我只能跟父母坐在家里，之前我都會跟朋友出去。”在奧托·普雷斯布格爾看來，對猶太人態度轉變的背后，最重要的動機是貪婪。“墻上貼著從德國報紙上剪下來的連環畫，上面是一個大鼻子猶太人肩上扛著裝滿錢的大袋子，一個赫林卡衛兵照他的屁股踢了一腳，他的錢全掉出來。城里到處都貼著這樣的招貼畫。”

斯洛伐克的赫林卡衛隊負責開展反猶行動，與納粹沖鋒隊一樣，他們也處處打壓猶太人，并同樣于細微之處滲透反猶主義思想。“斯洛伐克人很樂意接管（猶太人的）商店，大撈一筆，”米夏爾·卡巴奇[[34]](#_34__BBCFang_Tan_1)說，他曾是一名赫林卡衛兵，“他們（猶太人）過去開商鋪，做著騙人的勾當。他們從不工作，就想過輕松日子。他們天生就是這樣的人。猶太人不愿意工作，這算是某種世界共識。連希特勒都怕他們變成歐洲的特權階層，所以先下手為強。全都是政治。”反猶主義偏見有顯而易見的內在矛盾：無論是米夏爾·卡巴奇，還是第一章提到的漢斯·弗里德里希，他們一邊罵猶太人懶惰，一邊又怪他們勤奮；嫉妒猶太人把生意做得又大又成功的同時，卻宣稱他們從不工作。他們都不覺得這其中有什么矛盾的地方。如果硬要為弗里德里希和卡巴奇自相矛盾的觀點辯解，只能說他們堅持認為猶太人做的不是“真正的”工作，比如務農，而是選擇做買賣或者經營店鋪。事實上，正是因為在許多歐洲國家，數百年來猶太人都被禁止擁有土地，他們才會從事這些活動。

此時，對納粹來說，奧斯維辛突然變成接收斯洛伐克猶太人的理想地點。希姆萊意識到，不會再有新的蘇聯戰俘被送至奧斯維辛了。德國與蘇聯在莫斯科附近的交戰陷入僵局，這清楚地表明，東線戰爭不會像納粹預計的那樣速戰速決。如今，已被俘獲的紅軍被視為非常寶貴的勞動力，在奧斯維辛這樣的集中營里使用實在是一種浪費。不久戈林便正式下令，所有蘇聯戰俘都要送到軍工廠。由此，比克瑙無法再發揮它預先設想的作用。誰來填補蘇聯戰俘留下的空缺呢？慣于迅速改變政策的希姆萊馬上給出了答案——猶太人。

猶太人也正是斯洛伐克當局想要驅逐的對象。1941年秋，納粹就向斯洛伐克提出為帝國提供勞動力的要求。到了1942年2月，斯洛伐克以家庭為單位，總共交出了2萬名猶太人。與東線的納粹分子一樣，蒂索和斯洛伐克其他政府官員也不愿留下那些失去了家中支柱的老幼婦孺，把所有人一起送走對他們來說要容易得多。然而，讓斯洛伐克輕松的方案卻給納粹制造了麻煩。納粹尚不具備進行大規模屠殺的能力，他們可不愿意在這個時候接收沒有工作能力的猶太人。為解決這個問題，1942年2月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發召開了一次會議，與會者包括斯洛伐克總理沃伊捷赫·圖卡（Vojtech Tuka），他的辦公室主任伊西多爾·科索博士，以及艾希曼在斯洛伐克的代表、黨衛隊突擊隊大隊領袖（少校）迪特爾·威斯里舍尼。威斯里舍尼和圖卡戰后都就會議上進行的討論提供了證詞，通過比較，我們可以大致判斷出會議內容。[[35]](#_35__Yi_Ju_Wei_Si_Li_She_Ni_De_Z)斯洛伐克方表示，將養家糊口的人與其他家庭成員分開“不符合基督教精神”，如果猶太壯勞力都去帝國工作，就“沒人照看他們的家人”。但根據威斯里舍尼的回憶，斯洛伐克人最關心的不是“基督教精神”，而是勞動力被納粹接收、留下他們失去經濟來源的家人留下所造成的“經濟影響”。最后，斯洛伐克方表示，他們或許可以通過某種方式，補償德國因同時接收勞動者及其家人而付出的“代價”。



1．海因里希·希姆萊（左）與奧斯維辛指揮官魯道夫·霍斯，攝于1942年7月前者訪問集中營時。



2．在納粹“最終解決”方案形成過程中，阿道夫·希特勒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盡管他沒有參與日常的屠殺行動，但他的部下所遵從的正是他本人想要毀滅猶太人的愿望。



3．萊因哈德·海德里希，希姆萊的副手，一個有教養的人，也是實施大屠殺的劊子手。



4．東部某地的處決現場。在納粹占領時期這種場景隨處可見。



5．漢斯·弗里德里希，黨衛軍第一步兵旅成員。他曾于1941年在烏克蘭參與對猶太人的處決。



6．波蘭羅茲猶太人隔離區街景。這張照片里的絕大部分人都于1944年秋天被殺害。



7．莫得哈伊·哈伊姆·魯姆科夫斯基（右），羅茲隔離區的猶太“統治者”，一個充滿爭議、甚至可以說惡名昭彰的人物。



8．魯姆科夫斯基，圖中白發者，在黨衛隊高層訪問隔離區時與希姆萊交談。



9．猶太男男女女在羅茲隔離區一個臨時的戶外工廠編制籃子。



10．在隔離區，甚至兒童都要工作，不工作意味著把自己置于更危險的處境。



11．1942年一個炎熱的夏日，希姆萊正研究在莫洛維茨建造大型合成橡膠工廠的方案，這是奧斯維辛集合體當中最大的工業設施。



12．希姆萊（左起第二）對他在奧斯維辛見到的進展大為滿意，隨后提拔了指揮官霍斯，將其升為黨衛隊上級突擊隊大隊領袖。

這個問題最終在柏林得到解決。斯洛伐克政府同意，每驅逐一名猶太人，就付給德國500馬克，條件是這些人再也不會回到斯洛伐克，并且德國人不得占有他們留下的房產及其他財產。就這樣，在這位羅馬天主教神父總理的領導下，斯洛伐克付錢給德國人，讓他們把自己的猶太人全部帶走。

1942年3月，對斯洛伐克猶太人的強制驅逐展開，此前大多數人都被關在斯洛伐克的臨時集中營內。西爾維婭·韋塞勒 [[36]](#_36__BBCFang_Tan)那年春天就關在波普拉德（Poprad），她回憶道：“有些斯洛伐克士兵真的很蠢，他們會故意在地板上大便，然后讓我們用手清理干凈。他們管我們叫‘猶太婊子’，用腳踢我們。他們的舉止極其惡劣。還對我們說：‘讓我們教教你們猶太人怎么工作。’其實我們都是窮苦的女人，過去都有工作。你的尊嚴被剝奪是很恥辱的一種感覺。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你突然什么都不是了，我們像動物一樣被對待。”

在臨時集中營工作的赫林卡衛兵有不少油水可撈。米夏爾·卡巴奇說：“猶太人來集中營的時候都帶著自己的財物和衣服。副指揮官經常叫我們去挑自己想要的衣服。大家都能拿什么就拿什么，我拿了一雙鞋，用繩子把鞋捆好帶回家。守衛們都拿到了想要的東西。”在猶太人離開之前對他們強取豪奪的不光有斯洛伐克人。西爾維婭·韋塞勒說：“一天來了一個人高馬大的黨衛隊軍官，到了就開始朝我們大吼，我不明白他為什么要吼。然后有人把大籃子放在我們面前，一共三個大籃子，我們要把自己的金銀錢財以及所有值錢的東西都交出來。他們對我們說，我們就要去工作了，用不上這些值錢的東西。我很窮，只有一塊手表，是我姑姑給我的，我就把手表交給了他們。”

臨時集中營不僅偷盜之風盛行，還充斥著肆意的虐待。“我們的守衛經常打他們（猶太人），”米夏爾·卡巴奇說，“有個特殊部門專門負責懲罰犯錯的人。他們把這些人帶到一個特殊的房間，用一根木棍打他們的腳。”當然，誰是“犯錯的人”完全由赫林卡衛兵隨意決定。

斯洛伐克猶太人關在臨時集中營的時間從幾天到幾周不等，但最終都會被帶去附近的火車站，登上駛離這個國家的列車。西爾維婭·韋塞勒清楚地記得，去火車站的路上斯洛伐克留給她的最后印象：“他們朝我們吐口水，大叫著：‘猶太婊子，這是你們應得的下場！你們終于要去工作了！’他們還朝我們扔石子，想盡一切辦法羞辱我們。也有人靜靜地站在旁邊看著，其中一些還哭了。但大多數人，無論是老一輩還是年輕的，都在侮辱我們。我希望這種事不要發生在任何人身上，那種感覺太可怕了。”

斯洛伐克猶太人在赫林卡衛兵的看守下來到火車站。“我接到命令，要把猶太女人趕上火車并負責看管她們，”米夏爾·卡巴奇說，“我自言自語道：‘你們不想工作，你們這群猶太蠢豬！’”沒過幾個月，卡巴奇等赫林卡士兵便得知這些猶太人被送去處死，但這個消息并沒有引起他們太多的同情：“我覺得歉疚，但一想到他們是斯洛伐克的蛀蟲，又不同情他們。我們不覺得自己做錯什么，他們被帶走是件好事，這樣他們就不能再欺騙我們，再也不能靠損害工人階級的利益發財了。”

在這之前，卡巴奇與猶太人幾乎沒有任何直接接觸。他所居住的村莊沒有什么猶太人，他也承認斯洛伐克的猶太人從沒給他本人找過什么“麻煩”。他熱烈擁護反猶主義政策，不是出于個人恩怨，而是因為他是一位狂熱的民族主義者，為現在斯洛伐克成為一個獨立國家感到自豪，而且斯洛伐克的領導人告訴大家“猶太人都是打劫斯洛伐克人的騙子”。他的故事有力地證明偏見可以如此迅速地深入人心，只要它融于一整套充滿吸引力的價值理念中。為了證明自己是個堅定的、愛國的斯洛伐克民族主義信徒，米夏爾·卡巴奇接受了極端反猶主義的思想。在打擊猶太人的過程中，他通過占據他們的財務獲得經濟上的好處，并把這一罪行粉飾為“正義的復仇”。西爾維婭·韋塞勒親眼見證了斯洛伐克的主流道德觀在多么短的時間內發生改變。“我好幾次反思這段經歷。人是很容易被改造的。你想對他們做什么都行。事關金錢和人命的時候，你很難碰見愿意為你犧牲的人。我很受傷，真的很受傷，尤其是當我的同學揮著拳頭對我喊‘這是你應得的下場！’打那以后，我對人再也不抱什么希望。”

與此同時，奧斯維辛正在盡力完善營地的屠殺設施。1942年2月27日，魯道夫·霍斯、建筑師卡爾·比朔夫和黨衛隊中央技術管理局的漢斯·卡姆勒[[37]](#_37__Deborah_DworkHe_Robert_Jan)開了一次會，原定建在奧斯維辛1號營地的焚尸場，決定改建在比克瑙的新集中營。他們打算把這個新焚尸場建在一個偏遠的角落，挨著一處小農舍。只需把原有的門窗用磚封死，內部隔出兩個可以充作毒氣室的密閉空間，農舍便可以在很短時間內被改造成臨時屠殺中心。屋子的新入口將直通各毒氣室，磚墻高處應鑿出一個洞口，用來投放齊克隆B顆粒。這個農舍后來被稱為“小紅房”，又叫“1號倉”（Bunker 1）。它于1942年3月底首次投入使用，當時一批當地猶太人被視為不適合工作而送往奧斯維辛。“小紅房”的兩個毒氣室滿員時，一次可毒死約800人。

現在，一個新的屠殺中心聽憑霍斯支配，舊焚尸場的問題在這里都得到解決。無論“小紅房子”里的受害者喊得多大聲，都不會對營地的正常運作產生干擾。但霍斯知道，要在附近建起一座焚化爐來處理這個臨時毒氣室的尸體，還需要等上好幾個月的時間（實際上等了一年多）。舊問題（如何在相對秘密的環境下屠殺）不去，新問題（如何毀尸滅跡）不來。

首批斯洛伐克猶太人于1942年3月到達奧斯維辛，他們沒被送去毒氣室，但這并不妨礙黨衛隊和卡波的下馬威 。作為其中一員，奧托·普雷斯布格爾對此有切身體會：“我們一下火車，便得五個人一組從火車站（朝奧斯維辛1號營）跑過去。他們（黨衛隊）大吼著：‘快跑！跑，跑，跑！’（Schnell laufen！Laufen，laufen，laufen !）我們就跑。跑不動的人被他們當場打死。我們覺得自己連狗都不如。之前我們被告知要去工作，沒人說是去集中營。”

度過了沒吃沒喝的一夜，第二天早上，奧托·普雷斯布格爾和他的父親，還有同來的約1000名斯洛伐克猶太男人，被命令從主營地跑到比克瑙的營地。他估計有七八十人死在路上。污泥爛沼的比克瑙是個特別可怕的地方。黨衛隊隊員佩里·布羅德回憶道：“比克瑙的條件比奧斯維辛（主營地）要差得多。每一步腳都深陷爛泥。幾乎沒有水可以用來洗漱。”[[38]](#_38____Na_Cui_Dang_Wei_Dui_Yan_Z)犯人就生活在這種極端惡劣的環境下，到處都是污泥和他們自己的排泄物。

剛到比克瑙，奧托·普雷斯布格爾就體會到集中營管理體制的殘酷。一個波蘭男孩偷父親的皮帶，奧托抓住這個男孩揍了他幾拳。另一個囚犯很快對他說，他犯了一個可能致命的錯誤。這個男孩是個“男寵”（pipel）——在集中營的暗語中，它指的是卡波的年輕仆從（很多情況下與卡波有著同性關系）。“我們只能跑回營房躲起來，”普雷斯布格爾說，“負責這里的卡波走進營房，讓我們都躺下，面朝走道。‘男寵’進來找我，但他沒認出我來，我們長得都差不多，都沒有頭發（所有犯人到了以后都要剃光頭），穿著一樣的衣服。我很幸運，否則他們一定會殺了我。”

在比克瑙勞動的第一天，奧托·普雷斯布格爾還目睹了另一起事件，它以更殘忍的方式向他展示，此時所處的環境是多么令人絕望：“我們去修路，卡波和黨衛隊看守在旁邊監督。有一個猶太人跟我來自同一個鎮，他長得又高又壯，他們家很富有。卡波發現他鑲著金牙，就讓他把牙給他。他回答說不行，但卡波堅持他必須照做。他還是說自己不能把金牙給他。卡波生氣了，說我們所有人都必須服從他的命令。他拿起鐵鍬照著他的頭打了好幾下，直到他倒下。卡波把他翻過來，把鐵鍬放在他喉嚨上，然后跳上去折斷他的脖子，再用鐵鍬從他嘴里撬出了金牙。站在不遠處的另一個猶太人問卡波他怎么能這樣做。卡波走過去，說演示給他看，然后就用同樣的方法把他也殺了。然后卡波對我們說，永遠不要提問題，管好自己的事。那天晚上我們運了十二具尸體回營房。他殺死這些人純粹出于好玩。所有這一切都發生在第一天。”

奧斯維辛從建立之初就伴隨著卡波的暴行，因此新到囚犯的經歷雖然駭人，但在這個集中營里并不是什么稀罕事兒。然而，隨著這批斯洛伐克犯人的到來，集中營的文化（如果在奧斯維辛的語境下也可以使用這個詞的話）將要在兩方面發生重大改變。

第一個變化，是現在集中營里有了女犯。到目前為止，奧斯維辛一直都只有男性。女人的到來絲毫沒有讓奧斯維辛的管理者變得更“文明”，而是如西爾維婭·韋塞勒所見，幾乎產生了相反的效果。在奧托·普雷斯布格爾到達集中營后不久，她也乘坐著一輛載有幾百個女人和一個男人的列車來到這里，男人是一位猶太醫生，斯洛伐克當局準許他陪同這些女犯一起前來。“我們剛到奧斯維辛就被趕下了火車，”韋塞勒說，“黨衛隊軍官開始朝我們的醫生大喊，他們想弄清楚為什么他是這批犯人中唯一的男人。他用非常流利的德語回答說：‘我是醫生，是猶太組織派我來的。我負責陪同，他們讓我把人送到后就回斯洛伐克。’然后，一個納粹軍官掏出槍把他打死了。就在我眼前，他們如此隨便地殺了他，就因為他是這么多女人中間唯一的男人。那是第一件讓我震驚的事。”

接著，斯洛伐克的女犯走到奧斯維辛主營地。“我們看見高聳的營房和大門，”西爾維婭·韋塞勒說，“大門上面寫著‘Arbeit macht frei’，勞動使人自由。所以我們以為自己是來這里工作的。”幾個營房已被清空，以迎接這些女犯的到來。她們被要求脫光衣服，交出任何還藏著的貴重物品。“別看德國人那么厭惡我們，他們拿走我們衣服、鞋子和珠寶的時候可是一點都沒猶豫。幫我解釋一下，我一直都想不通，他們對我們的東西為什么不覺得反感？”

等到這些斯洛伐克女犯剃光了頭，赤裸著身體坐下來，一位黨衛隊軍官走進房間，讓其中五個人去醫務室。“他想要檢查猶太女人的身體，”西爾維婭·韋塞勒說，“看看猶太女人是不是真的處女。他還想知道猶太女人干不干凈。他們做完檢查以后非常吃驚，但這可不是好事。他們無法相信我們這么干凈，而且90%以上都是處女。這些猶太女孩都有宗教信仰，所有人都不會在結婚前讓男人碰自己。但在接受檢查的過程中，每個女孩都失去了貞操，因為醫生用他們的手指，這是羞辱她們的另一種方式。我的一位朋友全家人都信教，她對我說：‘我想為我的丈夫守住貞操，結果卻這樣失身了！’”

盡管在剛到集中營的數十個小時內，普雷斯布格爾和韋塞勒便經歷了如此可怕的遭遇，但這些還不算是奧斯維辛最具代表性的行為。它眾多臭名昭著的做法之一才剛要開始，即第一天的篩選。這也是斯洛伐克的猶太人到來后，集中營出現的第二個重要變化。早在4月底開始就有對新到犯人的定期篩選，但直到1942年7月4日才開始系統化。那天，一批斯洛伐克猶太人方抵達，黨衛隊立刻把他們分開：適合工作、可以被集中營接收的，以及不適合工作、需要立即被毒死的。直到這時——距第一批囚犯到來已兩年——奧斯維辛當局才最終展開對新到囚犯的篩選，它將成為這里最具代表性的冷酷和恐怖。

首批參加篩選的猶太人中包括埃娃·沃塔沃娃和她的父母。這批被驅逐的斯洛伐克人既有年邁的老人和年幼的兒童，也有埃娃這種健康的年輕人。“我們到了奧斯維辛站，每五個人站成一排。痛苦的一幕就在這里上演：他們把年輕人與老人和小孩分開。父親和我們母女被拆散。從那以后我再沒有他的消息。我對他的最后印象，是他滿是擔憂、傷心和絕望的臉。”

此時，“小紅房”完工已有幾個星期，幾百米外的另一個農舍，也就是所謂的“小白房”，又叫“2號倉”（Bunker 2），也被改造成一個屠殺中心，一次可以毒死1200人。在“2號倉”內，四個狹促的房間被用作毒氣室。這里的通風效果比1號倉（“小紅房”）更好，屠殺結束后可以更快地將屋里的齊克隆B排干凈——所有這些，都是奧斯維辛為“改進”屠殺程序所常見的自主創新。

被選去處死的斯洛伐克囚犯在農舍外等待，奧托·普雷斯布格爾目睹了這一場景：“他們就坐在那兒，肯定在家吃過了飯。黨衛隊士兵帶著狗站在周圍警戒。當然，他們對接下來要發生的事毫不知情，我們也不想告訴他們，那樣對他們只會更糟。我們常常想，那些把他們帶到這里的家伙根本不是人，都是叢林里的野獸。”按照他的說法，這一時期的毒氣謀殺都是晚上進行。“他們從不在白天干這事，（因為）人們有可能會大喊大叫或者試圖跑出來。我們只會在第二天早上看見堆在坑邊的尸體。”

普雷斯布格爾被分到一個特殊部門，負責掩埋在兩個農舍中被毒死的犯人尸體。“用毒氣殺人很簡單，你只需要封嚴門窗，不讓毒氣漏出去。他們把門鎖上，幾分鐘后里面的人就都死了。他們（黨衛隊）把這些（尸體）搬到洞口，我就在洞邊工作。一般是第二天早上埋尸體。我們往它們身上灑石灰粉和土，直到尸體被蓋住，別人看不見。”這種尸體處理方式有非常大的缺陷，炎熱的夏天一到，坑里的尸體就開始腐爛。于是，普雷斯布格爾原本已經像噩夢的工作現在變得更加可怕：“死去的肉體復活。它們逐漸腐爛，從洞里冒了出來。到處都是血跡和臟東西，我們不得不用手撿拾它們。看上去不再像死人的身體，而是一團爛乎乎的東西。我們要把這些東西都挖出來，有時候揀出一個人頭，有時候是一只手或一條腿。那個氣味讓人難以忍受。我要是想活命，（除了做這份工作）沒有別的選擇，否則他們肯定會殺了我。我想活著。有時我也會問自己，這樣的人生到底值不值得。”等這些尸體都被挖出來，黨衛隊命令犯人把它們都倒進一個巨大的、燃燒著的火坑里。就這樣，在等待附近正規焚化爐建好的過程中，奧斯維辛當局臨時造出一個應急的焚化爐。普雷斯布格爾說：“我們用木頭和汽油生起一把大火，然后把它們（尸體）扔進火坑。我們一般是兩個人一起扔，一個人抓著腿，另一個抓胳膊。那個地方臭氣熏天。我們從來沒有因為干這種活得到更多的食物。黨衛隊士兵經常喝伏特加、白蘭地或者其他酒。他們也忍受不了。”

普雷斯布格爾強迫自己繼續做著挖尸體和埋尸體的可怕工作，與此同時還要面對父親的死給他帶來的感情創傷。犯人經常又餓又渴，他的父親喝了泥坑里的雨水，這是引發感染并造成死亡的一個常見原因。“小的時候給我看病的醫生也在奧斯維辛，”普雷斯布格爾說，“他跟我說永遠不要喝那里（泥坑）的水，否則用不了24小時我就沒命了。經常有人因為喝了那里的雨水，兩條腿都腫起來，甚至往外滲水。”但他父親沒管住自己，喝了里面的水后就死了。在經歷了最初的震驚和失去親人的痛苦后，普雷斯布格爾意識到，要想繼續活下去，唯一的辦法就是不去理會身邊發生的一切，甚至是自己父親的死。“想活得長，就必須忘得快。”他說。

在以鐵人般的意志力進行自控、特別是忍耐著饑餓和口渴帶來的巨大痛苦時，普雷斯布格爾沒想到對童年經歷的回憶幫了他：“我還是個小孩子的時候，父母會給我零花錢讓我在上學路上買三明治，但我從來都不買，而是去買甘草糖。所以一整天我除了甘草糖什么都不吃，直到下午回家。”這意味著在比克瑙，當身邊的人都“餓得發瘋”時，他卻能夠應付：“我習慣吃得不多，到現在還是這樣。”

依靠回憶過去的貧苦生活撐下來的不只奧托·普雷斯布格爾。如雅各布·茲伯斯坦在討論羅茲隔離區時所說的，許多德國猶太人難以忍受隔離區的生活，因為他們來自條件優渥的家庭，而他和他的家人來自相對貧困的地區，所以反差沒有那么大。西爾維婭·韋塞勒也在富裕的中產階級斯洛伐克女性身上發現了類似的情況。來奧斯維辛之前，斯洛伐克中轉營的生活條件就已經讓她們感到難以忍受，而她這種出身較貧寒的人應付起來則要容易得多。帕維爾·斯滕金也發現，作為奧斯維辛里的蘇聯戰俘，他艱苦的成長經歷現在成了優勢。小的時候沒有足夠的食物，也沒有得到過很多疼愛，這些現在卻成了可貴的資本。

猶太人隔離區和集中營里這種形式的“篩選”，正是萊因哈德·海德里希在萬湖會議上提出應該予以關注的。納粹篤信達爾文主義的“適者生存”思想，他們無法容忍那些經受住強制勞動的可怕考驗的猶太人。事實上，是納粹的種族理論創造出他們自認為最需擔心的敵人。這種排除一切的堅持到底、把自己的扭曲邏輯發揮到極致的做法，是造成納粹的“最終解決”與其他一些種族滅絕行為不同的原因之一。為了實現納粹的目標，每一個猶太人都必須從德國的領土上消失，不管通過何種方式。

奧托·普雷斯布格爾最近重訪了比克瑙的尸體掩埋地點，他想起幾千名跟他一起從斯洛伐克來到奧斯維辛的同胞，他們如今卻不能再踏上這樣的旅途。“太可怕了。我還記得我當時挨著父親（站在這里）。在這兒工作的大部分人都跟我來自同一個城市，他們所有人我都認識。人在一天天消失。他們肯定還埋在附近某個地方。只有四個人熬過了那三年活了下來。”

1942年春天和初夏，數千名來自上西里西亞地區和斯洛伐克的猶太人在“小紅房”和“小白房”里失去了生命。在去往毒氣室的路上，格哈德·帕利奇這樣的黨衛隊軍官會跟每個猶太人聊天，問他們的職業、有什么專長。魯道夫·霍斯曾在他的回憶錄中強調，如此大規模的屠殺之所以能成功實施，最關鍵的一點是整個過程在極其平和的氣氛中進行。霍斯還寫道，如果隊伍中有人在前往毒氣室的途中說起窒息或屠殺，造成“恐慌迅速蔓延”，那么屠殺會變得困難得多。而這種情況是有可能發生的。后來，納粹會重點關注那些有可能造成這類麻煩的人，一旦有任何跡象表明精心創造的順從氣氛可能遭到破壞，他們會第一時間不引人注目地把這些人轉移到隊伍看不見的地方，然后用小口徑手槍把他們打死，這種手槍聲音較小，可以保證附近的人不會聽到。

那些察覺到將會發生什么的母親，與她們的孩子走過“農院里鮮花開滿枝頭的果樹”（霍斯語）邁向死亡，她們所承受的情感折磨我們幾乎無法想象。霍斯寫道，有一次，一個女人悄聲對他說：“你怎么下得了手，殺死這么漂亮、這么可愛的孩子？你就沒有一點同情心嗎？”還有一次他看見，一個女人在毒氣室的門被關上的那一剎那想要把她的孩子們扔出來，還大喊：“至少讓我的寶貝們活下來吧！”這些令人心碎的場景確實曾給霍斯帶來一些感情困擾，但他在回憶錄里寫道，騎上快馬飛奔一陣，或是喝上幾杯酒以后，沒有什么煩惱忘不了。[[39]](#_39__Huo_Si____Zhi_Hui_Guan)

將大規模屠殺集中在比克瑙一個偏僻的角落里進行，意味著奧斯維辛主營的日常事務可以不再受屠殺干擾。雖然犯人的生活依然非常艱苦，但對黨衛隊來說，這里變成了一個有可能在工作之余休息放松的地方。因被懷疑參與波蘭抵抗運動而被蓋世太保抓捕的塔德烏什·里巴奇[[40]](#_40__BBCFang_Tan)，其所見所聞證明了這一點。

幾個月以來，里巴奇換了數次工作，最終得到一份最搶手的——在黨衛隊餐廳做服務生。就在斯洛伐克女犯于1942年春到達奧斯維辛的同時，黨衛隊的女看守也到了這里。里巴奇目睹了好幾次狂歡晚宴。“一群流氓的聚會，”他回憶起其中一個夜晚，“他們唱歌、喝酒、大聲慶賀，什么樣的酒都有。我把酒倒進他們的玻璃杯里，當我把酒遞給一個女看守時，她開始拉我的胳膊，對我說：‘親愛的……’所有人都開始看我。當時我的處境特別危險，我差點把酒灑出來。但幸運的是，有個黨衛隊守衛沖她喊：‘閉嘴！你這個賤女人！’然后她就松手了。”那天晚些時候，里巴奇又注意到另一個女看守向他和其他服務生調情。“有個醉醺醺、大塊頭的女人搖搖晃晃地走著，大概是想去洗手間，她看見我們站在那里，就開始朝我們比劃一些暗示性交的手勢。我們一個個面無表情，低聲對彼此說：‘她想干什么？那個婊子！’”

他無法不去注意黨衛隊看守的放蕩生活與犯人殘酷的生存現狀形成的極大反差：“只有犯人會死于饑餓。他們在集中營里的生活本來就是一個漸進的處決過程，因為他們要面臨饑餓、挨打和重體力勞動。但他們（黨衛隊）什么都有。我們在宴會上看到，那里什么都有，有各種酒，甚至還有法國白蘭地。他們什么都不缺。那里看起來就像魔鬼們的可怕聚會，你無法想象那幅景象。”

盡管如此，里巴奇深知自己能夠在餐廳做一名服務生是多么幸運。這份工作不僅是“有屋頂的”——他認為這是他能熬過冬天的最主要原因——而且還可以讓他直接接觸到集中營里最最重要的物品：食物。他和其他當服務員的犯人能偷什么就偷什么，然后把它們藏在這棟房子的閣樓里。但這樣做也要冒著巨大風險。一次，幾個黨衛隊士兵正站在緊鄰餐廳的自助餐臺前，里巴奇和其他幾個服務生聽到了很大的聲響，他們回頭朝餐廳望過去，“嚇得頭發都豎起來了”。“一個人的兩條腿和半個身體從天花板上露了出來。”他們馬上就知道發生了什么。有一個服務生在閣樓藏偷來的食物時滑倒了。“你在上面要特別小心地踩在橫梁上，否則就會踩空。”本來他們所有人都可能性命不保，但幸運的是，附近的黨衛隊士兵完全沉醉在大笑和豪飲當中，沒有回頭看這個房間。掉下來的那個犯人又爬了回去，瓦礫也被迅速清掃干凈。但這還是在天花板上留下一個大窟窿。第二天早上上班時，他們用黃油和香腸賄賂了一個黨衛隊士兵，讓他不要過問這個洞是怎么回事。兩天以后他們把洞補好了。

朋友在天花板上踩空，無助地垂掛在空中的兩條腿——若不是發生在奧斯維辛，塔德烏什·里巴奇的回憶其實相當滑稽；而他和他的同胞通過賄賂一位黨衛隊普通士兵逃脫了懲罰這個事實，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好萊塢制片人酷愛設置的德國守衛形象。在西方，戰俘營生活往往以一種傳奇的方式被講述。但是，在奧斯維辛，里巴奇的故事與上述一切毫無共通之處。相反，它再一次清楚地表明，1942年夏天，奧斯維辛分成了兩個彼此隔絕的營地。這種隔離不光體現在地理位置——比克瑙坐落在距離奧斯維辛主營不到2英里的泥沼之中——也體現在思想和心理狀態。一邊，塔德烏什·里巴奇這樣的犯人努力獲得最好的工作、“順手牽來”更多的食物，竭盡所能地爭取活下去的機會，而在另一邊，男女老少在到達營地的數小時之內便慘遭殺害。

對于霍斯來說，那個夏天他的主要精力無疑應該放在比克瑙和屠殺的具體操作上。而在兩個經過改造的農舍內建造毒氣室、在戶外焚燒尸體等做法，仍是納粹為完成他們布置給自己的屠殺任務所找出的臨時解決方案。奧斯維辛此時的屠殺流程仍然效率不高，純屬湊合。距離成為大規模屠殺中心這個目標，奧斯維辛還有相當長的路要走，現有的屠殺能力極其有限。與霍斯及其同僚在戰后給出的證詞相反，他們多次自主研發新的措施以開展大規模屠戮。但他們知道，他們最重要的任務還有待完成，這也是后來使奧斯維辛臭名遠播的——

成為一座殺人工廠。

[[1]](#filepos235381) 引自古斯塔夫·吉爾伯特，《紐倫堡日記》（Nuremberg Diary, Farrar 1947）。

[[2]](#filepos238235) 引自Christopher Browning，《最終解決的起源：1939年9月—1942年3月納粹猶太人政策的演變》（The Origins of the Final Solution: The Evolution of Nazi Jewish Policy September 1939—March 1942, William Heinemann 2004），第318頁。

[[3]](#filepos241529) BBC訪談。

[[4]](#filepos243081) BBC訪談。

[[5]](#filepos245621) 引自Ian Kershaw，“第三帝國中的猶太人迫害與德國人的公眾輿論”（The Persecution of the Jews and German Public Opinion in the Third Reich），載于《利奧·貝克研究所年鑒》（Yearbook of the Leo Baeck Institute, 1981），第二十六卷，第284頁。

[[6]](#filepos247480) 蘇聯國家軍事檔案（Russian State Military Archive）502K/1/218。

[[7]](#filepos248259) Peter Witte等編著，Himmler’s Dienstkalender 1941/2（Hamburg 1999）， 第123頁，腳注2，及Sybille Steinbacher, Musterstadt Auschwitz （Munich 2000），第238—239頁。

[[8]](#filepos251812) BBC訪談。

[[9]](#filepos253099) BBC訪談。

[[10]](#filepos254643) Irena Strzelecka和Piotr Setkiewicz，“集中營及其分營的建設、擴大及發展”（The Construction, Expans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amp and Its Branches），載于《奧斯維辛1940-1945，集中營歷史上的核心問題》（Auschwitz1940—1945, Central Issu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Camp，第一卷，奧斯維辛-比克瑙國立博物館2000年），第78頁。

[[11]](#filepos255383) 魯道夫·霍斯，《奧斯維辛指揮官》，第123頁。

[[12]](#filepos257192) Michael Thad Allen，“邪惡的細節：比克瑙毒氣室，1941年10月”（The Devil in the Details: the Gas Chambers of Birkenau, October 1941），載于《大屠殺與種族滅絕研究》（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16/2 2002秋。

[[13]](#filepos258761) 《大屠殺百科全書》（Encyclopedia of the Holocaust第二卷，Macmillan, New York），第902頁。

[[14]](#filepos259213) BBC訪談。

[[15]](#filepos260036) BBC訪談。

[[16]](#filepos261165) Christopher Browning，《通往種族滅絕之路》（Path to Genocid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第28—56頁。

[[17]](#filepos266962) 引自Burmeister 1961年1月24日的證詞，路德維希堡聯邦檔案館，303 AR-Z 69/59，第3頁。

[[18]](#filepos269827) 《希特勒席間談話：1941—1944》（Hitler’s Table Talk 1941—1944 , Phoenix Press 2000）。

[[19]](#filepos270265) 引自Peter Longerich，《未寫下的命令》（The Unwritten Order, Tempus 2001），第78頁。

[[20]](#filepos270585) Gerhard Weinberg，“盟軍與大屠殺”（The Allies and the Holocaust），載于Michael J. Neufeld和Michael Berenbaum編著，《對奧斯維辛的轟炸：盟軍與大屠殺》（Allies and the Holocaust in the Bombing of Auschwitz , St Martin’s Press, New York 2000）第20頁。

[[21]](#filepos274680) J. Noakes和G. Pridham編著，《納粹主義：1919—1945》，第三卷，第1126頁。

[[22]](#filepos275283) 引自Longerich，《未寫下的命令》，第92頁。

[[23]](#filepos277464) BBC訪談。

[[24]](#filepos279800) 1961年11月8日，pp. 5-6 2 StL 203 AR-2 69/59 Bd3.

[[25]](#filepos290330) 引自Ernst Klee, Willi Dressen和Volker Riess,《那時歲月》第255頁。

[[26]](#filepos290603) BBC訪談。

[[27]](#filepos292679) 注：Perry Broad于1942年4月到達奧斯維辛。

[[28]](#filepos293207) 《納粹黨衛隊眼中的奧斯維辛集中營》，第129頁。

[[29]](#filepos293538) 《納粹黨衛隊眼中的奧斯維辛集中營》，第130頁。

[[30]](#filepos294970) 馬伊達內克（Majdanek）集中營于1941年10月建于盧布林附近，建造之初擬用于關押蘇聯戰俘，后來關押的大多為猶太人和波蘭人。該集中營內也建造了一個使用齊克隆B的小型毒氣室。但無論屠殺能力還是規模，它都不能與奧斯維辛相提并論，且最初也不具有集中營的功能。

[[31]](#filepos311218) 安德烈·赫林卡（Andrej Hlinka，1864—1938），斯洛伐克神父、政治家，是二戰前捷克斯洛伐克最重要的公共人物之一。1938—1945年斯洛伐克人民黨內的軍事組織赫林卡衛隊便以其命名。

[[32]](#filepos311888) BBC訪談。

[[33]](#filepos312457) BBC訪談。

[[34]](#filepos313749) BBC訪談。

[[35]](#filepos316703) 依據威斯里舍尼的戰后證詞，該證詞分別于1946年5月6日和7日（Statny oblastny archive v Bratislave, Fond Ludovy sud, 10/48）和1946年8月12日（Statny oblastny archive v Bratislave, Fond Ludovy sud, 13/48）在斯洛伐克收錄。另見Koso于1947年4月11日提供的證詞（Statny oblastny archive v Bratislave, Fond Ludovy sud, 13/48）。

[[36]](#filepos322130) BBC訪談。

[[37]](#filepos327111) Deborah Dwork和Robert Jan van Pelt，《奧斯維辛：1270年至今》，第302頁。

[[38]](#filepos329600) 《納粹黨衛隊眼中的奧斯維辛集中營》，第105頁。

[[39]](#filepos344492) 霍斯，《指揮官》，第150頁。

[[40]](#filepos344987) BBC訪談。

# 第三章 死亡工廠

1942年初，納粹帝國內只有海烏姆諾一處是專為滅絕目的設置的集中營，盡管如此，納粹還是啟動了無節制的殺戮。在一個不那么激進的組織中，人們會先進行詳細的規劃，然后再采取行動，但納粹在相關設施還未經過試用或流程設置尚未完全到位的情況下，就展開對猶太人的驅逐。由此導致的混亂無序成為納粹種族滅絕的根植土壤。如何在這樣的環境里組織屠殺？1942年如何成為“最終解決”執行過程中屠戮規模最大的一年？這里敘述的故事將更多地揭示納粹行兇者的心態。

在1942年的大屠殺中，奧斯維辛并沒有發揮最主要的作用，但正是在這一年，它的魔爪開始伸向西歐：就在斯洛伐克政府與德國協商將猶太人送往奧斯維辛僅數天之后，3月23日，另一個歐洲國家裝滿猶太人的火車也首次朝那里駛去。它的形成背景及之后的發展比斯洛伐克更曲折、更慘烈，主要由于這是一個深陷德國鐵蹄之下、卻被給予了極大自主權的國家——法國。

1940年6月，法國迅速淪陷，隨后被分為占領區和非占領區兩部分。一戰英雄貝當元帥成為非占領區維希政權的首腦。戰爭初期他頗受歡迎（遠遠超過許多法國人在戰后所愿意承認的程度），全國上下都期待著貝當能重新為法國挽回尊嚴。至于德國人，他們有兩個自相矛盾的愿望：一方面想要控制法國，另一方面卻又希望盡可能減少派駐法國的工作人員。當時占領區和非占領區的德國官員加起來還不到1500人，因此，德國人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法國官員及其行政系統進行管理。

占領的第一年，法國人和德國人之間幾乎沒發生什么沖突。在巴黎瑪吉思緹酒店（Hotel Majestic）運籌帷幄的德國駐軍司令，奧托·馮·施蒂爾普納格爾將軍，與其說是努力想要奴役另一個民族的納粹分子，不如說更像羅馬帝國時代管理著半自治行省的羅馬總督。盡管如此，法國猶太人仍沒有逃過迫害。1940年，法國大約有35萬猶太人，其中近半數沒有法國護照。許多人是20世紀20年代從東歐來到法國的，剩下的則是不久前為躲避納粹徒勞地流亡至此。這些外來猶太人成了早期被迫害的對象。1940年10月，新成立的法國政府頒布了“猶太人法令”，所有猶太人都被禁止從事特定工作，而非占領區的外國猶太人則被送進集中營，忍受額外的牢獄之苦。

在占領初期，納粹對猶太人的迫害是以他們慣有的方式進行的：首先進行身份登記，隨后頒布法令清算猶太人的財產，實行沒收，最終是對占領區里所有猶太人的驅逐。維希政府在整個過程中一直不聲不響地予以配合。然而，到了1941年夏天，相對平和的占領被數千英里外的事件改變，那就是納粹對蘇聯的入侵。1941年8月21日，兩名德國人在巴黎遭到槍擊，一死一重傷。這一暴力事件很快被證實是法國共產黨所為。9月3日的另一起謀殺事件使德國人更加擔憂，法國風平浪靜的日子就要結束了。

作為對謀殺事件的回應，德國當局關押了共產黨人，并進行了報復——9月事件爆發后，三名人質立即遭到槍決。但在希特勒看來，這些還不夠。他當時正忙著在東普魯士森林里的總部指揮東線戰場上的廝殺，陸軍元帥威廉·凱特爾向巴黎傳達了希特勒的不滿：“對三名人質的報復行動太溫和了！元首認為一名德國士兵的價值遠遠超過三個法國共產黨員。元首希望通過最殘酷的報復行動回應這類事件。再有暗殺事件發生，每一個（被殺害的）德國人都應該立即用至少100個人的性命來換。不采取這種嚴厲的懲罰措施，事態就無法得到控制。”[[1]](#_1__Yin_Zi_Ulrich_Herbert__De_Gu)

希特勒希望他的駐法代表能果斷、殘酷地采取行動，就像他駐烏克蘭的總指揮官，后者在1941年12月面臨類似危機時曾寫道：“只有當大眾意識到游擊隊員及他們的同情者早晚都得死，打擊游擊隊的戰爭才有可能取得勝利。絞刑尤其能夠激發恐懼。”[[2]](#_2__Wolodymyr_Kosyk___Di_San_Di)希特勒本人后來如此評論：“只有抱著毫不留情的冷酷態度開展與游擊隊這群敗類的斗爭，才能取得勝利。”[[3]](#_3__Timothy_Patrick_Mulligan___Z)

身在巴黎的德國管理者陷入兩難。這一年10月，一名德國官員在南特遭槍擊，隨后98名人質被殺，這在當時激起了公憤。因此，德國管理者擔心，如果接受希特勒的建議，他們很有可能失去法國民眾的合作。馮·施蒂爾普納格爾將軍心里明白，“對付波蘭人的方法”[[4]](#_4__Yin_Zi_Herbert__De_Guo_Zai_B)在法國并不適用，但他在政治上是個講求實際的人，明白希特勒絕不會改變心意，不會允許他們在法國謹慎地處理這類問題。元首已經打定主意要展開“殘酷的報復”。于是，按照納粹領導層解決問題的典型做法，德國占領當局對希特勒的專斷觀點進行變通，將可能造成他們與法國人關系的損害降至最低。另種形式的“殘酷報復”方案很快被提出：對特定人群處以罰金并進行驅逐。由于共產主義者和猶太人之間的“關聯”在每個納粹分子心中都根深蒂固，因此，對巴黎的德國管理者來說，對猶太人征收罰金并驅逐他們，以此報復共產黨對德國人的謀殺是再合理不過的了。報復性處決仍會繼續，但規模減小，而且在所有“殘酷報復”行動中只占很小一部分。

盡管施蒂爾普納格爾在某種程度上有了交代，但他還是感到需要再次向他的上級提出抗議。他在1942年1月說，自己“無法再昧著良心槍殺一大批人，也無法在歷史的法庭上為這些人負責”。[[5]](#_5__Yin_Zi_Herbert__De_Guo_Zai_B)不出所料，吐露心聲的施蒂爾普納格爾不久便離職，但他所創立的原則保留下來：一旦法國人反抗，德國人的一系列報復行動中一定會包括對猶太人和共產黨員的驅逐。第一批受害者于1942年3月離開法國，前往奧斯維辛。盡管德國軍官不想讓自己“在歷史的法庭上”為報復性槍殺負責，但他們實際上還是把被驅逐的人置于絕境。饑餓、虐待和疾病摧毀了后者。在貢比涅登上列車的1112名男性當中，1008人于五個月內喪生。[[6]](#_6__Shu_Zi_Yin_Zi_Susan_Zuccotti)據估計，僅有大約20個人活到了戰后。也就是說，第一批被驅逐的人超過98%死在了奧斯維辛。

對納粹來說，驅逐法國猶太人不僅是一種報復措施，同時也完全符合一個更宏大的目標——完成對法國“猶太問題”的“最終解決”。1942年1月的萬湖會議已明確指出納粹的長期戰略目標，在日常工作中實現它的任務，就落在派駐法國的黨衛隊高級小隊領袖特奧多爾·丹內克爾身上。他向阿道夫·艾希曼匯報，而艾希曼則對萊因哈德·海德里希負責。5月6日，海德里希親自來到巴黎，并向一小部分人透露：“全歐洲的猶太人都被判了死刑，他們的下場將會跟基輔的蘇聯猶太人一樣，最近幾周開始被驅逐的法國猶太人也不例外。”[[7]](#_7__Yin_Zi_Herbert__De_Guo_Zai_B)

要實現讓法國“肅清猶太人”這個目標，納粹面臨的一個巨大障礙就是法國當局。如果沒有法國行政部門和警察部門的積極合作，僅靠德國在法國的人力，根本不可能完成對法國猶太人的辨認、召集和驅逐工作，更何況納粹最初為法國分配的驅逐人數高于其他任何西歐國家：1942年6月11日，一個由阿道夫·艾希曼主持的會議在柏林召開，會上確定了各國要送到奧斯維辛的猶太人數量：比利時1萬，荷蘭1.5萬，法國則有10萬之多。這些猶太人的年齡須在16至40歲之間，其中“不適合工作的人”僅可以占10%。我們一直無法確知這樣的數字和限制條件背后是怎樣的考量，但暫不接受大量兒童和老人的決定或許可以表明，奧斯維辛當時的屠殺能力尚十分有限。特奧多爾·丹內克爾急于取悅上級，一心要驅逐每一個適齡的法國猶太人。柏林會議結束沒多久，丹內克爾就制定了一個方案，打算在三個月的時間內將4萬名法國猶太人送到東部。

當然，制定宏大的方案是一回事，在一個很大程度上自治的國家去執行則完全是另外一回事。7月2日，維希政府警察部門負責人勒內·布斯凱與納粹官員會面，會上，德國人對理想與現實的差距有了切身體會。布斯凱表明維希政府的立場：在占領區，只有外籍猶太人可以被驅逐，而在非占領區，法國警察不會參與任何圍捕行動。布斯凱說：“法國的立場是，我們并不反對拘捕本身，但如果由法國警察在巴黎實施，這就有些令人難堪了。這是（貝當）元帥本人的意思。”[[8]](#_8__Yin_Zi_Serge_Klarsfeld___Da)德國安全警察負責人赫爾穆特·克諾亨馬上提出抗議，他知道，沒有法國的合作，驅逐根本不可能完成。他提醒布斯凱，希特勒不會理解法國在這個對他如此重要的問題上為何采取此種立場。受到這一隱晦的威脅后，布斯凱同意讓法國警察在占領區和非占領區都參與抓捕，但只針對在法國的外籍猶太人。法國當局的政治態度非常明確——他們會配合德國人交出外國人，以此來保護本國公民。

兩天后，法國總理皮埃爾·賴伐爾與丹內克爾會面時，（根據丹內克爾的轉述）賴伐爾提出：“驅逐非占領區的猶太家庭時，（可以）包括16歲以下的孩子。至于占領區的猶太兒童，我并不關心。”[[9]](#_9__Yin_Zi_Zuccotti___Da_Tu_Sha)歷史學家認為，賴伐爾對兒童的處置方案稱得上他“永久的恥辱”[[10]](#_10__Yin_Zi_Zuccotti___Da_Tu_Sha)，這一時刻應該“永遠載入法國史冊”[[11]](#_11__Klarsfeld___Fa_Guo_Er_Tong)。一個完全公正的評價，特別是考慮到這些孩子將要遭受的駭人苦難，很大程度上源自一個法國政治家做出的承諾，由法國人民在法國的土地上執行。

1942年7月16日，法國警察開始在巴黎抓捕外籍猶太人。那天晚上，安妮特·穆勒和弟弟米歇爾、兩個哥哥以及母親全都在他們位于第十區的家中。他們的父親是波蘭人，因為之前聽到一些傳言，此時他已經離開家在附近藏身，而其他留下的家庭成員則完全沒有料到，他們都將面臨災難。安妮特[[12]](#_12__BBCFang_Tan_1)當時9歲，她清楚地記得那天晚上發生的一切：“我們被一陣敲門聲驚醒，警察闖了進來。我母親乞求他們放過我們，警察局局長一把推開她，說：‘動作快！別耽誤我們的時間！’我嚇壞了。這么多年來，我一直在做噩夢，因為突然之間我所崇敬的母親做出這種舉動。我無法理解她為什么在他們面前這樣羞辱自己。”

安妮特的母親匆忙把床單鋪在地上，包起一些衣服和干糧。幾分鐘后他們下樓到街上去。此時安妮特發現自己忘了帶梳子，警察允許她回去拿，只要她能“馬上回來”。回到房間，她發現還有警察在里面：“家里被翻了個底朝天，我（還想）帶上我的洋娃娃……他們一把奪走我的娃娃，他們把它從我懷里搶過去，重重地扔在沒來得及鋪好的床上。我這時明白過來，接下來肯定不會有什么好事。”

等他們走上街，在混雜著警察和猶太人的隊伍里，她母親讓兩個年紀較大的男孩（分別是10歲和11歲）趕快逃跑，于是他們消失在人群中（這兩人被法國人藏了起來，都活到了戰后）。隨后，警察把所有人趕上巴士，把他們帶到位于十五區的一個封閉自行車賽場（Vélodrôme d’Hiver），所有于大搜捕的兩晚被抓捕的猶太人家庭都被帶到了這里，共計12 884人，其中包括4115名兒童。米歇爾·穆勒 [[13]](#_13__BBCFang_Tan)當時7歲，接下來發生的事在他的記憶中是一個個片段：“無論白天還是晚上，燈都亮著。有一個巨大的天窗。天氣非常熱。我們很少再見到警察的身影。有一兩處可以接水的地方，還有廁所——大概也是兩個。我身上一直有一股臭味，兩天后就讓人難以忍受。孩子們都在玩耍，我認識很多小孩。我們在自行車道上滑行，那是一個木制的軌道。”

在這種惡臭撲鼻的環境下，安妮特·穆勒病倒了。她被帶到自行車賽道的中心躺下休息。“我看見住在離未來大街（rue de l’avenir）不遠處的那個癱瘓的男人。我們每次去他家，他總是用一條毯子蓋住他的腿。他的孩子們圍著他，畢恭畢敬地對他說話。我記得看到這個人，他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當時他躺在地上，沒穿衣服——順便說一句，那也是我第一次見到赤身裸體的人——他大聲喊叫著。他的眼睛半睜著，渾身雪白，一絲不掛。那個畫面挺嚇人的。”

在自行車賽場住了幾天后，這些猶太家庭被火車送往法國鄉下的集中營，其中穆勒一家被送到了博恩拉羅朗德（Beaune-la-Rolande）。“那是個很美的小村子，”米歇爾·穆勒說，“很漂亮，也很熱。村里有一條林間小路。我們穿過村莊時，村里的人都看著我們，充滿好奇。”穆勒一家屬于最后一批到達集中營的人，在這個匆匆搭建起來的營地里已經沒有床鋪給他們睡，所以他們只能在地板上鋪稻草，盡可能讓自己好受些。即便是這樣，米歇爾也并不發愁：“一開始我并不擔心。我們跟媽媽在一起，這讓我很踏實。我還跟朋友們一起玩。”他只有一個擔憂：“我們都是好學生，我們擔心的問題就是自己趕得上開學嗎？”

盡管集中營的條件十分艱苦，但對安妮特和米歇爾來說，與他們的母親在一起就是最大的慰藉。“她在家的時候非常愁苦，”安妮特說，“我們都不太敢跟她說話，但剛到營地時，她跟我們很親近。她陪我們玩，我們擁抱她。其他女人看見我們這樣摟摟抱抱著玩鬧，都哈哈大笑。”然而，剛進集中營時，一件與母親有關的事讓安妮特終生耿耿于懷：“我們住在營地的第一晚，外面在下雨，有雨水滴到她身上。弟弟和我爭執起來，誰都不愿意跟她睡在一起，因為我們都不想把自己弄濕。她說：‘你們就為了不被水打濕，都不愿睡在媽媽旁邊啊。’我們分開后，這件事一直折磨著我。我有機會睡在她身邊時卻沒有好好把握。”幾天后，他們的母親通過賄賂一名法國警察（他們在營地里見到的所有衛兵都是法國人）給丈夫寄去一封信，正是這封信后來救了她兩個幼子的命。

到達營地沒幾天，看守就要求女囚交出她們的貴重物品，但有人寧愿把她們最珍視的物品丟掉，也不愿讓抓捕她們的人拿去。“公廁里有一個糞池，”米歇爾·穆勒說，“糞池上架著一塊木板。上廁所時所有人都能看見。這把我嚇壞了。在所有人都能看得見的地方上廁所真是太丟人了。有些（女人）真的把她們的首飾扔進糞坑里。”后來，米歇爾看見幾個當地居民被雇來對猶太女囚搜身，還帶著一根棍子搜廁所。“我萬萬沒想到會這樣。”他說。

雖然穆勒一家和其他數千個家庭在博恩拉羅朗德和皮蒂維耶（Pithiviers）等地的集中營已吃盡苦頭，但更可怕的命運還在等著他們。德國原本只要求法國遣送能夠工作的成年人，兒童是為了湊數后加進去的，因此柏林方面并未正式批準以家庭為單位的驅逐方案。盡管法國政府知道，只要等上幾周，這樣的方案幾乎一定通過，但他們還是同意將父母與孩子分開，先送走成年人。維希警官讓·勒蓋在給奧爾良地方長官的信中寫道：“兒童不該與他們的父母一同離開。”他補充說：“在與他們的父母團聚之前，將有人負責照料他們。”[[14]](#_14__Yin_Zi_Klarsfeld___Fa_Guo_E)事實上勒蓋很清楚，孩子們很快也會被送走，因為他接下來寫道：“兒童專車將于8月中下旬出發。”[[15]](#_15__Yin_Zi_Klarsfeld___Fa_Guo_E)就這樣，法國政府沒有建議德國人推遲驅逐，讓一家人一起離開，而是任由極其痛苦的骨肉分離隨后發生。

賴伐爾曾聲明，他之所以提議將孩子一起驅逐，是出于一種“人道”精神，避免讓一家人分開。這個聲明原本就跟斯洛伐克政府出于“基督徒”的考量要求遣送整個家庭一樣虛偽，此時更被證明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謊言。沒有什么比賴伐爾現在提出的方案更不“人道”了——博恩拉羅朗德和皮蒂維耶集中營的孩子將被迫離開父母的懷抱。正如歷史學家塞爾日·克拉斯菲爾德所述：“勒蓋對驅逐會造成的實際影響視而不見，還落井下石。他在自己那間位于蒙索（Monceau）大街、灑滿陽光的辦公室里最關心的，就是如何塞滿蓋世太保安排的那些列車。”[[16]](#_16__Yin_Zi_Klarsfeld___Fa_Guo_E)

8月初，成年人可能會被帶走的消息在博恩拉羅朗德傳開。“我記得她——我母親——把錢縫進我外套的墊肩里，”米歇爾·穆勒說，“那是我做禮拜時穿的套裝，還有一件配套的馬甲和短褲，我覺得它很像高爾夫短褲，特別喜歡。她把錢縫進去，告訴我要當心。第二天他們就來抓人了。”法國警察闖進集中營，把所有人召集起來。他們一宣布要把孩子和他們的父母分開，現場就陷入了混亂。“好多孩子緊緊攥著他們的母親，”米歇爾回憶道，“那真是生離死別的一刻。孩子一邊緊抓著母親不放，一邊哭喊，憲兵有些招架不住。”安妮特也說道：“警察狠狠毆打這些婦女，讓她們后退。孩子們拉著她們的衣服。他們（憲兵）用水槍沖散人群。他們扯爛了女人的衣服。好多人在哭喊。現場本來一片嘈雜，可突然之間，大家都安靜下來。”原來，一把機關槍架到了這些婦女兒童面前，威脅清清楚楚。“女人們在前面排成一條長隊，”安妮特說，“直到今天那個隊列還會浮現在我眼前。我們小孩子互相牽著。我母親站在前排，她朝我們使了個眼色，我們看著她。我記得她眼里帶著笑意，仿佛在說她會回來的。米歇爾哭了。那是母親留給我們的最后印象。”

父母離開后，這些孩子在營地里的境況迅速惡化。沒有母親的照顧，他們變得臟兮兮的，渾身是土。很多人因為只能吃上稀湯和豆子而染上痢疾。但最難忍受的，還是感情上的失落。“晚上最難熬，”米歇爾·穆勒回憶道，“那通常是母親給我們講故事的時間，她走了，我們只能自己給自己講。”安妮特補充道：“她離開以后，有好幾天我都不愿意走出營房，因為太難過了，止不住地哭。我一直睡在稻草堆上，對自己說，媽媽是因為我的過錯才離開的，因為我對她不夠好。我反復用類似的事責怪自己。米歇爾硬拉著我出去走走。我得了痢疾以后，米歇爾幫我清洗，強迫我吃飯。他帶著我在營地里一點一點地轉，到處拔草然后吞進肚子里。”

7歲的米歇爾擔起保護姐姐的義務，但他面臨著巨大的困難。安妮特病倒了，不能排隊領湯，而吃草的實驗以失敗告終——米歇爾原本以為草吃起來會和蔬菜沙拉一個味兒。而最大的問題在于，7歲的他比許多男孩都要年幼，個頭兒也更小，所以開飯搶食物時他根本不是他們的對手。“我清楚地記得領湯的時候大家打作一團的情景，我會與別的小孩打架。因為我個頭兒太小，擠不進領湯的人群里，有時候我只能帶著空空的罐子回去，什么都沒領到。姐姐一直在生病，我們只能去搜別人盛食物的空罐子，看里面有沒有什么東西剩下。我們經常聊到跟吃有關的話題，告訴對方自己要點的菜，其實在家里我們通常都吃得不多，但那個時候真的餓壞了。”他和姐姐一天比一天虛弱，米歇爾意識到，想要活下去，他必須徹底改變他們的境況。因此，當他看見營地醫務室外的一則告示時，他決定采取行動：“上面說醫務室將供給5歲以下的孩子吃飯。幸好我識字，又會寫——我一直告訴我的小孩，必須學會讀和寫，這非常有用——我假裝自己只有5歲，我成功了。通過這個辦法我吃上了飯，也讓我姐姐吃上了飯（因為米歇爾會偷藏一些食物帶出來）。”

這段歷史之所以格外殘忍，格外令人心酸，不光是孩子們被迫與自己的父母分離，還因為法國政府沒有好好對待這些留給他們“照料”的孩子。他們遭到忽視，吃不飽飯，情感上也得不到安慰。在他們人生最脆弱的階段甚至遭到侮辱。對米歇爾·穆勒傷害最大的并不是饑餓或骯臟，而是他在博恩拉羅朗德所遭受的肆意羞辱：“由于衛生條件非常差，我們都長了虱子，他們把我們都剃成光頭。那時我長著濃密的卷發，我的頭發讓媽媽特別引以為傲。警察給我剃頭，他把我夾在兩腿之間，說：‘哦，接下來我們要給最后的莫希干人剃頭了。’他在我的頭發中間剃出一條道。只有中間被剃禿，我覺得特別丟人，偷了一頂貝雷帽蓋住腦袋。”剃完發的米歇爾讓他九歲的姐姐都嚇了一跳。“我記得我媽媽很喜歡給他梳頭，他長著漂亮的金發，她覺得他是個特別漂亮的小男孩。他們把他中間的頭發剃掉之后，他看起來特別丑。我終于理解人們為什么要把猶太人趕走了，因為哪怕是我自己的弟弟，當我看到他臟臟的小臉和那樣的發型后，我都會覺得嫌惡。他讓我產生了嫌惡的感覺。”幾天后，警察終于剃掉了米歇爾兩邊的頭發。他們覺得很有趣的一件事，卻給米歇爾留下了至今都無法抹平的情感創傷。

到了1942年8月中旬，法國政府終于做出安排送走這些兒童，以便湊夠他們承諾德國人的數字。按計劃，這些孩子將被送到巴黎東北部郊區的德朗西（Drancy）集中營，再跟那里的成年人一起被送去奧斯維辛。也就是說，他們將在陌生人的陪伴下，走向死亡。

8月15日，一群孤苦伶仃的孩子排著隊，走在博恩拉羅朗德這個美麗的小村莊里，沿著兩側載滿綠樹的道路朝火車站走去。兩周以前，那些跟隨母親走進營地、健康活潑的男孩女孩，現在的樣貌發生了很大變化。“我記得村里的人都看著我們，”安妮特·穆勒說，“他們臉上帶著那種我自己也曾產生過的嫌惡。我們肯定臭烘烘的，被剃光了頭，身上長滿瘡。我看見人們臉上那種嫌惡的表情，就像你在地鐵站里看到臟兮兮、睡在長椅上的流浪漢時會有的表情。我們仿佛已經不再是人。”盡管如此，在前往火車站的路上，孩子們都在高聲歌唱，安妮特說，這是因為“我們相信自己就要見到爸爸媽媽了”。然而，他們將要前往的并不是自己的家，而是德朗西這個中轉站，6.5萬多人從這里被送往東部的滅絕營，其中超過6萬被送到了奧斯維辛。

奧黛特·達爾特羅夫-巴蒂克爾[[17]](#_17__BBCFang_Tan) 1942年8月在德朗西集中營，和另外兩個朋友自愿照顧這些從博恩拉羅朗德和皮蒂維耶來的孩子。“他們剛到時身體狀況非常糟糕。身上都是蟲，特別、特別臟，還生著痢疾。我們想給他們沖澡，但沒有東西把他們擦干。我們想給他們些吃的——這些孩子已經好幾天沒吃東西了——可幾乎什么也沒有。我們還想整理出一份完整的名單，可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的姓，他們只會說：‘我是皮埃爾的弟弟。’我們盡量詢問每個孩子的名字，當然，都是大孩子，那些小的是不可能問出來的。他們的母親把一塊寫著名字的小木牌系在他們身上，但很多孩子摘下了木牌拿著玩。”

看著這些可憐的孩子，奧黛特和另外兩個人除了用自己也不相信的話去安慰他們，其他什么也做不了。“我們對他們撒謊。我們告訴他們：‘你們就要見到爸爸媽媽了。’當然，他們不相信我們。很奇怪，他們仿佛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么。很多孩子對我朋友或者對我說：‘女士，收養我吧……收養我吧。’他們想留在集中營里，哪怕這里的條件已經這么差。他們不想再去別的地方。有一個小男孩，一個長得非常漂亮的小男孩，大概3歲半。他的樣子我到今天還記得。他不停地說：‘媽媽，我會害怕的。媽媽，我會害怕的。’他一直重復著這幾句。說來也怪，他知道未來會讓他更加害怕。他們都特別悲觀。他們寧愿留在恐怖的集中營里。他們看事情比我們看得清楚多了。”

奧黛特看到，這些孩子仍留著“對他們特別重要的一些小物件”，比如他們父母的照片，或是小小的首飾。“有一個戴耳環的小女孩說：‘你覺得他們會讓我留著金子做的小東西嗎？’”就在這些孩子離開的前一天，集中營里的一些猶太女囚開始搜查孩子們身上的貴重物品。“這些女人是按日計酬的。我們知道，她們搜出來的大約有一半會進自己的口袋，我看見她們對孩子一點都不友善。她們完全無動于衷，這讓我難以理解。”

在米歇爾和安妮特看來，在德朗西集中營里的日子“就像活在一場噩夢中”。這個營地其實是一片尚未完工、造價低廉的住宅區。讓安妮特驚訝的不僅是生活條件的惡劣（她和弟弟只能睡在水泥地上，周圍都是糞便），還有另一個現實：前來照料他們的大人屈指可數，面對眾多孩子根本忙不過來，這意味著，“沒人照顧，我們真的是自生自滅。我不記得有哪個大人關心過我們”。就在送他們去奧斯維辛的列車開動前夕，她聽見有人點自己和弟弟的名字。她和米歇爾被帶出德朗西，經過帶刺的鐵絲網，來到一輛等待的警車前。“我們以為自己就要被釋放了，”安妮特說，“我們會再次見到家人，并回到未來大街去。米歇爾和我想給我們的父母一個驚喜，還策劃了一番，想藏在桌子底下然后再跑出來，這樣他們見到我們一定會特別開心。就在這時，我轉過頭，看到警察在流眼淚，他們肯定知道我們不是要回家。”

安妮特和米歇爾被帶到離德朗西不遠，另一個關押外籍猶太人的收容中心，那曾是蒙馬特區拉馬克大街（rue Lamarck）的一個收容所。他們當時并不知道，這是他們通往自由的第一步。他們的父親收到了妻子在博恩拉羅朗德寫的信，于是他四處買通關節，通過一位有影響力的法國猶太人，把錢送到了法國政府那里。結果，年幼的安妮特和米歇爾都被重新劃為“皮貨制造工人”，被帶出了德朗西。他們到了新的收容中心，在父親的安排下，一家天主教孤兒院派人接走了他們，并在戰爭期間把他們藏在里面。

1942年夏天被送到德朗西的數千名兒童絕大多數沒有這么好的運氣。8月17日至8月底之間，這些在博恩拉羅朗德和皮蒂維耶被迫與父母生離死別的孩子，前后搭乘七輛火車從德朗西到奧斯維辛。“出發前的那個早上，我們盡了最大努力打扮他們，”奧黛特·達爾特羅夫-巴蒂克爾說，“他們大部分人甚至無法帶上他們的小行李箱。他們的行李箱都混在一起，我們不知道那些箱子都是誰的。他們不想下樓，不想上巴士，我們只好把他們拖過去。等到幾千人都離開以后，我記得醫務室里大約還有80個人。我們本以為可以救下這些孩子，實際上根本不可能。有一天他們告訴我們，就連這80個人也得離開。驅逐那天早上，我們試圖把他們拉下樓，他們又踢又叫。警察走上來，費了好大勁才強迫這些孩子下樓去。有一兩個警察看見這悲慘的場面，似乎顯得有些難過。”

18歲的約·尼森曼[[18]](#_18__BBCFang_Tan)于8月26日離開德朗西，前往奧斯維辛。火車上有700名成人和400名兒童，其中包括他那“一頭金發、非常漂亮的”10歲的妹妹。跟他同一節車廂的大約有90個人，其中約有30個是沒有父母陪同的兒童。約還記得孩子們如何在運貨列車車廂里“堅強地”忍受這段漫長的征程。“我們大概是兩三天以后到達奧斯維辛前一站，當然，我沒法告訴你確切的時間。附近有一個工作營，需要一些身體健康的男人，所以他們停下列車，帶走了250個人。”約便是被選中的成年人之一。“他們拿著棍子，強迫我們下車。我們沒有逗留就被帶走。我把我妹妹留在了車里……但我們無論如何都想象不出接下來會發生什么……我記得他們沒有哭。那些一面之緣的小家伙，有的長得特別可愛，他們全都被殺害了。太殘忍了。”60年過去了，約·尼森曼還是每天都會想起他妹妹和其他從德朗西上車的孩子們的悲催遭遇。“我家后面有一個幼兒園，我看見母親們排隊等著接孩子，手里拿著給他們的巧克力牛角面包。可那些孩子沒有媽媽陪伴，也沒有巧克力牛角面包……”

在納粹屠猶歷史上發生過許多可怕的事，而那些從法國運來的猶太兒童，他們的故事尤其令人心痛，其中最揪心的，當屬孩子與父母生離死別的那一幕：不僅是那駭人的暴力場景——在博恩拉羅朗德等集中營，孩子們從母親的懷抱中被生生拽走；甚至，有一些家長不得不違背天性，遺棄自己的孩子來期待他們能夠幸存，正如在最開始的圍捕中讓兒子逃跑的母親所做的那樣。由此造成的情感創傷肯定給當事人造成了極大的痛苦。

即便霍斯本人，也曾親眼目睹奧斯維辛的犯人如何不惜一切代價地要與家人在一起。篩選過程將男人和女人分開，將丈夫與妻子分開，但納粹很快意識到，強迫母親與她們的孩子分開幾乎總是損人又不利己。把一些年輕健康的女人和她們的孩子一起送進毒氣室，雖讓納粹損失了寶貴的勞動力，但他們發現，如果在最初的篩選中強迫孩子離開他們的母親，那會造成極其可怕的場面，幾乎不可能實現對屠殺過程的有效控制。此外，進行這種分離所造成的心理壓力是如此巨大，與特別行動隊近距離射殺婦女和兒童時所承受的情感困擾不相上下，而減少這種情感困擾本是修建毒氣室的初衷。

法國政府在1942年夏天送走幾批兒童后，也得出了相同的結論。被迫離開媽媽的小孩自己照料自己的畫面是如此令人不安，因此，德朗西最后一批沒有父母陪伴的兒童于8月31日乘火車離開后，當局下令停止這種做法。法國再也沒有把孩子與他們的母親分開驅逐，而是把整家人一起送去奧斯維辛。但重要的是，我們完全有理由確信，法國政府并非突然產生了惻隱之心，而是與霍斯一樣，意識到不把母親與孩子分開對他們來說更容易，為的是他們自身的利益。

這個故事讓人難以接受的另一個原因，是法國當局在每一階段與納粹的串通。納粹一開始就知道，如果沒有法國的合作，對猶太人的驅逐是不可能完成的。而法國決定交出“外國”猶太人、保護他們“自己的”猶太人時所表現出的某種程度的犬儒心態，時隔這么多年還是令人感到震驚（不過從后面的章節中我們將會看到，在接下來的幾年里，好幾個國家都做出了同樣的決定）。戰時法國的驅逐造成近8萬名猶太人喪生，大約占法國猶太總人口的20%~25%。這意味著每5名法國猶太人中，約有4人活到了戰后。這個數字有時會被辯護者當作一個“正面的數據”引用，以說明法國政府在納粹占領時期的光榮表現。事實上，這個數字所表明的恰恰是相反的結論，因為我們幾乎可以肯定，如果法國拒絕合作、拒絕交出“外國”猶太人，那么這一切都不會發生。1942年11月，法國全境被占領，法國當局不再合作，致使德國人后來的驅逐目標無法實現。即使是在這種情況下，納粹也沒有展開任何激烈的報復行動。

1942年7月的巴黎圍捕行動及后來對兒童的驅逐發生后不久，宗教領袖對法國政治領導人的做法提出了強烈抗議。8月23日，圖盧茲市大主教在寫給教區教友的公開信中表達了他的反對態度，里昂市大主教9月1日與賴伐爾會面，他對后者說，自己不但支持反抗運動，也支持天主教徒把猶太孩子藏起來的行為。但這一切來得太晚，無法再改變那年7月在巴黎大掃蕩中被帶走的人的命運。在博恩拉羅朗德，米歇爾和安妮特的母親與孩子分開后死在了奧斯維辛。誠然，想要置她于死地的是納粹分子，但真正讓她陷入絕境的卻是法國人自己。“讓我最難以接受的，”米歇爾說，“是一切都發生得無緣無故。人們被捕僅僅是因為他們生下來就是猶太人，而實施抓捕的居然是法國人，我現在仍然無法理解。60年過去了，我還是覺得難以相信。”

1942年夏天，在沒有父母陪同的情況下被送去奧斯維辛的4000多個孩子全部死在了那里，沒有一個幸存。“我的兩個哥哥（在最初的圍捕中）逃跑的時候，”安妮特說，“他們一個同學的媽媽也催促她的兒子快跑。那個男孩逃脫后，又不想孤零零一個人，特別想回去找媽媽，所以他求一個警官（允許他）回到他母親所在的地方。最后他也被送進了毒氣室。這些都是很有想法的孩子，他們都是快樂的孩子，充滿對生命的熱愛。但就因為是猶太人，他們就要遭此劫難。其中，又有多少本是有能力、有才華，充滿個性的人？”

這些兒童與父母的分離、在各個中轉營忍受的苦難，甚至在遣送途中的“堅強”，它們都有目擊者，然而，沒有人能告訴我們，他們走進奧斯維辛的大門之后究竟發生了什么。我們很難想象篩選的場景，也幾乎無法想象作為一個屠殺的劊子手，參與這個過程會是一種什么樣的體驗。唯一可以解開謎團的方法，就是從當時在奧斯維辛工作的黨衛隊成員中找到一位可靠的目擊證人。經過數月的調研，我們竟然真的找到了這樣一個人，對他進行了訪談。他就是奧斯卡·格倫寧（Oskar Groening）[[19]](#_19__BBCFang_Tan)。

1942年，21歲的格倫寧派駐奧斯維辛，就在從法國來的兒童到達僅數周后。剛來不久，他就看見一輛列車停靠在“坡道”（指猶太人下車的站臺）邊上。“我站在坡道上，”他說，“我的任務是跟其他人一起看管即將到達的那批囚犯的行李。”他看到黨衛隊醫生首先將男人與婦女兒童分開，然后又篩選出可以工作的人以及要馬上送進毒氣室的人。“病人都被抬上了卡車，”格倫寧說，“畫著紅十字的卡車——他們總在制造一種假象，那就是沒什么可怕的。”據他估計，1942年9月他第一次見到的那批犯人當中，有80%~90%的人被選去立即殺害。“（篩選）過程是以一種比較有秩序的方式進行的，但等篩選結束以后，那里就像一個菜市場一樣。有成堆的垃圾，垃圾旁邊是生病的人、走不了路的人，可能還有某個找不到媽媽的小孩子，或是某個藏在車廂里、在我們搜查火車時被發現的人。這些人腦袋上直接挨一槍，當場就死了。他們對待這些人的方式讓我產生了懷疑和憤怒。他們抓著一個小孩的腿，把他扔到卡車上……等他發出像生病的小雞一樣的叫聲，他們就把他舉起來砸向卡車的邊緣。我不明白黨衛隊士兵為什么要舉起一個小孩子，拿他的頭去砸卡車的邊緣……或是開槍殺死他們，然后把他們扔到卡車上，就像在扔一袋小麥。”

按照格倫寧的說法，由于他充滿“懷疑和憤怒”，因此他找到他的上級，對后者說：“我辦不到，沒法再在這里繼續工作下去。如果必須要殺光猶太人，至少應該按照一定的規矩來辦。我跟他說了這些，然后說：‘我想離開。’”格倫寧的上級平靜地聽完他的抱怨，提醒他別忘了當初的黨衛隊效忠宣誓，并告訴他應該“忘了”離開奧斯維辛這個念頭。但他也給了格倫寧一些希望，他告訴格倫寧，那天晚上所見到的“過激行為”只是個“例外”，并說他本人也同意黨衛隊士兵不應該參與這種“殘暴的”行動。相關文件證明，格倫寧后來確實提出了申請，要求把自己調至前線，但沒有獲得批準，因此繼續留在了奧斯維辛。

重要的是，格倫寧并沒有向他的上級抱怨屠殺猶太人這個原則，只抱怨了實施的具體方式。當他望著面前的猶太人，知道他們幾小時內就會死在毒氣室的時候，他說他的心情“非常復雜”。“假如你在蘇聯，面前架著一部機關槍，蘇聯的軍隊正朝你沖過來，而你要做的就是扣動扳機，打死盡可能多的人，這個時候你會有什么樣的感受？我故意這樣說，是因為我們一直都認定一個事實，那就是猶太人是來自德國內部的敵人。政治宣傳對我們產生了很大影響，讓我們理所當然地認為對猶太人的滅絕只不過是戰爭中會發生的事。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并不會產生同情或同理心。”當被追問為什么兒童也不放過時，格倫寧答道：“敵人不是那個時間點的那些孩子，而是他們身上流淌的血，是他們長大后將要變成的那個危險的猶太人，正因為如此，兒童也受到了牽連。”

從奧斯卡·格倫寧被調去奧斯維辛之前的經歷中，我們可以找到一些線索，來解釋他為什么會認為無助的婦女兒童也是“敵人”，必須被“滅絕”。他于1921年出生于下薩克森州，父親是一名紡織熟練工，也是個傳統的保守派，“對德國取得的成就深感自豪”。從格倫寧記事起，他就愛翻看祖父的照片，他祖父曾是不倫瑞克公國精銳步兵團的一員。“我還是個小男孩的時候，他的儀態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騎在馬背上，吹著他的小號，帥氣極了。”德國在一戰中失利后，格倫寧的父親加入了右翼組織“鋼盔黨”（Stahlhelm），這是《凡爾賽條約》簽訂后涌現出的眾多極端民族主義組織中的一個，它們將該條約視為恥辱。隨著生活更加拮據（由于缺乏資金，他的紡織生意于1929年宣告破產），格倫寧的父親因德國所遭受的不公待遇而產生的憤怒之情也變得更加強烈。20世紀30年代初，年輕的奧斯卡加入了鋼盔黨的青少年組織“沙恩霍斯特”（Scharnhorst）。“我戴著一頂灰色的軍帽，身穿襯衫和長褲。看起來有些怪異，但我們感到很自豪。我們還會穿黑色、白色和紅色的衣服，也就是威廉皇帝時代國旗的顏色。”

1933年，納粹上臺。對當時11歲的格倫寧來說，由鋼盔黨的沙恩霍斯特轉入希特勒青年團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他繼承了父母的價值觀，認為納粹分子“是希望德國有更美好的未來、并為此而采取行動的一群人”。作為希特勒青年團的一員，他參與了焚燒“猶太人和其他墮落分子”所撰寫書籍的行動，認為如此有助于德國消除不合國情的外來文化。他還認為，此時明顯可以看出民族社會主義者正在努力振興經濟：“（自納粹上臺以來）六個月內，500萬失業人口從街上消失了，人人都有了工作。接著，（1936年）希特勒進軍萊茵蘭（Rhineland，它在《凡爾賽條約》中被規定為非軍事區），沒有遭到任何人的阻攔。對此我們高興極了，我父親還開了一瓶酒。”

在此期間，年輕的奧斯卡上學了。盡管他覺得自己有時“相當懶，或許還有一點笨”，但他最后還是以相當好的成績畢業，17歲時成為一家銀行的培訓生。在銀行沒工作多久，戰爭就爆發了，20個職員中的8人迅速被征召入伍，他們的工作由年輕女性接替。這意味著剩下的培訓生（比如格倫寧）可能要“做一些通常情況下絕對不會做的工作。比如我要負責看管現金出納機”。盡管這些培訓生在銀行業的職業生涯得到了意想不到的發展，但是當聽到德國在波蘭和法國迅速獲勝的消息后，他們都“情緒高漲”，一心“想要參與其中”、“想要幫忙”。

奧斯卡·格倫寧想要加入德軍的“精銳”部隊，就像他祖父那樣。對這個年輕人來說，只有一個組織能實現他這個夢想：“武裝黨衛隊（Waffen SS）由沖鋒隊（SA）的一部分成員組建而成，那時人們特別需要一個可以完全信賴的部隊。在黨員集會上，最后經過的方陣是穿著黑色制服的（黨衛隊士兵），所有人都在一米九以上，看上去個個意氣風發。”因此，當武裝黨衛隊在一家酒店征兵時，奧斯卡沒有告訴父親便跑去報名入伍。“等我回到家，我父親說：‘我希望他們會因為你戴眼鏡拒絕你。’然后他說：‘很抱歉，但你以后就會知道你能從中得到些什么。’”

被這個精英團體接納后，奧斯卡·格倫寧開始在黨衛隊行政部門做一名記賬員。對于這個崗位，他沒有絲毫不快：“我是個喜歡坐辦公室的人。我希望我的工作既能讓我體驗軍人的生活，又能有一些行政方面的內容。”這份記賬員的工作他做了一年，直到1942年9月。在這個月，他們接到命令，要把在薪酬管理中心工作的那些身體健康的黨衛隊士兵調至更有挑戰性的崗位，把行政工作留給在前線受傷致殘、即將歸來的老兵。“因此，我們大概有22個人帶著行李登上了去往柏林的列車，以為我們即將投身戰場。很奇怪，一般來說我們接到的命令都是把我們派去某個部隊集結的地方，但這次沒有。”

格倫寧和他的戰友們來到黨衛隊總部某間辦公室報到，它位于首都柏林一棟“漂亮的大樓”里。他們被帶進一間會議室，在那里，幾位黨衛隊高官對他們發表了一番演說：“他們進行訓話，說我們將要執行的任務是出于對我們的信任才下達給我們的，這項任務執行起來很有些困難。他們還提醒說，我們都是宣過誓的人，誓言是‘忠誠就是我的榮耀’，現在我們可以通過執行布置給我們的這項任務來證明我們的忠誠，任務的細節我們隨后就會知道。接著，一個級別低一些的黨衛隊軍官說，我們對這項任務必須嚴格保密，這是高度機密，我們不能對親人、朋友、戰友或這個團隊之外的任何人說起關于這項任務的任何信息。于是，我們逐一走上前，簽署了一份表達類似意思的聲明。”

在這棟大樓的院子里，格倫寧和他的戰友們被分為幾個小組，每組去不同的地方，隨后，他們便被分別送到柏林幾個不同的火車站，各自上車。“我們一路向南，”奧斯卡·格倫寧說，“朝著卡托維茲的方向。我們的領隊手上有一份文件，說我們要去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指揮官那里報到。我之前從沒聽說過奧斯維辛。”

他們是晚上到達的，幾名軍警領著他們進入了主營。他們到中央辦公大樓報到，隨后在黨衛隊宿舍里被分配了“臨時”鋪位。那天晚上，在宿舍遇見的其他黨衛隊士兵都很友好地歡迎他們的到來。“那里的人馬上接納了我們，他們說：‘你們吃東西了沒有？’我們說沒吃，所以他們就給我們找來一些吃的。”讓格倫寧吃驚的是，除了黨衛隊的基本配給——面包和香腸以外，這里還有別的食物提供，包括鯡魚罐頭和沙丁魚罐頭。他們的新朋友還有朗姆酒和伏特加，他們拿出來放在桌上，說：‘請自便。’我們吃著喝著，特別高興。我們問：‘這是個什么地方？’他們說我們應該自己找答案，并說這是個特殊的集中營。突然，門開了，有人說：‘火車到了！’三四個人跳起來然后消失了。”

這一晚格倫寧睡得很好。第二天，他跟其他新人一起到黨衛隊中央辦公大樓履新。幾位黨衛隊高官詢問了他們在戰前的情況：“我們要告訴他們我們都干過什么，做的是哪類工作，教育程度是什么。我說我是一個銀行的職員，并說我想在行政部門工作。其中一位軍官說：‘噢，我用得上這樣的人。’于是我就被他帶走了。我來到一個營房，犯人的錢都存放在這里，我被告知等犯人有了編號以后，每個人身上有多少錢就會被登記，等他們離開時再還給他們。”

到目前為止，從奧斯卡·格倫寧在奧斯維辛的經歷來看，這里完全是個“正常”的集中營，唯一特別的地方就是黨衛隊的伙食特別好。但當他開始進行登記時，他第一次了解到奧斯維辛“不同尋常”的額外功能：“那里的人（在營房工作的人）告訴我們，錢是不會還給犯人的。被送進集中營的猶太人不一樣，他們身上的錢被拿走以后就不會再退還給他們了。”格倫寧問：“這跟晚上到達的那些‘火車’有關系嗎？”他的同事回答道：“這個嘛，你不知道么？這里的規矩就是這樣的。猶太人被運來以后，要是他們不能工作，就得除掉他們。”格倫寧追問他們“除掉”究竟指什么，得到答復后，他驚訝不已：“你真的想象不出來。我直到在篩選過程中看管貴重物品和行李箱，才完全相信了他的話。你要問我那是什么感受，我只能說，是一種你一開始無法接受的驚訝。但你一定不要忘了，不光是從1933年（希特勒當權）開始，其實從更早的時候起，從我還是個小男孩的時候，新聞里的政治宣傳、媒體宣傳和我所生活的社會就一直在說服我們，是猶太人造成了一戰的爆發，并最后‘在德國人背上刺了一刀’，還讓我們認為，德國今天之所以落得這么悲慘的下場，都是猶太人的過錯。我們的世界觀讓我們堅信，猶太人正聯合起來謀劃著反抗。在奧斯維辛有人說過，這一切必須避免，一戰所發生的事必須避免，不能再讓猶太人把我們逼上絕路。德國內部的敵人正被消滅——如果有必要甚至是徹底滅絕。發生在前線的戰爭和發生在大后方的戰爭沒有任何區別，我們滅絕的不是別人，不過是敵人而已。”

如今，與奧斯卡·格倫寧面對面坐著，聽他解釋他在奧斯維辛的所作所為是一種很奇怪的體驗。年過八十的他，談論的仿佛是另一個奧斯卡·格倫寧，一個60年前在奧斯維辛工作的人。對于“那個”格倫寧，他可以不留情面地坦誠揭露。很重要的一點是，他不斷提到周圍的政治宣傳對他的影響，以及在一個有極端民族主義傾向的家庭中成長的經歷，好讓自己不用為參與滅絕負全部責任。直到戰爭結束，新的世界觀對納粹的“猶太人國際陰謀集團”假想和猶太人被編造的一戰角色提出了質疑，他這才變成了“全新的”奧斯卡·格倫寧。在一個現代、民主的德國，新格倫寧完全可以作為一名對社會有用的公民面對接下來的生活。

這并不意味著格倫寧試圖躲在“遵從命令”的盾牌背后。他并沒有把自己描述為一個沒有主見、全盤接受下達給他的所有命令的機器人。當有人跟他說，他在奧斯維辛連“雅利安”兒童被殺也能接受時，他堅決提出反對。他推翻了一些歷史學家甚為推崇的一個觀念，那就是黨衛隊士兵經過嚴苛的訓練，無論要求他們殺死什么人他們都會照做。與此相反，格倫寧的決策過程遠沒有這么簡單。的確，他聲稱自己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當時政治宣傳的影響，但在戰爭中他還是做出了一系列個人選擇。他之所以繼續留在奧斯維辛工作，不光是因為他被命令這樣做，還因為他對自己面前的跡象進行判斷后，認為屠殺行為是正確的。戰爭結束后，他開始懷疑那些依據的準確性，但他并沒有把自己的所作所為歸結于他需要像個機器人一樣行動。他一生都在做他認為“正確”的事，只不過所謂的正確，已昨是今非。

我們不該過分苛責這樣一種做法。當然他本可以做出不同的選擇，可以拒絕接受他所在的價值體系并進行反抗，也可以從奧斯維辛一走了之（雖然沒有任何記錄表明，曾有哪個黨衛隊成員基于道德考慮，拒絕在集中營工作并因此逃跑），但這都是少數的例外。奧斯卡·格倫寧的所作所為之所以讓人吃驚，根本在于他是再平凡不過的普通人。度過幾年戰俘生涯，格倫寧在一家玻璃制造廠找到了一份人事經理的工作，在那里默默干到退休。奧斯維辛的那段日子是格倫寧極其普通的一生中唯一的例外。

一項研究對奧斯維辛的黨衛隊看守進行了歷史學—社會學的剖析，基于統計數據，研究發現，“無論是職業結構還是教育程度，集中營的黨衛隊成員和當時社會的其他人員相比都沒有特別之處”。[[20]](#_20__Aleksander_Lasik__Dang_Wei)奧斯卡·格倫寧是這個結論的典型代表。其代表性還體現在，在黨衛隊系統中他是個普通士兵，最高只做到下士（Rottenführer）。奧斯維辛約有70%的黨衛隊士兵屬于這種情況，另有26%的人屬于軍士（高于下士一級的非委任軍官），只有4%是軍官。不同時期，在奧斯維辛1號營及其子營地工作的黨衛隊人數始終保持在3000人左右。[[21]](#_21__Zhe_Xie_Shu_Zi_Yin_Zi_Lasik)黨衛隊對集中營的管理是通過五大部門實現的：總部（人事、法務和其他相關職能）、醫療單位（醫生和牙醫）、政治部（蓋世太保和刑事警察“Kripo”）、經濟管理（職責包括登記和處理死去囚犯的財物）以及營務管理（負責集中營的防務）。其中，最后一個部門最為龐大——在奧斯維辛工作的黨衛隊成員約有75%從事安保工作。奧斯卡·格倫寧唯一的特殊之處，就在于他負責的是相對“簡單”的經濟管理。

1942年夏天，奧斯維辛接收的猶太人來自歐洲各國，包括斯洛伐克、法國、比利時和荷蘭。早先，西歐猶太人會先被送到羅茲等臨時隔離區，再挑出“不適合工作”的犧牲者，但這套自1941年底起執行的程序此時已被棄用。一旦奧斯維辛發展出站臺上的篩選機制，整個滅絕過程就更為精簡。奧斯維辛的魔掌甚至伸及英國，連海峽群島的度假勝地根西島（Guernsey）都與殺戮掛鉤。對于一些人來說，所謂的“英國典范”（Britishness），其中一定包括英國對希特勒的抵抗。他們確信如果納粹登陸英國海岸，英格蘭、蘇格蘭和威爾士不會有一個人與他們合作。這樣的人到今天還有很多。但接下來的故事將讓他們倍感不安。

海峽群島是法國西北海岸附近的小型群島，澤西島（Jersey）和根西島是其中最大也是最主要的兩個島嶼。英國人的領土防務在此十分松散，作為皇室屬地，它很大程度上獨立于英國政府的管理。1940年六七月間，德國人毫不費力地攻占了群島。與占領法國一樣，德國人更希望與現有的政府機構合作，而不是采取他們在波蘭和蘇聯的占領模式。然而，納粹不能容忍海峽群島上有猶太人存在，這點與他們在明斯克和華沙的態度并無二致。1941年10月，《澤西島晚報》登出通知，要求猶太人到克利福·奧林奇那里進行登記，他是管理島上外來人口的負責人。同月，《根西島晚報》也通知所有猶太人主動去警察局報備。

大部分猶太人事先知道德國人的到來，已經逃往英國本島，只有一小撮無法離開或不愿離開的人留下來。澤西島共有12名猶太人前去登記，根西島是4名。與納粹治下的其他地方一樣，登記標志著系統化迫害的開始。起初，猶太人要在自己店鋪的窗戶上掛一塊牌子，寫上“猶太物業”；接著，他們的生意被“雅利安化”，強行出讓給非猶太人。在這過程中，海峽群島的管理者給予了密切的配合，事實上，這些行動就是由他們組織實施的。1941年1月23日，澤西島猶太人內森·戴維森給總檢察長寫了一封信，語氣沉重，極具代表性：“按照您的指示，請允許我向您報告，我已經完成店鋪的停業清理……拉下百葉窗，‘停業’的牌子也掛上了。”[[22]](#_22__Yin_Zi_Frederick_Cohen___19)1941年6月，克利福·奧林奇向澤西島的行政長官確認，并通過后者向德國政府報告：“本島所有登記在案的猶太人無一從事商業活動。”[[23]](#_23__Yin_Zi_Cohen___Hai_Xia_Qun)

隨后，海峽群島上的猶太人外出購物的時間進一步遭到限制，并強制實行宵禁。唯一被澤西島政府駁回的歧視法令，是讓猶太人佩戴黃色星章。行政長官和總檢察長就這項命令向德國當局提出抗議，要求他們重新考慮，但德國指揮官卡斯珀博士對此不予理睬，仍要求將特制的星章運往小島，星章中心印的是英語“Jew”而不是“Jude”。這批星章終究沒有抵達目的地。受宵禁影響，海峽群島上的猶太人大都難以維持生計。店鋪倒閉，遭受迫害的內森·戴維森一蹶不振，1943年2月被送進澤西島上的一家精神病院，第二年去世。另一名澤西島猶太人維克托·伊曼紐爾則以自殺的方式告別人生。

然而，對猶太人的驅逐是從附近的根西島開始的。1942年4月，奧古斯塔·施皮茨、瑪麗安·格倫菲爾德和特蕾澤·施泰納三名猶太婦女被送出小島。她們都不是英國人：施皮茨和施泰納是奧地利人，格倫菲爾德是波蘭人。因此，納粹對猶太人的憎恨，她們三人是再清楚不過了。拿特蕾澤·施泰納來說，她在奧地利反猶主義傾向愈發嚴重的時候離開，最終在海峽群島找到一份保姆的工作。她的雇主一家1939年來到島上，1940年春返回英國本島，但海峽群島政府禁止特蕾澤離開，并按照英國內政部的規定，將她作為“外來人員”拘留。就這樣，盡管特意逃到英國以求回避，她還是落入納粹的魔掌。特蕾澤曾在根西島上的一家醫院當過護士，在那里工作的芭芭拉·紐曼[[24]](#_24__BBCFang_Tan)與她相熟：“她很漂亮，一頭好看的大波浪卷發，猶太人的鼻子——那是唯一能體現她作為猶太人的特征。她說話語速很快，當然還帶著口音。她有些認死理，有時讓事情變得復雜，但我們是很好的朋友，真的。”芭芭拉·紐曼很清楚特蕾澤對納粹的態度：“她給我的印象是，如果她有機會，一定會朝他們吐口水。這就是她對那些人的感受。”

1942年春，德國當局要求根西島政府驅逐三名外籍猶太人。根西島警長歐內斯特·普萊溫，回憶當初他命令特蕾澤·施泰納收拾行李、去德國人那里報到時的場景：“我還記得特蕾澤走進辦公室，我向她傳達了德國軍事部門下達給根西島警察局的指示，特蕾澤特別悲傷，一下子大哭起來，并喊著說我再也不會見到她了。”[[25]](#_25__Yin_Zi_Cohen___Hai_Xia_Qun)

1942年4月21日是個星期二，在這天，芭芭拉·紐曼陪著特蕾澤朝圣彼得港走去，那是她在根西島上走過的最后一段路。“當時的畫面仍然印在我腦海中：我記得我們把她的行李放在一輛自行車上，推著走，你知道的，就像人們常做的那樣。然后我們站在那里道別，我看著她通過關口，邊走邊揮手……一切都不受我們控制。你沒法太擔心，太擔心的話你就堅持不下去了。你只能接受命令，試著習慣。我常常想，戰爭結束后大家要怎么辦？再也沒有人告訴我們該干什么了。”芭芭拉·紐曼完全沒有想到，離開根西島的特蕾澤是去送死：“那完全超出了我們的經驗范圍，真的，不是嗎？那種事情不會發生在英格蘭。”

在圣彼得港，施皮茨、格倫菲爾德和施泰納把自己交給了德國人。一艘小船把她們帶到了法國，剛上岸她們就接受猶太人身份登記。特蕾澤·施泰納找到一份臨時的護士工作。7月，她們在法國對外籍猶太人的大規模驅逐中被捕，7月20日被送往奧斯維辛，三天后到達。她們有沒有挺過第一輪篩選，我們不得而知，但可以確定的是，沒人活到戰后。特蕾澤說的沒錯，根西島的居民再沒見過她。

海峽群島上剩下的猶太人于第二年，也就是1943年2月遭到驅逐。等待他們的是完全不同的命運。一起被送走的還有海峽群島上其他幾類居民，包括“共濟會成員”、“前武裝部隊軍官”和“疑似共產主義者”。[[26]](#_26__Wan_Zheng_Ming_Dan_Jian_Coh)對他們的驅逐是為了報復五個月前英國對薩克島發動的突襲，那是海峽群島中有人居住的最小島嶼之一。只有一個人得到德國人的“特殊對待”，即來自羅馬尼亞的約翰·馬克斯·芬克爾施泰因。他先是被送到布痕瓦爾德集中營，最后去到位于特萊西恩施塔特的特殊猶太人隔離區。他活到了戰后。

其他被驅逐的人，包括猶太人在內，全部被送到法國和德國的拘留營，在那些地方，他們雖然吃了不少苦，但還不及布痕瓦爾德和奧斯維辛的囚犯所承受的苦難。重要的是，這些猶太人（除約翰·馬克斯·芬克爾施泰因以外）并沒有與其他海峽群島的居民分開。納粹這么做的原因我們只能進行猜測。“最終解決”執行過程中總有特例，在這里，或許因為這些猶太人是與其他被德國人視為不那么“危險”的群體一起遣送，而且他們來自一個被納粹認為屬于“文明開化”、還不打算公開交惡的國家（出于同樣的原因，1943年秋被驅逐的丹麥猶太人目的地是特萊西恩施塔特，而非奧斯維辛）。

誠然，海峽群島當地政府在幫助德國人驅逐猶太人時，不可能確切知道后者最終所面臨的命運。但納粹單單挑出猶太人進行迫害，這點他們是清楚的，自己當然是在把這些受害者推入火坑，那些被送走的人原本已不堪忍受的生活肯定更加不幸。但他們沒有做出任何努力來阻止驅逐，相反，警察和公務員給予德國人充分的配合。澤西島政府確實對佩戴黃色星章的命令提出了反對（而根西島沒有），但問題的關鍵在于，正如弗雷德里克·科恩在一份對占領時期海峽群島猶太人遭遇的開拓性研究中所指出的，相比猶太人，澤西島政府為保護島上的共濟會成員所付出的努力要多得多。[[27]](#_27__Cohen___Hai_Xia_Qun_Dao_De)一份1945年8月的英國情報這樣寫道：“當德國人提出實行他們的反猶措施時，根西島政府官員中無一人提出異議。他們迅速提供德國人所有可能需要的協助。與此相反，到了要對根西島上為數眾多的共濟會成員下手時，行政長官則提出了激烈的反對，并竭盡全力地施以援手。”[[28]](#_28__Cohen___Hai_Xia_Qun_Dao_De)

我們無法確知，如果根西島政府也強烈反對驅逐施皮茨、格倫菲爾德和施泰納，結局會有什么不同。有可能這種反對起不到什么實質作用（但會成為根西島歷史上永遠令人驕傲的一刻），也有可能真的能拯救這三名到英國尋求庇護的婦女。光是這一點點可能性，就足以讓整件事成為小島難以抹除的歷史污點。

就在根西島這三個人到達奧斯維辛的同一個月，海因里希·希姆萊再次造訪集中營。1942年7月17日，距這位黨衛隊全國領袖首次來此地視察15個月后，他的座駕再次開進集中營的大門。當時的波蘭政治犯卡齊米日·什莫倫[[29]](#_29__BBCFang_Tan)回憶起希姆萊時說道：“他看上去不太像個軍人，戴著金邊眼鏡，有點胖，腆著個大肚子。他看起來像——不好意思，我無意冒犯任何人——他看起來就像個鄉村教師。”

這個長相平平、戴著眼鏡大腹便便的人，在這次訪問中目睹了集中營的變化，視察了比克瑙在建的一套全新設施。他花了些時間查看集中營未來的發展規劃，然后參觀了占地25平方英里的“奧斯維辛利益區”（由集中營直接管控的區域）。接著，他觀看一批新到的犯人經過篩選、隨后在“小白房”里被毒死的過程。在這之后，希姆萊到地方長官布拉赫特的家鄉——附近的小城卡托維茲，出席了為他舉辦的招待活動，并于第二天返回。此后，他又視察了比克瑙女子集中營，在那里觀看一位犯人遭鞭打的過程，這也是他親自批準的一種刑罰手段。希姆萊對于他在奧斯維辛的所見所聞甚為滿意，當即把魯道夫·霍斯提拔為黨衛隊上級突擊隊大隊領袖。

霍斯的事業此時如日中天，全國領袖的到訪大獲成功。但問題還是存在的，比如，他的上司對奧斯維辛囚犯逃亡的情況很不滿意。逃跑在集中營并不是什么新鮮事，最早記錄在案的可追溯到1940年7月6日。但1942年夏天，一起特別大膽的出逃讓所有集中營的黨衛隊指揮官都收到了警告，這起事件就發生在希姆萊到訪的幾周之前。

大逃亡的主要策劃者是卡齊米日（卡濟克）·皮耶霍夫斯基 [[30]](#_30__BBCFang_Tan)。作為一名波蘭政治犯，他在奧斯維辛被關押了18個月。逃跑的風險他再清楚不過：“以前人們嘗試過各種方法逃跑，但大部分都失敗了，因為點名的時候，一旦他們（指黨衛隊和卡波）發現哪個人不見了，他們就帶著經過特殊訓練的警犬展開搜查，在某塊木板底下或成堆的水泥袋之間，藏匿者很快就被揪出來。這些被發現的人要背上一塊牌子，上面寫著：‘萬歲！萬歲！我又回來陪伴你們啦！’一邊敲著大鼓，一邊在集中營里來來回回地走，最后來到絞刑架下。他們走得特別慢，仿佛是想延長他們的生命。”打算逃跑的囚犯還有另一個困擾，那就是一旦被發現越獄，他身邊的獄友將面臨可怕的懲罰。在馬克西米利安·科爾貝神父的例子中，逃犯所在的營房有十個人被挑出來活活餓死。“這讓有些人完全沒法采取行動，”皮耶霍夫斯基說，“但總是有人不怎么考慮后果，他們不惜一切代價想要離開這個地獄。”

因此，擺在皮耶霍夫斯基面前的有兩個難題：如何逃出集中營，以及如何防止留下的人遭到報復。而在解決這兩個問題之前，更緊迫的，是如何讓自己活下去。起初，他所在的工作小分隊是條件最惡劣的分隊之一，犯人要在冰天雪地的戶外勞作。“工作任務很繁重，吃的基本指望不上。我就快要變成‘穆斯林’（Muselmann）[[31]](#_31___Muselmann_Shi__Muslim_De_D)了，那是黨衛隊對半死不活的犯人的稱呼。我覺得特別無助。”接著好運氣降臨，他被另一個工作小分隊挑中。“我加入了這個分隊，走出大門時，我問朋友：‘咱們要去哪兒？’同伴說：‘你不知道嗎？你中大獎啦！我們要去倉庫工作。雖然挺累的，但至少你不用在外面挨凍，你要在有屋頂的地方工作了。’我覺得自己一下子到了天堂。”皮耶霍夫斯基發現，在倉庫這個“天堂”里面工作還有一個額外的好處：“我的同伴教我一招，面粉裝車的時候，我就敲打袋子，讓面粉漏出來。守衛會讓我們清掃干凈，但我們不會把掃出來的面粉扔掉，而是摻上水做成面團。”在這個幸運的轉機出現以后，皮耶霍夫斯基覺得他“能活下來了”。

一天，皮耶霍夫斯基與烏克蘭人歐根紐什 (熱內克) ·本德拉聊了起來，后者在附近的黨衛隊車庫當機械工。“他（本德拉）跟我們一起上工，一起回去。有一天他偷偷對我說，他已經被列入要處死的名單——那時篩選非常頻繁。他對我說：‘卡濟克，我該怎么辦？我上了死亡名單了！’我對他說：‘我也沒有辦法。’但他不肯罷休，說道：‘卡濟克，咱們為什么不從這個地方逃出去？’我吃了一驚，我們怎么逃？他說：‘這個嘛，要有一輛車。我隨時都可以弄到一輛車。’我開始思考可能性。然后我對熱內克說，要想離開我們需要一些制服，黨衛隊的制服。”

逃跑計劃的成敗關鍵就在這里。上哪兒去找黨衛隊制服呢？他們再次得到命運的眷顧。皮耶霍夫斯基的卡波吩咐他去平時工作倉庫的二層拿一些空盒子下來。在走廊上，皮耶霍夫斯基看見其中一個房間的門上用德語寫著“制服”。他試著推了推，但門鎖著。沒過多久，他的卡波又派他上樓，這次他注意到門是半掩著的。“我當時唯一的想法，”皮耶霍夫斯基說，“就是進去看看會發生什么。我推開門，有個黨衛隊看守正往架子上放什么東西，他開始對我拳打腳踢。我倒在地上。‘你這頭豬！’他說，‘你這頭波蘭豬，你這條狗，你沒有權力進來！去向總辦公室匯報，你這頭波蘭蠢豬！’于是我爬出房間回到了走廊上。”

皮耶霍夫斯基知道，如果把闖進房間一事向上匯報，他將被送去懲戒分隊，那樣的話基本必死無疑。所以他什么也沒說，心存僥幸。他真的躲過了處罰，因為那個黨衛隊士兵沒有繼續追究，這是繼一連串偶然的好運氣后又一件幸事。他賭了一把，并贏了賭注，因為他瞥見了房間里的東西：制服、手榴彈、子彈和頭盔，事實上，這里有他和他的同伴需要的全部物品。

逃跑的最佳時間是星期六，因為到了周末，集中營的這個區域沒有黨衛隊看守值班。皮耶霍夫斯基想出進入倉庫的好辦法：平時，煤炭都是通過一條管道倒進倉庫的地下煤倉，管道上有蓋子，皮耶霍夫斯基卸掉了蓋子上的螺絲，于是他們可以從煤倉進到這棟房子的其他地方。皮耶霍夫斯基下定決心鋌而走險，可等他躺在床上，突然被一個念頭震醒：他意識到“每跑掉一個人，就要有十個人被處死”。“我整夜都睡不著，這件事一直折磨著我，直到我靈機一動，想出一個辦法（防止這種情況發生），就是假冒一個工作分隊。”按照皮耶霍夫斯基的設想，四個人將推著一輛手推車離開主營地，假裝自己是“手推車小分隊”的犯人，他們登記之后就可以正式獲準離開內圍安全區，盡管還沒出外圍警戒圈，許多犯人都在這里工作。如果他們成功脫身，他們營區只有卡波要負全部責任，因為黨衛隊會認為這個分隊是卡波批準成立的。

這是一個非常大膽的計劃，并且要找到另外兩個愿意跟他們一起冒險的人，因為現在需要四個人來組成這個“手推車小分隊”。本德拉馬上找到他營區里的神父，約瑟夫·倫帕特，可接下來他們陷入了困境。皮耶霍夫斯基詢問了他最好的朋友之一，但對方說他參與行動的前提條件是讓他帶上另一個人。這是無法實現的，因為這個分隊只能有四個人。皮耶霍夫斯基又找到另一個朋友，但他說：“也許有機會成功，可希望太渺茫了。”因此他拒絕了。最后，一個來自華沙、曾參加過童子軍的年輕人斯坦尼斯瓦夫·雅斯特爾同意加入，盡管他覺得實施這個大膽的計劃要冒“極高的風險”。

雅斯特爾很快意識到，整個逃跑方案中最關鍵的一環是完全無法預期的，那就是看守外圍區大門的黨衛隊士兵是否會不查證件就讓他們通過。如果這些守衛按規定攔下他們的車，他們就完了。萬一出現這種情況，這幾個越獄者商定，與其向黨衛隊看守開槍，還不如自我了結。他們擔心，逃跑的過程中哪怕只殺死一名黨衛隊士兵，集中營剩下的犯人都將遭到可怕的報復，可能會有五百或一千名犯人被處決。

1942年6月20日，星期六，他們決定動身。一大早，他們當中的兩人戴上袖章，假裝自己是卡波，然后四個人一起推著一輛裝滿垃圾的手推車，走出奧斯維辛一號營地寫有“勞動使人自由”的大門，朝營地外圍區走去。“在大門口，”皮耶霍夫斯基說，“我用德語對守衛報告：‘918號囚犯和手推車小分隊另外三人要去倉庫。’他（黨衛隊看守）在本子上登記后就放我們通過了。”一走出大門，歐根紐什·本德拉便朝黨衛隊廢棄的車庫走去，做開車的準備，其他三人通過煤倉進到倉庫。他們來到二樓，存放衣物的那個房間被一根沉重的鋼條牢牢頂著，但“渾身是勁”的斯坦尼斯瓦夫用一把十字鎬砸開了門。他們匆忙為自己和本德拉選了制服，還拿上四挺機關槍和八個手榴彈。

三個人換完裝，正準備離開倉庫時，他們聽見兩個德國人在外面說話。“要是他們進來，我真不知道該怎么辦，”皮耶霍夫斯基說，“但奇跡發生了，如果你相信有奇跡的話。那兩個人就站在外面交談，沒有進來。他們隨即離開了。”

他們通過倉庫的窗戶向本德拉比了個手勢，讓他把車向前開幾米，開到倉庫門口。然后他下了車，在他三個打扮成黨衛隊模樣的朋友面前立正站好。“每隔六七十米就有一座瞭望塔，”皮耶霍夫斯基說，“守衛正望著我們，但我們不在乎，因為我們很有把握。熱內克摘下他的帽子，對我說了幾句，我向他指了指倉庫，他進去換了衣服扮成黨衛隊士兵。”

此時，他們四人已經準備好邁出這次越獄行動中最危險的一步。“我們出發了。第一次轉彎后，我們看見兩個黨衛隊士兵。熱內克說：‘當心！’我們經過他們身邊時，他們說：‘希特勒萬歲！’我們說了同樣的話。我們又往前開了三四百米，另一個黨衛隊士兵在修自行車。他看見我們以后說：‘希特勒萬歲！’我們又說了同樣的話。這個時候，我們正朝大門前進，還不知道他們會不會不看任何證件就讓我們通過，但我們認為這是有可能的。大門關著，右邊站著一名黨衛隊士兵，帶著機關槍，左邊有一張桌子和一把椅子，一個黨衛隊士兵坐在那里。距大門80米遠時，熱內克把速度降到了二檔，50米，大門仍然關著。他們能看見車，也能看見我們所有人都穿著制服，但大門依然緊閉。20米，我看了看熱內克，他的前額和鼻子都在冒汗。等我們離大門大概15米時，我想：‘自我了斷的時候到了。’就像已經說好的那樣。就在這時，那個神父拍了一下我的背，我意識到他們都指望著我。于是我朝黨衛隊士兵大聲喊道：‘要讓我們在這里等多久！’我對他們罵罵咧咧。瞭望塔上的守衛說了句什么，然后他打開大門，我們就開了出去。我們自由了。”

欣喜若狂的四個人開著車行駛在波蘭的郊區，僅僅數分鐘，就把奧斯維辛拋在幾英里的身后。在附近朋友的幫助下，他們換下黨衛隊制服，丟棄了車子，混入普通波蘭人中。他們實現了計劃的第一步——讓自己成功逃脫。

在奧斯維辛，計劃的另一半也很順利。多虧卡齊米日·皮耶霍夫斯基編造出一個工作小分隊的計策，其他囚犯沒有遭到報復，只有一人除外：他的卡波被送去了11號樓的禁食牢房。

然而，對于曾被關押在奧斯維辛的人來說，離開并不一定意味著苦難的終結。皮耶霍夫斯基三個同伴后來的經歷便是最好的證明：斯坦尼斯瓦夫· 雅斯特爾不得不接受一個可怕的消息 ：為了報復他的出逃，他父母被送去奧斯維辛，最終死在里面。他本人于德軍占領華沙時期遇害。[[32]](#_32__Yu_Le_Jie_Wei_Rao_Ya_Si_Te)約瑟夫神父由于奧斯維辛給他留下過于嚴重的心理創傷，以至于——用皮耶霍夫斯基的話來說——整天“神情恍惚地到處亂晃”。戰后，他被一輛公交車撞倒，死于這場事故。最先提議逃跑的歐根紐什·本德拉，回到家后發現妻子已經離開了他，在酒精麻醉中死去。只有卡齊米日·皮耶霍夫斯基還健在。但他也說，過去的遭遇讓他時不時仍會“心神不寧”。他會夢見自己被帶著狗的黨衛隊士兵追打，醒來時“渾身被汗水浸透、魂不守舍”。

縱使這四個人在奇跡般逃出奧斯維之后仍經歷種種磨難，沒有一個對他們不惜一切代價也要逃脫的決定產生過懷疑。如果他們得知希姆萊在1942年7月視察奧斯維辛時腦中的盤算，毫無疑問會更加慶幸自己的決定，因為在波蘭的屠殺行動將進一步升級。7月19日，希姆萊宣布：“我在此下令，對總督轄區所有猶太人的重新安置，應于12月31日前展開和完成。”這里的“重新安置”不過是“屠殺”的委婉說法。由此可見，希姆萊已經為幾百萬波蘭猶太人的滅絕定好了期限。

不過，與其說希姆萊是在對未來進行部署，不如說他是在做一次最后陳述，因為促成這個結論的決策過程其實十分漫長，可以追溯到納粹入侵蘇聯之前；我們看到的只是一系列因果鏈條中的最后一環，之前的每一次重大決定，都為1942年7月19日希姆萊冷漠的死亡宣言奠定了基礎，這些決定包括建立波蘭猶太人隔離區，在東部戰場坑殺猶太人，進行毒氣試驗，驅逐德國猶太人，想方設法除去隔離區“沒有價值的”猶太人，好為德國猶太人騰出空間，等等。概念構想階段已經結束，最終決定幾個月前就已做出，納粹即將對猶太人大開殺戒。現在只剩下操作層面的問題，而納粹認為這正是他們最擅長的領域。

為了實現“最終解決”目標，納粹在1942年大大加快了處決的速度。而在這個階段，奧斯維辛的屠殺能力仍非常有限（由于遭遇本書第二章所描述的困難，在主營地焚化爐進行的常規屠殺已經中止），只能依靠“小紅房”和“小白房”的毒氣室。因此，在1942年納粹對波蘭猶太人的大屠殺中，后來臭名昭著的奧斯維辛其實只起了次要作用。

希姆萊之所以有信心要求手下在1942年底之前完成對波蘭猶太人的屠殺，并不是因為他認為奧斯維辛會發揮主要作用，而是他知道三個新的滅絕營已經在波蘭的森林里建成，大部分屠殺行動將在這三地展開。與奧斯維辛不同，這三處很少為公眾所知，它們分別是貝爾賽克（Bełżec）、索比堡（Sobibór）和特雷布林卡（Treblinka）。如今，人們大談特談的只有奧斯維辛，這其實非常諷刺，因為讓三個滅絕營的名字從歷史上消失正是納粹的愿望。他們在屠殺計劃得逞后，竭力抹去證明這三個營地曾經存在的每一絲痕跡。早在戰爭結束前，納粹就拆除了這幾個滅絕營，把它們恢復為森林或重新開墾為農田。與此形成鮮明反差的是，納粹從沒打算銷毀奧斯維辛存在的證據，即便在它解放之前的最后日子。奧斯維辛作為集中營，沿用了納粹體制在戰前就已確立的做法，納粹從來不曾打算向公眾隱瞞這類營地的存在，事實上，同為集中營的達豪就建在城鎮的郊區地帶。對納粹來說，明確表示他們會關押和“再教育”他們眼中的異見人士，是一種行之有效的政治宣傳。正如我們之前所討論過的，只有在奧斯維辛的囚犯遭遇大規模集體處決之后，這個營地的另一重功能才顯現。因此，納粹撤離奧斯維辛時炸毀了毒氣室，卻把其他大部分設施完整地保留了下來。

1942年的貝爾賽克、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則有著完全不同的性質。這三個滅絕營不僅在納粹德國沒有先例，甚至可以說在整個人類歷史上都不曾出現過。它們沒有范例可以參照。在許多方面，它們的存在和運作方式都比奧斯維辛更能準確體現出納粹“最終解決”的特別之處。

最早動工的貝爾賽克，是唯一一個1942年之前就開始修建的滅絕營。這個與世隔絕的小鎮位于總督轄區東南角，1941年11月，納粹開始在貝爾賽克修建一個小型營地，它距離火車站只有500米遠。在納粹眼里，貝爾賽克只是“區域性”工程，為的是解決一個“區域性”的問題，也就是解決附近盧布林地區“沒有價值的”猶太人，一如海烏姆諾的毒氣貨車主要是為屠殺羅茲隔離區的猶太人而造。

1941年12月，黨衛隊高級小隊領袖克里斯蒂安·維爾特出任貝爾賽克指揮官。時年56歲的他本是一名木匠，后來參加了一戰，因表現英勇被授予勛章，隨后加入納粹黨。20世紀30年代，他在斯圖加特為蓋世太保工作。1939年，他參與了針對精神病患者的安樂死項目，用瓶裝一氧化碳殺害病人。截止到1941年，他已經在盧布林地區組織過多次安樂死屠殺行動。有著“野蠻的基督徒”稱號的維爾特是個虐待狂，有人看過他用皮鞭抽打一個猶太婦女，把她趕進毒氣室。他也親手殺過猶太人。在鼓勵手下行兇時，血涌上頭的他滿頭是汗，會大爆粗口。

這個面目可憎的家伙，把他過去全部的殺人經驗都搬到貝爾賽克。他決定使用一氧化碳，但不是安樂死項目用到的罐裝一氧化碳，而是普通汽車發動機產生的氣體，與威德曼幾個月前在蘇聯使用的設施類似。他命人在一棟磚砌建筑內隔出了三間毒氣室，把它們偽裝成淋浴間，一氧化碳從噴頭輸出。

通過汽車引擎和假噴頭，維爾特已經對舊有的屠殺方法做出改進。而在指導集中營的規劃時，他又完全突破了現有的集中營設計模式。他意識到大部分人在這里只會活上幾個小時，因此指出奧斯維辛和達豪集中營里的大量屋舍可以免去。相較于集中營，滅絕營基本不需要什么總體設施，而且只需很小的空間。貝爾賽克的總面積不到九平方公里。

到貝爾賽克、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參觀過的人（遠遠少于參觀奧斯維辛的游客），都深深驚訝于這些滅絕營的面積之小。三個營地的總死亡人數約有170萬，比奧斯維辛的遇害者多出60萬，可它們的面積之和還沒有奧斯維辛-比克瑙大。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大屠殺的實行手段都是對人類尊嚴的莫大羞辱，而其中最恥辱的，便是成千上萬的人竟然是在如此狹小的空間里遇害，這一點如果不是親眼所見，是很難相信的。不知為何，人們總是容易把慘烈的悲劇與更大的空間相聯系，這也許是奧斯維辛在今天比這三個滅絕營更為人們所熟知的另一個原因。目睹比克瑙的開闊，人們很容易感知到罪行的嚴重性，可類似的聯想很難發生在貝爾賽克的訪客身上。一個人如何能想象足足60萬人（貝爾賽克死亡總人數估計）死在這個300×300平方米不到的空間內？

盡管貝爾賽克已經夠小，但它仍然被分隔為不同的營地。維爾特知道，要讓他的死亡工廠順利運轉，最關鍵的一點是盡可能久地向剛到達的囚犯隱瞞此地的真實用途。因此，他把毒氣室建在滅絕營的一個特殊區域，稱為2號營地。它隱身在樹叢中，被纏繞著枝蔓的鐵絲網包圍，只能通過“管道”（由鐵絲網圍起的通道）去往營中其他地方。貝爾賽克其余部分就是1號營地，包括鐵軌旁人們下車的地方、不同用途的營房（供新來的人更衣、他們被沒收的財物在運走前的存放），以及一個用來點名的廣場。

在貝爾賽克及后來的另外兩個滅絕營里，工作人員分為三類。第一類是猶太人。維爾特很快想到，在屠殺過程中使用猶太人，不僅可以減輕下屬們的心理負擔，還意味著只需要少數德國人就可以完成對集中營的管理。毫無疑問，猶太人在其中要承受的情感折磨也恰恰能滿足他扭曲的心理。因此，數百名身體健全的猶太人剛一下車就被挑選出來，被迫承擔掩埋尸體、清理毒氣室的工作，還要整理集中營里迅速堆積的衣物。按照最初的設想，這些猶太人在工作幾天以后就會被處決，但很快這就給納粹造成難題：他們清楚“洗澡”意味著什么，而且殺死他們之后，還得重新挑選和培訓下一批猶太人。另一方面，如果允許他們多活一段時間，由于看到所有人早晚都得死，無所畏懼的他們有更多時間來思考自己的未來，也許會密謀反抗。對納粹來說，這種兩難的困境一直存在：當人們明白他們所臣服的對象最終會把屠刀揮向自己時，如何保證他們繼續乖乖聽話？

第二類工作人員是烏克蘭守衛。他們大約有一百人，被分成兩組，主要負責集中營基本的監管工作。這些烏克蘭人以殘忍著稱，很多曾為紅軍效力，后來接受德國人的重新訓練，通過這里的工作免受戰俘營之苦。第三類當然就是德國人。但維爾特是如此擅長依靠其他國家的人來運作他的殺人機器，因此參與貝爾賽克大屠殺的德國黨衛隊士兵只有二十個左右。1942年3月，第一批受害者到達貝爾賽克，維爾特終于實現了希姆萊的夢想：他建成一座能屠殺數十萬人的殺人工廠，卻只需要少數德國人進行管理，而且，這些人不必再像東部戰場上的特別行動隊成員那樣承受巨大的心理負擔。

就在貝爾賽克投入使用的同一個月，納粹開始了另一個滅絕營——索比堡的建造。它位于貝爾賽克正北方，地處波蘭最東邊一個猶太人口密集的區域。索比堡的建造和運作在很大程度上效仿貝爾賽克。與維爾特一樣，這里的大部分黨衛隊官兵都參與過T4安樂死項目，包括指揮官弗朗茨·施坦格爾在內。與貝爾賽克相同，這里也有大約一百名烏克蘭人（許多之前是戰俘）擔任集中營守衛。比起奧斯維辛-比克瑙，索比堡的面積依然非常小（盡管長600米、寬400米的索比堡比貝爾賽克略大），但它與貝爾賽克一樣，也被分成兩個子營地，一條通道將接收區與毒氣室連通起來。貝爾賽克的黨衛隊看守住在附近被征用的房子里，與此不同的是，索比堡的黨衛隊官兵在當地沒有合適的住處，于是修建了第三個子營地，用作黨衛隊和烏克蘭守衛的宿舍。

索比堡的設計和建造理念與貝爾賽克類似。營地工作人員會哄騙剛到的受害者，讓他們以為自己只是下車消毒，預防傳染病，然后在最短的時間內匆忙把這些人處死。與貝爾賽克一樣，集中營的每個分區都被枝蔓纏繞的鐵絲高網分隔，因此初來乍到的人很難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么，而等他們發現時又太晚了。1942年5月，索比堡迎來第一批受害者，在一年多一點的時間內，有25萬人在這里喪生。

同樣在1942年5月，第三個、也是最后一個主要滅絕營特雷布林卡破土動工。由于它借鑒了納粹在貝爾賽克和索比堡的經驗，死在這里的人比其他任何一個滅絕營都要多（據估計有80萬到90萬人），幾乎趕上了奧斯維辛。特雷布林卡位于索比堡的西北方，從華沙乘火車到這里只有一小段路程。華沙的猶太人區是納粹治下最大的隔離區，特雷布林卡的興建主要就是為了屠戮那里的猶太人。

一開始，這幾個滅絕營的屠殺行動開展都不順利。值得再次提醒的是，納粹干的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勾當，也就是在短短數月里，對數百萬男女老少進行流水線式的殺戮。雖然這樣的比喻令人不悅，但德國人建造的確實就是三個殺人工廠，與任何工業操作一樣，每一個環節都需要按部就班地銜接，才能達到預期的結果。如果火車無法按計劃把犯人送到，如果毒氣室不能及時處理每一批新到的犯人，如果整個體系中有任何一處出現問題，那么血腥的混亂場面就會出現。這也恰恰是滅絕營運轉初期的情況。

在貝爾賽克，按計劃運來的大量受害者很快就讓毒氣室不敷使用，新毒氣室的趕工讓整個營地在6月被迫關閉了一個月左右。而在索比堡，毒氣室的容量和犯人的運輸都出了麻煩，8月到10月期間也停止運轉，以便集中解決問題。但對納粹來說，最棘手的是特雷布林卡，這里上演了地獄般的一幕。

最開始，特雷布林卡基本按照納粹的計劃運轉，每天約有6000人被運到這里處決。但到了8月，犯人的數量翻了一番，滅絕營的操作便陷入混亂，但指揮官伊姆弗里德·埃貝爾博士（Dr. Irmfried Eberl）仍沒有關閉這里。奧古斯特·興斯特當時是特雷布林卡的一位黨衛隊士兵，他回憶道：“埃貝爾博士野心勃勃，想讓死亡人數盡可能創新高，并超過其他所有集中營，所以有特別多的人被運到這里，不能再像以往那樣光靠毒氣室解決他們。”[[33]](#_33__Yin_Zi_Yitzhak_Arad___Bei_E)于是，不少人在營地外圍被草草槍斃，而這種做法使得維持集中營正常運轉的假象不再成立，因為滿地的尸體不可能讓人繼續相信他們來到的地方只是消毒站。結果，列車不得不從特雷布林卡站倒退兩英里，等待營地清理干凈。由于列車上的條件太過惡劣，很多人死在車廂中。奧斯卡·貝格爾在8月下旬到達特雷布林卡，那正是最混亂的時期。“下車以后，我們眼前是特別恐怖的景象，好幾百具尸體橫七豎八地散在四周，成堆的包裹、衣服、手提箱，各種東西都混在一起。黨衛隊士兵和烏克蘭看守站在營房的屋頂上朝人群掃射，男人、女人和孩子都倒在血泊中，到處充滿尖叫和哭喊。”[[34]](#_34__Yin_Zi_Arad___Bei_Er_Sai_Ke)在這種情況下，附近村莊的波蘭居民不可能不發現滅絕營的真實面目。“尸體腐爛的味道太可怕了，”歐金尼婭·薩穆埃爾[[35]](#_35__BBCFang_Tan)說，她當時還是學生，“那股惡臭讓你根本沒法開窗也沒法出門。你都想象不出有多臭。”

盡管如此，這片混亂中的死亡人數依然居高不下。在一個月多一點的時間里，也就是1942年7月底到8月底之間，據估計有31.25萬人在特雷布林卡喪生。[[36]](#_36__Shu_Zi_Yin_Zi_Arad___Bei_Er)這是一個驚人的數字，意味著每天大約有1萬人被殺死，超過了當時任何一個集中營，直到1944年的“匈牙利行動”，奧斯維辛的死亡達到頂峰，比克瑙的四個焚化爐全部滿負荷運轉，這個數字才被追上。然而對埃貝爾博士的上級來說，不可思議的數字背后是不堪負荷的代價。他們收到各種各樣關于特雷布林卡的混亂持續惡化的報告。而且從納粹高層的角度看來，更糟糕的是這可能給第三帝國造成經濟損失，因為死去猶太人的財物在營地各處散落，流言蜚語四起，說德國人和烏克蘭人自己侵吞了不少貴重物品。

1942年8月，貝爾賽克的建造者克里斯蒂安·維爾特被任命為三個滅絕營的督察員。他上任第一件事，就是與上司、黨衛隊全國副總指揮奧迪路·格洛博奇尼克一起到特雷布林卡視察。維爾特的手下約瑟夫· 奧伯豪澤爾就他們到達后發生的事提供了證言：“特雷布林卡一片狼藉……埃貝爾博士當即被開除……格洛博奇尼克在相關談話中提到，要不是因為埃貝爾博士是他同鄉，他一定會把他抓起來，送交黨衛隊和警察處置。”埃貝爾被解雇后，特雷布林卡停止新一輪的接收，過去曾與維爾特共事、此時正在索比堡任職的弗朗茨·施坦格爾成為特雷布林卡新任指揮官，奉命收拾殘局。

埃貝爾誤解了上級真正想要的東西，他給他們特別驚人的效率，卻沒有“恰當地”組織屠殺過程。關于埃貝爾被解雇，最值得注意的是格洛博奇尼克的評論：埃貝爾應該因管理特雷布林卡的方式不當而被移送法辦。在黨衛隊高層扭曲的道德觀念里，埃貝爾應該遭到起訴，是因為他沒有以更有效的方式來組織對男女老少的大規模屠殺。在我們今天看來，埃貝爾在他上級眼中的罪行，其實是殺人的活兒做得“不夠漂亮”。

整個屠殺過程中至關重要的一環，是把猶太人運到新建成的滅絕營。這些死亡工廠需要原料，而且需求量極大。因此，1942年夏天和秋天，一系列“重新安置”行動在納粹占領下的波蘭展開。希姆萊于7月19日下達指示，特意把總督轄區所有猶太人也包含在內。他擔心如果地方官員有自主決定權，整個行動將面臨失敗。這里的顧慮在于，雖然理論上所有納粹分子都認同解決“猶太問題”的必要性，但有些人可能會試圖拯救個別他們認為的“好猶太人”。一個有著極強人道主義精神的德國人會如何對待驅逐命令？下面的例子可以很好地說明希姆萊所擔憂的問題。

阿爾貝特·巴特爾（Albert Battel）中尉任職于波蘭南部普熱梅希爾地區，已年過50的他比大部分國防軍軍官都要年長，戰前一直從事律師工作。盡管他也是納粹黨員，但作為一名民族社會主義者他有著不良記錄，有人檢舉他在30年代對猶太人過于禮貌。1942年7月，一批猶太人被送到普熱梅希爾，交到巴特爾和德國軍隊手上。其中有不少人在軍工廠工作，住在附近的隔離區。比起其他波蘭猶太人，這些人自以為擁有特權和靠山。月底的時候，有傳言說黨衛隊很快就要在小鎮里展開行動，把猶太人“重新安置”到貝爾賽克滅絕營。但為德軍工作的猶太人聽到這些傳言后，相對鎮靜，因為這些人都持有Ausweis，也就是軍隊發給的通行證，他們以為有這個證件，自己就不會成為黨衛隊驅逐的對象。他們還分析說，鑒于自己正在為德國的戰事出力，驅逐他們是毫無意義的。然而，他們不曾料到希姆萊的命令背后，有著不容置疑的意識形態理念，那就是所有猶太人都必須死，沒有任何例外。

7月25日，星期六，普熱梅希爾的猶太人聽到消息，黨衛隊將在下周一展開驅逐，屆時德國人發給他們的通行證很可能不起作用。其中一個猶太人塞繆爾·伊吉爾設法在周日一大早找到巴特爾中尉，告知將要發生的行動。[[37]](#_37__Hou_Wen_De_Ri_Qi_Ji_Yu_Samu)巴特爾致電當地蓋世太保負責人，結果被對方掛了電話。憤怒的巴特爾在向他的上級利特克中校請示后，派出一支部隊封鎖了桑河（San）上的吊橋。由于桑河貫穿整個鎮子，此舉等于切斷了進入隔離區的通道。結果，當地蓋世太保負責人和克拉科夫的納粹當局做出讓步，同意為2500名普熱梅希爾猶太人發放許可證，讓他們暫時不被驅逐。為救出那些直接為他工作的猶太人，巴特爾中尉還派卡車開進隔離區，接走他們和他們的家人，安置在小鎮德軍司令部的地下室里。總共約有240名猶太人以這種方式離開了隔離區。

7月27日，黨衛隊針對普熱梅希爾猶太人的“重新安置”行動按原計劃展開，絕大部分人被送到了貝爾賽克。然而，數千人因阿爾貝特·巴特爾的介入沒有立即被驅逐。幾周后，巴特爾從普熱梅希爾的崗位上調離，黨衛隊對他的行為展開了秘密調查。結果報告到了希姆萊手上，他批示要在戰爭結束后對巴特爾的行為追究責任。巴特爾因健康原因被軍隊開除，在家鄉布雷斯勞（Breslau）他加入人民沖鋒隊（Volkssturm），最終被紅軍俘虜。從蘇聯戰俘營獲釋后，他回到家鄉，因曾是一名納粹黨員，被拒絕繼續從事律師職業。

我們很難分清巴特爾拯救普熱梅希爾猶太人的行為背后有哪些動機。顯然，他的黨衛隊上級之所以支持他，主要是想避免失去訓練有素的勞動力帶來的損失，但推動巴特爾的似乎是他認為驅逐行動根本就是一個錯誤。因此，1981年，巴特爾的人道主義行為獲得承認，他被色列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Yad Vashem）授予“國際義人”（Righteous Among the Nations）稱號，盡管此時他已離世多年。

還有一些德國軍官和巴特爾一樣，在1942年夏秋對驅逐猶太人的行動提出了反對，但他們在駐守波蘭的國防軍中只占極小一部分，也沒能改變大批猶太人被送進滅絕營的結局。盡管如此，確實有少數猶太人獲救，而且很重要的是，這表明，并不是所有德國人在接到命令時都簡單地接受新的現實。

然而，大多數人在1942年的大屠殺中接受了分配給他們的角色，奧斯卡·格倫寧無疑便是其中之一。按照他的說法，在奧斯維辛待了幾個月之后，他的工作變成了“例行公事”。他負責整理從新來的犯人身上搜來的各種錢幣，點清數目后再把它們寄到柏林。他依然參與篩選，但不負責區分生死——這些決定由黨衛隊醫生來做，他的任務是確保拿走猶太人的所有行李，并存放在一個安全的地方，直到可以整理行李中的物品。這些工作是在營地里一個被稱為“加拿大”的地方完成的，因為這個國家被大家視為夢想中的目的地，一片無比富足的土地。

就這樣，格倫寧在奧斯維辛為自己創造出一種他認為可以忍受的生活。殘忍的暴行離坐辦公室里的他很遙遠，走在營地里，他可以有意避開任何讓他不快的景象。通常情況下，他與屠殺過程沒有直接關系，也不需要進入比克瑙最深的角落，也就是實施屠殺的地點。唯一能夠提醒他那些不同國家的受害者正在到來的，就是出現在他桌上的各種貨幣——有時是法郎，有時是捷克克朗，過幾天又變成了波蘭茲羅提（此外永遠都會有美元），還有就是犯人帶來的各種酒——希臘的烏佐、法國的白蘭地和意大利的森布卡茴香酒。“當我拿到很多烏佐酒時，”奧斯卡·格倫寧說，“我知道它們肯定來自希臘。除了這種方法，我們無法判斷人們是從哪個國家來的。我們不會對猶太人產生特別的同情，除非你特別想要某種類型的伏特加或其他烈酒——蘇聯人有一種伏特加很受歡迎……我們喝很多伏特加。也不是每天都喝醉，但喝酒是家常便飯。我們醉醺醺地上床，要是有人懶得關燈，就開槍把燈打滅。也沒人說什么。”

雖然格倫寧沒有用“享受”來形容他在奧斯維辛的那段日子，但不難看出，這個詞完全適用于他所描繪的生活。“奧斯維辛主營地就像個小鎮。這里有八卦新聞，甚至有個菜站。有食堂、電影院，還有一個定期舉辦演出的劇院。這里有體育俱樂部，我還是俱樂部的會員。另有舞蹈等各種娛樂活動。”對奧斯卡·格倫寧來說，奧斯維辛生活的另外一個“積極面”就是他的同事：“我不得不說，在那里工作的很多人一點都不笨，他們都非常聰明。”當他在1944年離開集中營時，他還抱有一絲遺憾：“我離開的是一群我已經熟識的朋友，一群我喜愛的朋友，對我來說這是件很困難的事。除了一些蠢貨只顧著滿足自己——確實有這樣的人，我在奧斯維辛那個特殊的環境下結交了不少朋友，每當想起他們我都特別開心，到今天我還是這樣覺得。”

然而，1942年年底的一個晚上，格倫寧在奧斯維辛波瀾不驚的生活被一次偶然事件攪動，他瞥見了如噩夢般真實的屠殺過程。在比克瑙周邊的黨衛隊宿舍中熟睡的他，和同事一起突然被警報聲驚醒。他們被告知，幾個猶太人在被送往毒氣室的路上逃跑，鉆進了附近的樹林。“我們被要求帶上手槍，到林里搜查，”格倫寧說，“但我們一個也沒發現。”隨后，他和他的同事散開回到集中營的處決區域。“我們以星星隊形朝農舍走去。農舍外面有燈照著，門前有七八具尸體，大概是想逃跑結果被抓回來斃掉的人。大門外幾個黨衛隊士兵對我們說：‘完事了，你們可以回去了。’”

在好奇心的驅使下，格倫寧和他的同事決定先不“回去”，而是躲在陰影處逗留一陣。他們看著一個黨衛隊士兵戴上面罩，把齊克隆B從農舍側面墻壁上的洞口倒進去。農舍里之前傳出的嗡嗡聲此時變成長達一分鐘的“尖聲喊叫”，隨后一切都安靜下來。“有一個人，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軍官，走過去站在門前，門上有一個窺視孔，他朝里面看了看，檢查是否一切正常，里面的人是不是都死了。”屠殺的整個過程在格倫寧眼前展露無疑，他這樣描述自己當時的感受：“就好像你看見兩輛貨車在高速公路上相撞。你問自己：‘必須這樣嗎？有這個必要嗎？’當然，之前提到過的那種想法會影響這個問題的答案，我們會說：‘是的，這是一場戰爭，他們是我們的敵人。’”

隨后，格倫寧還目睹了焚尸的過程。“有個同事說：‘跟我來，我帶你看看。’我實在太震驚了，只能遠遠站著，離火堆大概70米遠的地方。火焰熊熊燃燒。那邊的卡波后來向我描述了焚燒的細節。真是太惡心了，簡直令人毛骨悚然。他還拿那些被燒的尸體取樂，因為尸體著火后，顯然肺里面或其他地方產生了氣體，一個個仿佛都跳了起來，男性生殖器會突然勃起，這讓他覺得特別好笑。”見過毒氣裝置和尸體焚燒坑后，奧斯卡·格倫寧在奧斯維辛創造的舒適生活瞬間蒙上了陰影，他再次找到他的上級傾訴。那個黨衛隊少尉“是個奧地利人，總的來說是個坦率的家伙”。“他聽我說完，然后說：‘親愛的格倫寧，你反對它有什么好處？我們都在同一條船上。我們的義務就是接受它——甚至不帶任何思考。’”格倫寧反復琢磨上級的話，之后又回到工作崗位上。他曾宣誓效忠，也認為猶太人是德國的敵人，并且他知道，在集中營里可以通過自己的調適，避免再看見最恐怖的景象。他留了下來。

作為黨衛隊系統里的普通士兵，奧斯卡·格倫寧與他的同事舒適地生活在營房里，而軍官們的生活還要愜意。很多人能和家人待在一起，他們住在奧斯維辛小鎮中心被征用的房子里，或住在索拉河畔緊鄰主營地的地方。如果當初加入的是作戰部隊，他們的生活水準無論從哪方面來看，都遠遠趕不上現在奧斯維辛所擁有的一切。這些軍官過著征服者的生活，而作為征服者，他們需要傭人幫他們做飯、打掃、照顧孩子，但問題來了：在納粹的種族理論中，猶太人和波蘭人相較于德國人過于低劣，遠非仆人的理想人選，沒有資格介入他們舒適的私人生活；而且他們可能會利用在集中營鐵絲網之外（雖然還在有守衛值守的奧斯維辛利益區內）工作的便利試圖逃跑，或者更可怕地，攻擊他們所服侍的德國家庭。

一向別出心裁的納粹分子想出了一個辦法。他們打算雇傭一群特殊的犯人，這些人大都是德國人，并且可以確定他們絕對不會傷害他們的主人或嘗試逃跑。耶和華見證人在德國以“圣經信徒”（Bible Students）聞名，1933年這個組織宣布，總的來說他們不反對納粹的國家政策，且在意識形態上，他們同樣反猶太人、反共產主義者（盡管不像納粹這樣赤裸裸）。直到作為和平主義者的這些人拒絕服役，問題才嚴重起來，他們都被關進了集中營。

奧斯維辛關押了幾百名德國耶和華見證人，埃爾澤·阿布特[[38]](#_38__BBCFang_Tan_1)便是其中之一。她于1914年出生于但澤一個信奉路德教的家庭，后來經朋友介紹有了新的信仰。她與另一個耶和華見證人結了婚，1939年產下一女，此后一直過著平靜的生活。戰爭期間，她的丈夫拒絕用自己的工程師專長為納粹提供幫助，于是他們的麻煩來了。她的丈夫鋃鐺入獄，她因還在哺乳暫時躲過牢獄之災。然而，等女兒兩歲半，蓋世太保找上了門。那一幕令人心碎，她的小女兒一邊大喊著“讓我媽媽留下！讓我媽媽留下！”一邊抓著蓋世太保軍官的褲腳，但埃爾澤·阿布特還是被帶走了，她的孩子留給朋友照顧。

剛抵達奧斯維辛，排在她身前的一隊猶太女人引起了埃爾澤·阿布特的注意。“就我們所看到的，她們得到的待遇還不如動物。這些士兵對我們很同情，但對待猶太人卻一點也不人道，這讓我很吃驚。”來奧斯維辛之前，埃爾澤·阿布特幾乎從未接觸過猶太人。“我從來不去猶太人的商店，”她說，“當我聽說母親去他們那里買東西我還很不高興，因為他們的東西總是很貴。我從來不光顧猶太人的商店，因為他們總是抬高（定價）再打折，那些蠢貨就以為自己只付了一半的錢。這是真的，我在但澤看到過，他們確實用某種方法改變價格。這是我個人觀點。但我沒有和猶太人過不去。在集中營，有一次我病了，一個猶太女人走過來想幫我洗外套。她想做好事。”

在奧斯維辛，埃爾澤·阿布特被告知，只要她放棄自己的信仰，馬上就可以獲得釋放。也就是說，耶和華見證人是集中營里唯一一群只需簽署聲明便可以獲得自由的犯人。但大部分人都拒絕。包括埃爾澤·阿布特在內，對他們來說奧斯維辛是一個考驗：“我在《圣經》里讀到過亞伯拉罕的故事。他被要求犧牲自己的兒子，《圣經》里說他愿意這樣做。然后我們的創始人耶和華見他愿意，就阻止了他。他只不過是想考驗他的信仰。我當時也是這么想的。”

就這樣，這群來自德國的耶和華見證人成了奧斯維辛黨衛隊軍官的完美仆從，遠遠勝過第二備選波蘭人。只有他們忙不過來時，納粹軍官才會用到波蘭人。埃爾澤·阿布特在一位黨衛隊高官家中工作，服侍他和他的妻女。她負責打掃房間、為他們做飯，還要照顧他們的小女兒。她的態度是：“ （把她關在奧斯維辛）不是孩子的錯，也不是他妻子的錯。”她盡職盡責、充滿熱情，在小女孩生病期間全心全意地看護她，因此獲得了孩子父母的感激。

于是，耶和華見證人會成為魯道夫·霍斯最偏愛的犯人也就不足為奇了。他們從不惹麻煩，這只是其中一個原因。霍斯最早接觸到大量耶和華見證人，是在20世紀30年代末的薩克森豪森集中營，當時他們拒絕參軍。霍斯曾記錄了信仰賦予他們的巨大力量，這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霍斯說，當這些人因為拒絕服從集中營的規矩而遭到鞭打時，他們不但沒有求饒，反而要求更多的鞭打，好讓他們能夠為他們的信仰承受更多的苦難。霍斯還目睹了特別行動隊槍斃兩個見證人的過程，他驚訝地發現，在生命走向終點時，他們竟然雙手高舉伸向天空，臉上帶著幸福的表情。這讓霍斯聯想到早期基督教殉道者的就義情景。

耶和華見證人的行為不僅對霍斯產生巨大沖擊，也深深影響了他的上級。“在好幾個場合，”霍斯寫道，“希姆萊和艾克都把耶和華見證人狂熱的信仰用作例子。黨衛隊的民族社會主義理想以及對阿道夫·希特勒的信仰，必須像見證人對耶和華的信仰那樣強烈和堅定。只有當所有黨衛隊成員都有如此熱烈和堅定的信仰，阿道夫·希特勒的國家才能長治久安。”[[39]](#_39__Lu_Dao_Fu__Huo_Si____Ao_Si)

在奧斯維辛，霍斯和他的妻子在家里雇傭了兩名耶和華見證人，并且深深感動于自己的孩子從他們那里得到的無微不至的照料。霍斯說許多見證人都是“特別美好的人”。[[40]](#_40__Huo_Si____Zhi_Hui_Guan)重要的是，霍斯還寫道，他相信見證人也認為滅絕猶太人是“正確的”，因為導致耶穌被害的正是猶太人的祖先。這種觀點遭到了埃爾澤·阿布特的否認。她認為黨衛隊屠殺猶太人的做法是錯誤的，是在為“魔鬼”服務。然而，她認為她應該通過自己的“態度”證明她的信仰。這就造成了一種荒謬的局面：一方面，她忠心耿耿、幾乎滿腔熱情地在奧斯維辛照顧黨衛隊軍官的女兒；但另一方面，納粹卻禁止她接觸自己的女兒。為了說服自己接受現狀，她告訴自己應該“向所有人行善”，包括黨衛隊成員在內。她承認，就算被安排在希特勒的家中做事，她一樣會盡職地工作。而讓她的心情更加糾結和復雜的是，只要她愿意，她隨時可以走出集中營，回到自己的女兒身邊——只要簽署一份聲明，放棄她的信仰就可以實現。但埃爾澤·阿布特始終沒有簽字：“那意味著妥協。我從未這么做。”

這個離奇的故事還有更曲折的情節：等埃爾澤·阿布特戰后回到家中，她發現一直照顧自己女兒的，竟是一個放棄了信仰換得自由的耶和華見證人，這樣的人屈指可數。“我們去拜訪他和他的妻子，因為是他們撫養了我們的女兒。他哭得像個孩子，因為自己是個懦夫。”對于他對自己女兒的照料，埃爾澤·阿布特并沒有特別感激：“我沒有特別擔心（我女兒）。總會有人幫忙的。我們不會依賴某一個人。我們的創始人會在我們有需要的時候為我們送來需要的東西。他永遠在我們之中。”她的女兒后來也成了一名耶和華見證人。埃爾澤·阿布特說：“她明白我的選擇并且很高興我做到了忠誠——不是對某個人，而是對我們的創始人耶和華，因為他一直在照看我們，這是我在奧斯維辛發現的。他有能力改變所有人。那些憎恨我們的人開始思考，事實上他們的態度發生了徹底的改變。”埃爾澤·阿布特信念堅定，但對于不具備她這種信仰的人來說，很難看出耶和華見證人的創始人是如何“照看”他的信徒的，比如霍斯所描述的那些在薩克森豪森被槍殺的人；他似乎也沒有“照看”在奧斯維辛被殘忍地奪去生命的波蘭人、蘇聯戰俘、病人、猶太人和不計其數的其他人。但埃爾澤·阿布特的事例中有一點引人深思，那就是，這種暴行在她那里可以毫無困難地得到解釋，她會認為那是上帝的旨意，我們雖然無法完全領會，但必須無條件地保持忠誠。如果上帝允許這類事情發生，那一定有其原因，只不過我們尚不能想清楚原因是什么。

我們必須謹慎，當這種態度與納粹的狂熱信仰被直接和不假思索地拿來比較——如希姆萊的做法。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耶和華見證人認為對待他人應抱有同情心和善意，這與納粹當然大相徑庭。但是，如果把埃爾澤·阿布特證詞中的“耶和華”一詞替換為“希特勒”，就會發現，她的態度與霍斯這樣的黨衛隊成員所持有的意識形態確實驚人地相似。

1942年走向尾聲，黨衛隊軍官已在奧斯維辛為自己打造出一個安定的生活環境。他們有自己的仆人，有一份工作，大都成功地找到了讓自己遠離屠殺現場的方法。大規模屠殺變成了一種按部就班的工業操作，它不僅發生在奧斯維辛，這個時期的特雷布林卡也發生了變化。1942年9月，弗朗茨·施坦格爾接替不稱職的埃貝爾成為新任指揮官，立即開始整改滅絕營。犯人的運送被叫停，遍地的尸體被運走，整個滅絕營被清理干凈。施坦格爾和維爾特很快都發現了埃貝爾所面臨的根本問題，就在于毒氣室的容量不足以順利完成屠殺任務。于是，新的毒氣室馬上投入建設。這個磚砌的新建筑比原來的毒氣室大得多，中央通道與八間獨立的小毒氣室相連通，且每個毒氣室都可以從外部直接進入，這意味著清理里面的尸體要比原來容易得多。新毒氣室可以同時容納超過3000人，比原來的大了六倍不止。它于10月完工待用。與此同時，施坦格爾還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消除新來的猶太人可能產生的懷疑。他命人重新粉刷了猶太人下車站臺旁邊的小屋，讓這里看起來就像一個普通的火車站，還豎起了候車室標示牌。他們種上一盆盆鮮花，把整個接待區域布置得盡量整潔有序。

沒有人確切知道特雷布林卡這樣的滅絕營在1942年到底屠殺了多少人。納粹銷毀了所有能夠揭示真相的文件，不同人對這個數字的估計值相差很多。但就在幾年前，有學者在倫敦的英國國家檔案館找到了一份德國人發的電報，它讓我們對這個問題有了更確切的答案。[[41]](#_41__Ying_Guo_Guo_Jia_Dang_An_Gu)這份電報由英國人截獲并破譯，里面寫有截至1942年12月31日“萊因哈德行動”（Operation Reinhard，1942年6月，萊因哈德·海德里希遇刺[[42]](#_42__Bian_An__Yuan_Shu_You_Wu__H)，納粹把在波蘭展開的屠殺行動命名為“萊因哈德行動”，以向他表示“敬意”）中幾個滅絕營的屠殺人數。

德國人的電報顯示，特雷布林卡、貝爾賽克、索比堡和馬伊達內克（Majdanek，盧布林地區一個規模小得多的滅絕營）到目前為止共屠殺了1 274 166人，這個數字又被進一步細化為：馬伊達內克24 733人，索比堡101 370人，貝爾賽克434 508人。在這則被截獲的電報中，特雷布林卡的死亡人數被寫成了71 355，但這顯然是一個筆誤，因為要湊足1 274 166這個總數，特雷布林卡的屠殺人數應該是713 555。于是，特雷布林卡成為1942年納粹統治下最大的屠殺中心，奧斯維辛遠遠落后。

但這種情況并沒有持續太久。

[[1]](#filepos364483) 引自Ulrich Herbert，“德國在巴黎的軍事命令及對法國猶太人的驅逐”（The German Military Command in Paris and the Deportation of the French Jews），見《國家社會主義者的滅絕政策》（National Socialist Extermination Policies, Berghahn Books 2000），第139頁。可通過閱讀此篇文章中的開拓性研究，了解對這一問題的全面討論和分析。

[[2]](#filepos364942) Wolodymyr Kosyk，《第三帝國與烏克蘭》（The Third Reich and Ukraine, Peter Lang 1993），第621頁。

[[3]](#filepos365170) Timothy Patrick Mulligan，《政治幻想與帝國》（The Politics of Illusion and Empire, Preager 1988），第139頁。

[[4]](#filepos365650) 引自Herbert，“德國在巴黎的軍事命令”，第140頁。

[[5]](#filepos366906) 引自Herbert，“德國在巴黎的軍事命令”，第142頁。

[[6]](#filepos367546) 數字引自Susan Zuccotti，《大屠殺，法國人與猶太人》（The Holocaust, the French and the Jews, Basic Books 1993），第89頁。

[[7]](#filepos368500) 引自Herbert，“德國在巴黎的軍事命令”，第152頁，司法部長Balz對會議的回憶。

[[8]](#filepos370401) 引自Serge Klarsfeld，《大屠殺中的法國兒童》（French Children of the Holocaust,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6），第34頁。

[[9]](#filepos371310) 引自Zuccotti，《大屠殺》，第99頁。

[[10]](#filepos371481) 引自Zuccotti，《大屠殺》，第99頁。

[[11]](#filepos371617) Klarsfeld，《法國兒童》，第35頁。

[[12]](#filepos372332) BBC訪談。

[[13]](#filepos373974) BBC訪談。

[[14]](#filepos378504) 引自Klarsfeld，《法國兒童》，第45頁。

[[15]](#filepos378722) 引自Klarsfeld，《法國兒童》，第45頁。

[[16]](#filepos379722) 引自Klarsfeld，《法國兒童》，第45頁。

[[17]](#filepos386597) BBC訪談。

[[18]](#filepos391963) BBC訪談。

[[19]](#filepos399072) BBC訪談。

[[20]](#filepos415314) Aleksander Lasik，“黨衛隊的歷史學-社會學側寫”（Historical-sociological Profile of the SS），見Yisreal Gutman和Michael Berenbaum編著， 《奧斯維辛滅絕營剖析》（The Anatomy of the Auschwitz Death Camp,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第278頁。

[[21]](#filepos415826) 這些數字引自Lasik，“黨衛隊的歷史學—社會學側寫”。

[[22]](#filepos419068) 引自Frederick Cohen，《1940—1945年德國占領時期海峽群島的猶太人》（The Jews in the Channel Islands during the German Occupation 1940—1945, Jersey Heritage Trust 2000），第26頁。

[[23]](#filepos419331) 引自Cohen，《海峽群島的猶太人》，第34頁。

[[24]](#filepos421165) BBC訪談。

[[25]](#filepos422175) 引自Cohen，《海峽群島的猶太人》，第52頁。

[[26]](#filepos424007) 完整名單見Cohen，《海峽群島的猶太人》，第52頁。

[[27]](#filepos426125) Cohen，《海峽群島的猶太人》。

[[28]](#filepos426575) Cohen，《海峽群島的猶太人》。第92頁。

[[29]](#filepos427450) BBC訪談。

[[30]](#filepos429271) BBC訪談。

[[31]](#filepos430914) “Muselmann”是“Muslim”的德語拼法，指那些因饑餓而虛弱不堪、將不久于世的犯人。有人認為之所以有這種稱呼，是因為這些犯人弓著身體的樣子很像穆斯林在做禱告。

[[32]](#filepos440898) 欲了解圍繞雅斯特爾的去世展開的爭論，參見Henryk Swiebocki，“逃離集中營”（Escapes from the Camp），載于《奧斯維辛1940—1945》，第四卷，第199頁，腳注532。

[[33]](#filepos455518) 引自Yitzhak Arad，《貝爾賽克、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萊因哈德行動中的滅絕營》（Belzec, Sobibor, Treblinka – the Operation Reinhard Death Camp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7），第87頁。

[[34]](#filepos456383) 引自Arad，《貝爾賽克、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第84頁。

[[35]](#filepos456629) BBC訪談。

[[36]](#filepos457076) 數字引自Arad，《貝爾賽克、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第87頁。

[[37]](#filepos461597) 后文的日期基于Samuel Igiel的報告，見《我記得每一天……普熱梅希爾猶太人的命運》（I Remember Every Day ... The Fates of the Jews of Przemysl, Remembrance and Reconciliation Inc., Ann Arbor 2002)，第237—240頁。

[[38]](#filepos471869) BBC訪談。

[[39]](#filepos476245) 魯道夫·霍斯，《奧斯維辛指揮官》，第91頁。

[[40]](#filepos476603) 霍斯，《指揮官》，第136頁。

[[41]](#filepos481918) 英國國家檔案館，檔案編號HW 16/10。

[[42]](#filepos482174) 編按：原書有誤，海德里希是5月27日遇刺，6月4日去世。

# 第四章 腐敗

對于奧斯維辛、對于納粹的“最終解決”，1943年都是轉折性的一年。1941年，大部分殺戮是由特別行動隊在蘇聯占領區進行的；1942年，萊因哈德行動下的滅絕營在大規模屠殺中發揮了主要作用。但到了1943年，也就是奧斯維辛投入使用三年之后，終于輪到奧斯維辛成為主角。與這段歷史上大部分事件一樣，這個轉變背后的原因是復雜和多方面的。

1943年初，希姆萊到訪特雷布林卡和索比堡，親自視察他手下的殺人工作。截至當時，萊因哈德行動滅絕營已經屠殺了165萬人（占這些滅絕營死亡總人數170萬的97%）。[[1]](#_1__Jian_Yitzhak_Arad___Bei_Er_S)由于殺戮如此“成功”，2月16日，希姆萊下令清空華沙的猶太人隔離區，他認為那里已經沒有繼續存在的必要。4月，一件在納粹看來不可思議的事情發生了——華沙隔離區的猶太人發起了反抗。納粹首次面臨來自猶太人有組織成規模的武裝抵抗，而沖突就發生在一個毫無遮蔽和防護的地方：波蘭首都的中心地帶。[[2]](#_2__Zhi_De_Zhu_Yi_De_Shi__Dui_Na)

華沙隔離區是納粹所建最大的猶太人隔離區。1942年夏天在這里進行的最早幾次驅逐行動沒有遇到任何意外。大約有30萬猶太人被送往特雷布林卡，隔離區只剩下約6萬人。在明白納粹是要把他們趕盡殺絕后，有越來越多的人加入了“猶太人戰斗組織”（Żydowska Organizacja Bojowa）。這個組織于1942年7月在隔離區內成立，它與“猶太人軍事聯盟”（Żydowski Związek Wojskowy）共同決定對接下來的驅逐行動做出反抗。

1943年1月，納粹清空隔離區的行動遭到一定程度的抵抗，但還是有幾千名猶太人被帶走。猶太領導層以為是他們的反抗阻止了隔離區被徹底清空，但我們現在知道，納粹在這個階段的行動目標只是每次帶走一定數量的猶太人，且這個數字始終沒有超過8000。不管怎么說，反抗行動讓猶太人確信，他們有能力阻止德國人。他們已經做好準備，要對德國人徹底摧毀隔離區的行為抗擊到底，他們知道離德國人采取行動的那一天已經不會太遠。

亞倫·卡爾米[[3]](#_3__BBCFang_Tan_1)當時21歲，是華沙隔離區里打算進行反抗的猶太人之一。前一年，他已經有過一次奇跡般與死神擦肩的經歷，當時他和他的父親都在一輛開往特雷布林卡的列車上，但他成功跳下了火車。“我父親說：‘快走！如果我能救你，我就是救了全宇宙。’然后他又說：‘如果你們誰能活下來，一定要讓他們血債血償。’然后我們互相道別，我知道那是什么樣的道別——一種不一樣的道別，一種以前從沒有過的道別。”

卡爾米和其他反抗戰士找出了他們能找到的所有武器，收集在一起，構筑一個臨時的防御陣地。隔離區里的其他人挖出幾個地下掩體用作藏身之處。盡管準備工作如此充分，但沒有人幻想能夠打敗德國人。“我們從沒想過取得勝利，”卡爾米說，“只想爭取不在他們規定的時間登上列車。如果我們能成功拖延一天，第二天我們會努力再拖一天。”

卡爾米和另外五六個同伴在一棟房子的三層就位，從那里可以眺望到隔離區的圍墻。他手里緊緊握著一把德國P38手槍，等待著納粹的到來。有傳言說德國人已經承諾要在4月20日之前清空隔離區，因為那天是希特勒的生日，他們要為元首獻上一份生日禮物。而正是在希特勒生日當天，卡爾米的團隊首次展開行動：“我們聽到300名德國士兵朝我們靠近的聲音，他們的樣子就像正朝前線行進，比如要去斯大林格勒或別的什么地方。他們恰好在我們的正前方。”

就在那一刻，卡爾米的領隊朝德國人連續扔出兩枚手榴彈，這是示意卡爾米和其他隊員開火的信號：“我馬上用我的手槍朝經過的人群（德國人）射擊。德國人大喊：‘救命！’接著就躲到一面墻的后面。這是我們第一次看見德國人逃跑。我們習慣了做那個從德國人身邊逃跑的人。他們沒想過猶太人會這樣反抗。有人流血了，我沒法轉移我的視線。我說：‘德國人的血。’我記起父親對我說的話：‘如果你們誰能活下來，一定要讓他們血債血償。’那個部隊的（德國）指揮官開始朝他的士兵大吼：‘怎么，你們都躲起來了？離開那面墻！’他們走出來，看清子彈是從哪里打來的，于是他們開始反擊。他們的裝備可跟我們不一樣——我們只有手榴彈和幾把手槍。他們一開火，所有的窗戶都被震碎了，到處都是煙和碎玻璃。”

由黨衛隊少將于爾根·施特羅普統帥的德國士兵很快意識到，他們遇到的抵抗比一開始所想象的要頑強。成千上萬名猶太人化整為零，絕大部分藏在地下。隔離區的街道空空蕩蕩，幾乎抓不到人。德國人決定采用一種簡單粗暴的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把猶太人熏出來。他們一條街挨著一條街、一個街區挨著一個街區地放火。面對強大的敵人和四周熊熊燃燒的建筑，亞倫·卡爾米和他的同伴只好撤到下水道，從地下越過了隔離區的鐵絲網到達華沙的郊區。在這里，他的生活并沒有變得更有保障：“兩年后，80個逃進樹林里的人只剩下11個。”

施特羅普提交的報告是現今研究這次隔離區起義最主要的文獻。根據他的記載，56 065名猶太人最終被捕，大約7000名猶太人在起義中被擊斃，而犧牲的德國士兵不到20人。這些數字顯然是在弱化德國人的損失，同時夸大猶太人的死亡人數。

盡管施特羅普努力掩蓋華沙隔離區爆發的事件，但他沒能瞞過希姆萊。這次抗爭開創了一個危險的先例，它是猶太人首次發動大規模、有組織的抵抗運動。希姆萊一定更加確信，隔離區有脫離控制的風險。在他看來，猶太人隔離區的存在是為了解決一個已成為歷史的問題，“最終解決”未來的“執行”應該依靠別處，具體來說，在奧斯維辛。

1943年3月，就在華沙隔離區起義爆發前幾周，奧斯維辛發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比克瑙的首座焚尸場投入使用。它的建造經過很長一段時間，且計劃幾經改變。最初的構想是在1941年10月提出的，當時是打算用它取代主營地的舊焚尸場，但隨后建造地點改到了比克瑙。1942年是策劃階段的重要轉折點，因為在這一年，黨衛隊建筑師瓦爾特·德亞科改變了焚尸場的功能：地下室的兩個房間原本都要被用作停尸房，但現在它們分別具有不同的功能：犯人們將在其中一個大房間里脫去衣服，另一間與第一間呈直角排列，將被設計為一個毒氣室。裝有齊克隆B的小罐子將從毒氣室房頂的開口投入屋內。一層是一個大焚化場，共有五個巨大的爐子，每個爐子有三個爐門。尸體將通過小電梯從地下室的毒氣室運至焚化場中。

沒人知道黨衛隊領導層要求改造焚尸場的具體日期，但我們可以通過奧斯維辛建筑辦公室下達的一系列指令來追蹤其變化。例如，毒氣室的門被要求加上一個“窺視孔”，并改成向外拉開，而不是原來設計的向內推開（這個改動是非常必要的，納粹已經發現毒氣發揮作用后門會被尸體堵死）。其他變化還包括舍棄運尸體的滑梯，增建更多通向地下室的樓梯，這顯然是考慮到現在人們會自己走到樓下的毒氣室，而不是被運進原計劃中的停尸間。

最初納粹只打算建造一座焚尸場，但既然焚尸場的功能發生轉變，現在他們也決定增建類似的設施。截至1943年初夏，共有四座焚尸場/毒氣室合一的建筑在奧斯維辛-比克瑙建成。其中兩個（2號和3號焚尸場）依據修改后的方案建造，也就是把地下室用作毒氣室。在比克瑙，新來的受害者下車的地方被稱為“坡道”（直到1944年春末才完全建好），這兩個焚尸場距坡道不到100米。另外兩個（4號和5號焚尸場）建在比克瑙的偏僻角落，與“小紅房”和“小白房”中的臨時毒氣室相鄰。這兩個焚尸場的毒氣室不在地下，而是與焚化爐一起都在一層。對納粹規劃者來說，這個設計是一個明顯的“改進”，它意味著尸體不需要再從地下室被運到地面。4號和5號焚尸場各有一個巨大的焚化爐，每個爐子分別有八個爐門。這四個焚尸場加起來每天可以殺死約4700人，同時可以完成對尸體的處理。也就是說，如果新的屠殺設施全部啟用，那么每月奧斯維辛可以殺害15萬人。

奧斯維辛的焚尸場——這些磚砌的堅固建筑恰恰是納粹“最終解決”恐怖之處的有形體現。屠殺無需再在改造的農舍中進行，而是在類似工廠的地方、按照工業生產的方式操作。歷史上，對婦女和兒童的血腥屠戮屢見不鮮，但這次完全不同：在納粹費盡心思建造的屠殺工廠里，人類的犧牲將不見血光。在比克瑙的焚尸場，那一排排整齊的紅磚房里，納粹分子將沉著、鎮靜、有條不紊地奪取性命。

不過，有一個與奧斯維辛-比克瑙有關的錯誤認識，雖可以理解但有必要澄清。這里的焚尸場直到1943年春天才投入使用，它們并不是納粹在“最終解決”執行過程中首座固定屠殺設施。在前一年，萊因哈德行動中的滅絕營已經使用過毒氣室，雖然要簡陋得多。1942年12月，特雷布林卡的舊毒氣室已經被一個更堅固、更寬敞的毒氣室取代。此外，奧斯維辛焚尸場投入使用時，屠殺的高峰早已過去。1942年，約有270萬猶太人被害（約20萬死在奧斯維辛，165萬死在萊因哈德行動的滅絕營，85萬死在東線特別行動隊的槍口下），而1943年被害猶太人數量最多50萬，其中約半數死在奧斯維辛。

盡管如此，奧斯維辛在納粹統治內還是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多年來，納粹分子中一直有兩派觀點，一派認為猶太人應該為帝國工作，另一派認為猶太人都應該被殺死。在1942年1月的萬湖會議上，萊因哈德·海德里希提出讓猶太人從事繁重的勞動直至累死，由此把這兩個看似矛盾的態度結合在一起。但在實際情況中，這兩種政策常常無法調和，尤其是在希姆萊下令殺死總督轄區所有猶太人之后。正如巴特爾中尉在普熱梅希爾所見到的，能夠工作的猶太人仍被送往貝爾賽克處死。

到了1943年春天，希姆萊等人發現，在納粹帝國內部，顯然只有一個地方可以把工作和屠殺這兩個目標完美地結合在一起，這個地方就是奧斯維辛。比克瑙的焚尸場/毒氣室將作為一個大型半工業化集合體的中樞，擁有數量眾多的子營地。經過篩選，猶太人首先會被送到附近的子營地強制勞動，經過數個月的虐待和壓榨之后，當他們被認為不再適合工作時，就會被送到幾英里之外的奧斯維辛-比克瑙滅絕。

無論在概念上還是在實踐中，奧斯維辛都完美地符合希姆萊的設想。希姆萊希望系統內部能夠有一些靈活度，可以根據對勞動力的需求隨時改變“適合工作”的定義。而對他來說更重要的或許是，在華沙事件發生之后，他意識到黨衛隊可以較有把握地確保奧斯維辛內部的秩序，這在隔離區是無法實現的。

最終共建成了28座奧斯維辛子營地，它們分布在上西里西亞地區大大小小的工廠附近，從戈萊舒芙（Goleszów）的水泥廠到“和諧之屋”（Eintrachthütte）的軍工廠，上西里西亞能源供應股份公司（Energieversorgung Oberschlesien AG）的發電廠，以及IG法本公司的丁鈉橡膠工廠。[[4]](#_4____Ao_Si_Wei_Xin_1940__1945)體量龐大的莫洛維茨（Monowitz）營區便是為了丁鈉橡膠工廠的需要而建，約1萬名奧斯維辛的囚犯（包括意大利作家普里莫·萊維，他在戰后寫就了一系列解讀納粹體制殘酷特性的著作）在此關押。截至1944年，在上西里西亞地區各工廠做苦役的犯人超過4萬人。[[5]](#_5__StrzeleckaHe_Setkiewicz__Ji)據估計，奧斯維辛為了滿足私利強迫犯人勞動的做法，最終為納粹德國創造了約3000萬馬克的純利潤。[[6]](#_6__Franciszek_Piper__Dui_Ku_Yi)

這些子營地的生活條件與奧斯維辛主營地及比克瑙一樣惡劣。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建在礦坑旁邊的福爾斯滕格魯伯（Fürstengrube）。本雅明·雅各布斯[[7]](#_7__BBCFang_Tan)于1943年初秋便被送到那里。通常情況下，這無異于被判了死刑，因為在奧斯維辛礦坑工作的犯人一般只能活幾個星期，但雅各布斯掌握的一門特殊手藝救了他。作為牙醫，他的經歷充分說明納粹如何竭盡全力地剝削猶太人，無論是死是活。

雅各布斯先是給犯人看牙，后來又為營地里的納粹軍官服務：“我負責給集中營里的黨衛隊士兵、高級官員還有醫生等人看牙。他們都會給我一些好處。當他們來到我這兒，想找個牙醫的時候，都很友善。他們一般會給我帶一些面包或伏特加，但不會親手交給我，只會‘不小心’落在椅子上。通過這種方式我能得到更好的食物……我想我在別人眼里是受到特別待遇的人。我覺得很自豪。你會覺得你的地位更高，待遇也更好。” 本雅明·雅各布斯“唯一一次后悔”在工作營里當牙醫，是他被派去從死人嘴里撬金牙的時候。他不得不走進堆滿犯人尸體的房間，他們不是上工時被擊斃就是累死在礦井里。雅各布斯發現“這些尸體看起來扭曲變形”，而他“做的事是他從未曾想過自己會干的”。他不得不跪在尸體旁邊，“用工具使勁撬開犯人的嘴”，把上下頜分開，在此過程中尸體的嘴巴會發出“咔咔的聲音”。等到犯人的嘴被撐開固定后，雅各布斯再把金牙取下來：“這不是什么值得自豪的事。我那個時候很麻木。我想活下去。雖然這種生活不怎么合意，但你還是想努力活著。”

從死人嘴里取出的金牙會被熔掉，以便再加工成珠寶首飾，這個過程充分體現了納粹建造整個奧斯維辛集合體背后的理念，那就是犯人擁有的任何物品都不應浪費，無論是多么私密的東西。在奧斯維辛主營地和比克瑙被稱為“加拿大”的區域，這種態度更為直觀。1943年，19歲的琳達·布雷德[[8]](#_8__BBCFang_Tan_2)開始在“加拿大”工作。一年前她來到這里，屬于斯洛伐克最早一批驅往奧斯維辛的猶太女人。一開始她被分到室外勞役，條件極為艱苦，后來被選去整理和分揀沒收來的物品。“事實上，在‘加拿大’的工作救了我的命，因為我們能弄到吃的，還有水，可以在那里洗澡。”比起本雅明·雅各布斯，琳達·布雷德被迫要做的或許沒那么可怕，但本質是一樣的，即確保納粹從他們的受害者身上獲得最大的經濟利益。“死人的遺物都存放在奧斯維辛。除了疊衣服，我們還要搜查貴重物品，無論是內衣褲還是別的什么，每一件都不放過。我們經常會找到很多鉆石、金子、硬幣、美元，還有歐洲各國的貨幣。發現的東西都必須放到營房中間一個頂上只開一條縫的大木箱里……其他人都不知道這里有這么多財寶和衣服，只有我們——600個在那里工作的女孩。”

奧斯維辛當局有明確規定（事實上這也是黨衛隊在整個納粹體制下所貫徹的做法）：囚犯擁有的所有貴重物品都屬于帝國財產。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加拿大”的誘惑是無法抗拒的，無論是對在那里工作的犯人還是黨衛隊看守。因此，從“加拿大”順手牽羊的事時有發生。“我們經常偷拿衣服，”琳達·布雷德說，“還偷鞋子、內褲、內衣。我們上繳的衣服都是自己不需要的。”由于還能找到藏在行李中的食物，布雷德等在“加拿大”工作的人幾乎比奧斯維辛其他所有猶太囚犯都吃得更好。“是的，我們會吃。對我們來說那是救命的食物。就連動物在餓了的時候都會吃掉同類……我們想活著。我們想活下去。我們應該把吃的扔了嗎？我們沒有殺人，只不過是吃他們的食物。那時他們早都死了……有吃的，有水，有足夠的睡眠，這就是我們在乎的事。在‘加拿大’，這些要求都能滿足。”

而黨衛隊成員從“加拿大”獲得的私利要大得多，這其實一點都不令人意外。“德國人的錢越攢越多，”布雷德說，“但留給我們的只有死亡……（黨衛隊）所有人都在偷。他們之所以到這里來，是因為沒有哪個地方像這里一樣什么都有。”魯道夫·霍斯曾經承認，“猶太人隨身的財物給集中營造成了無法回避的難題”，因為他手下的黨衛隊成員“有時不夠堅定，不能抵擋那些觸手可及的貴重物品帶給他們的誘惑”。[[9]](#_9__Lu_Dao_Fu__Huo_Si____Ao_Si_W)奧斯卡·格倫寧證實了他指揮官的觀點：“確實有（偷盜的）機會。因為如果一大堆東西都堆在一起，那你很容易就能偷走一些，給自己撈到便宜，而在奧斯維辛這種情況很常見。”由于他在經濟部門工作，因此他知道，從犯人下車把行李存放在坡道處開始，經“加拿大”完成分揀，再到裝滿貴重物品的木箱被運到他的辦公室，整個過程有“不少人經手”這些貴重物品。“可以肯定很多東西去了它們不該去的地方。”

出人意料的是，奧斯維辛當局對黨衛隊的監管“相當寬松”，這點格倫寧有證實。他承認營地里黨衛隊偷盜成風，他自己也經常參與這種腐敗行為，偷拿他經手的現金，以便從奧斯維辛日漸繁盛的黑市上囤貨。例如，他厭煩了每次從營地的軍械庫領左輪手槍，下班以后再還回去，因此他找到“有關系的人”，對他說：“兄弟，我需要一把配有子彈的槍。”大家都知道格倫寧是“美元之王”，因為他的工作就是清點和整理掠奪來的錢，于是他們協定以30美元成交。對格倫寧來說，從他每天經手的貨幣中偷取這個數量易如反掌。他交出錢，拿到了手槍。

在奧斯維辛，每周都有數千起與格倫寧的所作所為類似的非法交易。大量的財富流入營地，相應的監管卻少之又少，偷盜的機會俯拾即是，因此，很難想像有哪個黨衛隊成員沒參與過此種勾當。從想要一臺新收音機的普通士兵，到倒賣珠寶贓物的軍官，集中營的腐敗現象日益泛濫。

1943年10月，希姆萊在他著名的“波茲南演說”中提到了極其敏感的黨衛隊腐敗問題，當時在場的聽眾包括50名黨衛隊高級官員。“我要坦率地跟你們談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希姆萊說，“這件事在咱們之間說說無妨，但絕不可以在公開場合說起……我指的是對猶太人的驅逐，對猶太民族的滅絕。你們大多數人都知道，當100具、500具、1000具尸體堆在一起的時候，這意味著什么……我們在努力完成這項任務，只在極個別的情況下敗給人類的弱點……我們保持了體面，這讓我們堅強。這是我們歷史上光榮的一頁，它過去從未發生，將來也永遠不會被超越。我們奪走他們（猶太人）的財富，并且……我曾經下過一道嚴格的命令，由黨衛隊全國副總指揮波爾負責執行，那就是我們要把所有這些財富都上交給帝國，交給國家。我們自己什么也不要。我們有道德權力，也對我們的人民負有義務，來毀滅那些想要毀滅我們的人。我們是出于對人民的愛去完成這個極其艱巨的任務。我們的內心、我們的靈魂和我們的性格都沒有因此受損。”

就這樣，希姆萊用“為了帝國的利益”來證明屠殺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卻將獲取私利定義為一項罪行，在兩者之間劃下一道清楚的界線。他這樣做的目的是要維護黨衛隊“堅定”、“清廉”的形象。不難理解他為什么要把兩者區分開來。他在兩年前曾親眼目睹近距離射殺猶太人給行動隊成員帶來的心理傷害。他也注意到通過使用毒氣室，具體的實施得到改進，可以避免給行刑者造成情感創傷。此刻，他有意區分道德高尚、意志堅定的帝國捍衛者和品行不端、謀求私利的機會主義者，來為他的下屬提供思想上的慰藉。為了讓他們不會感到內疚，甚或“原諒”那個參與“最終解決”的自己，希姆萊意識到，在向這些屠殺婦女兒童的黨衛隊成員描述他們的任務時，必須強調他們依然可以擁有榮譽和體面，而他的方法就是提醒這些人，他們沒有從這些殺戮中獲利。

當然，這完全是個謊言，不僅因為它明顯與事實不符——奧斯維辛的黨衛隊成員普遍參與到腐敗與偷盜當中——而且從本質上來說，它也是個徹頭徹尾的謊言。納粹在“最終解決”中對手無寸鐵的平民進行的“光榮屠殺”根本就是純粹野蠻的暴行。奧斯維辛黨衛隊醫生的所作所為便是最好的證明。從坡道的篩選到對選定犯人的加害，這些醫學專家參與了屠殺的每一個環節。齊克隆B由一輛畫有紅十字標志的假救護車運到毒氣室，這恰好象征了醫生的作用。比起其他手染鮮血的納粹分子，這些奧斯維辛醫生作為全程參與的共犯所面臨的困境更嚴峻，最好用一個問題來概括：如何在參與執行大規模屠殺的同時，還能相信自己的行為符合希波克拉底誓言（Hippocratic oath）的精神，即所有醫生都該救死扶傷？

要想了解他們如何回答這個問題，必須要知道，這些納粹醫生并不是到了奧斯維辛后才突然得知，屠殺需要專業醫務人員的介入。從1933年納粹上臺那一刻起，納粹領導人就一直在宣揚特定“種族”、甚至是特定人群比其他人更“不配”生存。這種觀念的首次實踐，是20世紀30年代對患有嚴重精神疾病的人進行的強制絕育，當時約有30萬德國人被迫接受了絕育手術。

我們在前面已經談到過，萊因哈德行動里的滅絕營工作人員，有很多曾參與過納粹在1939年秋進行的成年人安樂死項目。滅絕營的創建者，如維爾特和施坦格爾等，都是以協助殺害殘疾人為起點開展他們日后的大屠殺事業。值得一提的是，在成年人安樂死項目中，負責篩選的是醫生而不是警察，這種做法在奧斯維辛得到延續。在大屠殺之前，納粹就已經把除掉所謂“沒有生存價值的人”上升為醫學從業者的首要職責，因此醫生成為殺戮者可以說是歷史的必然。正是出于這種扭曲的邏輯，埃貝爾博士作為醫學從業者能當上特雷布林卡滅絕營的指揮官，這在納粹眼中是一件再正常不過的事。

等埃貝爾到特雷布林卡就任的時候，“沒有生存價值的人”顯然已經從精神病患者和殘疾人擴大到猶太人。為了證明屠猶的正當性，黨衛隊醫生借用了納粹早期政治宣傳中的謊言，即猶太人會對整個國家產生腐化影響。“我是一名醫生，”一位名叫弗里茨·克萊因的納粹醫生說，“出于對生命的尊重，如果一個病人的闌尾壞死了，我會把它切除。猶太人就是人類壞死的闌尾。”[[10]](#_10__Yin_Zi_Robert_Jay_Lifton)

因此，在納粹最純正的觀點中，奧斯維辛和其他滅絕營所做的不過是維護健康，也就是協助除掉那些對國家發展造成負擔或構成威脅的人。基于這種觀點，奧斯維辛早期處決不適合工作的犯人時，有時會在10號樓、也就是醫療室進行，方法為注射苯酚。這與正常的醫學倫理完全背道而馳，被送到醫院的人不是接受治療，而是被殺死。

對剛到達的犯人進行篩選的制度于1942年確立之后，納粹醫生開始在大規模屠殺進程里扮演重要角色，因為奧斯維辛運轉的關鍵就在于他們的生死篩選。篩選過程中醫生的積極參與對納粹至關重要，這有其現實和理論方面的原因。現實原因很容易理解：要一眼判斷出某個人是否適合工作（每個決定只花上幾秒），醫生無疑是最合適的人選。理論方面不那么明顯，意義卻更重大：醫生密切參與篩選過程可以給人一種感覺，即屠殺不是基于偏見隨意進行的，而是有科學上的必要性；奧斯維辛不是一個隨心所欲大開殺戒的刑場，而是通過慎重和冷靜的行動，為國民健康做出貢獻的地方。

然而，真正讓奧斯維辛的醫生惡名遠揚的，是他們的醫學實驗。將犯人用作實驗對象符合納粹的一個理念：國家的敵人應該被用來為帝國提供“服務”，如果不能作為帝國的勞動力，那就把生命貢獻給對“醫學知識”的探索。對于那些想要投身科研、又不想被人道主義精神或同情心羈絆的醫生來說，奧斯維辛是絕無僅有的實驗室。克勞貝格博士和舒曼博士都在奧斯維辛對絕育展開過“醫學研究”，后者在這之前就有過相關經驗：他作為成年人安樂死項目的醫生，曾在宗嫩斯坦工作過，那里在1941年7月就處決過奧斯維辛的猶太人。

西爾維婭·韋塞勒[[11]](#_11__BBCFang_Tan)是最早那批從斯洛伐克被送到奧斯維辛的女犯之一，她被迫為克勞貝格和舒曼工作，在主營地10號樓擔任護士。很多實驗便是在此進行。“我被告知，這棟樓里儲有X光機——它們體積不小，都帶著大大的圓管——的地方，是舒曼博士在此進行絕育實驗；克勞貝格博士在另一處，他采用化學手段，把化學物質注射到婦女的子宮和卵巢里，讓它們都粘在一起。這些實驗的主要目的是確定成功絕育所需要的劑量。”

希姆萊對奧斯維辛這些絕育實驗特別感興趣。絕育是納粹為應對他們自己制造出來的“猶太問題”而想出的“解決方案”之一，早在毒氣室出現之前就被提出。在萬湖會議上，有人提議對混血的德國猶太人進行絕育而不是驅逐。雖然有克勞貝格博士這樣的醫學領軍人物投身研究，但希姆萊至今仍沒有得到他想要的那種便宜、高效的絕育技術。

這些實驗令人痛苦不堪，西爾維婭·韋塞勒照料那些被當作實驗對象的婦女，“盡量避免感情的觸動，最好就是什么都不想。他們要研究X射線對人類小腸的影響。簡直太可怕了。這些女人一直在吐，特別恐怖。”X射線除了被用來絕育之外，還被用來檢查子宮注射化學物質后的變化：“女人們躺在X光機的平臺上，擺出做婦科檢查的姿勢。她們張開雙腿，醫生就撐開宮口，往她們的子宮里注射東西。他從操作臺那里可以看到注射得對不對。我的工作就是在每次檢查和注射之后打開X射線，看那些女人是否絕育成功，她們的卵巢是不是粘在一起了……對他們來說，我們根本不是人。我們是畜生。你懂不懂？我們只不過是數字和做實驗用的動物。”

在10號樓，西爾維婭·韋塞勒自己也沒有逃過克勞貝格博士的魔爪。“我病了。他們就在我身上做實驗……不幸的是，戰后我結了婚，雖然接受過那些實驗，但我還是懷上了孩子。我不得不做了一個極其痛苦的人流手術。醫生對我說：‘一次就夠了！你不可以再懷孕！’”

在10號樓以醫學研究的名義虐待女犯的，不僅有進行絕育實驗的舒曼和克勞貝格，還有對宮頸功能進行“研究”的奧斯維辛總醫務官，維爾茨博士。此外，在主營地的28號樓那里，進行以男性犯人為對象的醫學實驗，其中之一是把各種有毒物質涂在犯人的皮膚上，以便模擬想逃兵役的人可能會用到的伎倆。

奧斯維辛的囚犯甚至像小白鼠一樣，被“賣給”隸屬于IG法本公司的拜耳（Bayer）來測試新藥。拜耳公司在給奧斯維辛當局的一封信中寫道：“150個女人抵達時狀態良好，然而我們沒能得出結論，因為她們在實驗過程中都死了。真誠請求你們能再提供相同數量的婦女，我們將支付相同的費用。”[[12]](#_12__Yin_Zi_Irena_Strzelecka__Sh)這些因測試一種還在實驗階段的麻醉劑而死去的女人，拜耳公司支付的價碼是每人170馬克。

盡管克勞貝格、舒曼、維爾特以及拜耳公司都給奧斯維辛的犯人造成極大的痛苦，但一提到奧斯維辛的醫學實驗，人們馬上聯想到的并不是他們，而是一個相貌堂堂、曾獲得鐵十字勛章的退伍軍人。1943年3月，32歲的他被派到奧斯維辛。這就是約瑟夫·門格勒博士。他幾乎成了奧斯維辛的代名詞，無人能出其右。這來自人物角色和環境兩方面的原因：從角色上說，門格勒充分享有奧斯維辛所賦予他的權力，以及這里提供的進行冷血實驗的機會。從環境上來說，他到達營地時正逢比克瑙的焚尸場完工，奧斯維辛即將進入它最具殺傷力的階段。

許多曾關押在奧斯維辛的犯人都談到過門格勒分裂的性格。當他身著黨衛隊制服、衣冠楚楚地站在犯人面前時，他時而面帶微笑，顯得非常有魅力，時而又殘忍得無以復加。曾有人目睹他在坡道槍殺一對母子，就因為他們給他添了麻煩，但也有人回憶起門格勒時說，他總是很客氣地對他們說話。薇拉·亞歷山大[[13]](#_13__BBCFang_Tan_1)，一個來自捷克斯洛伐克的犯人，近距離見證了門格勒的這種雙重性格。她曾擔任一個分區的卡波，其中有不少吉卜賽和波蘭兒童，“門格勒每天都到營地來，還會帶巧克力……我大聲斥責孩子們的時候，他們經常回嘴說：‘我們要告訴叔叔你是壞人。’門格勒就是那個‘好叔叔’”。當然，門格勒這樣做是有原因的，這些孩子對他來說不過是實驗的原材料罷了。在拜訪過他們的“好叔叔”后，回到營地的孩子們痛楚哀嚎的程度，薇拉·亞歷山大可是歷歷在目。

門格勒最“感興趣”的領域之一是雙胞胎研究——他過去的專業可是“遺傳生物學”。按照營地里流傳的說法，他一直想弄明白雙胞胎或多胞胎誕生的具體條件，以便進一步研究，好讓德意志帝國的婦女能在更短時間內生出更多的孩子。但更可能驅動他的，是去了解基因遺傳在人的發育和行為中起到的作用，這也是令許多納粹科學家著迷的課題。

埃娃·莫澤斯·科爾[[14]](#_14__BBCFang_Tan_1)1944年的時候10歲，她和她的雙胞胎姐妹米麗婭姆引起了門格勒的注意：“門格勒每天點名之后都會過來，他想看看他有多少小白鼠。每周有三次，他們把我兩個胳膊綁緊，限制血液流動，然后從我的左胳膊抽出很多很多血。有時抽到我們暈過去。就在抽血的同時，他們往我的右胳膊注射至少五管東西，有一次注射結束后我病得特別厲害，第二天早上門格勒博士和其他四個醫生一起來了，他看了看我的體溫記錄，挖苦地笑了起來，說：‘太可惜了，她還這么年輕。她只能再活兩個星期。’我有時清醒有時迷糊，在半清醒狀態下我一直對自己說：‘我必須活下來。我必須活下來。’他們在等著我死。如果我死了，我的雙胞胎姐妹米麗婭姆就會立即被送進門格勒的實驗室，心臟被扎上一針，然后門格勒就可以做配對尸體解剖。”

正如米克洛斯·尼斯利 [[15]](#_15__Miklos_Nyiszli___Ao_Si_Wei)所評論——作為集中營的醫生，他曾近距離觀察過門格勒：“這個現象在世界醫學史上都是十分罕見的。兩兄弟如果同時死去，就可以對兩人同時做尸體解剖。在正常情況下，你能找到在同一個地點同時去世的雙胞胎兄弟嗎？”

埃娃·莫澤斯·科爾最后成功退了燒，不僅讓自己活了下來，也救了她雙胞胎姐妹的命。“有人問我：‘你是不是很堅強？’我說：‘我沒有選擇。如果我不能戰勝它，就只有死路一條。’”這并不單純是個令人感到恐怖的故事，更重要的是，這個故事揭示了一個關鍵事實，那就是門格勒在奧斯維辛可以對犯人為所欲為。他所謂的“醫學實驗”在范圍和程度上都沒有限制。嗜虐成性的他為了滿足自己的好奇心，可以對犯人進行無盡的折磨和肆意的殺害。他的實驗對象不僅有雙胞胎，還包括侏儒和患有走馬疳（noma，即面部出現壞疽的一種疾病）的犯人，這些人在比克瑙關押吉卜賽人的營地里有很多，因為那里的條件非常惡劣。然而問題在于，三個也好三十個也罷，門格勒可以隨心所欲地對各種研究領域表示興趣。在他到達奧斯維辛之前，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他會變成虐待狂。據說他在東線作戰時表現得十分英勇，還從一輛正在開炮的坦克前救下兩名士兵，而再之前，他從法蘭克福大學畢業后從事醫學工作，過著相對平凡的生活。是奧斯維辛的環境造就了世人所知的那個門格勒。這又一次證明，很難預測在特殊的環境中，誰會變成一個喪失人性的怪物。

從很多方面來看，門格勒都是奧斯維辛納粹軍官的典型。他在任何場合的衣著打扮都堪稱完美，對犯人有著非常徹底的蔑視態度，與他們建立任何形式的親密關系都會讓他極其厭惡，性接觸在他眼里更是不可想象——最后這點與納粹的理念完全契合。在納粹的種族理論中，被關押在集中營里的人會對帝國公民的身體健康構成威脅，因此黨衛隊成員與集中營犯人之間的性關系是被明令禁止的，這種行為可以構成德國人的“種族罪”。事實上，納粹所犯下的“最終解決”暴行與20世紀戰爭時期發生的其他許多罪行有一個很大的區別，那就是納粹公開禁止他們的軍隊實施性侵。這當然不是出于人道主義的考慮，而是出于意識形態的原因。在戰爭時期的許多罪行中，對“敵方”婦女的性侵是非常普遍的，包括一戰時土耳其人對亞美尼亞人的大屠殺，20世紀30年代起日本對中國的殖民戰爭，以及20世紀90年代塞爾維亞意圖征服波斯尼亞。從波斯尼亞的強奸營，到被賣到“閨房”（harems）的亞美尼亞女性基督徒，再到日本皇軍士兵對中國婦女的輪奸，在20世紀的戰爭沖突中，男性性暴力事件不勝枚舉。但對納粹來說，東線的戰爭是一場不一樣的戰爭。如果是在海峽群島或法國，那么德國士兵完全有可能與當地婦女發生性關系，可東部的猶太人和斯拉夫人是危險的種族。納粹的政治宣傳大肆鼓吹：帝國每一名士兵最神圣的任務之一，便是確保“德國血統的純正性”。斯拉夫女人和猶太女人（特別是后者）是絕對不可以接觸的。戰前德國甚至通過了一項法律，禁止猶太人與非猶太人通婚。

所有這一切都意味著，在奧斯維辛，黨衛隊成員與猶太犯人之間理應不會發生性行為。屠殺猶太婦女是黨衛隊的神圣責任，而與她們發生關系則是犯罪。然而，正如奧斯卡·格倫寧指出的：“當對某些人的興趣超越了對整個猶太人群體的感覺，這些事情是會發生的。如果一個人每天的工作是看管20個年輕女孩，他特別喜歡其中的某一個，她正煮著咖啡，天知道會發生什么。這個時候那些東西——宣傳的那些東西已經不再重要了……”如果黨衛隊看守負責看管的是女犯，格倫寧覺得就算見到“他們互相愛撫或接吻，又或者有強迫的性行為”，他也不會感到奇怪。

在“加拿大”工作的女性最容易成為黨衛隊成員背棄信念、實施強奸的對象。在奧斯維辛，絕大多數女犯都被剃成了光頭，并且都營養不良、病病怏怏。與此相反，在“加拿大”工作的女犯有吃有喝，因為她們可以在整理物品時偷拿食物，還可以留著頭發。此外，黨衛隊看守經常與“加拿大”的女犯閑談，不光是為了監督她們的工作，也為了方便他們自己偷東西。結果，強奸在“加拿大”時有發生。琳達·布雷德對此進行了證實：“我們剛到‘加拿大’的時候沒有自來水。‘加拿大’的指揮官（指負責的黨衛隊軍官）讓建一個淋浴室，淋浴室就在大樓后面。雖然流出來的水是冰涼的，但我還是經常在那里洗澡。有一次，一個布拉迪斯拉發的女孩正在洗澡，她很漂亮，不是那種特別瘦的人，然后一個黨衛隊軍官走到她面前，在她洗澡的時候虐待了她。他把她強奸了。”這個軍官后來被調離“加拿大”，但沒有受到進一步的懲罰。還有一個黨衛隊成員被發現與集中營里的一個猶太女犯發生了性行為，但也被從輕處罰。比克瑙被舉報的軍官之一格哈德·帕利奇[[16]](#_16__Aleksander_Lasik__Ao_Si_Wei)雖然被抓起來，但幾乎可以肯定霍斯為他求了情，他僅僅是被轉到一個遠離比克瑙的子營地。

比克瑙還有一個區域跟“加拿大”一樣，允許女犯穿自己的衣服并留著頭發，這里也常發生強奸。這個地方被稱為“家庭營”，是一片由籬墻圍起來的獨立區域，自1943年9月直到1944年7月集中營被清空，這里面一直關押著從捷克斯洛伐克的特萊西恩施塔特驅逐出來的猶太人，共計約1.8萬名男女老少。這些猶太人到達以后并沒有經過篩選，因為納粹打算把他們用作“宣傳”目的：他們被要求給家人寫明信片，談談這里的待遇有多好，以便破除奧斯維辛是個滅絕營的傳言。與吉卜賽營不同（吉卜賽營是比克瑙除了“家庭營”以外唯一一個允許家人住在一起的營地），在家庭營，男人及男孩與女人及女孩分住在不同的營房。

露特·埃利亞斯[[17]](#_17__BBCFang_Tan_1)當時就住在女性營房。她兩次目睹醉醺醺的黨衛隊看守來到營房，挑選女犯帶走：“那些女孩都哭著回來，她們被強奸了。她們的情況很糟。”

奧斯維辛的黨衛隊士兵強奸猶太婦女的事實雖然令人錯愕，但細想之下其實并不意外。這些女犯完全在黨衛隊的控制之下，黨衛隊確定她們遲早會被殺死，他們知道自己的罪行不會暴露，再加上一點酒精的作用，意識形態就被拋到一邊了。在大部分與奧斯維辛有關的傳統文獻中，這類罪行都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同樣也不足為奇。這是一個特別敏感的話題，可以理解，那些曾遭黨衛隊蹂躪的女性都希望保持沉默。正如犯罪學家在很早以前就注意到的，與強奸有關的“黑色”數據（即被上報的侵犯事件與實際發生的侵犯事件數量之差）在所有類型的犯罪中是最高的。

奧斯維辛的黨衛隊隊員強奸女犯的做法其實并不新奇，因為許多士兵都這樣對待“敵方”女性，但以下這個事實卻可以完全顛覆我們的想象：至少有一位黨衛隊成員愛上了在集中營工作的猶太女性。海倫娜·斯特洛諾娃[[18]](#_18__BBCFang_Tan_1)與弗朗茨·溫施的故事確實是奧斯維辛歷史上最離奇的故事之一。海倫娜來自斯洛伐克，早在1942年3月就被送到了奧斯維辛。她在集中營初期的經歷沒有什么特別之處，同樣是在饑餓和身體虐待中掙扎。頭幾個月她被分到一個在戶外工作的分隊，負責拆建筑、搬碎石。睡在滿是跳蚤的稻草堆上，她驚恐地看著身邊的女犯逐漸喪失希望，一個接一個死去，而她最好的朋友是頭一個放棄的。她“看了看周圍的一切”，然后說：“我一分鐘也不想活了。”她開始歇斯底里地大喊，直到黨衛隊把她帶走，結束了她的痛苦。

與其他人一樣，海倫娜也意識到，要想活下來，她必須轉到一個不那么耗費體力的分隊。她認識的一個斯洛伐克女友當時已經在“加拿大”工作，她給海倫娜提了一個建議：她們分區有一個女犯剛剛去世，如果海倫娜愿意裹上白色的頭巾，穿上從那個女人身上脫下來的條紋囚服，那她第二天就可以加入她們，混進整理衣服的營房工作。海倫娜照她說的做了，但不幸的是，卡波看出她是“混進來的人”，并對她說，她回主營地以后將被送到“懲戒分隊”。海倫娜知道這無異于死刑判決，“但我不在乎，因為我想，至少我能在有屋頂的地方工作一天”。

巧的是，海倫娜在“加拿大”工作的第一天（本來也應該是最后一天）剛好是負責監督衣物整理區的一位黨衛隊士兵的生日，他就是弗朗茨·溫施。“吃午飯的時候，”海倫娜說，“她（指卡波）問誰歌唱得好或者會朗誦，因為今天是一位黨衛隊隊員的生日。一個希臘女孩奧爾加說她會跳舞，可以在我們疊衣服的那張大桌子上跳。我的嗓音很好聽，所以卡波說：‘你真的會唱德語歌嗎？’我說：‘我不會。’因為我不想在那里唱歌。但他們強迫我唱。我為溫施唱歌時一直低著頭，不想看見他的制服。我一邊唱一邊流眼淚，等我唱完，我突然聽見他說：‘謝謝。’他輕聲讓我再唱一遍……其他女孩都說：‘唱啊！唱啊！他可能會讓你留下！’于是我就又唱了一遍。那是一首我（在學校）學會的德語歌。他就這樣注意到了我，我想也是從那一刻開始他愛上了我。我的命就是這樣保住的，因為一首歌。”

溫施要求卡波讓這個唱歌如此動聽的女孩第二天繼續來“加拿大”工作，這個要求救了她的命。海倫娜不用被送去懲戒分隊，而是正式成為“加拿大”的一員。雖然第一次見面時溫施對海倫娜十分友善，但海倫娜一開始對他很“反感”。她之前就聽說他可能有暴力傾向，其他犯人說他殺死過一個進行違規交易的犯人。然而，在接下來的幾天以及幾周時間里，溫施依然和善地對待海倫娜。他休假期間，還通過手下的猶太男孩給她送去幾盒“小點心”。休假回來后溫施做了一件更大膽的事——給她遞紙條：“他回到我工作的營房以后，走到我身邊，給我扔過來一張紙條，我不得不馬上銷毀，但我看見了上面的字：‘愛——我愛上了你。’我痛苦極了。我寧愿死也不愿跟一個黨衛隊士兵在一起。”

溫施在“加拿大”有自己的辦公室。他想出各種理由讓海倫娜來見他。有一次，他讓海倫娜來給他剪指甲。“房間里只有我們兩個，然后他說：‘給我剪指甲，讓我看看你。’我說：‘絕對不行。我聽說你殺過人，一個年輕人，就在圍欄邊上。’他總是說沒有那回事……然后我說：‘別讓我再踏進這個房間……別讓我剪指甲，什么都別讓我做。我不給別人剪指甲。’我轉過身，說：‘我要走了，我不想再多看你一眼。’于是他朝我大喊，他突然之間就變回了黨衛隊隊員：‘如果你敢走出那扇門，我就要你的命！’他拿出手槍威脅我。他愛我，但他的面子、他的自尊受到了傷害。‘什么叫你要走了？我允許你走了嗎？’我說：‘開槍打死我吧！開槍吧！我寧愿死也不想再做個兩面派。’他當然沒有開槍，我還是走了出去。”

隨著時間流逝，海倫娜漸漸意識到，溫施是個可以讓她依靠的人，雖然一開始她完全無法相信這點。知道溫施對她的感情后，她有一種“安全感，我想，這個人不會讓任何不好的事發生在我身上”。這種感覺有一天變得更加強烈，因為那天海倫娜從一個斯洛伐克同胞那里得知，有人在集中營里見到了她的姐姐羅津卡和她的兩個孩子，他們將要被送進焚尸場。當時海倫娜結束了工作，正在比克瑙的營房中休息，她聽到這個消息后悲痛欲絕，不顧宵禁離開營房，跑到焚尸場附近。沒過多久溫施就聽說了海倫娜的舉動，在焚尸場附近找到了她。溫施先對其他黨衛隊士兵大聲說，海倫娜是“我倉庫里一名優秀的工人”，然后他把海倫娜摁在地上揍她，因為她違反了宵禁規定，這樣其他人就不會懷疑他們之間的關系。溫施已經得知海倫娜是為了她姐姐跑到焚尸場附近，于是對她說：“趕緊告訴我你姐姐的名字，要不就來不及了。”海倫娜告訴他是“羅津卡”，并說她還帶著兩個小孩子。溫施說“小孩在這兒活不了！”，然后就朝焚尸場跑去。

溫施從焚尸場找到了羅津卡，把她拉出隊列，說她是他的工人。但羅津卡的孩子死在了毒氣室。溫施后來幫羅津卡在“加拿大”安排了一份工作，讓她留在海倫娜身邊。“我姐姐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海倫娜說，“他們對她說她要工作，而她的孩子被送進了幼兒園。他們對我們所有人都是這么說的。她問我：‘孩子們去哪兒了？’我說：‘在營地另外一邊，那里有個幼兒園。’她又說：‘我能去看他們嗎？’我說：‘再過些日子可以。’”

海倫娜的姐姐不停地詢問孩子的情況，這讓海倫娜特別沮喪，“加拿大”的其他女犯看到后，終于有一天對羅津卡說：“別再糾纏了！孩子們已經不在了。看見那堆火沒有？他們就在那里火化了你的孩子！”羅津卡大吃一驚，心如死灰，“不想再活下去”。是海倫娜不斷的照料和關心，讓她姐姐熬過了接下來的幾個月。

羅津卡因孩子慘死而悲痛欲絕，但她仍是非常幸運的，因為她自己活了下來，并在她妹妹的保護下活到了戰后。“加拿大”的其他女犯對她們兩人懷有復雜的情感。“我的姐姐還活著，但她們的姐妹卻沒有，”海倫娜說，“我姐姐來了，他（溫施）救了她的命。這樣的奇跡為什么不能發生在她們身上？她們失去了父母、兄弟、姐妹，失去了一切。就連那些曾經為我高興的人現在也不是那么高興了。我沒法跟朋友分享我的喜悅，我怕她們。她們特別嫉妒，嫉妒我的好運氣。其中一個很漂亮的女犯人對我說：‘如果溫施碰見你之前先看見了我，他愛上的肯定是我。’”

在溫施救了姐姐后，海倫娜對他的感情發生了很大變化：“隨著時間一點點過去，我最后真的愛上了他。他不止一次（為了我）冒生命危險。”但與奧斯維辛其他一些男女不同，這對戀人之間從未發生過性行為：“猶太（男）犯人在工作時愛上了各種女人，每隔一段時間，他們就會溜到我們疊衣服的營房中，在那里做愛。有一個人幫他們放哨，如果有黨衛隊士兵過來就趕緊告訴他們。我卻不行，因為他（溫施）是個黨衛隊隊員。”他們兩人只有眉目間的傳情、匆匆說出的情話和潦草寫下的字條：“他會先東張西望一番，確定沒人在聽才對我說：‘我愛你。’在那個地獄里，這讓我感到溫暖，給了我鼓勵，盡管這些話只代表著一段瘋狂的、永遠無法實現的愛情，在那個地方沒有什么計劃是可以實現的。太不現實了。有些時候我會忘了我是個猶太人而他不是猶太人。真的。我愛他。但這份愛太不現實了。在那個地方，什么都可能發生，無論是愛情還是死亡，但大部分是死亡。”一段時間之后，“整個奧斯維辛”都知道了他們兩人的感情，他們最終被人告發了。沒人知道告密的是個犯人還是個黨衛隊看守，總之，用海倫娜的話來說，是個“卑鄙小人”。

一天，海倫娜結束了工作，正往營地走，一個卡波讓她出列。她被帶到了11號樓的懲戒地窖。“他們每天都把我帶出去，并威脅我說，如果我不告訴他們我與這個黨衛隊士兵之間是怎么回事，他們就會當場要我的命。我站在那里，堅持說我們之間什么事也沒有。”與此同時，溫施也被抓了起來，與海倫娜一樣，在遭到逼問時他一口咬定他們之間沒有任何關系。因此，在經過了五天的審問后，他們兩人都被釋放了。海倫娜遭到了進一步的“處罰”，被要求在“加拿大”營房的一個區域獨自工作，遠離其他女犯。溫施更加小心謹慎地處理他與海倫娜的關系，但如我們將在第六章中看到的，他還是繼續保護著海倫娜和她的姐姐，直到奧斯維辛解放。

海倫娜與溫施的故事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因為在奧斯維辛，有太多謀殺、偷盜和背叛，體現了人類最原始的殘忍特質，而關于愛的故事卻寥寥無幾。但在這樣的環境下，愛情竟可以在一個猶太女犯和一個黨衛隊守衛之間滋生，這實在令人不敢相信。如果這些事實被寫進一本小說中，讀者會認為這樣的情節太不可信，但在奧斯維辛發生的太多事情都會給人不真實的感覺。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段愛情生根發芽的過程中，環境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如果海倫娜還留在房屋拆除分隊工作，溫施幾乎不可能愛上她。他們沒有機會密切接觸，溫施也沒有機會保護她。而且相當重要的一點是，海倫娜根本不會有機會在溫施生日那天為他唱一首德語歌，讓他從此深深迷上自己。但在“加拿大”，黨衛隊與猶太女犯之間不但有接觸，還有發展長期關系的機會。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在“加拿大”工作的女犯幸存的比例比奧斯維辛其他任何地方都高。

當然，溫施與海倫娜的關系也說明，奧斯維辛的現狀與希姆萊對集中營的設想之間有多大差距。按照他對“腐敗”更寬泛的定義，溫施的做法也可以算作腐敗。1943年秋，黨衛隊上級突擊隊領袖康拉德·摩根到達奧斯維辛，力圖按照納粹領導人的構想“治理”這個地方。摩根的到來對奧斯維辛產生了巨大影響，因為他不是一名普通的黨衛隊軍官，而是黨衛隊后備隊的一名法官，同時是國家刑事警察局的地方預審法官。集中營里的腐敗行為與希姆萊在波茲南演說中宣稱的“我們從他們（即猶太人）那里什么也沒拿”形成巨大了反差，將摩根派到奧斯維辛，便是黨衛隊高層為調查這些腐敗行為而采取的種種措施之一。

奧斯卡·格倫寧和他的同事都很清楚摩根為何而來：“我猜腐敗行為越來越多，他們不能再視而不見，所以他們說：‘我們要遏制它，遏制這股腐敗之風。’”然而，所有人都不知道摩根對比克瑙黨衛隊兵營進行突擊搜查的具體時間。格倫寧從柏林回來后，發現“我的兩個同事被關進了監獄。他們在其中一個人的柜子里發現了幾支鋼筆和一罐沙丁魚，我不知道他們在另一個人的柜子里發現了什么，但那個人后來上吊自盡了。我的柜子是鎖著的”。

摩根和他的同事沒有打開格倫寧的柜子，他們堅持要在格倫寧本人在場時展開調查。對格倫寧來說這是莫大的幸事。柜子的正面被封條封了起來，以便看出它是否被打開過，但摩根沒有預料到格倫寧及他的同伴會想出下面這個辦法：“我們把柜子往前挪動，把柜子后面的板子卸掉——那個三合板很好卸。然后我們把可疑的香皂、牙膏等不該出現在里面的東西全部拿走，把板子安了回去，并用釘子釘死。接著我找到蓋世太保，說：‘請問，你們在搞什么？我沒法打開我的柜子。’他們說：‘好，我們需要先檢查一下。’他們來到我房間，撕掉封條，打開了柜子，什么都沒發現，他們拍拍我的肩膀說：‘沒事了。繼續保持。’”

格倫寧僥幸逃過了制裁，但摩根從其他人那里發現了大量證據，最終只能說明一個結論，那就是奧斯維辛的腐敗現象泛濫成災。“黨衛隊成員的行為完全不像一名軍人該有的樣子，”摩根后來證實道，“他們給人的印象就是一群墮落的、野蠻的寄生蟲。在對柜子進行搜查后，我們發現了大量黃金、珠寶、戒指以及各國的貨幣。有一兩個柜子里甚至還藏有從剛剛被屠宰的公牛身上割下來的牛鞭，用來增強性能力。我以前從沒見過這種東西。”[[19]](#_19__Jian_Konrad_MorgenYu_1962Ni)

比起財務上的腐敗，更讓黨衛隊總部擔憂的似乎是不該發生的性關系，而最令人震驚的是，指揮官魯道夫·霍斯本人也被牽扯了進來。摩根是個不肯善罷甘休的調查者，在一年多的時間里，他一直在搜集對霍斯的指控。1944年10月，摩根在慕尼黑的一個監獄醫院里對他最重要的證人進行了審問，這個人是曾關押在奧斯維辛的犯人，愛麗諾· 霍迪斯（Eleonore Hodys）。

霍迪斯是一名來自奧地利的政治犯，1942年3月隨最早的那批女犯到達奧斯維辛。由于霍迪斯屬于德意志帝國公民（Reichsdeutsche），她一到集中營就成了有特權的犯人，被選作霍斯家的傭人。1942年5月，霍斯趁妻子不在家，向霍迪斯調情并意圖親吻她。霍迪斯嚇壞了，跑到洗手間躲了起來。根據霍迪斯的證言，幾周后她被叫進房間，被霍斯的夫人開除。當時霍斯因騎馬出了意外，正在醫院養傷。可以合理地推測，霍斯夫人一定在懷疑霍迪斯與她丈夫之間有什么不正當關系。后來，霍迪斯被關了起來，但不是關在11號樓，而是關在辦公樓主樓地下室的一個特殊監獄里，這個監獄主要用來關押犯有重罪的黨衛隊士兵，把奧斯維辛的犯人關在這里非常奇怪。當然，霍迪斯不是普通的奧斯維辛犯人，她被送到這個黨衛隊監獄是有原因的。

霍迪斯對摩根說：“有一天晚上，我已經睡著了，他（指霍斯）突然出現在我的牢房里。我聽見他好像在說：‘噓！’然后他打開了手電筒，我看見了指揮官的臉。他坐在床邊，靠我越來越近，想要親我。我反抗的時候，他問我為什么這么拘謹。我回答說，因為他是指揮官，而且是個結了婚的男人。最后他離開了。”[[20]](#_20__Jian_Konrad_Morgen_1944Nian)在摩根的追問下，霍迪斯承認霍斯后來又在多個晚上來到她的牢房，“我們最后發生了關系。”為了避開守衛，霍斯并不是通過常規的路徑，也就是從他樓上的辦公室直接進入監獄，而是從他自己花園一個用作防空洞的地下通道來到主樓地下室。霍斯找到了通往霍迪斯牢房的秘密通道，也成功地讓她順從了自己的意愿，于是，在好幾個晚上，霍斯都與她發生了性行為。霍迪斯甚至說道，有一次警報響起時，指揮官正赤身裸體地躺在她床上，之后只好藏在牢房的角落里。

霍迪斯在黨衛隊監獄里關了幾周，之后被轉到了11號樓。但她的身體狀況發生了變化：她懷孕了。她說霍斯為了自保，逼她簽了一份聲明，承認自己與集中營里另一名犯人偷情。接下來的幾個月她都待在11號樓，一直想讓自己流產，卻沒有成功。等她被放回比克瑙的女犯營，才終于拿到了“一些東西”打掉胎兒。

霍迪斯對她與霍斯私通一事的講述有很多問題，其中一個重要問題，是她所說的一切都沒有第二個證人。但摩根似乎相信了她，而摩根又是有律師背景的。此外，編造與霍斯的關系對霍迪斯幾乎沒有任何好處，特別是考慮到摩根審問那時她已經離開奧斯維辛。霍斯從未承認過他與霍迪斯的事，但他說起他與妻子的關系時，曾給出前后矛盾的描述。在戰后的紐倫堡審判中，霍斯向美國官員吉爾伯特博士承認，他的妻子得知他在奧斯維辛的所作所為后就很少與他同床了。但在他的回憶錄中，他對他們的夫妻關系卻充滿溢美之詞，說她是他“夢寐以求”的女人。

摩根對霍斯與霍迪斯之間關系展開的調查沒有任何結果。訪問是在1944年10月進行的，當時紅軍正在逼近，顯然奧斯維辛不會存在太久了，事實上整個納粹國家都受到威脅。不管怎么說，摩根在前一年對集中營運作情況的初步調查已經造成了嚴重的后果：不光有黨衛隊士兵因腐敗行為被追究，而且人人聞之喪膽的11號樓其負責人馬克西米利安 ·格拉布納也被問責，因為他處決犯人事先沒有從柏林方面獲得相應的“許可”。這是奧斯維辛歷史上一件非常詭異的事。摩根無視發生在比克瑙毒氣室里的屠殺——按道理這種大規模屠殺才應得到上級的“許可”，卻對格拉布納提出指控，這聽起來十分荒唐。盡管如此，格拉布納還是遭到了審訊，他的辯解是霍斯曾“準許”他通過槍決的方式“清空”11號樓。霍斯本人從未遭到任何指控，幾乎可以肯定納粹高層中有一些他的支持者在保護著他，而沒有靠山的格拉布納被送上了黨衛隊法庭，此案最終不了了之。后來格拉布納在盟軍的法庭上被處以死刑，這回當然不是因為他違反了黨衛隊的規定，而是他在戰爭中犯下的罪行。

厘清摩根整個調查行動背后不同人的復雜動機并非易事。所有就此事提供證詞的關鍵人物——霍斯、格拉布納和摩根本人，在戰后講述這段歷史時都有自己想要達到的目的：格拉布納想要證明他的行動完全是霍斯授意的，摩根想把自己塑造成一個堅持不懈挖掘真相的人，霍斯則強調他心甘情愿地參與奧斯維辛滅絕行動的同時，始終遵照希姆萊聲明里所說的，“什么也沒拿”。不過，可以確定的是，摩根調查的一系列結果背后有黨衛隊內部政治因素的影響，至少在免去霍斯指揮官一職這個決定上是如此。1943年秋天，霍斯的解聘被偽裝成“晉升”，高層宣布要把他調至柏林集中營管理部門一個更高的職位上，但顯然他并不想去，因為這意味著他要離開留在奧斯維辛的家人，此外，馬丁·鮑曼（希特勒的黨內秘書，有很大權力）與希姆萊的通信表明，前者努力想幫霍斯保住工作，但希姆萊不肯讓步，堅持讓霍斯離開集中營。[[21]](#_21__Yu_Xiang_Xi_Le_Jie_MorgenDe)

霍斯在奧斯維辛最后的一個大動作，似乎是他做過的所有事情中最奇怪的，那就是建造一個與集中營現有環境格格不入的場所——妓院。它供被選中的犯人使用，建造地點選在了最顯眼的24號樓，緊挨著主營地寫有“勞動使人自由”的大門。不過，奧斯維辛并不是唯一一個有妓院的集中營，事實上，它是納粹國家中第五個提供此類“服務”的營地。希姆萊認為，在各個集中營里建造妓院有助于提高生產效率，因為如果“勤奮的”工人（除猶太人以外）能得到獎勵，他們會更努力地工作。早在1941年5月，希姆萊視察了奧地利的毛特豪森-古森集中營后，便下令建造妓院（1942年夏天開始投入使用）。接著，在1943年3月，希姆萊視察了布痕瓦爾德集中營，要求在那里和其他幾個營地建造妓院。1943年5月，希姆萊忠誠的總管奧斯瓦爾德·波爾向各個集中營指揮官下達了相關指令。[[22]](#_22__Xin_Xi_Lai_Yuan_Yu_Robert_S)

約瑟夫·帕欽斯基[[23]](#_23__BBCFang_Tan_1)是一名來自波蘭的政治犯，1943年夏天被關在24號樓。他第一次聽到這個消息時不禁哈哈大笑，但其實這不是笑話。他和其他犯人被轉移，在接下來的幾天里眼看著“一群木匠和磚瓦工”把營房空曠的一層改造成許多個小房間。“他們把房間漆成雅致的顏色，把床搬進去，甚至還掛上了窗簾。有一天我們收工后，注意到窗簾后面有女人的面孔。但他們不讓那些女人靠窗戶太近，也不讓我們往里看。”

幾天后，“歡愉小屋”正式迎來第一批客人，其中就包括帕欽斯基。“因為我來得比較早，我的卡波又有兩張（進入‘妓院’的）票，所以他就給了我一張。我打扮了一下，然后就過去了。”帕欽斯基發現，現場的軍事化管理讓整個流程非常高效：每個“顧客”首先要接受黨衛隊醫生的細致檢查，如果犯人通過了這一檢查，他們的手上會被蓋一個戳，然后被帶到位于24號樓一層的另一個房間。在這里，他們“抽簽決定”每個人將進入樓上的幾號房間（也就決定了分到哪個妓女），并決定他們上樓的順序。帕欽斯基記得他抽到的是“第二個，房間號是9”。每隔十五分鐘，鈴聲就會響起，以提醒每個妓女更換“顧客”。鈴聲剛一響，心急如焚的帕欽斯基就沖進了9號房間，結果看到前一位犯人正在穿褲子。但不幸的是，帕欽斯基后來“無法勃起”，因此在規定的時間里，他就坐在床上跟一個“優雅的、好看的女孩”聊天。

理夏德·達科[[24]](#_24__BBCFang_Tan_1)是另一個享受過妓院之“樂趣“的犯人。1943年，他25歲，是主營地的一名消防員。這是一份好差事，因為消防員可以相對自由地在奧斯維辛到處走動，很方便“順手牽羊 ”大量違禁品。此外，德國人很尊重消防員，達科認為這是因為消防員在德國本來就是個受人尊重的職業。奧斯維辛消防隊的成員拿到很多張集中營妓院入場券，達科自然欣然前往。他與一個名叫阿琳卡的女孩共度了一段美妙時光：“我盡可能地靠近她，想抱著她。距我被抓來已經過去三年半了，這三年半里我沒碰過一個女人。”根據達科的敘述，阿琳卡是個“非常好的女孩，她一點都不害羞，別人想要什么她都滿足”。

這些女人接客的房間如今還在，現在被用來存放檔案文件。每個房間的門上都有一個巨大的窺視孔，這著實出人意料。“他們（指黨衛隊）想要維持秩序”，理夏德·達科說，“以防有哪個犯人勒死里面的女孩之類的，所以他們會透過門上的洞往里看。它（同時還）滿足了男人的窺視癖。很多男人喜歡看別人做愛。”黨衛隊監視犯人做愛過程還有其他目的，首先是杜絕“變態”的性行為（按照約瑟夫· 帕欽斯基的說法，犯人做愛時只可以采用傳教士體位），此外還有防止兩人之間發展出親密關系（在有些集中營的妓院中，犯人甚至被禁止與女孩說話）。

但每天凌晨，黨衛隊對妓院的監管比較松弛，問題一般都出現在這個時候。達科記得一個犯人成功配了一把妓院的鑰匙，以便晚上去找他最喜歡的那個女孩，但其他犯人也有同樣的想法，因此一層的走廊上常常發生打斗。

奧斯維辛的犯人竟可以在黨衛隊建造的妓院里大打出手，乍聽起來這讓人難以相信，但它實際上說明了集中營的犯人當時已建立起明確的等級分化。正如約瑟夫·帕欽斯基所說，讓猶太人進入妓院是不可想象的，他們被視為犯人中的低等人，他們受到的虐待是一些波蘭或非猶太裔的德國犯人不會遭受的折磨。

納粹知道，一群特殊犯人的態度對于集中營的順利運轉會產生重要影響，這些人從事著相對有特權的工作，很多都是政治犯，在多年前就進入了集中營。一般來說，他們不需要像其他犯人那樣參與頻頻進行、冷酷無情的篩選過程。不過，德國人想找出一個更好的方法來激勵這100名左右的特別犯人，因此他們建造了一所妓院，并規定憑黨衛隊發放的入場券才能進入，這樣一來，優秀的表現可以得到獎勵，未來的努力也有了更大的動力。另一個可能的原因與集中營里泛濫的同性關系有關，約瑟夫·帕欽斯基也同意這種看法。他還記得犯人里的“大人物”會選出一些男孩做他們的私人仆從，而他們之間經常發展出同性關系。因此他認為，“納粹是想杜絕這種同性戀行為”才建造了妓院。

無疑，奧斯維辛妓院是個極其敏感的話題，其中最敏感的一點是“享用”妓院的犯人抱有的態度。大體上來說，他們似乎沒有絲毫道德困擾。妓院里的女人大部分是從比克瑙選出來的犯人（但其他集中營的妓院則不同，里面的女犯都是從拉文斯布呂克[Ravensbrück]集中營送過去的）。她們每天被迫要與大約六個男人發生性行為。這些女犯在奧斯維辛妓院里的經歷是集中營里不為人知的故事。她們的遭遇與遭到日軍折磨和性虐待的韓國“慰安婦”有一定相似之處，但這些女人與其說是被同情，不如說更多是被嫉妒。理夏德·達科說：“那些女孩受到非常好的待遇。她們有好吃的，可以散步，她們只不過要做她們該做的事。”

達科這句毫無同情心的“只不過要做她們該做的事”，可以充分說明外在環境對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產生的巨大影響。在奧斯維辛，折磨和殺戮是如此常見，乃至達科會認為妓院里的女人過的是一種“很好”的生活。當他身邊有太多苦難在發生時，他從沒想過“我應不應該和這些女人做愛？”相反，他想的完全是另外的東西，即他已經忍受了“三年半沒碰過一個女人”的生活，而改變這種狀況的機會終于來了。

奧斯維辛的妓院還帶來另一個問題：大屠殺的否認者和其他為納粹辯護的用妓院的存在來證明，奧斯維辛與常見史學著作所描繪的完全不同，如果再加上奧斯維辛主營地里所謂的“游泳池”，就更是如此。這個“游泳池”實際上是個蓄水池，消防員在上面搭了一個簡易的跳板，不過一部分犯人顯然可以在里面游泳。“奧斯維辛里有個給消防隊員用的泳池，”理夏德·達科證實道，“連我都可以在里面游泳。”這成了大屠殺否認者最愛亮出的王牌。“這像個滅絕營嗎？”他們說，“還有給犯人的游泳池？別開玩笑了！”然而，泳池與妓院實際上異曲同工，它們的存在并不能改變奧斯維辛是個屠殺中心這一毋庸置疑的事實，但它們再次證明了奧斯維辛集不同功能于一身的復雜特性。

正因為奧斯維辛各營地有著不同的等級結構和用途，大屠殺否認者才能夠找出一些所謂的反例進行辯駁。奧斯維辛不同地方的差別是巨大的，一邊是“游泳池”和妓院，另一邊是連兒童也不放過的焚尸場。這種復雜性讓奧斯維辛在1943年引起希姆萊的強烈興趣，又在今天成為大屠殺否認者關注的焦點。

1943年，在奧斯維辛不斷發展擴大的同時，萊因哈德行動滅絕營卻走向衰落。這一年的秋天，波蘭東部的索比堡滅絕營爆發了抵抗運動，這讓希姆萊更加確信，納粹滅絕計劃的執行以后要靠奧斯維辛。很重要的一點是，抵抗運動之所以能夠發生，恰恰是因為滅絕營守衛普遍存在著腐敗行為。索比堡是1942年5月展開屠殺行動的，截至1943年9月，已有25萬猶太人死在這里的毒氣室，他們中的大部分來自總督轄區。 托伊·布拉特便是從波蘭東部一個叫伊茲比卡（Izbica）的小鎮被送來的猶太人之一。關于他如何幸存下來、又在索比堡起義中扮演了何種角色的故事駭人聽聞，同時也引人深思。

托伊·布拉特生活的小鎮戰前約有3600名猶太人，小鎮居民并沒有表現出公開的反猶情緒，對在這里長大的托伊來說更是如此，因為他的父親曾效力于波蘭軍隊并在作戰時負傷，他們一家人在鎮上有一定的地位。但德軍到達后，托伊注意到變化馬上就出現了。“（波蘭）村民意識到猶太人是二等公民，想對他們干什么都可以。到最后，我的鄰居——那群基督徒比德國人更讓我害怕，因為德國人看不出來（我是猶太人），但我的鄰居知道。”

德國人對伊茲比卡猶太人的驅逐并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在數年時間里通過一系列“行動”進行的。納粹通常會在拂曉時分到達，帶走幾個猶太人。起初是把他們用作勞動力，但自1942年春天起，猶太人便直接被送進索比堡的毒氣室。在下一次“行動”以前，小鎮上剩下的猶太人不太需要東躲西藏，可以相對正常地生活。1943年4月，德國人終于要驅逐小鎮里所有猶太人了。托伊當時是個健康強壯的15歲男孩，他竭盡全力地想要逃跑。當他于大街小巷之間狂奔時，他看到了一位老同學雅內克，他是個信仰天主教的波蘭人。托伊大喊：“雅內克！救救我！”“沒問題！”雅內克回答道，“你去我們家不遠處的那個谷倉吧。”于是，托伊跑到谷倉門口，卻發現門上掛著一把大鎖。“我繞著谷倉走了一圈，這時一個小個子的波蘭女人朝我大喊：‘快跑啊，托伊，快跑！雅內克就要來啦！’雅內克要來我為什么要跑？他會幫我打開大門。但她為什么這么慌張？我轉過身，看見雅內克跟一個納粹一起走過來，那人手上的槍正對著我。雅內克對那個納粹說：‘這就是那個猶太人。’我說：‘雅內克，快跟他說你是開玩笑的！’雅內克說：‘他是個猶太人，把他帶走吧。’他跟我道別時說的話我到現在都不愿意再復述一遍……他說：‘再見了，托伊。下次見面時你就在肥皂店的架子上了。’他就是這么跟我道別的，因為有傳言說納粹會用人體做肥皂。”托伊怔怔地站在原地，不敢相信自己的朋友就這樣出賣了他。“（我）很害怕這是我生命的最后一天。當你還年輕，還只有十五歲的時候……你望著綠樹，望著鮮花，你想活下去。”[[25]](#_25__BBCFang_Tan___Ling_Jian_Tho)

托伊被帶到了小鎮的廣場上，他的父母和弟弟與其他幾百名猶太人已經在那里，周圍都是帶著槍的守衛。他們知道自己將被送向死亡，關于索比堡以及那里發生的事情有很多傳言，已經流傳了好幾個月。盡管如此，人們在這個美麗春日的下午三點鐘登上列車的時候，都還抱有希望：“當你失去了一切，什么都沒有了，剩下的就只有希望，希望會一直陪著你，直到最后那一刻……黑漆漆的車廂里，人們還在說：‘德國人不會殺了我們的，他們會把我們送去集中營。’”然而，列車繼續前行，開過了通往特拉夫尼基（Trawniki）工作營的那個轉彎，仍舊朝著索比堡的方向前進。這時，反抗的聲音出現了：“我聽見有人說：‘咱們應該跟他們戰斗！’我還聽見我父親那個年齡的人說：‘沒用的，不管怎么樣都是一死。’”

幾小時后，他們到達了索比堡。眼前的景象讓托伊吃了一驚：“在我的想象中，索比堡是燒死人、毒死人的地方，所以肯定跟地獄一樣。結果我看到的是漂亮的小房子，還看到了指揮官的別墅，別墅被漆成綠色的，還有一個小柵欄，種著花。另一邊有一個平臺，它被偽裝成一個列車站臺，那是用來騙荷蘭猶太人和法國猶太人的。他們不知道他們到了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么……但我們波蘭猶太人是知道的。”

這批犯人剛到就被分成了兩組，一組是女人和兒童，另一組是成年男人。15歲的托伊剛好處在兩組的分界線，但由于他長得結實強壯，他最終被分到了成年男人那一組：“我本來和母親在一起，于是我跟她道別，但我當時的所作所為讓我到今天還在后悔，這種悔恨大概到我死的那天也不會消失。其他人與他們的妻兒道別時挽著他們的胳膊，我卻沒有這樣做，我對我母親說：‘媽，你不讓我喝光牛奶，（而是讓我）留一些第二天喝。’語氣就像在責怪她。她說：‘你現在就想對我說這個嗎？’……事情的經過是，我們被送去索比堡的前一天，我很口渴，我問我媽：‘我能喝一點牛奶嗎？’她說：‘可以。’然后我就開始喝，但可能喝得太多了，她說：‘托伊，留點明天再喝。’在我母親要被送進毒氣室之前，我提醒她的就是這件事。”

一般來說，索比堡等萊因哈德行動營是不會對新到的犯人進行篩選的，全部犯人一律被送進毒氣室。但在極少數情況下，德國人需要從新到的猶太人當中選出少量的人在集中營里工作。托伊幸運地趕上了篩選。當他們站成一列，托伊意識到德國人可能會放過他們當中的一些人，或許是鞋匠或裁縫：“我什么手藝都不會，但我想活命，我向上帝祈禱——到了那個時候我還在祈禱。我對著這個德國人祈禱：‘選我吧！’……我仍然認為，他在我們這群人前面來回踱步時，不知怎么感知到了我強烈的意念，我感到他正在看我，于是我心里默念：‘老天幫幫我！’接著他說：‘出列，那個小家伙！’我很幸運，那個時候他們需要人。他們選出了大概四十個人。就這樣，我在索比堡又有了希望。”

托伊的父親和其他人被帶著朝毒氣室走去。他們離開時，托伊朝德國人大喊：“他是個皮匠！”然而，“他們需要木匠，可能還需要裁縫，但他們不需要他。”托伊承認，在他目送著自己的父親走向死亡時，“沒有任何感覺。我現在還在想這件事。你知道嗎，如果我父親或母親早幾天去世，比如兩天之前，那我會覺得痛苦萬分，我會白天黑夜地哭。但是在這個時候，我在同一個小時的同一分鐘，同時失去了我的父親、母親、我十歲的弟弟，可我卻沒有哭。我甚至都不會去想這件事。后來，我看了看（集中營里的）其他人，沒有人哭。我在想，或許是我有什么問題。戰爭結束后，我碰見別的幸存者，我問他們：‘你哭了嗎？’（他們回答：）‘沒有，我沒哭。’仿佛是本能在保護著我們，讓我們感覺不到真實的感情。想想看，如果我想到‘我的爸爸，我的父親和母親現在都在毒氣室里’，我肯定會崩潰，然后被殺死……如果我表現出任何哭過的跡象，我肯定會被殺死。”

篩選結束后不到一小時，托伊碰見了他的一位朋友尤澤克。尤澤克是跟隨前一批犯人到達索比堡的，他自己的父親在新到這批犯人之列，他沒進毒氣宮，因為他是個牙醫。尤澤克獲準跟著父親做他的“助手”。“我們在營房后面走著，我看見有人在拉小提琴，有人在吹口琴，還有兩個人在跳舞。我說：‘尤澤克，我不明白。你在一個滅絕營里，你怎么做得出那些事？怎么還能跳舞？’他說：‘托伊，我們活一天就賺一天，大家都會死的，這里就是終點。你看見那股煙了嗎？你的爸爸、弟弟、媽媽都變成那股煙了。咱們也會變成那股煙的。所以有什么分別呢？難道要戴上黑紗嗎？那咱們連一天都活不了！’”

從很多方面來看，托伊此時在索比堡的境況都與在奧斯維辛“加拿大”工作的犯人相似。他們都能獲得食物——大部分來自被毒死的猶太人；索比堡的工人也可以留著頭發，穿著日常的衣服。但與“加拿大”的工人不同的是，在索比堡工作的犯人與滅絕營里發生的屠殺有著密切的、甚至是直接的接觸。

托伊·布拉特很快就明白了自己在這個過程中扮演著什么樣的角色：“一批荷蘭猶太人到了索比堡，大概有3000個人。火車大約分成8到10個車廂，沿著一條專門的岔道開進了索比堡。一群車站分隊（Bahnhof Commando）的猶太犯人打開車門，拿走大件行李。我和其他年輕人站在一起，用荷蘭語大喊著讓他們留下行李。女人們本來都拎著包，我們讓她們都扔到一邊。就在這個時候，我注意到她們眼睛里有種特殊的焦慮。她們害怕了。有些人不愿意留下包，德國人就用鞭子抽她們。這些人被直接帶進了一個大院子里，一個被我們稱為‘死亡天使’的德國人和善地對她們說話。他先是為從荷蘭到這里的三天旅程道歉，然后他說她們現在到了一個美麗的地方，因為索比堡永遠都這么美麗。他接著說：‘出于衛生的考慮，你們需要沖個澡，過一會兒你們就會接到命令離開這里。’然后人們都鼓掌歡呼：‘太好了！’她們乖乖脫光衣服，穿過了一個大約60米長的大房間，走進一間營房。我又有任務了，我會在那里等她們。接著，女人們走進來，她們身上什么都沒穿。有小女孩，有少女，也有上了年紀的老太太。我是個羞澀的男孩，不知道該往哪兒看。他們給了我一把長剪子，但我不知道要用它干什么。于是我的朋友——他已經去過好多次了，他對我說：‘剪頭發，你要把頭發剪得特別短。’但她們都求我留一點頭發，特別是年輕女孩都在求我不要剪太多。她們不知道過不了幾分鐘她們就都死了。接下來她們要從營地走進毒氣室，只有幾步（遠）。他們這招太厲害了，我敢肯定她們走進毒氣室，發現噴出來的是氣體不是水的時候，大概都以為出了什么故障。”

托伊·布拉特所參與的屠殺過程極其高效，經過了精心的設計來防止意外情況的發生，因此，3000人從到達車站、交出物品、脫去衣服，到全部被殺死，只需要不到兩小時的時間。“等到一切工作都做完，我們把她們從毒氣室抬出來準備焚燒的時候，我記得我當時在想，這是個美麗的夜晚，（有）好多星星，那么安靜……3000個人死了，什么都沒變，星星還在原來的位置。”

荷蘭猶太人到達索比堡時，對這個營地的真實用途一無所知，他們毫無反抗地被騙進了毒氣室。但波蘭猶太人則不同，他們中的大部分人不相信這里只是個“衛生站”。“你怎么做得出來？”一個波蘭中年婦女在托伊給她剪頭發時質問他道，“他們也會殺了你的。你也會有那么一天的！”他什么也沒說，但一直記著她的話，“就像一句詛咒”。“我全部的念想都在怎么活著、到底該如何活下去上面。我知道我也會死，但我現在還活著，我不想今天就死。第二天來了，我也不想那天就死。”

托伊當然明白，無論他自己多么不情愿，他都在協助納粹管理著這個滅絕營。不難發現，剪頭發、整理衣服、從火車上搬行李、打掃營地——所有這些維持索比堡正常運轉的實務性工作都是由猶太人完成的。“是的，我想過這個問題，”他說，“但沒人做什么。（我只有）15歲，身邊都是成年人，但沒有人做任何事。人會隨著環境的變化而變化。人們問我：‘你學到了什么？’我想我只能確定一件事：沒人真正了解自己。你在大街上遇見一個和善的人，你問他：‘北街怎么走？’他陪你走了半個街區，給你指路，態度親切。可是在另一種環境下，同一個人可能變成最可怕的虐待狂。沒人了解自己。每個人都可能在這些（不同的）環境之下變成好人或壞人。有的時候，碰上對我特別和善的人，我忍不住會想：要是把他放在索比堡，他會變成什么樣呢？”

許多在集中營里生活過的人都同意托伊·布拉特的觀點，即人會因環境的變化而改變。這里說的并不是人會依據不同情景調整自己的行為這套老生常談，因為我們在生活中都會這樣做。顯然，一個人在搖滾音樂會上與在葬禮上的舉止是完全不同的。但托伊·布拉特指的是在極端環境下一個人的徹底改變，這不單單體現在行為上——雖然也有行為的變化，但更多是深層的性格變化。托伊等人在集中營里得出的結論可以用一個比喻來形容：人類如同根據溫度而改變的物質，就像水只有在一定溫度范圍內才是水，在其他溫度下會變成蒸汽或冰，人類在極其迥異的環境下也會變成不同的人。

托伊的結論最令人不安的一點是，依據我的經驗，許多行兇者都符合這種情況。還記得我追問一名當年十分忠誠的納粹黨黨員，問他為什么有那么多人支持這個恐怖的政權，他有些惱羞成怒：“當今世界的一個問題，是從來沒有經受過考驗的人到處去對那些經受考驗的人品頭論足！”這個觀點無疑會得到托伊·布拉特的認同。

當然，這并不是說集中營里的人在性格上出現的巨大變化一定是負面的。在任何環境下都存在著不同選項，有些人做出的選擇令人欽佩，托伊·布拉特便見過一例：一次，托伊被安排到一條沙土路上用耙子耙土，這條路連通著毒氣室與營地外圍地帶。“我發現無論你怎么耙，還是有小粒的東西（留）在土里。我問朋友：‘這是什么？’他說：‘是錢。’我當時覺得很吃驚。這些人已經知道他們馬上就要被殺死，他們手上還留著這幾美元或幾盧布。當他們意識到他們的人生已經走到終點時，他們花時間把所有錢（撕碎），不讓敵人拿（這些錢）去用。我覺得這是一種英雄主義，精神上的英雄主義。”

要想籌劃更激烈的抵抗運動，也就是對德國人的真正反擊，托伊·布拉特還需要克服一種情感，他把它稱為“反向的種族主義”。他第一次看到頭戴鋼盔、身穿漂亮制服的德國士兵時，就覺得他們是“更好的”人。“而另一方面，我看見猶太人和波蘭人擔驚受怕，東躲西藏，到處逃竄。”這種態度正是德國人想要在被他們壓迫的人中間建立的。這也是門格勒博士出現在奧斯維辛坡道上時一定會穿上他帥氣的黨衛隊制服、把靴子擦得锃亮的原因之一。德國人想要制造出一個自證預言，即他們所打壓的對象是低等人，而他們則有著優等民族的衣著打扮和言行舉止，他們想迫使敵人相信納粹確實高人一等。

考慮到這一背景，不難理解為什么直到一群不太受托伊·布拉特所說的“反向的種族主義”影響的猶太犯人——曾經的蘇聯紅軍戰士到達索比堡以后，激烈的反抗行動才開始醞釀。“我們是1943年9月21號或22號到達的索比堡，”阿爾卡季·魏斯帕皮爾[[26]](#_26__BBCFang_Tan_2)說，他是一名蘇聯戰俘，從明斯克被遣送到索比堡。“我們在上了鎖的車廂里困了三天，那是一節運牲畜的車廂。三天里我們什么都沒吃，也沒見過光。”幸運的是，納粹決定從這批犯人中選出一些勞工。“他們問有沒有人是木匠或者建筑師，”魏斯帕皮爾說，“還問我們有沒有人扛得動75公斤重的東西。”在進行篩選時，這些蘇聯戰俘都不知道營地的真實用途是什么。“我們不知道正在發生什么事，還以為這里是個勞動營。但到了晚上，一些老犯人過來跟我們說：‘你們的朋友被火化了。’這時我們才明白這是個什么營地。”

大約有80名蘇聯戰俘被選為勞工，其中有一位極具個人魅力的前紅軍中尉，名叫亞歷山大（薩沙）·佩切爾斯基。“他是個非常英俊的人，”魏斯帕皮爾說，“長得高大魁梧。大家都特別尊敬他，他的每句話對我們來說都是命令。”佩切爾斯基馬上對營地產生了巨大影響，并很快成為一個地下反抗組織的領軍人物。在蘇聯戰俘到達營地之前，曾有一些犯人嘗試過越獄，他們通常是趁著在鐵絲網之外工作的時機逃跑，但絕大多數都以失敗告終。“等你終于跑進了樹林以后，你還能往哪兒跑呢？”托伊·布拉特說，“基本上每天都有住在附近的農民押著猶太人回來，他們發現這些人躲在田里的某個地方。”送回猶太人可以換來“五磅白糖和一瓶伏特加”。佩切爾斯基和他的戰友改變了營地里的犯人普遍持有的這種聽天由命的態度，他們與萊昂· 費爾德亨德勒（在蘇聯戰俘到來之前他是索比堡一個小型地下組織的領導人）一起組織了一次大規模越獄。

到達索比堡僅兩周之后，蘇聯戰俘便開始挖掘逃跑用的地道，但沒過幾天地道就被水淹了，于是他們放棄了這個方案。佩切爾斯基很清楚，無論用何種方法，都不太可能讓索比堡600多名犯人在同一個晚上匍匐著爬出營地而不出任何事故。他很快認識到，一次成功的大規模越獄只能通過武裝反抗來實現。佩切爾斯基還想到，犯人們最好盡早行動。幾星期后就會迎來第一場降雪，到時德國人將很容易追蹤逃到樹林里的犯人。因此，在接下來的幾天里，在幾位關鍵卡波的參與下，一個方案漸漸成形。“第一階段的任務是收集武器，”托伊·布拉特說，“比如刀和斧子，很多木匠在他們工作的地方都有工具。”第二階段是把德國人“引誘”到營地的僻靜角落，殺掉他們后偷走他們的槍。第三階段，也是最后一個階段，便是公開的起義。

10月的第二周，地下組織得知，索比堡幾個最重要的德國人都回德國休假了，其中包括軍士長之一瓦格納，因此營地里的德國人比平時又少了一些。地下組織成員打算以“給你好處”為誘餌把剩下的德國人騙到裁縫或鞋匠的工作間，于是整個反抗行動成功與否就看營地守衛手腳有多不干凈了。佩切爾斯基命令魏斯帕皮爾藏在營地中的一個鞋匠工作間里，等到德國守衛過來試新鞋時就一斧子將他砍死。“我很激動，”魏斯帕皮爾說，“大家都明白，成敗在此一舉。”另一些德國人以為自己將得到一件新皮衣，他們被騙到裁縫室殺死。接下來，犯人們打算從正門逃跑，他們賭了一把，看很聽德國人話的烏克蘭守衛會不會因為缺乏足夠的彈藥和動力而不對他們進行阻攔。

起義發生在10月14日。下午3點半，魏斯帕皮爾和來自明斯克的一位猶太同鄉耶胡達· 萊納一起藏在鞋匠的小屋中。“一個德國人進來試鞋。他在我面前坐了下來，我一步上前用斧子朝他砍過去。我不知道應該用斧子后部，而是用了刀刃。我們把他拖走，在他身上蓋了一塊布。然后另一個德國人走進來，他走到尸體前，用腳踢了一下，然后說：‘這是什么？這里怎么一團亂？’接著他明白過來（發生了什么），所以我也用斧子砍了他。我們拿走了他們的槍然后逃跑。后來我一直在發抖，很長時間都平靜不下來。我覺得很惡心，我被濺了一身血。”

萊納和魏斯帕皮爾在鞋匠的工作間殺死了兩個德國人，另有三個黨衛隊士兵死在裁縫室，其他沒能被成功引誘出來的德國人在他們的辦公室里被殺。到了下午5點，集中營內大部分黨衛隊看守都已經被殺死，一共有9人。但令人擔心的是，指揮官還活著。犯人們開始像往常一樣聚集在一起準備點名。托伊·布拉特說：“但是到了5點45分，薩沙（佩切爾斯基）跳上桌子，發表了一番演講，演講內容我到今天都還記得。他講到了他的祖國蘇聯，講到有一天這一切都會改變，和平將會到來，還說如果有人能活下來，那他的責任就是告訴全世界這里發生了什么。”

接著，犯人們按計劃朝大門走去。突然之間，子彈從瞭望塔那里射向他們，指揮官弗倫策爾也從一個營房里走出來朝他們開槍。顯然，從正門逃跑是不可能了，于是犯人們嘗試破壞集中營后面帶刺的鐵絲網，盡管外面就是雷區。正當托伊·布拉特在槍林彈雨中與鐵絲網較勁時，他突然感到整個鐵絲網倒了，把他壓在下面。“我第一個念頭就是，我完蛋了！人們踩著我過去，鐵絲網上的刺扎進我的外套。但最后我靈機一動，把皮衣脫了下來讓它掛在鐵絲網上，自己爬了出去。我開始跑起來。我跌倒了大概兩三次，每次都以為自己被打中了，但我站起來以后又發現什么事也沒有。我終于（跑）到了樹林里。”在逃跑過程中，托伊·布拉特看到地雷“把人炸飛”，才意識到落在后頭離開營地其實是件“幸事”。

那天，索比堡的600名犯人中大約有一半成功出逃。托伊·布拉特認為，成功的最關鍵因素是：“他們（德國人）不把我們當人看，沒料到我們會采取行動。他們覺得我們都是垃圾。他們沒想到猶太人面對死亡（已經做好了準備），因為已經有幾千個猶太人白白送了命。”而在阿爾卡季·魏斯帕皮爾看來，越獄的另一個必要條件是蘇聯戰俘的到來，面對營地里的艱難處境，他們團結在一起。重要的是，這些蘇聯戰俘采取行動時，距他們到達營地還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雖然他們也曾被關押在德國其他集中營，但他們在索比堡所遭受的恐怖體驗是前所未有的，因此他們有機會對眼前的駭人景象迅速做出反抗。他們嚴格的軍紀再加上薩沙· 佩切爾斯基非凡的個人魅力，共同保證了反抗行動的成功。

逃離索比堡的300名犯人大都沒能活到戰后。很多人四處游蕩，在樹林里迷了路，幾小時后就被抓捕。還有一些人被波蘭人交給了德國人。薩沙· 佩切爾斯基和他的幾個戰友碰到了支持紅軍的人，并最終與行進中的蘇聯部隊會合。托伊·布拉特后來遇到了一系列險阻，多次僥幸逃脫。有些波蘭人向他伸出援手，也有一些出賣了他。戰后他決定在美國開始新的生活。

希姆萊對索比堡反抗行動極為關注，這次行動后，他下令屠殺特拉夫尼基、波尼亞托瓦（Poniatowa）和馬伊達內克三個集中營里的猶太人。屠戮于11月3日開始進行，是納粹“最終解決”歷史上最血腥的屠殺。這次被納粹稱為“豐收節”的行動造成大約4.3萬人喪生。這一行動充分說明，先進的技術手段在大規模屠殺中并不是必不可少的，在馬伊達內克，一天之內就有1.7萬名猶太人死在納粹的槍口下。

1943年11月的“豐收節”屠殺，恰逢納粹“最終解決”的實施目的（raison d’être）發生轉變的時期。1941年秋天和1942年春天的滅絕行動，至少有一部分目的是為東部德意志新帝國騰出更多“空間”，但到了1943年冬，納粹明顯將要輸掉戰爭，于是另一個目的出現了：報復。此時，納粹對猶太人的屠殺主要是為了確保他們最大的敵人不會從戰爭中獲益，無論戰爭的結局如何。當然，在納粹“最終解決”方案的籌劃和執行過程中，意識形態因素始終存在，將西歐猶太人也納入到納粹的大規模屠殺計劃中就表明，追求經濟利益和創造“空間”絕不是納粹犯下這樁罪行的全部動因。但到了這個時候，第三帝國的領導人在東部建立“納粹新秩序”的夢想已經破滅，他們是出于純粹的仇恨對猶太人展開大屠殺，以此尋求安慰。

然而在不受他們直接管轄的區域，德國人執行“最終解決”遇到了越來越多的困難。保加利亞政府此前曾交出11000名猶太人，這些人都來自色雷斯和馬其頓兩個淪陷區，最終在特雷布林卡遇害。1943年，保加利亞人多次抗議將猶太人驅逐出保加利亞的做法。羅馬尼亞領導人揚·安東內斯庫曾在比薩拉比亞、德涅斯特河沿岸和布科維納（Bukovina）參與過破壞猶太人社區的行動，但現在也拒絕將羅馬尼亞剩下的猶太人送進貝爾賽克的毒氣室。在意大利也是：雖然墨索里尼曾經實行過各種反猶措施，但他一直拒絕交出意大利的猶太人。[[27]](#_27__1943Nian_7Yue__Mo_Suo_Li_Ni)納粹之前的許多盟友現在都意識到自己支持的不再是將要獲勝的一方，他們曾幫助納粹迫害猶太人，是因為他們覺得這樣做對自己有好處，現在情況變了，他們開始拒絕推行反猶政策。他們的轉變主要是為了自身利益，而不是出于道德上的覺醒。

在所有曾被德國人占領的國家中，只有一個沒有因參與“最終解決”而留下道德污點，這個國家就是丹麥。在丹麥人的共同努力下，全國95%的猶太人免遭落入德國人之手的下場。丹麥人拯救猶太人的故事動人心弦，也令人振奮，細想之下，這些故事背后還有著更復雜的深意。

1940年4月9日德國人攻占丹麥。從一開始就可以明顯看出，德國人對丹麥的占領方式與對歐洲其他國家有很大差別。丹麥的主要機構（包括君主、議會和警察）大都維持不變，納粹也沒有像在其他地方那樣，強迫丹麥人頒布任何反猶法規。在丹麥政府看來，8000名猶太人是丹麥的合法公民，這一點不會改變。“我們沒有任何歧視，”克努茲·迪比[[28]](#_28__BBCFang_Tan)說道，他當時是丹麥的一名警察，“猶太人已經完全同化了。他們從事的職業、住的房子都和其他人一樣。我敢肯定在丹麥和猶太人通婚的人很多。我家就有個親戚娶了個猶太女演員。”甚至那些在納粹占領區堅持自己宗教信仰的猶太人也沒有遇到太多麻煩。本特·梅爾希奧[[29]](#_29__BBCFang_Tan_1)當時是個學生，他原本對德國人的到來頗為擔心，因為他的父親是一位拉比，曾公開反對納粹。但后來什么壞事也沒發生。“我們去上學、去教堂、去參加文化活動，一切照常。”

本特·梅爾希奧講述的故事可以說明丹麥社會對猶太人的接受度。本特的父親寫了一本小書，是對《摩西五經》的評注。由于對所有丹麥人來說，表達愛國之情的最好對象便是丹麥國王，他決定把一冊書進行特殊的裝訂，作為禮物送給他的君主。1941年的最后一天，本特的姐姐被吩咐把書送到位于哥本哈根的皇宮。她朝大門走去時，正好碰到王后走出來，王后看見她以后問：“這是給我丈夫的嗎？”他姐姐回答：“是的，陛下。”王后拿走了書。當天晚上，丹麥國王克里斯蒂安十世連夜寫了一封感謝信給本特的父親，向他及整個猶太人社區問好。“我們是1942年1月1日收到的信，”本特·梅爾希奧說，“這給整個社區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竟然會親自回復一個送他書的小拉比。”

考慮到納粹在歐洲其他地方展開的反猶屠殺，很難想象他們會允許一個國家對猶太人的接受度如此之高，但納粹對丹麥的態度其實非常微妙。首先，他們希望確保這個國家向德國輸送的糧食供給不受影響；其次，他們意識到，以這種“理想的”方式占領一個“雅利安”同胞的國家具有積極的宣傳意義；最后，和平的丹麥幾乎不需要多少德國士兵駐扎在此地進行管理，這也可以給他們帶來好處。然而，這種態度在1943年秋發生了改變。在斯大林格勒戰役中失利的德國軍隊全面撤退，此后丹麥爆發了多起反抗行動，并進一步引發了一系列罷工。德國人堅持鎮壓這些行動，但丹麥政府拒絕配合。因此，8月29日，德國奪取了丹麥政權。

德國駐丹麥全權代表維爾納·貝斯特博士（Dr Werner Best），此刻面臨著一種兩難處境，不知該如何處置丹麥的猶太人。從貝斯特的背景來看，很難認為他會采取同情的態度。他早年是一名律師，1930年加入納粹黨，第二年加入黨衛隊，此后一直擔任蓋世太保的法律顧問，并直接為萊因哈德·海德里希工作。在帝國安全辦公室工作期間，他參與了對波蘭知識分子的迫害，隨后他到法國任職，直接參與對法國猶太人的鎮壓。而現在，這個忠誠的納粹分子卻做了一件與他一貫風格完全相悖的事：他通過中間人向丹麥猶太人透露了將要展開的抓捕。

按計劃，抓捕行動將于1943年10月1日夜間至2日凌晨進行。就在預定日期的前幾天，貝斯特與德國海軍武官格奧爾格·杜克維茨（Georg Duckwitz）開了一個會，將突襲的安排告訴了他。大家都知道杜克維茨很同情丹麥人，因此貝斯特幾乎可以確定，杜克維茨一定會把這個消息透露給丹麥政治家，而他們一定會提醒猶太人社區的領導人。事實也確實如此。

“那是一個星期二（9月28日）的晚上，”本特·梅爾希奧說，“一個女人來到我們家，說要跟我父親談一下，還說這周五晚上會有抓捕行動。”第二天是個猶太教節日，因此一大早來到教堂的人比往常都多。本特的父親起身發言：“我父親中止了禮拜活動，告訴大家這件事非常重要，然后轉述了他聽到的消息。‘周五晚上不要待在家里。’他還說第二天教堂的禮拜活動也取消。但這樣還不夠，在場的每個人走出教堂后都需要再轉告他們的親朋好友，并告訴那些落單的人，總之想辦法通知盡可能多的人。”

大出逃發生在當天、也就是9月29日那天晚些時候。魯迪·比爾[[30]](#_30__BBCFang_Tan_1)和他的家人也在逃亡的隊伍中。他們走出哥本哈根大概10英里遠，住在魯迪父親的生意伙伴家中。“他們是非常好的一家人，有三個女兒，比我們稍大一點。他們住在一棟別墅里，有個花園，我們沒有花園，因為我們住在公寓里。他們把我們照顧得非常好。”

就在比爾一家在哥本哈根外的新住所安頓下來的同時，丹麥警方也得知了猶太人馬上要被驅逐的消息。“聽到這個消息時我正在警察局，”克努茲·迪比說，“我的一個同事說，他的猶太鄰居、一個叫雅各布森的商人找到了他。他和他們全家都特別緊張，希望我同事能幫幫他們。”迪比和他的同事們馬上決定為丹麥猶太人提供幫助。與納粹占領的其他國家（如法國和斯洛伐克）的警察所采取的行動相比，這些丹麥警察的做法更顯可貴。迪比自告奮勇幫雅各布森一家安排了出逃方案，即從丹麥和中立的瑞典之間的海峽逃走。“我們讓他們乘有軌電車或當地的火車去哥本哈根東部的港口車站，從那里搭出租車到港口。出租車司機知道是怎么回事，但還是幫了很大忙，甚至有人都沒要車費。到了港口，我們藏在德國人用來放漁網和工具的棚子里。”

等猶太人都藏好了，克努茲·迪比出去找漁民，看有沒有人愿意冒險在夜里帶他們穿過海峽。“我告訴漁民我們有幾個人，得求他們，還要借錢付給他們，要盡可多借些錢，好讓所有人都能上船。”這是一段異常艱辛的旅程：“有一次我帶著三個猶太男人，結果一艘德國巡邏艦突然朝我們開過來。我們跳進一條深溝里藏了起來，直到聽見德國人離開才出來。那一次我已經做好了開槍的準備，我肯定會保護我們四個人……我不想被抓起來送進集中營。”

幫助猶太人逃跑的不光有丹麥警察，還有其他許多機構的工作人員，比如丹麥的海岸警備隊隊員，當數不清的小船在深夜離開港口時，他們掉轉過頭假裝沒看見；再比如支持猶太人逃亡的神職人員：10月3日，丹麥各個教堂都宣讀了哥本哈根大主教的聲明，這一聲明直截了當地明確了教會的立場：“無論猶太人在何處因種族或宗教原因遭到迫害，基督教教堂都有責任反抗這種迫害……雖然我們有著不同的宗教觀念，但我們應該為猶太兄弟姐妹的自由抗爭到底，因為我們自己也把自由視為比生命還可貴的東西。”[[31]](#_31__Yin_Zi_Michael_Mogensen__Zh)

與此同時，魯迪·比爾一家覺得繼續住在國內的朋友家已經不再安全，他們也前往瑞典：“我們需要穿過哥本哈根市中心，在那里我們有一些不愉快的經歷。一個司機拐錯了彎，恰巧就在德國總部大樓前停了下來。一時之間我們有點害怕，不過他掉了頭，找對了路，我們就開走了。”比爾一家坐著車出了哥本哈根，又向南開了25英里，終于到達瑞典與丹麥距離最遠的一個地點，因為他們的保護人認為要穿越邊境，這里是最安全的。兩艘大船停在離海岸線不遠的地方，每艘船都可以容納200人。比爾一家劃著小船靠近其中一艘大船。當天晚上大約11點，他們的船啟程了。“我們站在甲板上，”魯迪回憶道，“我最小的弟弟妹妹們被喂了少量安眠藥，好讓他們不要哭鬧，他們一路都在睡覺。”幾個小時過去，什么也沒有發生，他們順利到達瑞典：“我們踏上瑞典的海岸線，發現這里非常不一樣。在丹麥晚上有燈火管制，但在瑞典大街小巷都亮著燈。當地人非常友好地接納了我們。人們唱起了歌——瑞典和丹麥的國歌，大家特別高興，眼下終于沒有什么危險了。”瑞典人傾盡全力地為這些猶太人提供幫助，他們派出亮著燈的小船，確保逃亡者可以安全上岸，并于10月2日在廣播中宣布，他們歡迎所有來瑞典的丹麥猶太人。

與魯迪·比爾有著類似經歷的人不在少數。絕大多數丹麥猶太人都成功逃到了瑞典。在10月1日晚的圍捕行動中，德國人只抓到284名猶太人，在之后的幾周里，他們又逮捕了不到200名在逃往瑞典途中的猶太人。丹麥總共有8000名猶太人，只有不到500人被抓捕并被驅逐，重要的是，這些人也沒有被送去奧斯維辛，而是送到了捷克斯洛伐克的特萊西恩施塔特。那里的生活雖然窘迫，但至少沒有篩選，也沒有系統化的屠殺。在被驅逐的丹麥猶太人當中，超過五分之四的人在戰后回到了家園。[[32]](#_32__Yin_Zi_Mogensen__Zheng_Jiu)

講到被驅逐的經歷，我們已經聽過太多關于背叛和報復的故事，因此丹麥猶太人獲救的經過無疑令人格外欣慰。然而，德國人在抓捕和驅逐丹麥猶太人時模棱兩可的態度也意味著，這個故事在為人稱道的同時，并不像表面看起來那么簡單。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在于維爾納·貝斯特令人捉摸不透的態度——他不僅通過中間人間接提醒了丹麥猶太人，在組織抓捕行動時也明顯沒有盡力。德國安全部門有一小部分人確實在賣力地工作，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便是漢斯·尤內爾（Hans Junl，“蓋世太保尤內爾”）在埃爾西諾（Elsinore）抓捕猶太人的行動，但大多數德國人似乎沒有這么認真。魯迪·比爾說：“我一直都認為，如果德國人想阻止我們，他們可以輕而易舉地做到，因為丹麥和瑞典之間的水域不寬，也不太長，如果他們派出四五艘魚雷艇，那整個逃亡行動就泡湯了。”但德軍的海上巡邏艦沒有攔下一艘逃亡的小船。

從維爾納·貝斯特10月5日交給柏林的一份報告中，我們可以找到一些線索來解釋。“丹麥‘猶太行動’（Judenaktion）的目標是讓這個國家中不再有猶太人，而不是要成功殺死多少猶太人，因此可以論定，‘猶太行動’已經實現了它的目標。”[[33]](#_33__Yin_Zi_Mogensen__Zheng_Jiu)在這里貝斯特強調了自己的功勞，因為他在最大限度地維護納粹統治的同時，讓丹麥成了“沒有猶太人”的國家。猶太人逃到了一個安全的地方，而不是被抓起來，對他有個很實際的好處：丹麥政府未來將更容易合作。

近期有學者提出了另一個問題，質疑與丹麥猶太人有關的傳統歷史觀，那就是拯救行動中的“利他主義”。舉例來說，第一批逃亡的猶太人很多都給了漁民大量的錢。“很遺憾，一些逃亡的人不得不花點錢以便盡快上船，”克努茲·迪比說，“漁民實際上是很窮的一群人，他們掙的錢很少。我敢肯定有的人希望賺些額外收入。”但丹麥漁民的做法難道是毫無道理的嗎？他們冒著丟掉飯碗（在他們看來甚至可能是丟掉性命）的巨大風險幫助猶太人逃脫。他們在可以收費的時候收了，這樣做是錯的嗎？特別是在前幾次的行動中，誰也不知道德國巡邏艦是不是正在對岸等著攔截他們。從這個角度來看，如果無論逃難者出多高的價錢丹麥漁民都拒絕冒險，那才是最該受到譴責的做法。而且重要的是，沒有一個丹麥猶太人因為交不出錢而被扔下不管。

當然，丹麥人拯救行動的成功也受益于一些不受他們控制的外在因素，地理位置便是其中之一，因為丹麥附近有一個中立國，而荷蘭或比利時則沒有。其次，截至1943年夏天，德國人對丹麥的統治都相對寬松，這意味著警察、海岸警衛隊等關鍵組織受納粹控制的程度相對較小。第三個因素是納粹迫害丹麥猶太人的時間點。前面已經說過，到了1943年秋天，明顯可以看出德國人快要輸掉戰爭，因此丹麥人知道，幫助猶太人是將要獲勝的一方所希望的。最后，相當重要的一點是，納粹對丹麥的統治從來沒有過于嚴酷，完全不同于波蘭等國家，如果納粹對丹麥猶太人以及幫助他們的人的迫害像在波蘭那樣殘忍，不知道丹麥人還會不會伸出援手。一方面，我們不該通過這個故事就認定丹麥人比別的民族都更有同情心，因為至少在20世紀30年代，丹麥人并不愿意接收從德國逃過來的大批猶太人，但另一方面，一些人認為丹麥人的高尚只是相對的，可他們經常忘了，即使是在1940年和1941年，德國人看似會贏得戰爭的時候，丹麥人也堅守住了道德原則，沒有迫害過猶太人，哪怕這種做法肯定會讓他們的納粹統治者非常高興。

我們也不該因為知道貝斯特讓大量丹麥猶太人逃跑的背后有他自己的政治考量，就否認其他丹麥人的救援行動所具有的道德價值。重要的是，丹麥人團結在一起反對驅逐行動時，沒人知道貝斯特是怎么想的。每個為猶太人提供幫助的人在那時都以為他們的做法違背了德國人的意愿，并且可能會給自己惹上很大麻煩。因此克努茲·迪比才會說：“丹麥人所做的一切都是發自內心的，是出于真正的友愛。那單純是一種博愛的情懷，是善良和尊重。全歐洲的人本來都應該和他們一樣。”這個觀點讓人難以反駁。1944年的春夏，歐洲另一個國家與丹麥人的英勇行為形成了極其鮮明的對比。奧斯維辛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屠殺，就發生在這一年。

[[1]](#filepos493696) 見Yitzhak Arad，《貝爾賽克、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萊因哈德行動中的滅絕營》，第165頁。

[[2]](#filepos494195) 值得注意的是，對納粹來說，由于波蘭已經不復存在，華沙也不再是首都了。

[[3]](#filepos495551) BBC訪談。

[[4]](#filepos506294) 《奧斯維辛1940—1945》，第一卷，第103頁。

[[5]](#filepos506718) Strzelecka和Setkiewicz，“集中營及其子營地的建造、擴大和發展”（The Construction, Expans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amp and Its Branches），載于《奧斯維辛1940—1945》，第一卷，第104頁。

[[6]](#filepos506935) Franciszek Piper，“對苦役犯的剝削”（The Exploitation of Prisoner Labour），載于《奧斯維辛1940—1945》，第二卷，第104頁。

[[7]](#filepos507262) BBC訪談。

[[8]](#filepos509446) BBC訪談。

[[9]](#filepos512235) 魯道夫·霍斯，《奧斯維辛指揮官》，第96頁。

[[10]](#filepos519298) 引自Robert Jay Lifton，《納粹醫生》（The Nazi Doctors, Basic Books 1986），第16頁。這是他在被一位幸存者、后來成為醫生的Ella Lingens-Reiner博士提問時給出的回答。

[[11]](#filepos521514) BBC訪談。

[[12]](#filepos524839) 引自Irena Strzelecka，“實驗”（Experiments），載于《奧斯維辛1940—1945》，第二卷，第363頁。

[[13]](#filepos526267) BBC訪談。

[[14]](#filepos527546) BBC訪談。

[[15]](#filepos528675) Miklos Nyiszli，《奧斯維辛：一名醫生的親身經歷》（Auschwitz, a Doctor’s Eyewtiness Account, Mayflower Books 1973），第53頁。

[[16]](#filepos534512) Aleksander Lasik，“奧斯維辛集中營的組織結構”（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Auschwitz Camp），載于《奧斯維辛1940—1945》，第一卷，第203頁。

[[17]](#filepos535659) BBC訪談。

[[18]](#filepos537069) BBC訪談。

[[19]](#filepos551507) 見Konrad Morgen于1962年3月8日在法蘭克福提供的證詞, 以及在法蘭克福的奧斯維辛審訊，載于Hermann Langbein，Der Auschwitz-Prozess: Eine Dokumentation （Neue Kritik, Frankfurt 1995），第143—145頁。

[[20]](#filepos553602) 見Konrad Morgen 1944年秋與Eleonore Hodyy談話的記錄，Institut für Zeitgeschichte ZS 599。

[[21]](#filepos558033) 欲詳細了解Morgen的調查、霍斯的解職與被指控的外遇，參見Jerzy Rawicz，《一場大屠殺的日常》（The Everyday Life of a Mass Murderer ［Dzien Powszedni Ludobójcy］ Czytelnik, 華沙，1973）。

[[22]](#filepos559192) 信息來源于Robert Sommer的博士論文（待完成）中對這個話題進行的開創性研究。

[[23]](#filepos559348) BBC訪談。

[[24]](#filepos561167) BBC訪談。

[[25]](#filepos570830) BBC訪談。另見Thomas Toivi Blatt，《索比堡的灰燼》（From the Ashes of Sobibor，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7）。

[[26]](#filepos584673) BBC訪談。

[[27]](#filepos594949) 1943年7月，墨索里尼被意大利國王解除最高統帥一職。9月，德國人將他從監獄中救出，并推選他出任傀儡政權的領導人。意大利的猶太人均是在德國占領期間（而不是在墨索里尼直接統治期間）被送往納粹的滅絕營。大約有20%的意大利猶太人在戰爭中喪生。

[[28]](#filepos596270) BBC訪談。

[[29]](#filepos596717) BBC訪談。

[[30]](#filepos600992) BBC訪談。

[[31]](#filepos603831) 引自Michael Mogensen，“拯救丹麥猶太人”（The Rescue of the Danish Jews），載于Mette Bastholm Jensen和Steven L. B. Jensen編著，《丹麥與大屠殺》（Denmark and the Holocaust, 哥本哈根大屠殺與種族滅絕研究中心，2003年），第45頁。

[[32]](#filepos606139) 引自Mogensen，“拯救丹麥猶太人”，第33頁。另見Leni Yahil，《拯救丹麥猶太人：民主政治的一場考驗》（The Rescue of Danish Jewry: Test of a Democracy, The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 1969）。

[[33]](#filepos607715) 引自Mogensen，“拯救丹麥猶太人”，第58頁。

# 第五章 瘋狂的殺戮

1944年的一系列事件，讓奧斯維辛成為歷史上最大規模屠殺的發生地。截至1944年春，奧斯維辛的總死亡人數比特雷布林卡少幾十萬，但這一年的春天和初夏，奧斯維辛一直在滿負荷甚至超負荷地運轉，迎來了建成以來最恐怖、最瘋狂的殺戮。在這段恐怖的時期飽受折磨、最終死去的大部分猶太人都來自同一個國家——匈牙利。

如此多的匈牙利猶太人在戰爭接近尾聲時被迫登上開往奧斯維辛的列車，原因錯綜復雜。匈牙利一直試圖與納粹進行政治博弈，在兩種強烈而又矛盾的情感中來回搖擺。一方面，他們一向懼怕德國勢力，另一方面，他們也想與贏面較大的一方合作，特別是如果合作能讓他們獲得東部鄰國羅馬尼亞的領土的話。直到1940年10月，匈牙利人才終于下定決心加入《三國同盟條約》，徹底與軸心國結為盟友。因為在此之前，納粹德國外交部長里賓特洛甫作為中間人促成了一項協議，將羅馬尼亞特蘭西瓦尼亞（Transylvania）地區北部劃給匈牙利。匈牙利人對這片土地垂涎已久，在這個協議的誘惑下，再加上認為納粹最終會贏得戰爭（在1940年夏天和初秋，這是一個“明智”的立場），匈牙利人在政治上和戰略上都開始向他們強大的鄰居靠攏。

1941年春，匈牙利人參與了希特勒入侵南斯拉夫的行動，6月，匈牙利軍隊又加入了納粹向蘇聯發動的戰爭。然而，納粹的閃電戰并沒有如預期的那樣擊敗斯大林，反倒被拖成了持久戰，此時，匈牙利人意識到他們站錯了隊。1943年1月，紅軍突破了匈牙利人在東部的防線，造成15萬匈牙利人被殺、負傷或被捕的慘重損失。匈牙利政府認為此時的“明智”立場是疏遠納粹，于是在1943年與西方盟軍進行了秘密會談，并與他們協定，一旦盟軍兵臨城下，匈牙利便會轉而支持盟軍。

1944年春，希特勒決定向他這個只能同富貴不能共患難的朋友發動進攻。在傳統史學研究中，這個決定被視為意識形態驅動下的個人行為，而不是一個務實的策略。但近期有學者的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結論，認為希特勒這樣做并不僅僅是想懲罰他搖擺不定的盟友那么簡單，相反，希特勒和納粹的行動相當理性。匈牙利是東歐少數幾個尚未遭到納粹劫掠的國家之一。希特勒認為，現在正是納粹在這片富饒的沃土上進行搜刮的大好時機。[[1]](#_1__Christian_GerlachHe_Gotz_Aly)

猶太人自然成了納粹強取豪奪的對象。匈牙利有超過76萬猶太人，占全國總人口近5%。雖然這些人在此之前忍受著種種反猶主義規定的約束，但大多數人生活的社區（以及他們的大部分財產）大體上未受到破壞。處在服役年齡的匈牙利猶太人被送去了東部前線做苦力，已有幾千人喪生，但剩下的猶太人仍抱有希望，以為他們可以逃脫殘酷的迫害。1944年3月19日，德軍長驅直入，占領了匈牙利。就在第二天，黨衛隊上級突擊隊大隊領袖阿道夫·艾希曼也到達此地，奉命把匈牙利猶太人的財物盡可能搜刮干凈之后驅逐他們。按照納粹的一貫作風，艾希曼從第一批巧取豪奪的物品中給自己挑了件禮物，即位于布達佩斯整潔的玫瑰山區（Rose Mount）的一棟豪華別墅——“阿希納別墅”（Achner Villa）。

然而，“最終解決”此時已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與1942年納粹負責人在總督轄區面臨的任務不同，艾希曼要做的不再是組織簡單的滅絕行動。考慮到眼前緊迫的軍事形勢以及對勞動力日益增長的需求，納粹需要更加努力地把有勞動能力、可以為德國的戰事出力的猶太人與那些對第三帝國毫無用處、需馬上被送走殺死的猶太人區分開來。在納粹看來，奧斯維辛成為匈牙利猶太人的理想去處，因為此時門格勒博士和他的同事們已經積攢了足夠豐富的經驗進行這種篩選。奧斯維辛仿若一個巨大的篩子，篩出的匈牙利人將被輸往第三帝國各地的苦役犯工廠。

艾希曼最開始在匈牙利采取的行動，與我們已經非常熟悉的、納粹慣常采用的反猶主義舉措完全一致。在驅逐行動中，他成功地得到了匈牙利警方的配合，并把剩下的猶太人都驅趕到布達佩斯以外的隔離區。德國人一開始要求匈牙利“向帝國”交出10萬名猶太人，但在猶太人都搬進隔離區后，匈牙利政府主動提出交出國內剩下的猶太人。與之前的其他國家、特別是斯洛伐克一樣，匈牙利也發現，當猶太人原有生活被打亂、家中男人被帶走以后，最“省心”的處理方法就是讓納粹帶走所有人。而這個提議正中艾希曼下懷。

然而，除了這些可以想象得到的工作，艾希曼還做了另一件事。1944年4月25日，一個名叫約埃爾·布蘭德（Joel Brand）的猶太人來到布達佩斯大華酒店與艾希曼會面。此人是“救援委員會”（Relief and Rescue Committee）的領導人，該組織致力于幫助猶太人逃離納粹的控制。布蘭德此前已經與艾希曼和其他黨衛隊軍官開過多次會議，試圖通過賄賂他們讓一部分猶太人離開匈牙利。這一次，艾希曼對他說：“你知道我是誰嗎？帝國、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動’都是我負責的。現在輪到匈牙利了。我叫你來是想跟你做個交易，我打算賣給你100萬個猶太人。你想救誰？能生孩子的男人女人？老人？還是嬰兒？坐下來，告訴我。”不難想象，布蘭德對艾希曼的提議大吃一驚。他抗議道，這不該由他來決定，但艾希曼回答道：“我沒法把全歐洲的猶太人都賣給你，只能放走100萬個。我們感興趣的是物品，不是錢。出國跟你們其他國家的負責人和盟軍直接聯絡一下，商量出一個具體方案后再回來。”[[2]](#_2__Yuan_Hua_Yin_Zi_Joel_BrandDe)

在納粹“最終解決”的歷史上，這是很反常的一件事。艾希曼多年來一直以滅絕猶太人為己任，是什么讓他在這個時候突然提出了一個看似反常的建議？我們可以從艾希曼當時所處的混亂政治局面中找到一絲線索：到達布達佩斯以后，艾希曼發現他不是唯一一個在匈牙利身擔特別任務的黨衛隊軍官，另外兩個人——格哈德·克拉格斯中校和庫爾特·貝歇爾中校也在這里。克拉格斯進行著各種“情報”工作，而貝歇爾則忙著敲詐匈牙利最大的工業集團所有者，魏斯家族。他以讓他們安全離開匈牙利為條件，要求他們把自己在集團的股份交給黨衛隊。在艾希曼看來，這兩位軍銜與他不相上下的同事顯然越了界，插手他原本以為會由自己全權負責的工作。富足的匈牙利就像一塊肥美的肉擺在一群豺狼面前，艾希曼意識到，他必須主動出擊才能在這場爭奪中贏得上風。

在與布蘭德會面前艾希曼得知，他的競爭對手貝歇爾已成功地將曼弗雷德-魏斯工廠的股份轉到納粹名下，作為回報，魏斯家族中約有50人獲準離開匈牙利，前往中立國。貝歇爾的職業前景看起來一片大好，還搬進了比艾希曼的寓所更大的別墅，這棟別墅曾屬于魏斯家族的某人。1961年艾希曼因戰爭中犯下的罪行遭到審訊時，曾在法庭上聲稱，自己真心希望布蘭德與盟軍的談判能獲得成功，但這顯然是自我辯護，他4月25日之所以開出這樣的條件，背后的動機似乎更直接也更自私：他在伺機從貝歇爾那里奪回主動權。如果他的上司希姆萊認可了對猶太人政策上的這一新變化，那么他，艾希曼，就不該落在后面，哪怕這種做法有悖于他的本性。艾希曼肯定知道這樁交易做成的機會不大，他知道盟軍把物資交給納粹、讓他們拿去對付東線紅軍的可能性絕不會太高。但通過推進這件事，他想讓希姆萊看到他是個愿意順應形勢而變通的人，一方面他不輸貝歇爾，另一方面幾乎可以肯定他仍能像過去一樣，出色完成篩選和滅絕任務。

艾希曼與布蘭德又進行了兩次會面之后，交易的內容基本敲定：布蘭德將前往伊斯坦布爾，在那里設法說服盟軍將1萬輛卡車交給納粹，讓他們用在對付蘇軍的冬季作戰中。作為交換，納粹將釋放100萬名猶太人。布蘭德要求艾希曼先釋放一部分猶太人來展現“誠意”，并提到“救援委員會”先前頒發的600張通行證，這些通行證的持有者應允許遷入巴勒斯坦，至少理論上是這樣。然而，艾希曼不但拒絕了布蘭德的提議，還堅持要把他的妻子漢莤關到大華酒店當作人質。

在大華酒店召開的最后一次會議上，克拉格斯、貝歇爾和其他幾位納粹人士也在場。鎮上每個德國代表似乎都想從這次行動中分一杯羹。克拉格斯執意要一個名叫班迪·格羅斯（Bandi Grosz）的神秘人物跟隨布蘭德一起前往伊斯坦布爾。格羅斯是阿勃維爾（Abwehr，德國諜報組織）的一名特工，不久前這個機構在匈牙利的工作被叫停，由克拉格斯組織進行的情報工作取代。格羅斯此行的真正目的直到好幾個月后才為人們所知曉。1944年5月17日傍晚，這兩個人驅車穿越邊界來到奧地利，并從那里登上了飛往伊斯坦布爾的飛機。布蘭德記得他身旁的格羅斯衣冠不整，胡子拉碴，偷偷地背著打印出來的指示，指示印滿了一頁半紙。[[3]](#_3__Jian_Bandi_Grosz_De_Shen_Xun)就是這樣一個不祥的、神秘的開端，開啟了一項不祥的、神秘的行動。

無論有沒有“用猶太人換卡車”的交易，艾希曼立即驅逐匈牙利猶太人的計劃都不會改變，奧斯維辛為接收這些人而做的特別安排也不會受到影響。在為迎接大批即將到來的犯人進行準備工作的同時，營地的納粹領導層也發生了若干變化。1943年11月就任集中營指揮官的阿圖爾·利伯亨舍爾（Arthur Liebehenschel）被解職，調至稍次的崗位，即盧布林地區馬伊達內克集中營指揮官。新的命令為整個奧斯維辛的納粹駐軍設置了一名總指揮官，此人不是別人，正是魯道夫·霍斯。奧斯維辛1號營地和奧斯維辛-比克瑙的指揮官現在都聽命于他。霍斯的歸來帶著一雪前恥的意味，面對眼前極其艱巨的任務，他過去所謂的過失都統統被納粹領導層遺忘了。

5月9日，也就是霍斯回到營地的第二天，他便提出迎接匈牙利猶太人的準備工作需要加快速度。按照奧斯維辛流傳的說法，利伯亨舍爾管理時期集中營效率低下，并且缺乏真正的納粹黨人應有的“冷酷”。霍斯決心改變這一切。直到這時，從一英里外的主軌道分岔駛向奧斯維辛的鐵軌才最終建好，犯人已可以被送到位于比克瑙中心的一個新坡道，這個坡道距2號和3號焚尸場僅100米遠。霍斯還下令立即修復5號焚尸場的焚化爐，并在附近挖五個坑，以便焚燒尸體。[[4]](#_4____Ao_Si_Wei_Xin_1940__1945_1)1942年的經驗讓他知道，屠殺猶太人對他和他的同事來說不是難事，最棘手的任務是如何同時處理成百上千具尸體。

不能不提的是，霍斯處處表現出他想要回到奧斯維辛的迫切愿望。1943年底離開營地的時候，他拒絕切斷與集中營的所有聯系，在柏林工作期間，他的家人繼續住在位于奧斯維辛外圍的指揮官寓所里（或許他們意識到，一個德國家庭住在波蘭南部要比住在納粹德國的首都安全得多，因為那里很可能成為盟軍空襲的目標）。此時，霍斯把滿腔的熱情投入到這個比原來更高一級的新崗位上。在人們的想象中，管理奧斯維辛大概是世界上最差的工作，但霍斯證明這種想法是完全錯誤的。他不僅在1943年11月即將被解職時努力地想要保住工作，并且為6個月后能重操舊業由衷振奮。霍斯的回憶錄里并沒有提到他回奧斯維辛后的真實感受，但我們不難列出種種理由來斷定，重獲奧斯維辛的管控大權一定讓霍斯非常高興：首先，他對奧斯維辛想必有一種強烈的主人心態，畢竟自集中營建造之初以來，他就一直擔任這里的指揮官；其次，他肯定知道匈牙利的猶太人相對來說有多么富裕，而且明白他們死去后，自己很有可能從中獲得好處；但比上述原因都重要的是，作為“最終解決”的堅定支持者，霍斯一定對執行眼前這項如此重要的任務充滿期待。

對于匈牙利的大多數猶太人來說，這只是噩夢的開始。從相對安全富足的生活到絕望的階下囚，轉變來得太突然，比其他任何一個被納粹“最終解決”影響到的國家都要猝不及防。截至1944年3月初，艾麗斯·洛克·卡哈納[[5]](#_5__BBCFang_Tan)一直與她的家人幸福地生活在靠近奧地利邊境的小鎮薩瓦爾（Sarvar）。她覺得他們過得無憂無慮。她的祖父擁有一家大型地毯織造廠，因此家境相對富裕。但納粹到了沒幾個星期，他們的工廠和住所就以一美元的價格被賣給一個姓克魯格的人。沒過多久，他們與成千上萬的匈牙利猶太人一起被迫登上了開往奧斯維辛的列車。在士兵的監督下，當時15歲的艾麗斯、年長她兩歲的姐姐埃迪特以及其他家庭成員朝火車站走去。她們恰好從自己原來的家門前經過，看見克魯格先生坐在窗邊。“我覺得特別恥辱，”艾麗斯說，“我腦海中出現了出埃及記的場景。克魯格先生看著我們走過去，臉上沒有同情，只有喜悅——他現在成了我們工廠的主人、我們房子的主人。就在這個時候，我們的狗跳了起來，它認出了我們，哀嚎起來。”

等他們接近火車站，艾麗斯更加真切地感覺到自己的生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對我來說，火車站總是跟美好的記憶聯系在一起，因為父親在布達佩斯有個辦公室，我們經常在周一陪他去火車站，然后周四接他回來。他總會給我們帶回點什么。”但這個曾讓她如此快樂的地方，現在卻完全變了個模樣：“我們看見了運牲畜的火車！我對我姐姐說：‘肯定搞錯了，這里停的都是載畜火車。他們不會讓我們上這些車的。爺爺不可能坐在裝牲畜車廂的地板上！’”但這顯然不是什么誤會。他們登上列車，車門“砰”地關上，唯一的光亮，是從車身木柵欄之間狹窄縫隙中透進來的光。在黑影中，她們能看見祖父坐在行李上，她們的母親站在祖父身旁。里面非常熱，很快空氣中就充滿令人作嘔的汗臭味，車廂角落那個被當作馬桶的鐵桶也散發出陣陣糞便味。四天后，他們終于到達奧斯維辛。

“到了以后，我對埃迪特說，沒有什么比這輛運牲畜的車更可怕的了。我確信他們會讓我們工作，而且會給孩子更好的食物。”艾麗斯說。等大家下了車，聚在比克瑙的坡道附近，艾麗斯的姐姐讓她站在兒童的隊伍中，她們都以為兒童的待遇會比大人好，她們覺得納粹畢竟來自一個文明的國家。因此，艾麗斯雖然個頭很高，但還是站在了兒童及她們的母親那一隊。當然，按照集中營里扭曲的邏輯，這群人恰恰是納粹最先要殺死的。那天在坡道負責篩選的是門格勒博士，他見艾麗斯等在那里，對她很是好奇：她是個頭特別高的孩子，還是年輕的母親？“您有孩子嗎（Haben Sie Kinder）？”他問。艾麗斯在學校里學過德語，回答說她只有15歲，于是門格勒讓她站到另一隊去，那隊是不會馬上被殺死的成年人和青少年。沒過多久，她被帶進了比克瑙的“桑拿室”，在那里沖了澡，剃了頭，領到一套尺碼大出三倍的破爛衣服。

艾麗斯發現自己被分到了比克瑙的女囚營，此時，她跟自己的父母、祖父、姐姐——也就是全家人——都失去了聯系。她迫切想要知道他們的消息，于是開始向其他女犯打聽。她執著于家人的去處，特別是姐姐埃迪特。結果卡波走過來給了她一巴掌。“在這兒不許問問題！”她吼道，“從現在起給我安靜！”

但艾麗斯決意不“安靜”，她一定要找到姐姐，無論付出什么代價。等到又有機會時，她詢問了更多問題，那是第二天凌晨四點，分區里所有人都被叫醒，被要求全體去廁所。在一片幽暗中，在充滿污穢物和下水道氣味的環境里，艾麗斯挨個問，有沒有人知道剛到的那批匈牙利猶太人被帶去了哪里。終于，一個女犯對她說，她覺得他們就在緊鄰的隔壁營地，但艾麗斯仍然不知道如何聯絡上她的姐姐。在奧斯維辛-比克瑙，圍墻隔開了一個個子營地，很難從其中一個去到另外一個。然而，另一位女犯告訴艾麗斯，每天早上都會由同一個人給兩個營地送變質的替代咖啡，要是艾麗斯寫個字條，或許能說服送咖啡的女人幫她捎去。而如果她能找到埃迪特，或許埃迪特可以獲準轉來這個營地。

艾麗斯很快了解到，在奧斯維辛，求人幫忙需要支付費用。她用自己的那份面包換來了一小片紙和一支筆，給埃迪特寫了字條：“我在C營地12樓”，然后又成功地賄賂了送咖啡的女人帶走字條。接著，按照艾麗斯的說法，“奇跡”出現了：幾天后她的字條被送了回來，上面潦草地寫著“我來了，埃迪特”。一天早上，埃迪特出現在送咖啡的女犯隊伍中，她負責帶回空咖啡杯。“我握著她的手，”艾麗斯說，“我們又在一起了。我們對彼此發誓，再也不分開。”

艾麗斯·洛克·卡哈納和她的姐姐埃迪特，只是40多萬被送到奧斯維辛的匈牙利猶太人中的一例。每批犯人被選中進行強制勞動的人數比例不定，有時只有10%，有時可達30%。但無論是哪一列火車，里面的絕大多數犯人都直接被送進毒氣室。奧斯維辛之前從未有過類似的屠殺狂潮：在不到八周的時間里，超過32萬人被害。事實上，在納粹德國，唯一可以與此相提并論的持續殺戮發生在早期的特雷布林卡，而那導致埃貝爾博士被開除。

為了趕上犯人運到的速度，納粹擴大了在奧斯維辛四個焚尸場工作的特遣隊（Sonderkommando）隊伍，特遣隊成員從原來的200人增至近900人。這些犯人所從事的是集中營里最可怕的工作，他們需要引導剛到的人走進毒氣室，在此過程中安撫他們，最后在殺戮結束后清理尸體。

達里奧·加巴伊[[6]](#_6__BBCFang_Tan)和莫里斯·韋內齊亞[[7]](#_7__BBCFang_Tan_1)是一對表兄弟，來自希臘的薩洛尼卡。納粹招募特遣隊成員時，他們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加入。兩人于1944年4月到達奧斯維辛，當德國人詢問誰做過理發師時，他們主動舉起了手。莫里斯的父親開了家理發店，雖然達里奧對這門手藝一竅不通，但莫里斯讓他也舉手。與奧斯維辛其他很多人一樣，和自己的親人在一起讓他們感到寬慰，因為不管接下來會發生什么，他們都可以共同面對。

莫里斯和達里奧被帶到比克瑙的一個焚尸場內，每人領到一把巨大的剪刀，他們都覺得用它剪羊毛比給人理發更合適。接著他們被帶進一間房間，里頭堆滿沒穿衣服的尸體。“我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莫里斯說，“那些人看起來就跟罐頭里的沙丁魚一樣！”帶他們進來的卡波踩在尸體上，以驚人的速度剪下女人的頭發，示意莫里斯和達里奧該怎么做。但他們都盡量不踩在尸體上，而是小心翼翼地繞著尸體走動，這讓卡波大為光火，用手杖狠狠抽打他們，于是他們只好踩著尸體，努力加快速度。當達里奧站到一個死去的女人肚子上時，她腹中的氣體受到擠壓從嘴里排出，這使得尸體發出類似呻吟的聲響。莫里斯說：“達里奧嚇得從尸體堆上跳了下來。”之前無論是卡波還是德國人，都沒有解釋過他們要做的是什么工作，因此他們毫無心理準備，直接進入了一個恐怖的世界。“簡直難以置信！”莫里斯說，“我能有什么感受呢？沒人能想象出到底發生了什么，德國人到底是怎樣對待我們猶太人的。”那時他們還不知道，1942年8月，納粹經濟部門向奧斯維辛和其他集中營的管理者下令，一定長度以上的頭發統統需要收集，以便把它們編起來做成“潛水艇上船員的襪子和包裹鐵軌用的紡織物”。[[8]](#_8__Yin_Zi_Andrzej_Strzelecki__D)

達里奧和莫里斯明白，要想活命他們必須適應這一切，而且必須迅速適應。隨著一批又一批犯人被帶進焚尸場的地下室，他們很快熟悉了工作流程：新到的犯人被迫走進地下一層一間長長的更衣室，之后德國人會大喊“Schnell！Schnell！”讓犯人脫去衣服并記住自己把衣服放在了什么位置，因為德國人告訴他們淋浴結束后需要穿回衣服。許多女人在被迫赤身裸體地朝外面的毒氣室跑過去時，都會喊：“丟人！丟人！”“有些人開始察覺到事情不太對勁，”達里奧·加巴伊說，“但沒人能做什么。這個過程必須繼續，你知道的。一切都按德國人的想法進行。他們組織這種事已經很多很多年，所以一切都很順暢。”

2號和3號焚尸場的毒氣室在地下，因此等毒氣室里擠滿了人，門也被關嚴之后，齊克隆B的投放方式相對是比較直接的。黨衛隊士兵站在毒氣室的屋頂上，打開蓋子，可以看到特制的鐵絲籠。隨后，他們把罐裝齊克隆B放進鐵絲籠內，讓鐵絲籠下降進入毒氣室，等降到底部再把屋頂上的蓋子重新蓋嚴。站在緊鎖的門外，達里奧·加巴伊和莫里斯·韋內齊亞能夠聽見兒童和他們的母親哭喊著抓撓墻壁的聲音。莫里斯還記得毒氣室里塞滿約一千人時，他聽見里面傳出“上帝啊！上帝啊！”的叫聲，那聲音仿佛是從地下墓穴中傳出來的一樣。等到喊叫聲平息，大功率電扇被打開吹散毒氣，這時就輪到莫里斯、達里奧和其他特遣隊成員開工了。“等他們打開門，”達里奧說，“我看見這些人，這些半小時以前還走路（進入毒氣室）的人，現在都立著，一些人被毒氣熏得渾身青黑，他們沒地方可逃，全都死了。我閉上眼睛，腦海里浮現出來的全都是那些立著的人，那些牽著孩子的女人們。”特遣隊需要把尸體搬出毒氣室，通過一個小電梯運到位于一層的焚化爐內。接著他們需要再次進入毒氣室，用水流強勁的水管把墻壁上、地板上的血跡和排泄物沖洗干凈。

這一整套恐怖的工作在黨衛隊士兵的監督下完成，但負責監督的通常只有兩個人，甚至在屠殺規模達到最高峰時，現場黨衛隊士兵的人數也屈指可數。這是為了盡可能減少因屠殺而承受心理創傷的德國人，這種心理負擔曾折磨著東部前線特別行動隊的成員。然而，對一些監督毒殺過程的黨衛隊看守來說，實際情況是他們的工作不但沒有給他們造成心理傷害，還帶來了施虐的快感。達里奧·加巴伊記得，有一個黨衛隊看守不時到焚尸場選出七八個漂亮女孩，讓她們在特遣隊成員面前脫光衣服，接著他掏出槍，把子彈打在她們的胸部或私處，讓她們死在這些人眼前。“那個時候我們沒什么感覺，”達里奧說，“我們知道自己的日子也不多了，在這樣的環境下我們肯定活不到最后。但我們漸漸習慣了一切。”

讓莫里斯·韋內齊亞記憶深刻的，是對匈牙利人的屠殺達到最高潮的一個晚上，三個年輕女人——其中兩人是姐妹，另一個是她們的朋友——走到一名黨衛隊士兵面前，要求他把她們三人一起殺死。這個黨衛隊士兵“非常樂意”滿足她們的要求。他讓她們站成一列，掏出左輪手槍，用一顆子彈殺了三個人。“我們立刻把這三個人抬走，”莫里斯說，“把她們扔進了火堆。接著我們聽見有人發出尖叫聲，原來第一個人并沒有中彈，只是一時失去意識倒了下去……那個德國軍官還是特別得意，覺得自己只用一槍就打死了兩個人。那些畜生……正常人是無法相信和理解這一切的。難以置信，但確實是我們親眼所見。”

幸存者的證言有時與當代文獻記錄驚人地吻合，達里奧和莫里斯的經歷便是絕佳的例證，他們的敘述與其他特遣隊成員信中所寫到的內容完全相符，這些信件被裝在各種容器里，埋在了焚尸場四周。戰后被發掘出來的殘破信箋，成了奧斯維辛歷史上最令人動容的資料，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這些記錄下自己經歷的人后來無一例外，全部被殺害了。1952年從3號焚尸場遺址附近挖掘出來的一封信，其中寫到的性虐待場景與達里奧和莫里斯的描述十分接近：“……或者是黨衛隊三級小隊長福斯特。有犯人到達時，他經常站在更衣室的大門口，用手去摸每個光著身體跑進毒氣室的年輕女孩的性器官。還有一些時候，黨衛隊隊員把手指伸進漂亮女孩的私處，這些德國人從高到低什么級別的都有。”[[9]](#_9____Zai_Zui_Nie_De_E_Meng_Zhon)這位特遣隊成員還記下了其他猶太人對他們幫助德國人的行為提出的抗議，其中有個七八歲的小男孩說：“為什么啊，你也是猶太人，你把這么可愛的孩子送去毒死，就為了自己能活著？活在一幫殺人犯中間，對你來說真的比那么多猶太人的命更重要嗎？”[[10]](#_10____Zai_Zui_Nie_De_E_Meng_Zho)

哈伊姆·赫爾曼寫給他妻子和女兒的信，或許是所有特遣隊成員信件中最令人心酸的一封。這封信是1945年2月在一個焚尸場附近發現的，當時它被埋在一堆骨灰下面。哈伊姆·赫爾曼寫信時無法確知他的家人是否還活著，但他仍祈求得到妻子的原諒：“我們的生活中曾發生過一些微不足道的小誤會，它們讓我現在體會到無法挽回時間是一種什么樣的感受。”[[11]](#_11____Zai_Zui_Nie_De_E_Meng_Zho)他這樣描述自己在奧斯維辛的生活：“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這個世界可以說就是個地獄。但丁所描述的地獄與這個真正的地獄相比根本不值一提。我們見證了這個地獄里發生的一切，而且也無法活著離開這里……”[[12]](#_12____Zai_Zui_Nie_De_E_Meng_Zho)他還以極其凄婉的筆調安慰妻子，讓她不必為他的心理狀態擔心。“我還想借這個機會讓你安心，我走的時候將十分平靜，可能還會十分英勇（將視實際情況而定）。”[[13]](#_13____Zai_Zui_Nie_De_E_Meng_Zho)可惜沒有一個目擊者能活下來告訴我們，哈伊姆·赫爾曼在1944年11月、也就是在這封信寫就不久后走向生命的終點時，到底有沒有守住給妻子的承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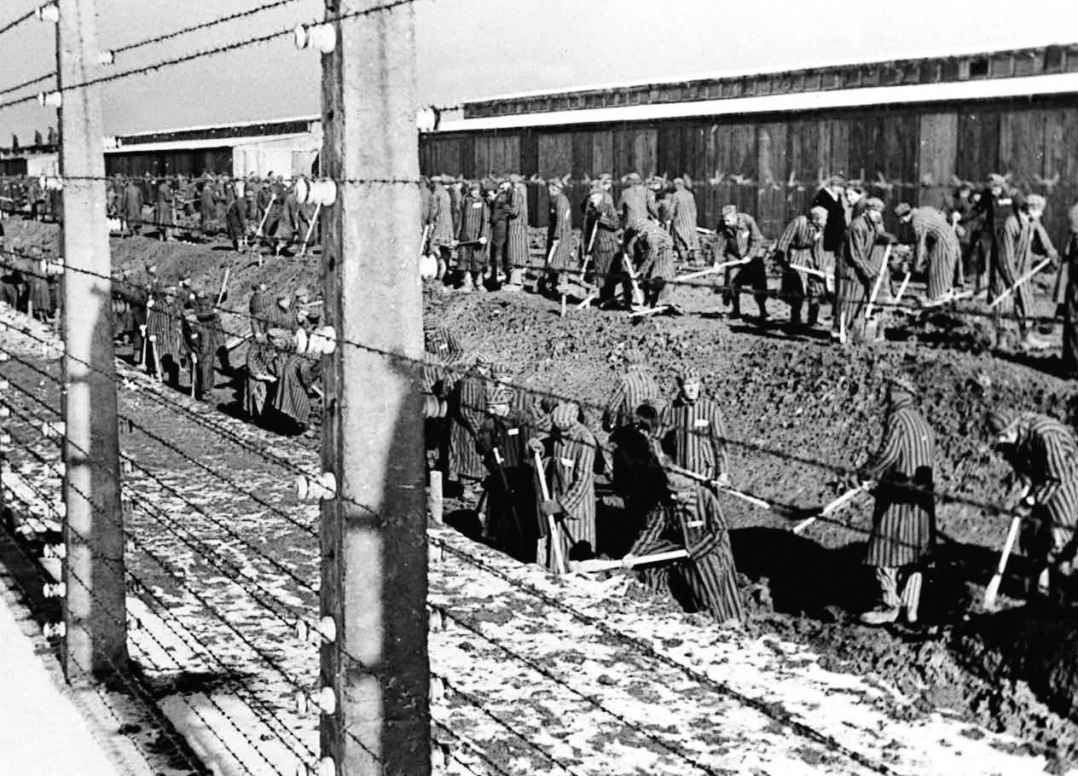
包括達里奧和莫里斯在內的許多特遣隊成員都知道，他們的親人已經死在了焚尸場，也知道自已正在協助納粹組織對數千人的殺戮。每個人不得不找出自己的一套方法來面對這一切。達里奧的方法很簡單，那就是“不去想”周圍發生的事，變得像個“機器人”一樣“無感”。“過不了多長時間，你就什么也不想了。沒有什么事讓你煩心。這就是為什么你的良知也藏了起來，一直藏到今天。發生了什么？我們為什么會做出這種事？”但在他內心深處，他很清楚自己為什么會繼續留在特遣隊工作，因為求生的欲望是如此“強烈”，無論情況變得多糟，“你總能找到活到第二天的力量”。莫里斯·韋內齊亞更加強烈地感到應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他說：“我們也變成了動物……每天都要焚燒尸體。每天，每天，每天。你漸漸就習慣了。”當他聽到毒氣室里傳出來的喊叫聲時，“我們覺得應該自我了結，再不給德國人工作，可就連自殺都沒那么容易。”

幸存者的證言和掩埋起來的信件都表明，特遣隊幾乎參與了屠殺過程的每一個環節。然而，被送進焚尸場的人越少，他們要做的反而越多，因為這個時候用巨大的毒氣室進行屠殺“不夠經濟”，因此更傳統的方式會被采用。“有時一列火車只送來50個人，”達里奧說，“我們得揪著他們的耳朵一個一個押送他們，然后黨衛隊士兵會在后面開槍把他們打死。”他記得每到這時總會“有很多血”。

盡管特遣隊成員在工作時被迫目睹如此可怕的場景，但他們的住處與奧斯維辛其他犯人相比要好很多。莫里斯和達里奧睡在焚尸場頂層，他們的床鋪比普通營房里的更干凈、虱子也更少。到了晚上，他們常坐在床上聊他們的過去，甚至有時還會唱希臘歌曲。他們的食物也比集中營其他地方強，偶爾還能喝到伏特加。與在“加拿大”工作的犯人類似，特遣隊成員能夠用同樣的方式獲得一些珍貴的物品，這讓他們有了堅持下去的可能：在屠殺過程中，他們有多次為自己“順手牽羊 ”的機會。他們負責整理犯人在更衣室里脫下來的衣服，常常能從中發現藏起來的食物或貴重物品，而鞋子是人們最喜歡藏珠寶和金子的地方。除此之外，他們還要檢查所有被毒死的人的五官七竅，在此過程中也會發現珠寶，雖然這個過程令人感到羞恥。



1．在工廠工作的奧斯維辛犯人，這樣的工廠在奧斯維辛利益區有很多。



2．奧斯維辛犯人在比克瑙挖排水溝，這是集中營里最耗損生命的勞動項目之一。



3．“加拿大”，比克瑙的收集區，犯人在這里分揀從新到犯人那里掠來的物品。



4．奧斯卡·格倫寧，他于1942年秋抵達奧斯維辛。



5．卡齊米日·皮耶霍夫斯基，波蘭政治犯，曾參與奧斯維辛最大膽的一次越獄行動。



6．特蕾澤·施泰納（左起第三），一名來自奧地利的猶太難民，后被驅逐出根西島，先到了法國，之后抵達奧斯維辛。



7．海倫娜·斯特洛諾娃，斯洛伐克猶太人，在“加拿大”工作的第一天便受到黨衛隊士兵弗朗茨·溫施的照顧。



8．1944年春夏之交，一車匈牙利猶太人抵達奧斯維辛-比克瑙。背景處可以看到火車左右兩側2號和3號焚尸場的兩個煙囪。



9．匈牙利猶太人到達后首先按性別分開，女人站一側，男人站在另外一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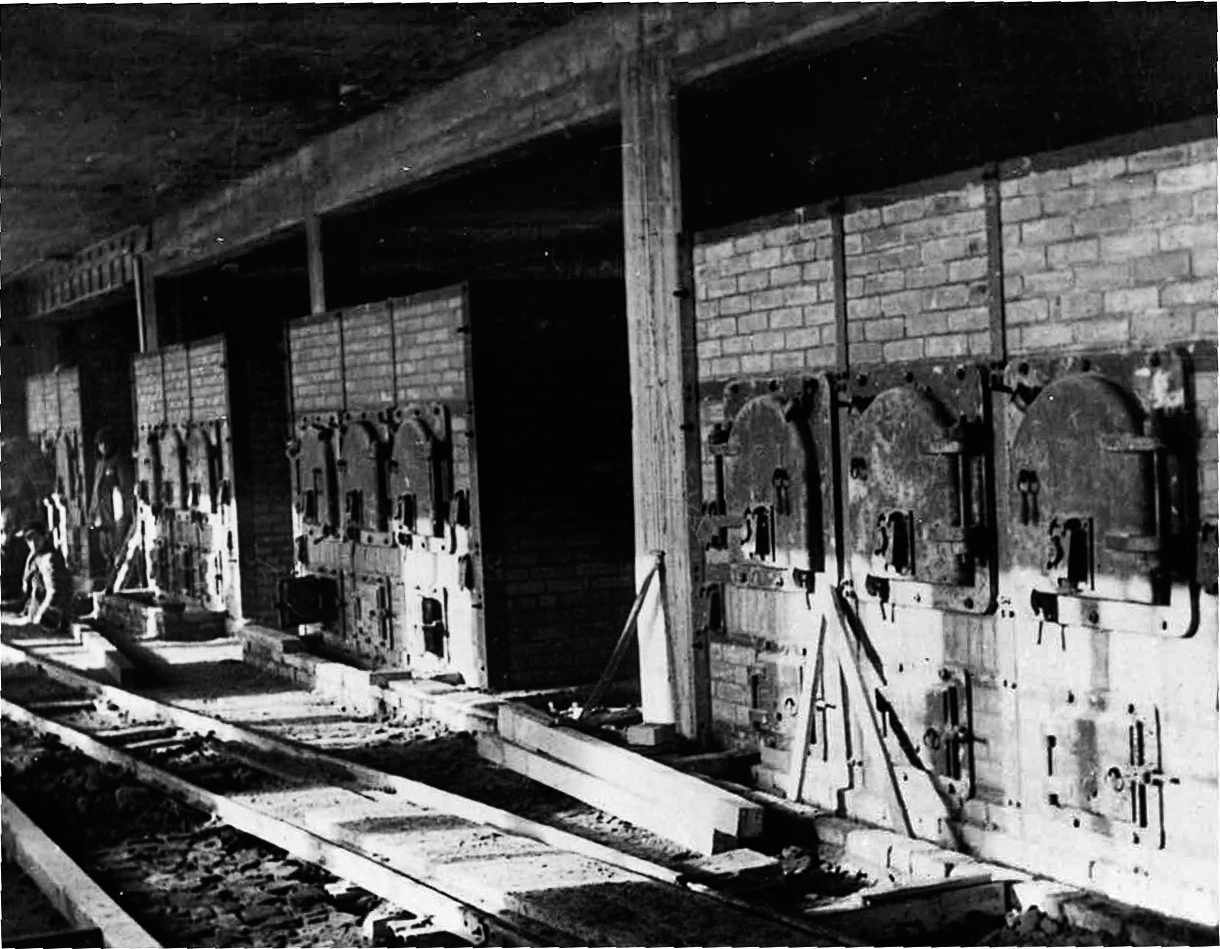
10．按性別分隊后，接下來將進行臭名昭著的篩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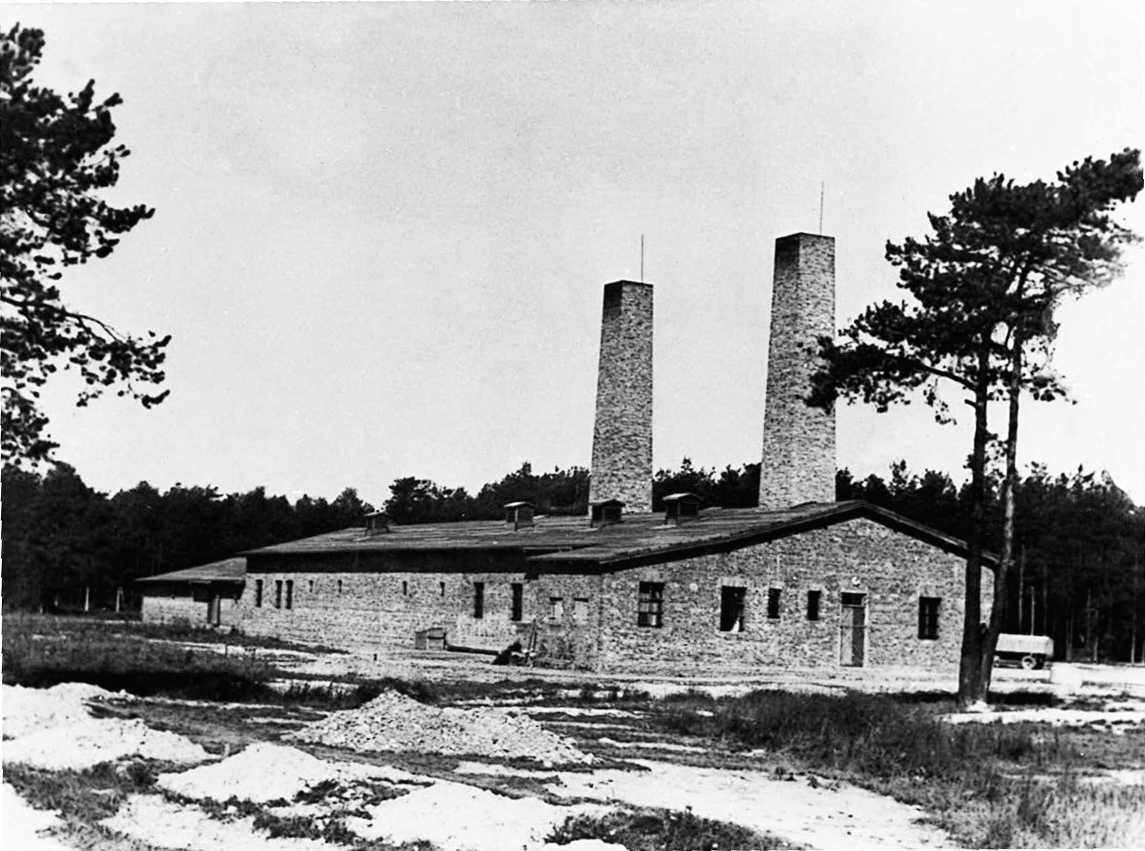
11．這列猶太男人正接受一位納粹醫生的檢查。他在很短的時間內決定誰可以活命，誰要被處死。



12．一個匈牙利猶太人家庭將被送進毒氣室，他們在4號和5號焚尸場旁的樹林中等待。



13．奧斯維辛焚尸場中的焚化爐，每個可同時容納數具尸體。



14．4號焚尸場。毒氣室位于地上，齊克隆B從墻上的洞口倒進毒氣室。



15．3號焚尸場，位于比克瑙坡道附近。毒氣室位于這棟建筑的地下。



16．被捕的魯道夫·霍斯。對一百多萬條人命負有責任的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認為滅絕猶太人的理由是“正當的”。

他們本該把找到的貴重物品全部交給卡波，再由卡波交給黨衛隊。但與“加拿大”的其他犯人一樣，特遣隊成員可以藏起一部分偷來的物品，并用它們在奧斯維辛繁榮的黑市進行交易。交易的對象有時是出于各種原因進入焚尸場工作的犯人，比如奧斯維辛的消防員，有時則是黨衛隊士兵。通過這種方式，特遣隊成員得以在他們有限的配給之外，獲得意大利香腸、香煙或酒水等珍貴物品。米克洛斯·尼斯利當時是奧斯維辛里的犯人，也是一名醫生，他回憶起見到食物時的場景，說道：“桌上堆滿了各種物品和美食，基本上一個被驅逐的人能帶上的所有東西都在這里了。有各種罐頭食品、果凍，有好幾種香腸、蛋糕和巧克力。”[[14]](#_14__Miklos_Nyiszli___Ao_Si_Wei)他還記得“我們面前的桌子上鋪著一塊厚重的絲綢緞面桌布，上面擺著刻有姓名首字母的精美瓷盤，成套的銀質餐具，還有其他各種曾經屬于它們被驅逐的主人的物品”。

當然，這些美食并不能真的彌補特遣隊成員生活中恐怖的那一面帶給他們的痛苦。聽過達里奧·加巴伊描述他是如何不思不想、像個“機器人”一樣做事之后，我們不難想象特遣隊成員是如何被他們恐怖的日常工作扼殺了全部情感。但莫里斯和達里奧的生活中發生了一件具有特別意義的事，它表明，總有一絲人性的光輝是納粹無法抹除的。1944年的一個夏日，一群病怏怏的犯人來到焚尸場等待槍決，莫里斯和達里奧發現其中有一位是他們的表親。他們知道自己沒有辦法救他的命，因為焚尸場四周都是高高的圍墻，但莫里斯仍希望能做些什么，讓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好過一些。“我跑到他面前，問他：‘你餓嗎？’當然，每個人都餓得要命，都非常渴望食物。他對我說：’我特別特別餓。’”莫里斯望著面前這位餓得虛弱無力的表親，決定冒一次險。他趁卡波不注意，跑上了樓，從自己的房間里拿出一個肉罐頭打開，然后沖下樓送到他表親手上。“他只用了一分鐘就把整罐肉吞下肚，他真的餓壞了。然后他就被殺了。”急匆匆地給自己的親戚送來最后一餐，在今天聽起來并不是多么英勇的行為，但對這些承受著巨大情感壓力、忍受著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恐怖生活的特遣隊員來說，這種行為確實可以稱得上英勇。

與此同時，截至1944年7月第一周，已有44萬匈牙利猶太人被送到奧斯維辛，其中絕大多數剛一到達便被殺害。雖然艾希曼在戰后聲稱他滿心希望布蘭德的談判能夠成功，但這個可怕的數字足以拆穿他的謊言。布蘭德還未離開布達佩斯，一輛輛列車就已經發往奧斯維辛，而在他努力說服盟軍接受納粹的方案時，犯人的輸送也從來沒有停止。

布蘭德的飛機于5月19日降落在土耳其，他落地后立即動身前往伊斯坦布爾的佩拉宮酒店（Pera Palace Hotel），與猶太人事務局（Jewish Agency）在當地分支機構取得聯系，與巴勒斯坦猶太人領導層的代表們見了面。他匆匆向他們解釋了艾希曼的提議，并表示在他看來，英國人不太可能把卡車送給德國人。但布蘭德認為，只要盟軍能提出一些不同意見與納粹保持談判，這些就都不是問題。然而，布蘭德失望地發現，猶太人代表中沒有任何一個資深人士，向耶路撒冷發電報也是無法實現的，只能讓信使把這個消息帶到巴勒斯坦。在此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約埃爾·布蘭德還將經歷更多的打擊，直到希望徹底破滅。

直到5月26日，位于巴勒斯坦的猶太人事務局負責人才把納粹的方案告知一位英國外交官，哈羅德·麥克邁克爾（Harold MacMichael）爵士。但這位英國人當即拒絕了布蘭德的提議，認為此舉是想破壞西方盟軍與蘇聯的關系。5月30日，英國戰時內閣委員會難民接收與住所提供部門的成員達成共識：艾希曼的提議是赤裸裸的敲詐，他們拒絕接受這樣的方案。美國人也迅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并在6月9日將納粹的提議轉達給莫斯科方面，迫切希望斯大林第一時間知會此事。蘇聯外交部副部長19日回應，他的政府“不允許”與德國人就此話題繼續展開討論。[[15]](#_15__Yehuda_Bauer___Dai_Chu_Shou)

與此同時，布蘭德和他的同行者班迪· 格羅斯被英國人扣留，格羅斯這個原本不起眼的人物此時引起了人們極大的關注。6月中旬，英國情報人員在開羅對他進行審訊時，他宣布了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他聲稱布蘭德的行動只是為了掩人耳目，他本人的任務才是此行的真正目的。他說自己直接受命于希姆萊，要在一個中立國促成英美高官及帝國保安部高層之間的會面，以便與西方盟軍商談能否單獨簽訂一個和約，共同對抗蘇聯。

我們無從確切知曉，深不可測如格羅斯，在開羅向英國人提出此種方案究竟是出于什么動機——后來人們才發現，格羅斯至少是“三料”間諜，為任何付報酬給他的人工作，同時也背叛所有這些人。然而，這個提議確實來自希姆萊本人。[[16]](#_16__Bauer___Dai_Chu_Shou_De_You)這位黨衛隊全國領袖顯然認為，走這一步棋對他個人有利。如果這個提議被公之于眾，他完全可以拿克拉格斯和其他人當作盾牌，否認是他給格羅斯下達的旨意；但凡西方盟軍表現出任何愿意接受的意向，希姆萊屆時將有兩個選擇：他可以自己把這個消息泄露出去，在英、美、蘇三方之間制造裂痕，也可以真的促成這一方案。

當然，英國人和美國人從沒認真考慮過格羅斯的提議，在今天看來，納粹會提出這樣的方案非常不可思議。然而，它確實反映出當戰爭進入到這一關鍵時期，某些納粹領導人、特別是希姆萊的想法。希姆萊顯然知道戰爭形勢對德國不利，他提出這個方案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對時局的考慮，然而，一個強烈的意識形態觀念也發揮了重要作用。簡單來說，希姆萊同幾乎所有納粹黨黨員一樣，從未理解英國人和美國人為什么要把自己跟斯大林綁在一起。納粹的愿望是與英國結盟對抗蘇聯，而希特勒的理想是讓德國成為歐洲大陸的統治者，讓大英帝國成為全世界海域的統治者。但1940年，溫斯頓·丘吉爾粉碎了任何讓英國與納粹結盟的可能。這樣一種外交政策給納粹造成的挫敗感和憤怒感是如此強烈，以至于他們在戰爭結束后仍難以釋懷。幾年前，我拜訪一位前納粹黨員，我剛一到，他就對我說：“怎么會發生這種事？”我以為他指的是對猶太人的屠殺，于是回答說，他對自己犯下的罪行感到如此難過，這讓我很欣慰。“我指的不是那個，”他說，“我指的是英國人和德國人最后怎么會打起來呢？真是個悲劇。你的帝國也沒了，我的國家也毀了，結果斯大林占領了東歐。”

1944年晚春，希姆萊無疑有著同樣的感受。他在某種程度上仍認為西方盟軍會“理性地”行動，與納粹聯手抗擊斯大林。納粹領導人一直堅持這樣的想法，直到戰爭的最后一刻，德國將領還是只愿意向西方盟軍投降，拒絕向紅軍繳械。甚至在希特勒自殺后，這種想法依然沒有改變。然而，并沒有跡象表明，希特勒在1944年春與希姆萊一樣，希望同盟軍單獨簽訂和約，也沒有證據表明他知悉班迪· 格羅斯的行動。希特勒是個相當務實的政客，他深知處于極大的劣勢時簽訂的任何和平條約都是站不住腳的。因此，布蘭德行動標志著希特勒和他“忠實的”海因里希之間開始出現分歧，而隨著戰爭走向終點，這一分歧還將進一步加深。

盟軍雖然拒絕了布蘭德–格羅斯的提議，但他們很謹慎地一直沒有把這個決定直接告訴納粹，以便在匈牙利國內進行的談判能夠繼續下去。由于沒有得到任何來自英國人和美國人的消息，布蘭德的妻子在“救援委員會”另一成員魯道夫·卡斯特納的協助下，再一次試圖說服艾希曼展現他對“猶太人換卡車”方案的誠意，即便盟軍那邊還沒有消息。也先釋放一部分匈牙利猶太人。但就在漢莤· 布蘭德和魯道夫·卡斯特納試圖與艾希曼談判時，他們兩人卻雙雙被匈牙利當局抓捕，并被監禁起來拷打，因為匈牙利政府迫切地想要知道事情進展。最后德國人進行了干預，他們才被釋放。他們什么也沒透露，仍然力圖說服艾希曼向盟軍示好。

艾希曼和他的黨衛隊同僚最后終于同意，讓少數匈牙利猶太人登上一輛列車，這輛列車按約定會把他們送出帝國。黨衛隊的主要動機再直白不過：貪婪。列車上一個席位最初售價200美元（艾希曼定的價格），后來漲到2000美元（貝歇爾的要求），最終定在1000美元。誰有權上車由一個委員會決定，卡斯特納也是這個委員會的成員。埃娃·斯佩特[[17]](#_17__BBCFang_Tan_2)是與卡斯特納相識的匈牙利猶太人，按照她的說法，這本應是個“諾亞方舟，應該由各行各業、各色人等的代表組成，包括青年組織、非法移民、東正教信徒、科學家、猶太復國主義者等等”。但從很多方面來看，這都是一艘奇怪的“諾亞方舟”，在決定誰能獲得“船票”的過程中，私人關系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登上列車的人里，有幾百人都是卡斯特納的朋友和親人，他們都來自卡斯特納的故鄉克魯日。埃娃·斯佩特的父親也是委員會成員，他決定把埃娃、她的丈夫、叔叔和祖父都列入可以登車者的名單中。

由于許多被準許上車的人付不起納粹所要求的高昂費用，因此有些座位被賣給富綽的匈牙利猶太人，以貼補其他人，這就造成不同家庭成員被區別對待，而且這種區分看起來毫無根據。舉例來說，埃娃·斯佩特及她的丈夫和兒子不需要付錢，但她的叔叔和祖父則需要。讓這個決定顯得更沒有邏輯的是，埃娃的丈夫才是實際上為其他人湊錢的那個人（但他卻不用給自己買票）：“我丈夫那個時候很有錢，他把錢給了我的叔叔和祖父，還把他所有剩下的錢都給了卡斯特納。”拉斯洛·德韋切里[[18]](#_18__BBCFang_Tan_2)是另一個拿到了車票的匈牙利猶太人，他曾幫忙在布達佩斯的哥倫布大街建造了一處集合營地，讓所有有資格登車的人在這里等待出發，這份差事讓他自己也獲得了上車資格。“每個人都聽說了（有這么一輛列車），大家自然都希望自己能在名單上，但很多人都不能，你想想，一共有60萬猶太人，而火車只能裝下1600人。那些被迫留下的人把卡斯特納當成了替罪羊。”

卡斯特納在戰后確實因他的所作所為受到了嚴厲的譴責，不光是因為他讓自己的家人上了車，還因為他沒有提醒其他匈牙利猶太人他們接下來將會面臨的命運。1954年，卡斯特納在以色列起訴一個名叫馬爾基爾·格林瓦爾德的人犯有誹謗罪，他說卡斯特納是猶太人的“叛徒”，然而，這起訴訟反倒迅速導致了對卡斯特納行為的調查，最終法官宣判他犯有“將靈魂出賣給撒旦”罪。考慮到1944年春夏卡斯特納所承受的壓力，這一判決似乎過于嚴厲了，而且在那之前卡斯特納曾非常熱心地救助過猶太人，幫很多人逃出了斯洛伐克。至于對卡斯特納沒有警告其他匈牙利猶太人的指責，事實上如果他真的這樣做了，那么他們之后很可能無法再與艾希曼進行任何談判，而且正如一位專門研究這段歷史的頂尖學者所說，卡斯特納“沒有立場警告任何人”。[[19]](#_19__Jian_Yehuda_BauerZai___Da_T)但不管怎么說，卡斯特納絕非完人，他傲慢無禮的性格在法庭辯護中對他毫無幫助，而他在漢莤· 布蘭德的丈夫出國期間與她私通一事顯然也沒起到什么積極作用。他成了一部分以色列右翼民族主義者仇恨的對象。1957年，就在以色列最高法院即將推翻原誹謗控訴中對他的大部分有罪裁定前夕，他被人暗殺。

1944年6月30日，滿載著難民的列車終于駛離布達佩斯。在此之前，大量的錢財和其他貴重物品被裝進行李箱中交給了黨衛隊，而貝歇爾、克拉格斯和艾希曼全都參與了這次敲詐行動。當然，即便如此，1684名乘客仍不能確定火車會不會沿著那條已經嚴重磨損的鐵軌開往奧斯維辛。“我們總是處在擔驚受怕中，”埃娃·斯佩特說，“在火車上當然也很害怕。我們從不知道自己的未來會怎樣，不過你本來也無法預知未來，不知道五分鐘后會不會有地震發生。這很好。”列車向西而不是向北開去，穿越邊境進入奧地利，最終到達林茨（Linz）。列車停了下來，納粹說匈牙利猶太人可以在這里體檢和“消毒”，這個消息讓火車上所有人都陷入了極大的恐慌，他們懷疑這是納粹在耍詭計，擔心自己將被送進毒氣室。“我記得我赤身裸體地站在醫生面前，”埃娃·斯佩特說，“但我看起來仍然非常自豪。我直直地看著他的眼睛，想讓他看看一個臨死之前仍充滿自豪的猶太女人是什么樣的。”她走進淋浴室，卻發現從水龍頭里流出來的是“舒適的熱水”。“我們本來都準備好死在里面了，那一刻覺得，自己撿回了一條命。”

雖然卡斯特納安排的列車并沒有開往滅絕營，但它也沒有像納粹承諾的那樣離開帝國，而是朝德國下薩克森州的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駛去。盟軍于1945年4月解放這個集中營時，其幸存者令人震驚的樣貌被拍成照片在全世界流傳，貝爾根-貝爾森也因此臭名遠揚。然而，匈牙利猶太人到達時的貝爾根-貝爾森是個完全不同的地方，因為這個營地于1943年4月投入使用時有一個特殊的用途，那就是關押一些納粹可能想在一段時間后驅逐出帝國的犯人。

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有好幾個子營地，并且各個子營地的條件相差很多，這讓這個集中營的情況更加復雜。在所謂的“囚犯營”，500名曾參與建造營地的“普通”犯人被關在這里，這個子營地的條件非常艱苦，而在關押用來交換的猶太人（Austauschjuden）的“星星營”，生活雖然也很困乏，但條件相對要好一些。這里的犯人可以與自己的家人住在一起，還可以穿自己的衣服。什穆埃爾·胡珀特[[20]](#_20__BBCFang_Tan__Jian_2000Nian)與他的母親一起被送到貝爾根-貝爾森時還是個小男孩，他們都屬于Austauschjuden，因為他們是為數不多持有巴勒斯坦頒發的入境準許證的猶太人，納粹認為可以用他們來交換人質。“從某種程度來說，生活還算過得去，”什穆埃爾說，“過得去的意思是，我們有三條毛毯，不至于凍著，有一些吃的，雖然不是特別多，但夠我們活下來。我們不用工作。我在貝爾根-貝爾森學會了下棋，到今天我還愛下。最重要的是，我們一直待在一起，我從沒有與我的母親分開過。”

乍看起來，納粹釋放猶太人、把他們送到西方國家的做法與滅絕政策完全格格不入，但我們不該忘記，在納粹制定出“最終解決”方案之前，他們處理所謂的“猶太問題”時更愿意采用的方式，就是對猶太人洗劫一番后將他們驅逐。1938年德奧合并以來，阿道夫·艾希曼一直積極地執行這一政策，它實際上與希特勒“擺脫”猶太人、勒索富人以獲得外幣的政策是一脈相承的。雖然此前從沒有過“100萬猶太人換1萬輛卡車”這種規模的交易，但早在1942年12月，希特勒就在原則上批準希姆萊可以為獲得錢財將個別猶太人驅逐出帝國。

1944年7月，卡斯特納列車上的1684名匈牙利猶太人發現，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并沒有他們一開始擔心的那么可怕。埃娃·斯佩特記得集中營甚至能提供某些“文化生活”，因為犯人有時會組織一些講座和演奏會。不過，對納粹不能遵守承諾的擔憂一直困擾著這些匈牙利人，隨著日子一天天過去，貝爾根-貝爾森的條件越來越糟，這種恐懼也變得更加強烈。好在絕大多數人最后都被釋放了，他們能獲得自由，要感謝貝歇爾等人與瑞士猶太人代表繼續進行的談判。1944年12月，埃娃·斯佩特和她的家人從貝爾根-貝爾森登上列車，這次火車終于把他們帶出了納粹的控制區。“當我知道我們到達瑞士的那一刻，我必須說，我心里的一塊大石頭終于落了地。瑞士人對我們非常好，給我們土耳其毛巾、熱水和香皂。簡直到了天堂。”

6月30日離開布達佩斯的那輛列車會迎來什么樣的命運，卡斯特納和漢莤· 布蘭德無法預料，他們也不會料到一系列戲劇性轉變會在幾天的時間里，導致納粹對匈牙利猶太人的驅逐被徹底終止。就在列車發車前一周，盟軍收到了關于奧斯維辛恐怖暴行的確切而詳細的描述。其實早在1941年，納粹對猶太人的滅絕在西方就不是什么秘密，并且被公開宣傳。丘吉爾本人就曾公開談到過納粹的大屠殺政策，流亡倫敦的波蘭政府在1941年5月也曾告知同盟國各國政府有個關押波蘭人的奧斯維辛集中營，包括他們在那里進行的處決。1942年7月[[21]](#_21___Zui_Zheng_De_Shou_Ji_Yu_Ch)，倫敦出版的《波蘭雙周評論》列出了納粹實施暴行的22個營地，其中就包括奧斯維辛。12月17日，英國外交大臣安東尼·艾登向議會宣讀了一份聲明，譴責納粹的暴行，包括他們對猶太人的屠殺。他的發言結束后，議員們起立默哀了一分鐘。1943年3月，波蘭反抗組織發出的一則消息也提到了幾個猶太人被屠殺的地點，奧斯維辛名列其中；同年6月1日[[22]](#_22___Zui_Zheng_De_Shou_Ji_Yu_Ch)，倫敦《泰晤士報》發表了一篇描述在奧斯維辛“納粹對猶太人有多么殘忍”的文章。

1944年1月，倫敦方面收到一位代號為“萬達”（Wanda）的波蘭特工撰寫的報告，這是讓盟軍對奧斯維辛有進一步認識的又一重要事件。[[23]](#_23__Te_Bie_Zhi_De_Yi_Du_De_Shi)這份報告寫道：“婦女兒童被塞進小汽車和卡車里，然后被送到（奧斯維辛-比克瑙）毒氣室。在那里，他們要度過極其痛苦的10到15分鐘，最后窒息而死。”[[24]](#_24__Yin_Zi___Ying_Guo_Ren_He_Me)報告繼續寫道，“每天有1萬人”在“三個巨大的焚尸場”被殺害，已有近65萬猶太人死在這個集中營。由于與這個話題有關的許多文檔仍屬機密，因此我們只能推測萬達的報告為何幾乎沒有什么影響。其中一部分原因或許是，奧斯維辛同時作為集中營和滅絕營有著多重功能，這種復雜性讓它難以被解釋清楚。另一個可能的原因，從接下來圍繞是否轟炸集中營進行的一場短暫辯論我們就可以看出，盟軍認為對奧斯維辛的關注會分散精力，妨礙他們完成最重要的任務——擊敗德國。

人們對奧斯維辛的認識，由于四名犯人的行動又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其中，魯道夫·弗爾巴和阿爾弗雷德·韋茨勒兩人于1944年4月逃出奧斯維辛，阿爾諾斯特·羅辛和切斯瓦夫·莫爾多維奇則是在5月成功越獄。他們逃到不遠處的斯洛伐克，在那里講述的內容后來經過整理，成了著名的《奧斯維辛報告》（Auschwitz Protocols）。卡斯特納于4月28日到達斯洛伐克，并拿到了基于前兩位證人提供的證詞所寫就的初步報告，但他決定不發表報告的內容，大概是擔心那會對他與艾希曼的談判造成不利影響。直到6月，西方國家才讀到《奧斯維辛報告》。6月18日，英國廣播電臺播出了與奧斯維辛相關的新聞，20日，《紐約時報》刊登了關于這個集中營的三篇系列文章中的第一篇，寫到“臭名昭著的德國集中營，比克瑙和奧斯維辛毒氣室”的存在。[[25]](#_25__Yin_Zi_Robert_Jan_van_Pelt)

可以肯定，1944年6月到7月間公眾對奧斯維辛大屠殺的了解促成了政策上的一個變化，主要是軸心國方面。自從大批匈牙利猶太人遭到驅逐以來，很多人向匈牙利國家領導人阿德米拉爾·霍爾蒂（Admiral Horthy）提出抗議，就連教宗庇護十二世也向霍爾蒂呼吁停止驅逐行動（他因沒有在戰爭中公開譴責納粹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而遭到廣泛批評），因為5月份羅馬教廷通過越獄者的報告了解到奧斯維辛內的恐怖情形。羅斯福總統和瑞典國王也接連對霍爾蒂進行游說。終于，到了6月26日，日內瓦猶太人事務局的一位工作人員理查德·利希特海姆向英國發了一封電報，電報包含與《奧斯維辛報告》有關的信息，并號召盟軍追究部分匈牙利政府官員對這一罪行負有的責任。這封電報被匈牙利當局截獲，并在7月初呈交給總理多姆·斯托堯伊（Dome Sztojay），隨后霍爾蒂被告知了電報的內容。

對這位76歲的匈牙利領導人來說，這樣的結局是他無法接受的。1940年，他認為德國人會贏得戰爭，因此支持德國；1943年，他又覺得他們可能會輸，因此嘗試著逐漸向盟軍靠攏；到了1944年3月，德軍占領了他的國家后，他與希特勒合作，因而得以繼續留在自己的位子上；現在，面對即將對他個人展開的問責行動，這個人再次見風使舵。他通知德國人，對匈牙利猶太人的驅逐必須終止。在匈牙利軍隊的保護下，霍爾蒂于首都下達了指令，7月9日，官方的驅逐行動正式停止。

可以說霍爾蒂在德國人最脆弱的時候又給了他們沉重一擊，因為1944年6月對納粹德國來說是一個災難性的月份。6月6日，盟軍在諾曼底海岸登陸，到7月初，局勢已經明朗，盟軍不會像希特勒預言的那樣再退回到海上。而在這中間，蘇聯于6月22日發動了“巴格拉基昂行動”，重挫白俄羅斯的德國中央集團軍。這個行動在西方不像諾曼底登陸那樣為大眾所熟知，但對于霍爾蒂來說，其統治國土位于歐洲中心，巴格拉基昂行動的意義重要得多。應對諾曼底登陸德國只派出30個師，而他們部署了165個師的重兵與紅軍交戰，但仍被紅軍擊退。用不了幾個月，蘇聯人就將攻入布達佩斯。與之前丹麥的維爾納·貝斯特一樣，此時的霍爾蒂意識到，是時候編造理由為自己開脫了。

揭露奧斯維辛真實面目的詳細信息傳到西方，還產生另一個影響，那就是引發了一場關于是否應該炸毀集中營的爭論，這個問題到今天仍沒有定論。1944年6月，位于華盛頓的戰時難民委員會接到一位名叫雅各布·羅森海姆的人發來的請求，他來自“以色列世界組織”（Agudas Israel World Organization），希望盟軍炸毀通往奧斯維辛的鐵軌。六天后，戰時難民委員會的領導人約翰·佩勒向戰爭部助理秘書長約翰·麥克洛伊轉達了這一請求，同時補充道，他對于這個提議的可行性有“一些疑慮”。[[26]](#_26__Yin_Zi_Martin_GilbertDe_Wen)6月26日，麥克洛伊拒絕了這個建議，認為它一方面不現實，另一方面會消耗本該用在其他“決定性戰役”中的炸彈。[[27]](#_27__Yin_Zi_NeufeldHe_BerenbaumB)

6月24日，華盛頓又收到另一封電報，這次是日內瓦的世界猶太人大會（World Jewish Congress）通過瑞士的戰時難民委員會發來的。這封電報也提出了一些建議，其中一條是炸毀毒氣室。7月4日，出于6月26日信件中列出的相同原因，麥克洛伊也拒絕了這個提議。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時期麥克洛伊的下屬格哈特上校在給麥克洛伊的辦公室內部備忘錄中有這樣一句話：“我知道你對我說過，讓我‘斷然拒絕’這樣的要求……”[[28]](#_28__Yin_Zi_NeufeldHe_BerenbaumB)這至少意味著，炸毀毒氣室的想法沒有經過進一步考慮就被否決。

倫敦也收到了轟炸奧斯維辛的請求。7月7日，丘吉爾得知這一請求后，向他的外交大臣安東尼·艾登寫下了那句著名的話：“盡管從空軍那里調用資源，如需我的支持請告知。”[[29]](#_29__Yin_Zi_NeufeldHe_BerenbaumB)在空軍部考量了各種可能的方案以后，空軍大臣阿奇博爾德·辛克萊爵士于7月15日給出了一個大體上否定的答復。他向艾登指出，英國人擅長的是夜間轟炸，英國轟炸機指揮部無法安排轟炸機在一夜的時間內飛越如此遠的距離。只有美軍可以在白天轟炸，因此他建議把這個任務交給美國人來完成。他還提議道，美國人最好能在轟炸毒氣室的同時空投一些武器，爭取促成一次大規模越獄。不管怎樣，從他的信件中可以明顯看出，他把全部責任都推給了美國空軍。美方將軍斯帕茨不久之后訪問了英國空軍部，英國人就這個方案向他征求了意見，他提出接下來可以對集中營進行空中偵察，這個提議被轉達給外交部，但后來再沒有被提及。

關于轟炸奧斯維辛的討論持續了整個夏天。8月，世界猶太人大會再次請求美國采取行動，但仍遭到美國戰爭部約翰·麥克洛伊的拒絕。一位英國外交部官員在一封內部備忘錄中寫道，且不論現實上的困難，不進行轟炸還有“政治”原因：幾乎可以肯定，大批流離失所的猶太人會在戰后回到巴勒斯坦尋找他們的圣殿，而那片區域當時正由英國人統轄。[[30]](#_30__Yin_Zi_NeufeldHe_BerenbaumB)

就這樣，位于大西洋兩岸的兩個國家都決定不轟炸奧斯維辛。更重要的是，他們甚至沒考慮轟炸的可行性。沒有人對集中營進行空中偵察，沒有人進行可行性研究，沒有人對不同備選方案進行過任何詳細評估。可以明顯感覺到，兩國政府關注的焦點完全在別的地方（可能溫斯頓·丘吉爾是唯一的例外，但他在寫下了“盡管從空軍那里調用資源”之后，也沒有再提及此事）。當然，英國人和美國人在1944年7月有很多要考慮的事，其中，盟軍在諾曼底的戰役便牽扯了他們大量的精力。此外，紅軍已經兵臨華沙城下，波蘭的“家鄉軍”（Home Army）也需要支援，7月20日，阿道夫·希特勒差點在他位于東普魯士的總部被刺殺。對于盟軍空中部隊來說，顯然有很多更重要的任務等待著他們完成。我們不難看出，無論在倫敦還是在華盛頓，占主流的都是以下觀點：摧毀奧斯維辛最好的方式就是直接忽視集中營，把全部精力放在盡快取得陸地戰役勝利上面。這種想法無可厚非，但其背后似乎隱藏著一個不大光彩的原因：未經認真考慮就做出的決定，一些文件里使用的不屑一顧的口吻，這一切都讓人不禁產生一種感覺，那就是沒人費心把轟炸奧斯維辛當成一件重要的事來對待。

那些當即拒絕轟炸請求的官員，要是知道這個問題在今天引發了多少學術討論，一定會大吃一驚。有一種流行的觀點已經深入人心：一位學者在與猶太人展開討論時發現，“不少人堅信，轟炸集中營可以讓600萬猶太受害者中的許多人獲救。”[[31]](#_31__Deborah_E__Lipstadt__Wei_Sh)轟炸問題已遠遠超越了事實層面的辯論，成為一種象征——它意味著盟軍本可以阻止猶太人被殺害，卻選擇不這樣做。正是出于這個原因，我們需要認真而冷靜地分析這個問題，以防止越來越多的人錯誤地認為，“600萬人中的許多人”真的能夠因轟炸而獲救。

當然，在討論盟軍對奧斯維辛的轟炸時有個問題，那就是它并沒有真的發生。我們要分析的是一段與事實相悖的歷史，因此誰也不知道另外一種結局究竟會是什么樣。雖然專家們在轟炸通向集中營的鐵軌這個問題上基本達成一致，認為那樣做于事無補，因為納粹可以讓列車改用其他軌道駛向奧斯維辛，并且可以迅速修好被炸毀的鐵軌，但在轟炸毒氣室問題上，學者們卻沒有取得類似共識。一篇篇充滿激情的文章詳細描述著空襲可能會遇到的大量困難，無論實施轟炸的是美軍的B17或B24轟炸機，還是英國的輕型蚊式戰斗轟炸機[[32]](#_32__James_H__KitchensIII__Hong)；而另一些文章則激烈地質疑所謂的技術困難，指出轟炸完全可以摧毀焚尸場[[33]](#_33__Stuart_G__Erdheim__Meng_Jun)。與很多歷史假設一樣，我們無法得到確定的答案。

幸運的是，至少還有一個方法可以讓我們解開謎團，那就是盟軍收到那些迫切而執著的轟炸請求的時間點。考慮到《奧斯維辛報告》送到盟軍手上的時間，以及霍爾蒂決定停止向奧斯維辛遣送匈牙利猶太人的時間，我們基本可以確定，無論轟炸集中營還是轟炸鐵軌都不可能阻止匈牙利猶太人被殺害，因為盟軍拿到集中營詳細信息時已經太晚了（對匈牙利猶太人的驅逐于7月9日正式停止，而英國空軍部長就推遲的轟炸行動向艾登提出拒絕的日期是15日）。

另一個基本可以確定的事實也能幫助我們分析這一復雜問題，那就是轟炸不會對集中營里的滅絕行動產生任何實質影響。《奧斯維辛報告》里詳細描述了四個主要焚尸場的位置，但即便轟炸機在白天經過精確瞄準向這些焚尸場投放炸彈，即便它們被徹底摧毀，納粹仍可以在奧斯維辛其他地方使用毒氣。至關重要的一點是，《奧斯維辛報告》中并沒有寫明“小白房”和“小紅房”的地點，而它們的屠殺能力已足夠滿足納粹當時的需要。在匈牙利的驅逐行動停止后，奧斯維辛有大量屠殺設施閑置。高峰時期這里每天有一萬人被殺死，此時屠殺人數下降到平均每天不到1500人，且這樣的數字一直持續到11月焚尸場被關閉。[[34]](#_34__Richard_Levy__Zai_Tan_Hong)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就算盟軍響應1944年夏天的轟炸請求，對集中營發動空襲，他們也不能真的解救“600萬人”中的“許多人”，相反，幾乎可以肯定他們一個也救不了。事實上，轟炸很可能會對一些離焚尸場僅數米遠的營房造成連帶性破壞，并奪去幾百名犯人的性命，而這群人正是空襲本要拯救的對象。

當然，這是一個理性的結論。鑒于與這個問題有關的大量討論都停留在感性層面，這個結論大概會令很多人感到不滿，他們更愿意相信，盟軍本可以做更多的事來阻止屠殺的發生。這不是完全沒有可能，例如，朝集中營空投槍支或許能促成一場反抗運動。然而，在沒有任何準備的情況下，因極度饑餓而虛弱不堪的犯人即時策劃出一場反抗行動的可能性極低，更何況他們面對的是瞭望塔里荷槍實彈、被四周電網保護起來的黨衛隊士兵。可惜我們永遠不會知道答案，這又是站在現在對過去一件沒有發生的事進行假設。

關于轟炸奧斯維辛問題的討論之所以如此激烈，是因為它背后隱含著一個更宏大、更寬泛的追問：拯救猶太人的努力是不是做得不夠？舉例來說，早在1943年初，英國政府就確切知道納粹對猶太人的系統化屠殺行動，甚至知道萊因哈德行動滅絕營的具體名字和每個滅絕營的死亡人數。盡管有埃莉諾·拉思伯恩等議員請求放寬移民限制，讓保加利亞、匈牙利和羅馬尼亞的大批猶太人獲準轉移到安全的國家，但英國政府一直對這個提議堅決予以否決。1943年2月，安東尼·艾登在回復一位名叫威廉·布朗的議員提出的類似請求時說：“要想終結猶太人的苦難，甚至我可以說要想終結歐洲其他受難之人所忍受的折磨，唯一真正有效的方法就是讓盟軍贏得勝利。”[[35]](#_35__Yin_Zi_Martin_Gilbert___Ao)幾周后，也就是1943年3月，艾登在華盛頓參與討論時說到，重要的是，“在主動提出把所有猶太人運出國時要格外謹慎”，并補充道，“如果這樣做，全世界的猶太人都會希望我們在波蘭和德國也采取相同的做法。面對這種要求希特勒不會善罷甘休的，而且全世界的船和其他交通工具加起來都不夠。”[[36]](#_36__Yin_Zi_Gilbert___Ao_Si_Wei)（可在戰爭的最后三年，他們卻找到了足夠的船只運送40多萬德國和意大利戰俘跨越大西洋。[[37]](#_37__Yin_Zi_Gilbert___Ao_Si_Wei)）1943年5月19日，埃莉諾·拉思伯恩在英國下議院進行演說，嚴厲譴責了盟軍的不作為：“如果在這場戰爭中不該喪命的人的血匯流成河，涌進白廳街，那么血河將把街邊那一棟棟灰色的樓房全部淹沒，那里就住著我們的統治者。”[[38]](#_38__Yin_Zi_Gilbert___Ao_Si_Wei)誠然，我們無法確切知道，如果盟軍不畏威脅、取消對猶太人的移民限制會發生什么，但拉思伯恩女士的觀點讓人不能不認同，那就是盟軍本可以提供更多援助。因此，如果現有的爭論不再集中在轟炸奧斯維辛，而是轉到盟軍戰時移民政策這個無疑更加復雜的問題上，那么辯論可能會更有成效。

對匈牙利猶太人的驅逐被停止后，艾希曼在布達佩斯暴跳如雷，而另一端的奧斯維辛也受到了影響：由于毒氣室空閑下來，納粹決定將比克瑙一個子營地里的犯人全部處死，那就是吉卜賽營。1943年2月以來，比克瑙的這一特殊區域（最多時）擁有約2.3萬名吉卜賽人。他們不必與家人分開，可以穿自己的衣服，也不用剃頭發。但沒過多久，吉卜賽營就成了奧斯維辛條件最惡劣的營地之一：人口過度密集，缺乏食物和水，這些又進一步導致疾病肆虐，特別是斑疹傷寒和一種名為走馬疳的皮膚病，奪走了幾千人的性命。在2.3萬名被送到奧斯維辛的吉卜賽人當中，總共有2.1萬人死在了那里，有的是因為疾病，有的是因為饑餓，還有一些在吉卜賽營最后被清空時死在了毒氣室。

在納粹看來，吉卜賽人是危險的、“反社會的”種族，應該被清除。考慮到被迫害人數占種族總人口的比例，吉卜賽人是第三帝國內除猶太人之外受苦難最深重的民族。究竟多少吉卜賽人被納粹殺害并沒有一個確切數字，據估計應有25萬到50萬。然而，納粹在不同國家實行的反吉卜賽人政策并不一致：在蘇聯，吉卜賽人與猶太人一樣，都死在特別行動隊的槍口下；在羅馬尼亞，吉卜賽人的人數雖多，但他們并沒有集體成為屠殺的對象（但還是有幾千人死于非人的對待）；在波蘭，大部分吉卜賽人被送進了集中營；在斯洛伐克，迫害政策的執行力度不盡相同；而在德國，許多吉卜賽人先是被送到了波蘭的隔離區，比如有5000人被送到了羅茲，后來又成為1942年1月最早死在海烏姆諾毒氣貨車里的受害者。

在德國，納粹認為吉卜賽人最“危險”之處，便是通過所謂的“混血”（Mischlinge）將吉卜賽種族特征轉移到“雅利安”人身上。有一個例子可以鮮活地說明，納粹在這方面的敏感到了多么夸張的地步。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個名叫埃爾澤·巴克[[39]](#_39__BBCFang_Tan)的小女孩，1944年夏天，8歲的她突然被帶到了比克瑙的吉卜賽人營地。就在年初，她還與自己的家人幸福地生活在漢堡。雖然戰爭也給他們帶來了困擾，但生在一個普通德國人家庭中的她仍過著相對安全的生活——或者說她本以為如此。然而，1944年年初的一個夜晚，她家突然響起一陣敲門聲，幾個陌生人闖了進來，自稱是蓋世太保。他們聲稱要把埃爾澤帶走，帶到她“真正”的母親身邊。埃爾澤在父母絕望的注視下被拖走，離開了自己的家，被黑漆漆的夜色包圍。她被帶到港口旁的一個大倉庫內，那里全是吉卜賽人，她記得很多人都披頭散發，衣冠不整。埃爾澤穿著母親給她的最好的衣服，站在那里看著那些人，陷入震驚。直到后來她才發現，她“真正的”母親有一半吉卜賽血統。一直被她當作親生父母的人其實是她的養父母，她十個月大時被領養，并由他們撫育長大。

和其他吉卜賽人一起，埃爾澤被趕上一輛載貨列車，送到了奧斯維辛。她記得自己被帶進比克瑙的“桑拿室”，被要求脫光衣服洗澡。后來她試圖從一堆衣服中找出自己的，但怎么也找不到。作為一個教養良好的小女孩，她不想拿走任何不是自己的東西，因此她孤零零地站在那里，什么也沒有穿，而她身邊其他的吉卜賽人紛紛挑揀最好的衣服給自己穿上。最后，她面前的水泥地上只剩下了五六件衣服，她旁邊的一個女人對她說：“你隨便抓一件穿吧。”結果，來時穿著自己最好的衣服、有層層冬衣御寒的埃爾澤，此時卻只穿上一條短內褲和一條薄薄的夏裙。

在陰暗擁擠的營房里，四周全是吉卜賽人家庭，這個8歲的小女孩由于驚恐而陷入了沉默。她不說話，也不哭，因為沒人在意她的眼淚。她淹沒在亂糟糟的人群中間，而在她看來，這些人全都“只顧自己死活”。后來一份從天而降的好運可說是救了她的命：一個名叫萬達的卡波可憐她，讓她住在自己的小房間里，睡在旁邊一張鋪著毯子的桌子上。那個地方“比營房里要強一百倍”。在集中營里的大部分時間，埃爾澤都在漫無目的地閑逛。每天她都會走到吉卜賽營的邊緣，那里的鐵絲網緊挨著鐵軌，她就在那兒看新犯人到達。她看見“大部分穿得很好”的人排著隊朝一個方向走去，后來她才知道，那通往焚尸場，而他們是被篩選出來毒死的匈牙利猶太人，當然她那個時候并不了解這些。鐵絲網外沒有新犯人可看的時候，她就會“玩”她僅有的一個玩具——從一副眼鏡上掉下來的一個鏡片，這是她在地上撿到的，她會找些干草堆成一堆，然后用鏡片聚焦太陽光，直到把干草點著。

幾周后，萬達對埃爾澤說：“你不能再跟我住在一起了。”她隨即離去。“我特別驚慌，”埃爾澤說，“我又是一個人了。我沉浸在驚慌中，不明白周圍發生著什么……我分不清白天黑夜，覺得一切都亂了套，你怎么形容都行。”埃爾澤記得她又被送回營地里一個比較大的分區，但這個分區沒有以前那么擁擠，因為在這之前黨衛隊組織了一輪篩選，很多吉卜賽人被轉移到集中營其他地方。隨后，停水了，所有人被要求回到營房。那天晚上有“很大的聲響，是很大聲的尖叫，我以前從沒聽到過那種尖叫”。我們無從確定當時外面發生著什么樣的暴行，可能是集中營里任何一次行動，可能是黨衛隊正在為接下來將要組織的吉卜賽營清空行動做準備。但有1400名吉卜賽人被挑選出來送往另一個集中營，從而逃過了最后的恐怖滅絕，埃爾澤便是其中之一。奧斯維辛的記錄顯示，編號為吉卜賽人10540號的埃爾澤于1944年8月1日離開。

即使是最有創造力的小說家也編不出埃爾澤的親身經歷。想想看，一個8歲的小女孩在成長過程中一直以為自己是德國人，卻突然從深愛她的父母身邊被奪走，被告知自己是領養的，而且還有吉卜賽血統，隨后被送到奧斯維辛，陷入完全自生自滅的境地，直到被一個卡波照顧，后來再次被拋棄，在暗無天日的營房中生活在一群陌生人中間，外面還發生著可怕的暴行，最終被送到另一個集中營。難怪埃爾澤會覺得這段曲折的經歷“讓你下半生再也不會對什么事感到驚訝，我絕對有發言權，真的會這樣”。

埃爾澤離開奧斯維辛的第二天，也就是8月2日晚上，吉卜賽營被清空，許多人目睹了納粹這一行動的恐怖場景，瓦迪斯瓦夫·斯米特[[40]](#_40__BBCFang_Tan_1)是其中一個。他本是吉卜賽人，卻被納粹誤當成波蘭政治犯，關在比克瑙與吉卜賽營相鄰的子營地，而他的許多親人就在隔壁。8月2日晚，他看到納粹抓起吉卜賽兒童朝卡車的一側撞去，聽見自動機關槍開火和手槍射擊的聲音。他看見吉卜賽人用他們找到的一切能當武器的東西奮力反擊，比如勺子或小刀，但他們很快就敗下陣來。“我開始哭喊，”他說，“我知道他們要被送去殺死。一切都結束了。當時的我肯定是全天下最痛苦的人。”那天晚上，2897名吉卜賽人被趕進焚尸場毒死，其中很多人的尸體就在附近的露天大坑里火化。

與此同時，埃爾澤被帶到位于柏林北部的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她在那里捱過了幾個星期，饑寒交迫，幾近昏迷。1944年9月的一個早晨，救贖的時刻終于到來：擔任她分區卡波的波蘭女犯點到她的名字。埃爾澤被送到行政區，突然被告知：“你馬上就自由了。”隨后被要求去沖澡，除了剛到奧斯維辛那天，這是她后來第一次洗澡。她赤裸著身體被領進一個房間，里面是堆得高高的衣服。她站在那里，“非常害怕和驚慌，什么也不敢做，就光著身體，渾身濕漉漉的，四處張望著，大概是等著因為走進這里而遭到處罰，我曾經在什么錯事都沒做的情況下挨打”。由于她太久都沒有從那個房間出來，一個女人不得不進來幫她穿衣服。接著，埃爾澤在行政區的一間辦公室里等待，直到她的養父被帶進來。看見養父時，埃爾澤的感覺是“麻木”：“太麻木了，什么感覺都沒有。如果他們那時對我說：‘全能的上帝來看你了’，我也不會有任何觸動。”被釋放之前，埃爾澤還要簽一份文件，這是所有離開集中營的犯人都要做的，以表示他們同意不泄露自己所在的地點，也不透露自己所經歷的事情。“我不需要劃十字，因為我會寫字，”她說，“我想那大概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簽名。”

隨后，埃爾澤與她的養父一起登上列車回到了漢堡。他們所在的那節車廂里有位德國陸軍軍官，埃爾澤還記得，養父向這位軍官講述了自己的養女被捕并被囚禁的經歷，而這一切只因為小女孩的外祖母是吉卜賽人：“他掀起我的裙子，露出我的腿，我的腿上都是潰爛的傷口。他說：‘這就是你們在前線為之奮斗的東西。’”她不記得那位軍官如何回答，但她記得她一回到家，她的姐姐就用土豆泥給她做了一個蛋糕（當時糖是限量配給的），并煮了幾根胡蘿卜插在上面當蠟燭。離開學校6個月之后，埃爾澤又回到了課堂，重新假裝自己是個普通的8歲德國小女孩。

沒人知道埃爾澤究竟為什么獲救，蓋世太保在戰爭結束時銷毀了所有可能揭開謎底的資料。或許是因為她的養父提出抗議，指出她已經完全同化于德國社會，而這一抗議最后終于被當地的納粹官員接受。那一年埃爾澤的養父甚至加入了納粹黨，以表明自己的忠心，很可能是這個舉動扭轉了局面。不過，可以肯定的是，6個月噩夢般的生活給一個人造成了極大的傷害。“人類的墮落沒有底線，”埃爾澤·巴克說，“這是永遠不會改變的事實。它是個特別憤世嫉俗的看法，但是根據我的親身經歷得出的。我很抱歉要這樣講。”

突如其來的暴力虐待，專斷霸道的行為，隨心所欲的殘忍，埃爾澤·巴克的個人遭遇揭示出奧斯維辛生活中最可怕的地方。但或許最重要的是，她的經歷表明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可以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讓犯人們有更大的可能活下來，實際上也讓這樣的生活更值得繼續。在埃爾澤的例子中，我們很難想象如果沒有萬達的幫助，她如何能熬過奧斯維辛的這段日子。對于這一點，與埃爾澤同時被關在奧斯維辛-比克瑙的艾麗斯·洛克·卡哈納也有同感。之前，艾麗斯對姐姐埃迪特的愛已經讓她在集中營一次次鋌而走險，只為能與姐姐在一起。但那年夏天她們遇到一個問題：埃迪特染上了傷寒，被送去醫護營房。對于埃迪特來說，這可能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不光因為那里的醫護條件不夠好，還因為納粹會對醫護營房里的病人進行頻繁的篩選，把選出來的人直接送進毒氣室。然而，艾麗斯堅信埃迪特一定能活下來，并且經常去探望她。為了進入醫院，她省下自己的面包拿去賄賂卡波，還答應幫她把前一天晚上死去的犯人尸體搬出醫院。“我只有15歲，”艾麗斯說，“之前從沒見過死人。我想，這些人昨天還活著，能說話、能走路，可現在卻被我扔在地上堆成一堆。這是件很恐怖的差事，但為了見到埃迪特我必須做這些，哪怕只能見她一分鐘。”

作為醫務室的訪客，艾麗斯很受歡迎，因為所有病人都想知道外面發生了什么。每當探望姐姐的艾麗斯走在醫護營房里，里面的犯人總會拉著她的衣服問：“外面有什么新鮮事？”置身于這個暗無天日、疾病肆虐的醫院，聞著排泄物和腐爛物質的味道，耳邊是垂死之人的呻吟，艾麗斯總是努力給這里的犯人一些慰藉：“我學會編故事，比如戰爭很快就要結束了。‘堅持住！’我們很快就可以回家了。”但艾麗斯知道事實，她親眼目睹人們從醫務室“消失”的速度有多快，一些人死在他們的床鋪上，另一些被挑出來送進了毒氣室。因此，盡管埃迪特病得很重，艾麗斯還是決定把她帶出醫院。她對埃迪特說：“如果你能忍受得了，你就裝死，我把你運出去，然后咱們回自己的營房。”第二天，埃迪特裝成死人，艾麗斯把她和其他那些在前一晚過世的人一起運出了醫院。她們一到醫院外，艾麗斯就攙扶著姐姐蹣跚地穿過比克瑙，回到自己原來的營房。

然而，在醫護室外面那個全是“健康”女性的環境中，保護生病的姐姐更是難上加難。“每天都有篩選，”艾麗斯說，“（他們）特別嚴厲，特別可怕。”女人們常常要站在衣冠楚楚的約瑟夫·門格勒博士面前等待。“那個時候我們身上都長滿虱子，那種感覺真是恐怖，太恐怖了。沒有什么比你覺得你渾身長滿虱子更屈辱。你的腦袋、衣服，你身體的任何地方，無論你往哪里看，都能看見有東西在爬。而且你沒法洗，沒有水。”

一天，艾麗斯和她的姐姐被選中，不過她們只是被調到比克瑙的另一個營房。就在那里，艾麗斯有了一次不可思議的與死神擦肩的經歷。當時是1944年10月，天氣已經越來越冷，分區的卡波讓所有青少年出列，說他們可以額外領到一些衣服。艾麗斯決定加入到這支“孩子”的隊伍，去領一些暖和的衣服給埃迪特穿，好讓她熬過波蘭即將到來的寒冬。“于是我們就去了。我們來到一棟漂亮的樓房前，樓房的窗臺上還擺著鮮花。我們走了進去，黨衛隊女兵說：‘所有人都把自己的鞋子放整齊，把衣服脫了放在地板上。’我們被帶進一個房間，大家都光著身子。”艾麗斯和其他人坐在房間里等待著，以為自己在領到說好的新衣服前要先洗個澡。“那個房間很大，墻壁是灰色的。光線很暗，等他們關上門以后，里面幾乎全黑了。我們坐在那里等著，凍得直打顫。就在那里等啊等啊等。”突然，門被猛地推開，一個黨衛隊女兵大叫著：“趕快離開這兒！趕緊出去！”并把這些大孩子的衣服扔還給他們。“快走！”她叫著，“跑得越快越好！”艾麗斯找不到自己原來的衣服，只好隨便穿上一件，回到了營房。回去以后她向其他人抱怨：“他們跟我們說會領到暖和的衣服，結果我自己的衣服都丟了！”其他犯人對她說：“傻孩子！你不知道你剛才在什么地方嗎？”直到這時她才意識到，她剛才等待的地方，是五號焚尸場的毒氣室。

艾麗斯的故事中最令人驚奇的地方是，即便已經在比克瑙住了好幾個月，她仍沒有意識到她被送到何處。她當然聽說過毒氣室，任何一個在比克瑙待過幾天的人都知道毒氣室的存在。然而，為了應對集中營里的艱難生活，艾麗斯屏蔽掉了這類信息，她肯定不清楚屠殺的具體機制。“我的注意力全在埃迪特身上，”艾麗斯說，“我把所用精力都用來讓埃迪特活下來，因此我并沒有想過那些恐怖的事。或許也因為那一切都太可怕了，已經超出了你的理解范圍。一個在正常環境下長大的15歲女孩，怎么能理解自己會被他們送進毒氣室？畢竟已經是20世紀了呀！我會去看電影，我的父親在布達佩斯有辦公室，我從沒聽說過這樣的事。在我們家你絕對不能說一個臟字。你怎么可能想象如此齷齪的事情？想到他們會用這種方式殺人？我們還一直被教育說德國是一個文明的國家。”

這是一個重要的發現：就連那些生活在焚尸場煙囪旁邊的人，都能把這些地方的存在從自己的思想中抹除。他們之所以能做到這點，不僅因為屠殺工廠的實際功用太過恐怖，讓人難以想象，還因為他們在集中營的每一天都過著屈辱的生活：他們穿著爬滿虱子的衣服，搶著用廁所，努力尋找糊口的食物，身邊的一切都骯臟污穢，所有這些都讓他們只關注眼下如何生存，而拋棄了其他所有念頭。但艾麗斯之所以沒有認出她所置身房間的實際用途，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60年過去，她依然清楚地記得走近焚尸場時看到了紅色的花，可能是天竺葵，它們種在盒子里，擺在窗臺上。在奧斯維辛艾麗斯從未見過鮮花，對她來說，那些花讓她想起過去安穩的生活：“我看見窗邊的花，它們讓你想起了家，讓你想起德國人攻進匈牙利時，母親出門去了，她沒有害怕、沒有哭喊，也沒有歇斯底里，而是到市場上買了紫羅蘭回來。那讓我感到非常平靜。如果母親還去買花，就說明情況不至于太糟。他們不會傷害我們。”正是這些小小的設計——比如焚尸場窗臺上的花——讓納粹的屠殺過程超越了單純的暴行，直到今天，這里頭所蘊含的深刻嘲諷在所謂的“文明”世界里無出其右。

那天艾麗斯之所以能夠活命，完全得益于一份不可思議的好運氣：她坐在毒氣室里的日期是10月7日，這是奧斯維辛歷史上特殊的一天，因為這天發生了特遣隊起義。早在6月，一些特遣隊成員就在一個地下反抗組織的協助下籌劃著反抗守衛的起義，該組織的領導人是一位名叫雅各布·卡明斯基的犯人。然而，這個計劃后來敗露。在奧斯維辛，猶太犯人很難進行秘密的反抗運動，一方面因為集中營里嚴密的卡波網絡時刻監管著他們，另一方面當然也因為集中營里高得驚人的死亡率。卡明斯基遭到告發，但團隊中其他核心成員活了下來，繼續努力“順手牽羊 ”他們能找到的所有武器，比如小刀、十字鎬等等，并透過鐵絲網與比克瑙的其他犯人進行交涉，以便獲得更多武器。

特遣隊員們覺得，他們無論如何也要在10月7日采取行動。因為就在幾天前，黨衛隊宣布招募“志愿者”為奧托·莫爾工作，這個黨衛隊軍官是所有焚尸場監工中最臭名昭著的一個，最近他被派往格利維采（Gliwice）子營地擔任指揮官。犯人們都知道這是個騙局，因為上一批被“選派去”馬伊達內克營地的特遣隊成員，實際上都被黨衛隊殺害了，他們的尸體當夜在2號焚尸場被火化。第二天早上，留下來的特遣隊成員認出了同伴燒了一半的尸體。他們曾對納粹為自己安排的最終結局抱有幻想，現在，連最后一絲希望也破滅了。

此外，特遣隊成員很清楚，自己對納粹的利用價值已經大打折扣。8月和9月，羅茲隔離區被清空，6.5萬名犯人到達奧斯維辛。正因為如此，納粹才沒有更早就開始削減奧斯維辛特遣隊的人數。此時，由于沒人“自愿”站出來申請“調到”格利維采，他們聽說4號和5號焚尸場的卡波已接到命令，要選出300個特遣隊成員“派往橡膠廠”。與納粹承諾特遣隊成員的所有目的地一樣，這些工廠當然也是子虛烏有。

面對迫在眉睫的死亡威脅，10月7日那個星期六的下午1點半，4號焚尸場的特遣隊成員發起了反抗。[[41]](#_41____Ao_Si_Wei_Xin__1940__1945)他們用十字鎬和大石塊當武器，等守衛靠近時對他們進行攻擊，隨后在焚尸場放了一把火。在與黨衛隊看守肉搏數分鐘后，一些特遣隊成員成功逃到附近的樹叢里，跑到拉伊斯科（Rajsko）這個小村莊以外的地方，但他們仍被困在奧斯維辛隔離區范圍內。與此同時，2號焚尸場的特遣隊成員也奮起反抗，把一個黨衛隊守衛推進了燃燒著的焚尸爐中。

約有250名奧斯維辛特遣隊成員在后來的報復中喪命。所有逃跑的人最后都被抓了回來并被槍決，另有一些被懷疑參與了起義的人也遭到殺害，共計200余人。特遣隊那一天的行動造成三名黨衛看守被殺。不過，這次起義也救了很多人的命：幾乎可以肯定，正是特遣隊在4號焚尸場造成的混亂，讓黨衛隊放走了隔壁5號焚尸場毒氣室里的艾麗斯·洛克·卡哈納等人。

奧斯維辛特遣隊暴動發生后的第九天，匈牙利的政治局勢再次發生變化，在納粹的支持下，匈牙利箭十字黨（Arrow Cross）推翻了拒絕服從的霍爾蒂政權。驅逐停止后，幾個月以來一直靠酒精度日的艾希曼立即召見卡斯特納，一見面就對他說道：“我回來了！”布達佩斯的猶太人本已逃過被驅逐的命運，現在卻成了艾希曼的新目標。鑒于紅軍正在逼近，安排那么多輛列車也有困難，把這些人送去奧斯維辛是不現實的，因此艾希曼決定，讓他們步行到120多英里之外的維也納。

11月，成千上萬名猶太人被迫離開布達佩斯，開始了向西的跋涉，在沒有食物、雨雪交織的情況下朝奧地利艱難行進，其慘烈景象讓心腸最硬的納粹軍官都看不下去，艾希曼被要求停止驅逐，然而他卻無視命令執意繼續，遭到目睹慘狀的中立國代表的強烈譴責。考慮到布達佩斯還有超過10萬名猶太人，眼看就要成為艾希曼殘酷行軍計劃的受害者，庫爾特·貝歇爾這個一向更為務實的納粹分子就他同僚的做法向希姆萊提出了抗議。貝歇爾和希姆萊都很清楚，戰爭很快就會結束，作為戰敗的一方，德國人的意識形態需要向現實妥協。

希姆萊把貝歇爾和艾希曼叫到他位于黑森林特里堡（Triberg）的私人列車上開會。按照貝歇爾的說法，希姆萊要求艾希曼停止驅逐匈牙利猶太人，并說：“到目前為止你一直都在滅絕猶太人，但我現在命令你從今天開始變成猶太人的擁護者。”[[42]](#_42__Jian_Kurt_Becher_1947Nian_7)對希姆萊這個納粹“最終解決”方案的主要策劃人來說，此舉無疑是極具戲劇性的大逆轉。隨著戰爭進入到最后幾個月，這位黨衛隊全國領袖還將有更多讓人大跌眼鏡的舉動。

[[1]](#filepos622082) Christian Gerlach和Götz Aly，《終曲》 （Das letzte Kapitel，Fischer 2004）。

[[2]](#filepos625880) 原話引自Joel Brand的審訊記錄，1944年6月16—30日，檔案編號為SIME/P 7769, FO 371/42811；另見1961年6月29日對艾希曼的審訊中Brand提供的證詞，審訊場次號為56。

[[3]](#filepos629842) 見Bandi Grosz 的審訊記錄，1944年6月6—22日，檔案編號為SIME/P 7755, TNA 371/42811，第42—43頁。

[[4]](#filepos631574) 《奧斯維辛1940—1945》，第五卷，第198頁。

[[5]](#filepos633572) BBC訪談。

[[6]](#filepos640013) BBC訪談。

[[7]](#filepos640123) BBC訪談。

[[8]](#filepos642230) 引自Andrzej Strzelecki，“對受害者遺體的利用”（Utilization of the Victims’ Corpses），載于《奧斯維辛：1940—1945》，第二卷，第407頁。

[[9]](#filepos647432) 《在罪孽的噩夢中：特遣隊成員手稿》（Amidst a Nightmare of Crime: Manuscripts of Members of Sonderkommando，奧斯維辛國立博物館，1973年），第119頁。

[[10]](#filepos647855) 《在罪孽的噩夢中》，第119頁。

[[11]](#filepos648459) 《在罪孽的噩夢中》，第182頁。

[[12]](#filepos648829) 《在罪孽的噩夢中》，第185頁。

[[13]](#filepos649136) 《在罪孽的噩夢中》，第181頁。

[[14]](#filepos658263) Miklos Nyiszli，《奧斯維辛：一名醫生的親身經歷》，第4頁。

[[15]](#filepos662223) Yehuda Bauer，《待出售的猶太人？》（Jews for Sale ?，耶魯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180頁。

[[16]](#filepos663284) Bauer，《待出售的猶太人？》，第167頁。

[[17]](#filepos667540) BBC訪談。

[[18]](#filepos669005) BBC訪談。

[[19]](#filepos670612) 見Yehuda Bauer在《大屠殺百科全書》第一卷中發表的評論，第790頁。

[[20]](#filepos673696) BBC訪談（見2000年1月19日播出的節目《時代的瞭望：希姆萊、希特勒與帝國的終結》[Timewatch: Himmler, Hitler and the End of the Reich]。制作人Detlef Siebert，執行制作人Laurence Rees。）

[[21]](#filepos676894) “罪證的收集與傳播”（Gathering and Disseminating Evidence of the Crime），載于《奧斯維辛：1940—1945》，第四卷，第307—315頁。

[[22]](#filepos677438) “罪證的收集與傳播”，第315頁。

[[23]](#filepos677860) 特別值得一讀的是Richard Breitman的著作《英國人和美國人都知道些什么》（What the British and Americans Knew，Allen Lane The Penguin Press 1998），第七章：“奧斯維辛官方機密揭底——納粹的計劃”。

[[24]](#filepos678151) 引自《英國人和美國人都知道些什么》，第120頁。

[[25]](#filepos679899) 引自Robert Jan van Pelt，《奧斯維辛之辯》（The Case for Auschwitz,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2）第154頁。

[[26]](#filepos683354) 引自Martin Gilbert的文章“關于轟炸奧斯維辛可行性的當代爭論”（The Contemporary Case for the Feasibility of Bombing Auschwitz），載于Michael J. Neufeld和Michael Berenbaum編著，《轟炸奧斯維辛——盟軍與大屠殺》（Allies and the Holocaust in the Bombing of Auschwitz，St Martin’s Press，紐約，2000年），第66頁。

[[27]](#filepos683592) 引自Neufeld和Berenbaum編著，《轟炸奧斯維辛》，第67頁。

[[28]](#filepos684276) 引自Neufeld和Berenbaum編著，《轟炸奧斯維辛》，第68頁。

[[29]](#filepos684728) 引自Neufeld和Berenbaum編著，《轟炸奧斯維辛》，第70頁。

[[30]](#filepos686165) 引自Neufeld和Berenbaum編著，《轟炸奧斯維辛》，第73頁（欲了解對檔案更詳細的分析，參見Gilbert論文全文，第65—75頁）。

[[31]](#filepos688080) Deborah E. Lipstadt，“未實施的救援與當代美國猶太史學研究中的大屠殺：遠距離評判”（The Failure to Rescue and Contemporary American Jewish Historiography of the Holocaust: Judging from a Distance），載于Neufeld和Berenbaum編著，《轟炸奧斯維辛》，第229頁。

[[32]](#filepos689251) James H. KitchensⅢ，“轟炸奧斯維辛問題再探討”（The Bombing of Auschwitz Re-examined），載于Neufeld和Berenbaum編著，《轟炸奧斯維辛》，第80—100頁。

[[33]](#filepos689438) Stuart G. Erdheim，“盟軍本可以轟炸奧斯維辛-比克瑙嗎？”（Could the Allies Have Bombed Auschwitz–Birkenau?），載于Neufeld和Berenbaum編著，《轟炸奧斯維辛》，第127—156頁。

[[34]](#filepos691108) Richard Levy，“再談轟炸奧斯維辛：一種批判性分析”（The Bombing of Auschwitz Revisited: a Critical Analysis），載于Neufeld和Berenbaum編著，《轟炸奧斯維辛》，第114頁。

[[35]](#filepos693249) 引自Martin Gilbert，《奧斯維辛與盟軍》（Auschwitz and the Allies，Pimlico 2001，初版于1981年），第121頁。

[[36]](#filepos693732) 引自Gilbert，《奧斯維辛與盟軍》，第127頁。

[[37]](#filepos693939) 引自Gilbert，《奧斯維辛與盟軍》，第127頁。

[[38]](#filepos694327) 引自Gilbert，《奧斯維辛與盟軍》，第139頁。

[[39]](#filepos697082) BBC訪談。

[[40]](#filepos702288) BBC訪談。

[[41]](#filepos716124) 《奧斯維辛：1940—1945》，第五卷，第217頁。

[[42]](#filepos718979) 見Kurt Becher 1947年7月10日的證詞，引自艾希曼審訊記錄，TAE第八卷，第2895—2896頁。

# 第六章 解放與報復

最后一刻，它來得很突然。1945年1月的一個晚上，10歲的埃娃·莫澤斯·科爾[[1]](#_1__BBCFang_Tan_1)和她的雙胞胎姐妹米麗婭姆正躺在奧斯維辛-比克瑙的床鋪上，突然被巨大的爆炸聲震醒。窗外紅色的火焰照亮了寒冬的夜空。原來，納粹炸了焚尸場。沒過多久，她們就被迫離開自己的營房，與其他雙胞胎一起沿著大路朝奧斯維辛主營地走去。這些雙胞胎都是門格勒博士的實驗對象。四周的場景宛如噩夢，抬起頭可以看到遠處紛飛的炮火。在黑暗中黨衛隊催趕著這些孩子，不讓他們有片刻的喘息。走不動路的被當場開槍打死，尸體就扔在路邊。一片混亂中，有兩對雙胞胎分別與自己的兄弟姐妹走散，再也沒能相見。

到了奧斯維辛主營地以后，埃娃和米麗婭姆基本處于無人看管的狀態。原本由卡波和守衛組成的嚴密監管網絡現已崩潰，犯人們全都自己照看自己。埃娃甚至穿過了外圍鐵絲網，走到主營地一側的索拉河河畔找水喝。在埃娃試著敲碎冰面的間隙，她抬起頭，看見一個跟她年紀相仿的小女孩站在河對岸。那個小女孩穿著漂亮的衣服，精心編起來的小辮子用絲帶綁著，還背著書包。此時的埃娃穿著破衣爛衫、渾身長滿虱子，站在對岸盯著她看。埃娃覺得眼前所見“幾乎讓人難以相信”。她說：“這是我們到奧斯維辛以來，我第一次意識到，外面還有一個世界，那個世界里的孩子看起來就像個孩子，他們會去上學。”

埃娃和米麗婭姆能活下來已經非常幸運，因為納粹的計劃本來是把她們和剩下的幾千名犯人一起殺死，這些人被認為太過虛弱，無法和大部隊一起從奧斯維辛出逃。處決這群人的命令由黨衛隊全國副總指揮施毛澤在1月20日下達，他也是這個地區的指揮官。[[2]](#_2__Andrzej_Strzelecki__Qing_Kon)在接下來的七天當中，黨衛隊特別分隊在比克瑙和附近的子營地殺害了約700名犯人，但包括埃娃和米麗婭姆在內，近8000名犯人僥幸逃過一死，因為紅軍朝奧斯維辛進發的速度太快，黨衛隊自顧不暇，已顧不上執行命令。

沒過多久槍聲就平息了。1月27日，烏克蘭第一方面軍的紅軍戰士到達營地。在IG法本公司丁納橡膠廠旁邊的莫洛維茨勞工營，他們發現了600名幸存者，在比克瑙解救了近6000名犯人，而奧斯維辛主營地剩下的犯人約為1000人出頭，其中就包括埃娃和她的姐妹米麗婭姆。埃娃第一次聽到有人宣布她的苦難就要結束，營房里一個女犯大聲呼喊著：“我們自由了！我們自由了！我們自由了！”埃娃跑到門邊，外面是一片白茫茫的大雪，她什么也沒看見。好幾分鐘之后，她才辨認出穿著白色外衣的紅軍戰士：“我們朝他們跑過去，他們擁抱我們，還給了我們餅干和巧克力。在極度孤獨的環境下，一個擁抱的意義比任何人所能想象的都大得多，因為它讓我們重新感受到了我們渴望已久的，人的價值。我們不光渴望食物，也渴望人的善意，而蘇聯紅軍確實在某種程度上滿足了我們的需求。戰爭結束后，我們回到家園，我最懷念、最渴望的就是擁抱和親吻，但沒有人再給我這些。因此，我給我的學生上課時，總會告訴他們：‘你們今天下午回家以后，請替我們所有這些從集中營里幸存下來的孩子多給你們的父母一個擁抱，多給他們一個吻，因為我們已經沒有可以擁抱和親吻的對象。’”

伊萬·馬蒂努什金是紅軍一個炮兵連的中尉，他與戰友們一起攻進了奧斯維辛鎮。他們到達比克瑙的時候，這個營地在幾小時前剛剛被解放，奇怪的是，四周一片靜寂。那里的犯人望著他，“眼中帶著感激”，臉上帶著“強擠出來的笑容”。“我們有一種感覺，那就是我們做了一件好事，”他說，“一件非常好的事。我們覺得自己仿佛已經完成了使命。”很重要的一點是，他說，雖然他和戰友對奧斯維辛的犯人“感到同情”，但眼前的景象并沒有給他們帶來特別大的觸動：“你要明白戰爭中的人是什么樣的心理狀態……我當時已經有超過一年直接作戰的經歷，在那段時期，我見過集中營，當然不是這種營地，但也是規模小一些的戰俘營。我見過被摧毀的城鎮，也見過被破壞的小村子。我見過我們自己人飽受痛苦。我見過傷殘的孩子。隨便哪個村莊全都經歷過這樣的恐怖、這樣的慘劇和這樣的苦難。”

伊萬·馬蒂努什金的話對我們很有幫助，它提醒我們注意許多在東部前線奮戰過的人初次見到奧斯維辛時身處的時代背景。對他們來說，奧斯維辛當然是個恐怖的地方，但眼前所見也只不過是一場充斥著諸多殘酷暴行的戰爭中又一個可怕的場景罷了。對奧斯維辛的解放在當時其實算不上什么重大新聞。它確有在報紙上被提及：2月2日，《真理報》刊登了他們的記者鮑里斯·波列伏依撰寫的報道[[3]](#_3__Yin_Zi_Robert_Jan_van_Pelt)，幾天后，英國的《猶太紀事報》轉載了這則消息。然而，解放奧斯維辛并沒有像前一年夏天，馬伊達內克集中營被發現那樣被廣泛報道。馬伊達內克是除奧斯維辛以外，唯一一個使用齊克隆B進行屠殺的納粹集中營（但規模要比奧斯維辛小很多），因此媒體最開始很可能把奧斯維辛視為“另一個馬伊達內克”。此外，1945年1月有很多更吸引眼球的新聞等待各大媒體報道，其中很重要的一條，是戰爭“三巨頭”（丘吉爾、羅斯福和斯大林）將要在克里米亞半島的雅爾塔進行會面。[[4]](#_4__van_Pelt___Ao_Si_Wei_Xin_Zhi)不過奧斯維辛的解放沒有立即在西方成為重大新聞，或許還有另一個原因：紅軍發現集中營后，已經有人在質問，贏得了戰爭的同盟國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經得起這場勝利的考驗。從波列伏依登在《真理報》上的文章中，我們可以明顯看出他對奧斯維辛進行的一種馬克思主義式解讀：他認為奧斯維辛從根本上來說是一個資本主義工廠，里面的工人是誰并不重要。這篇文章標志著東西方在對集中營的運作進行歷史解讀時出現了分歧，這一裂痕直到蘇聯解體后才終于彌合。在蘇聯當時以及后來對奧斯維辛進行的分析中，他們對猶太人在集中營里遭受的磨難只作了輕描淡寫，卻強調所有被迫害致死的人都是“法西斯主義的受害者”。這還算不上他們最過分的言論。

然而，回到1945年1月，埃娃·莫澤斯·科爾和她的姐妹米麗婭姆都認為她們能被紅軍解救是一件非常幸運的事。事實也確實如此。1月18日，紅軍已到達離集中營僅幾英里遠的地方，如果她們沒有被留下來，那么德國人一定會讓她們加入由其他6萬名所謂“健康”的犯人組成的隊伍，這些人都是從龐大的奧斯維辛營區中各個子營地里挑選出來的，他們將一起開始向西徒步行進。據許多被迫參與了大撤退的犯人回憶，接下來的幾個星期是他們階下囚生涯中最痛苦的一段時間，甚至比集中營里頻繁的篩選、匱乏的餐食、肆虐的疾病和他們居住的寒冷棚屋都更加可怕。奧斯維辛的犯人將要踏上的這段征程，后來被非常貼切地稱為“死亡行軍”。

對納粹來說，死亡行軍并不是什么新發明。1940年1月，800名波蘭戰俘（同時全都是猶太人）被迫從盧布林步行近60英里到達比亞瓦-波德拉斯卡（Biała Podlaska）。[[5]](#_5____Da_Tu_Sha_Bai_Ke_Quan_Shu)只有極少數人戰勝了波蘭的寒冬到達終點，大部分人都凍死在路邊，或被同行的黨衛隊殺害。在接下來的幾年中，納粹多次組織了死亡行軍，比如他們曾在清空隔離區之后強迫住在里面的猶太人徒步跋涉，也曾強迫蘇聯戰俘向西行進，前往臨時戰俘營。

但正如我們在第五章中討論過的，戰爭期間最大規模的幾次死亡行軍發生在1944年秋天。其中最可怕的當數11月發生在匈牙利的那一次，當時艾希曼強迫包括婦女兒童在內的近8萬名猶太人從布達佩斯向西朝奧地利行進。這次遠征的可怕場景令一些納粹分子都忍不住對其殘忍程度提出批評，而那些幸存下來的犯人最后被送進了毛特豪森和達豪等集中營。也就是說，奧斯維辛的犯人在1945年初將要進行的死亡行軍已有很多悲慘先例。

在黨衛隊看守的棍棒下，犯人們被趕出集中營，他們身上單薄的囚服完全無法抵御波蘭冬天的漫天大雪和凜冽寒風。他們就這樣上了路。也正是在這個時候，黨衛隊軍官弗朗茨·溫施向他深愛的女人——猶太犯人海倫娜·斯特洛諾娃最后一次伸出援手。當海倫娜與她的姐姐羅津卡站在營地大門口瑟瑟發抖時，溫施拿來“兩雙暖和的靴子，是那種有毛皮襯里的靴子。其他所有人，那些可憐的人，全都穿著用報紙做內襯的木底鞋。他真的是冒著生命危險（給我們拿鞋子）。”溫施對她說，他就要被派去前線了，但他的母親在維也納，她可以照顧海倫娜和她的姐姐，因為等到戰爭結束她們就該“無處可去”。他把一張寫著母親住址的小紙片塞進海倫娜手里。然而，等溫施離開后，海倫娜記起父親曾對自己說過的話：“別忘了你是誰。”父親對她強調，她必須永遠記得：“我是個猶太人，我要永遠忠于猶太人的身份。”于是，她扔掉了寫有溫施母親住址的紙片。

就這樣，這兩個女人在風雪交加的天氣下開始向西行進。海倫娜將最初的幾天形容為“不可思議地艱難”。她眼看著身邊的其他犯人“倒在雪地中，精疲力盡，就這樣死掉了。大家只能自己顧全自己。一切都亂了套。誰能活就活著，誰死了也就死了。”

伊比·曼[[6]](#_6__BBCFang_Tan_1)當時19歲，前一年她從捷克斯洛伐克被送到奧斯維辛。死亡行軍的經歷也給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們大半夜讓我們集合，我們從來不知道時間，不知道幾點幾分，什么都不知道。我們與世界脫節了。”盡管能聽到蘇軍的炮火就在不遠處，但納粹依然堅持清點犯人，讓他們每五人站成一排后出發。“要是有誰敢彎下腰，或者敢停下來休息一會兒，馬上就會被槍決。”與很多從死亡行軍中幸存下來的犯人一樣，伊比·曼并不是獨自一人面對這一切，她的姐姐一直與她在一起，不斷鼓勵著她。“我一直在說，‘我只能走到這兒了，一步也走不動了。’（但是）她會使勁拉著我繼續往前走。”到了晚上，她們就睡在谷倉里，還有一次睡在豬圈，有時就在戶外席地而睡，靠光禿禿的樹木和灌木叢遮風避雨。伊比和她姐姐是最晚離開營地的一批犯人，她們一路上經過許多塞滿尸體的水溝。隨著她們繼續蹣跚前進，雪水變成了泥漿，浸透了她們薄薄的鞋子。她們的腳上長出了水泡，鉆心地疼。兩人在行軍途中都沒有感到饑餓，只覺得口渴難耐。她們知道，如果自己彎下腰吃上一口融雪，她們一定會被黨衛隊開槍打死。了解犯人們承受的這些苦難以后，我們幾乎難以相信，納粹之所以讓奧斯維辛的犯人離開營地進行遠征，是因為他們認為這些犯人是有用的資源。戰爭進入到這個階段，有勞動能力的犯人對納粹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截至1944年底，在德國工廠工作的人當中約有50萬名都是犯人。

納粹驅趕著奧斯維辛的犯人朝帝國方向行進時，主要采用兩條路線，一條是朝西北方向，途經密科魯夫（Mikołow），到達近30英里以外的鐵路樞紐站格利維采，另一條是一路向西，行進約40英里后到達沃濟斯瓦夫（Wodzisław）火車站。對那些從行軍中幸存、登上列車的犯人來說，折磨卻遠未結束。列車將把他們帶往德國和奧地利的集中營。伊比和她的姐姐被趕進“積了半米深的雪”的露天車廂，車廂里的犯人塞得滿滿的，很多人找不到地方坐下來。

莫里斯·韋內齊亞[[7]](#_7__BBCFang_Tan_2)曾是奧斯維辛的一名特遣隊成員，他當時也在這輛可怕的列車上，而他是少數幾個在露天的車廂里找到地方坐的犯人之一。他記得那天非常冷，雪一直在下，落在他和他同伴的身上。他記得身邊不斷有人因承受不住如此惡劣的條件而倒下，因此他們經常需要從車廂里向外扔尸體。他還回憶起這段路途中發生的一件更令人驚詫的事：一樁謀殺的實施。

與莫里斯等人同車廂的有一個德國犯人，他在積雪中站了很長時間以后，迫切渴望能坐下來，于是他想跟莫里斯做個交易：他讓莫里斯把座位讓給他，作為交換，他給莫里斯幾根香煙。莫里斯站起身，拿走了煙，在抽煙的這段時間讓德國人蜷縮在車廂的角落坐了一會兒。大概10分鐘后，莫里斯抽完煙，讓德國人站起來，卻遭到拒絕。“于是我和幾個朋友坐在他身上”，莫里斯說，“大概過了30分鐘或一小時，他被悶死了。我們把他扔出車廂。沒什么大不了的，能殺死一個德國人我們很高興。”

直到今天，莫里斯都認為殺死這名德國犯人“沒什么大不了的”。對他來說，被他殺害的人同樣是一名奧斯維辛犯人這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這個人說的是哪國語言：“我很高興。他們（指德國人）殺了我全家，大概三四十人，可我只殺了一個德國人。哎！這不算什么。如果我能殺死一百個德國人我才高興呢。我們徹底被他們毀了。”在這個問題上，無論怎么質問莫里斯，他都不覺得統治奧斯維辛的德國人與那個在波蘭寒冷冬夜被他殺死在運牲畜列車上的德國犯人之間有什么區別。“不管怎么說，”他說，“我也想坐著，我也很累。憑什么給了我兩三根煙以后他就可以活命？他不想站起來，那我們就坐在他身上，然后他就死了。就這么簡單。”對于自己和同伴在西行途中殺害的這名德國犯人，莫里斯·韋內齊亞毫無關切之心，這點也提醒我們思考，集中營里的道德水準退化到了何種程度，犯人們是如何迫于形勢，把自己的生死置于其他一切之上。

兩萬名奧斯維辛犯人最后到達的地方，是下薩克森州的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如第五章所說，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在今天惡名遠揚，主要是因為英國人1945年4月15日解放集中營時在那里拍下的令人痛心的照片。這些圖片公之于世，那些極度消瘦、有如行走著的骷髏身形震驚了全世界。然而，圖片所呈現出來的畫面并沒有反映出這個營地建造之初的真實用途；很多人本就分不清集中營與專門的滅絕營之間的區別，這些照片更加深了這種混淆。

1943年建造之初，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本是用來關押那些被當作人質、“有特權的”猶太人，但到了1944年春，一些被認定無法從事有用工作的犯人從其他各個營地送到這里，自那之后它又多了一個用途。這些人在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遭受到非人的折磨，特別是來自德國卡波的殘酷虐待。另外三個因素的出現，促使貝爾根-貝爾森最終變成1945年春盟軍解放它時見到的那個恐怖所在：第一，約瑟夫·克拉默于1944年12月被任命為集中營指揮官；第二，納粹決定剝奪營地里“用于交換的猶太人”可能享有的任何“特權”；第三，1945年初那批死亡行軍隊伍中幸存的犯人，最后都涌入了貝爾根-貝爾森。一組簡單的數字可以讓我們了解貝爾根-貝爾森發生的巨大變化：1944年底，這個營地大約關押了1.5萬名犯人，而等到英國人于1945年4月到達此地時，集中營里有6萬名犯人。然而，德國人卻沒有為多出來的犯人安排任何住處，也沒有補充食物供給。

當然，歷史事件中的數字總是無法讓我們了解當事人的具體經歷，這方面信息只能通過聆聽他們的故事來獲得。艾麗斯·洛克·卡哈納為我們講述了1945年4月，她和姐姐埃迪特被囚禁在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時的經歷。她們本以為奧斯維辛的條件是人類能夠忍受的極限，卻沒想到這里的生活更加可怕。艾麗斯和埃迪特到達時，正趕上傷寒病在營地大肆爆發。由于營房過度擁擠，她們沒有床鋪，甚至幾乎找不到任何可以睡覺的地方。營地里沒有食物，也幾乎沒有水。這些來自奧斯維辛的犯人仿佛被困在這個小小的空間里等死。在接下來的幾周里，很多犯人精神崩潰。“沒有任何語言能夠形容貝爾根-貝爾森是什么樣的。”艾麗斯說。每天晚上，睡在她們不遠處的一位卡波都會“突然發狂”，用腳踩艾麗斯和她的姐姐。營房只造了一半，而造好的部分也逐漸開始垮塌。“當你不得不去廁所的時候，你就得踩著人過去。有些人滾進了過道的裂縫里。”無論白天還是黑夜，她們都會聽見有人在喊：“水！媽媽！水！媽媽！”

勒妮·薩爾特[[8]](#_8__BBCFang_Tan_3)是另一位被送到貝爾根-貝爾森的犯人。1945年她16歲。在被迫走過一條遍布尸體（這些死去的人都是以前送來的犯人）的道路，最終到達集中營后，她看見了如地獄一般恐怖的場景：“我們看見瘦得像骷髏一樣的人在四處走動，他們的胳膊和腿就像火柴棍一樣細，透過他們的皮膚可以看到突出的骨骼。營地里彌漫著濃烈的惡臭。我們吃了這么多苦以后，卻發現這里是個與以前都不一樣、還要更加恐怖的地方。”

集中營的管理系統已經全面癱瘓。點名早就停止了，因為犯人們根本沒有力氣站起來；食物的缺乏造成大量犯人餓死。才過了三周不到的時間，勒妮就知道自己快不行了。就在她馬上要失去意識的時候，有人向她指了指不遠處英軍的坦克。接著，她昏了過去，十天都沒有蘇醒。等她終于醒過來時，她發現自己在一家英國人的滅虱中心，正在接受消毒清洗。雖然她還是極度虛弱，但終于自由了。

艾麗斯·洛克·卡哈納講到，1945年4月15日，有人大喊：“解放了！我們解放了！”她馬上跳起來，對她姐姐說：“解放是什么？我得趁它不見之前找到它。”她蹣跚著走出營地，看見了坐在吉普車里的盟軍士兵。然而，她的快樂是短暫的，因為此時的埃迪特比以往任何時候病得都厲害，在英軍到達后不久，埃迪特就被送進了紅十字醫院。艾麗斯想跟她待在一起，但英國士兵堅持說她病得沒有那么嚴重，不能和她姐姐在一起。艾麗斯提出了抗議：“我說：‘你不明白，我們不能分開。我可以在那里給你們幫忙，我可以端便盆。’”她努力想要端起便盆，結果發現自己幾乎走不了路。在她快走到門口時，一個士兵抱起她，把她放進一輛吉普車里，送回了營房。

在奧斯維辛和貝爾根-貝爾森的艱苦環境中一路保護著姐姐，艾麗斯絕不會那么輕易地放棄。第二天，艾麗斯拖著虛弱的身體走回醫院。她到的時候剛好看見埃迪特被送進一輛救護車，她迅速鉆進車里，對埃迪特說：“我來了。不管他們把你帶到什么地方，我都跟你一起走。”但前一天開車送她回營地的那個士兵認出了她，對她說：“你怎么又來了？你不能待在這里。我們得把你姐姐送去另一家醫院，一家部隊醫院。”艾麗斯從救護車上被趕了下來，眼睜睜看著姐姐被送走。

艾麗斯就這樣開始了尋找姐姐的努力，而一找就是半個世紀。她試著通過紅十字會以及她能想到的所有途徑追蹤姐姐的去向，卻什么也沒找到。直到與姐姐失去聯系53年之后，她才從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的記錄中發現，一個名叫埃迪特·施瓦茨的人于1945年6月2日過世。施瓦茨是艾麗斯母親婚前的姓氏，埃迪特在集中營里一直用這個姓，不讓人知道她是艾麗斯的姐姐。她一直擔心如果納粹發現她們兩人是親姐妹，將會不擇手段地拆散她們。

艾麗斯等了53年。這53年中，每一次電話鈴聲響起、每一次有信件寄到，艾麗斯都祈禱那是埃迪特的消息。然而，多年來忍受的情感折磨換來的卻是這樣一個事實：她的姐姐，在與她最后一次分開沒幾天以后便過世了。無論是從匈牙利被遣往奧斯維辛的路上，在死亡行軍途中，還是在饑餓與疾病橫行的貝爾根-貝爾森，艾麗斯都一直努力保護著她的姐姐。到最后，埃迪特還是死于納粹的迫害。“對你來說，解放來得太晚了，我親愛的姐姐，”艾麗斯得知姐姐死訊后不久，在自己作的一首詩中這樣寫道，“他們怎么能這樣做？怎么做得出來？到底為什么？”

對埃迪特的死負有最大責任的人之一，便是海因里希·希姆萊。如果在“最終解決”實施初期讓他來回答艾麗斯·洛克·卡哈納提出的問題，他一定會毫不猶豫地以最殘忍和最簡潔的方式給出答案：猶太人之所以必須死去，是因為他和他的元首認為猶太人的存在是一種威脅。然而，在戰爭的最后幾個月，希姆萊的所作所為顯示他的立場遠沒有以前那么堅定和清晰。前面已經提到，1944年他批準了匈牙利“猶太人換卡車”計劃，并通過班迪· 格羅斯試探與英美簽訂協約的可能。雖然這些行動最后都沒有什么結果，但它們可以反映出希姆萊當時的想法：這位黨衛隊全國領袖此時所奉行的，已經從堅定的意識形態變成務實主義。

1945年2月，希姆萊多變的態度再次得到充分體現：他同意讓特萊西恩施塔特集中營里的1200名猶太犯人前往瑞士，這個結果經過多個中間人的協調，最終由美國正統猶太教教士聯盟（American Union of Orthodox Rabbis）與希姆萊共同商定。這一次，猶太人換來的不再是卡車，而是實實在在的硬貨幣。麗塔·雷[[9]](#_9__Tong_Shang__Jian_2000Nian_1Y)是從特萊西恩施塔特登上前往瑞士列車的猶太犯人之一。“我們上了車以后，納粹走過來，讓我們化妝梳頭，打扮一番，好讓我們到的時候看起來不會太糟。他們想讓我們給瑞士人一個好印象。”

阿道夫·希特勒是從瑞士一家報紙上，才知道特萊西恩施塔特集中營猶太犯人被釋放的消息。他暴跳如雷。雖然早在1942年12月，希姆萊確實獲得了希特勒的批準，原則上允許某些猶太人用硬貨幣給自己贖身，而且把猶太人中的一些“大人物”當作“人質”的做法也與納粹已有理念相符，然而，釋放特萊西恩施塔特集中營猶太人一事是在希特勒完全不知情也沒有批準的情況下進行的。考慮到這個時候戰爭顯然已經進入尾聲，這種舉動對納粹領導人來說無疑帶有一種失敗主義的意味。希特勒下令禁止再進行任何類似的交易。

然而，到了這一年4月，希姆萊又一次違背希特勒的指示，任由盟軍占領了貝爾根-貝爾森。希特勒曾要求所有集中營在盟軍到達前必須被摧毀，但希姆萊顯然沒有服從。他可能想通過讓貝爾根-貝爾森完整地落入盟軍手中來展示他對盟軍的“讓步”，也可能，他對集中營里的真實情況并不了解。不管怎樣，希姆萊的舉動造成了完全出乎意料的結果，揭露營地慘狀的圖片開始在全世界瘋狂流傳。“那個集中營里發生的一切都是無法用語言描述的，”一名英國士兵在錄制一段新聞影片時說道，“當你親眼見到這些人時，你終于明白你一直為了什么而戰。報紙上的圖片不能展示出全部。他們做的那些事——哎，你根本不覺得他們還算是人。”

雖然希姆萊巴結盟軍的做法帶來了嚴重后果，但他繼續違背希特勒的意愿行事。4月20日，他與世界猶太人大會的一名密使，諾貝特·馬蘇爾（Norbert Masur）會面，同意釋放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里的1000名猶太女犯。希姆萊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把這些犯人說成“波蘭人”，而不是猶太人，以期他的所作所為不會傳到希特勒那里。當天晚上，在馬蘇爾離開后，希姆萊向他的按摩師費利克斯·克斯滕吐露了心聲：“如果可以從頭開始，很多事我都會換一種做法。但作為一名忠誠的軍人，我不得不服從，因為如果沒有服從和紀律，那就什么事都做不成。”[[10]](#_10__Zhai_Zi___Shi_Dai_De_Liao_W)

在戰爭的最后幾個月，違抗元首的并不只有希姆萊一個人，其實整個黨衛隊都不再聽令于他。4月21日，元首在他位于柏林的秘密地堡內被炮火聲震醒。他一定想不到會有這樣一天——紅軍竟然攻進了柏林。希特勒曾命令黨衛隊全國副總指揮菲利克斯·施坦因納（Felix Steiner）向朱可夫元帥領導的白俄羅斯第一方面軍發起反擊，當時這個軍團正朝柏林北部郊區逼近，但施坦因納拒絕執行命令。“接到這一命令時，”施坦因納的副手弗朗茨·里德維克[[11]](#_11__Zhai_Zi___Shi_Dai_De_Liao_W)說，“他說：‘我不會再對蘇聯大軍發起進攻了，這等于是讓戰士們白白送死。我不要再為沒有意義的命令犧牲我的士兵。’”希特勒得知自己的命令遭到施坦因納拒絕后大發雷霆，地堡里所有人都沒見他如此咆哮過。黨衛隊拋棄了他。他曾公開表示，眼下唯一留給他的事，就是結束自己的生命。

4月23日，希特勒勃然大怒的消息傳到希姆萊那里。這一天他正與紅十字會的代表福爾克·貝納多特伯爵會面。希姆萊認為，既然希特勒已經宣布他將自我了結（說不定此時已經死了），那么他自己就成了帝國的代言人。因此，他對貝納多特說，德國愿意向英國和美國無條件投降，但不向蘇聯投降，并讓貝納多特把這個意愿轉達給西方盟軍。

希姆萊向部分同盟國投降的方案遭到了盟軍的拒絕，但他有意結束西方國家間戰爭的消息通過BBC廣播電臺傳播開來。希特勒也聽到了這則新聞。這位德國領導人還沒有變成毫無知覺的死人，恰恰相反，此時的他正處在一種最為強烈而真切的情感帶來的沖擊中，那就是背叛感。“希特勒當然氣炸了，” 貝恩德·弗賴塔格·馮·洛林霍芬[[12]](#_12__Zhai_Zi___Shi_Dai_De_Liao_W)說道，他是德軍總參謀部的一名工作人員，當時也在地堡里，“從軍事形勢來看已經沒什么希望，現在一個他或許最信任的人又做出這樣的舉動。那個人拋棄了他，投奔了盟軍。希特勒只好認命，他交代了他的政治遺愿和個人遺愿。兩天之內他就死了。”

1945年4月30日下午3點半，紅軍來到德國國會大廈門口，在此之前希特勒已經自殺身亡。他留下了一份前一晚寫就的政治聲明，在這份聲明里，他將戰爭的爆發歸咎于猶太人。希特勒至死都沒有變，他一直對整個猶太民族懷有深深的恨意，對他們沒有一絲同情。我們已經看到，納粹的“最終解決”方案在發展和執行過程中經過了多次修改和變化，希特勒提出的某些具體要求促成了其中一些變化，而另一些變化的發生則與他沒有那么直接的關系。但從希特勒最后對希姆萊一事的反應可以看出，自始至終沒有改變對猶太人的狂熱仇恨的，是元首本人。

比起自己所效忠的元首，希姆萊更愿意順應形勢而變。他不但同意交出猶太人來換取錢財，還試圖促成秘密和解協議的簽訂。與希特勒不同的是，希姆萊在戰爭的最后階段似乎認為還有別的出路。他的做法在他的黨衛隊隨從之間造成了恐慌。5月5日，在海軍元帥鄧尼茨的大本營，也就是德國北部弗倫斯堡的穆威克（Muerwick）海軍學校，希姆萊與幾位黨衛隊高官召開了最后一次會議，與會者包括魯道夫·霍斯。“命運給我安排了一項新的重要任務，”希姆萊宣布，“我將獨自完成它。因此，我現在再給你們下達最后一道命令：混進國防軍吧！”霍斯大吃一驚。顯然他所期待的是具有象征意義的最后一擊，而不是這種讓他們逃跑和藏匿起來的屈辱指令。“這就是一個我一直無比崇敬的人留給我們的道別，”霍斯寫道，“我曾經對這個人懷有無比堅定的信仰，他下達的每一道命令、他說的每一個字都被我視為真理。”盡管如此，霍斯還是聽從了希姆萊的建議，“混進”了國防軍。他找到一件海軍制服給自己穿上，裝成德國海軍隊伍中的一名普通士兵。

雖然希姆萊信心滿滿地認為，“命運”給他安排了新的重要任務，但與他的許多想法一樣，這不過又是一個幻想。5月23日，希姆萊自殺身亡，這一天距他與霍斯等人召開會議才過去了兩周多，但此時的希姆萊終于認識到，盟軍絕無可能與一個對幾百萬人的死負有責任的人做交易。他之前竟會抱有這樣的想法，也很好地說明他是一個什么樣的人：充滿不切實際的幻想，自我感覺膨脹，過度樂觀。而最重要的是，這種念頭反映出希姆萊的機會主義：在忠心耿耿地追隨了希特勒這么多年以后，當形勢發生改變，他卻可以搖身一變，成為另外一個人。

希特勒和希姆萊已死，底下的行兇者紛紛作鳥獸散。照理來說，戰爭一結束，所有在集中營里吃盡苦頭的人應該可以回歸正常生活，讓身心得到恢復，但事實并非如此。

1945年5月和6月，海倫娜·斯特洛諾娃和她的姐姐迷茫地游蕩在剛獲得解放的德國，與想要逃往西方的德國難民一起走在擁擠的道路上。她們睡在谷倉或被炸毀的房子里，四處尋找能吃的東西。沒過多久，她們就碰到了蘇聯紅軍。在海倫娜和她姐姐看來，這些士兵與其說像解放者，不如說更像是征服者。有那么幾次，無論難民躲在何處過夜，蘇聯士兵總能找到他們。“他們都喝醉了，徹底醉了，”海倫娜說，“他們就是一幫畜生。”這些士兵走進他們睡覺的地方，“找可愛的女孩強奸”。在此過程中，海倫娜藏在姐姐身體底下。由于姐姐比她大十歲，常被誤認為是她的母親，她們希望士兵見到她姐姐乞求的目光后能把目標移向別處。這個方法奏效了。然而，紅軍是怎樣對待其他女人的，海倫娜聽得一清二楚：“我聽見她們一開始一直在尖叫，到后來沒了力氣，安靜下來。有幾個人在被強暴的過程中死掉了。他們掐死了這些女人。我轉過頭去，不想看她們，因為我幫不了她們。我害怕他們也會強奸姐姐和我。他們都是畜生。不管我們藏在哪兒，他們總能找到我們，然后強奸我的一些女伴。他們會對這些女孩干些特別齷齪的事情。直到最后一刻，我都不敢相信我們能活下來。我們以為就算自己沒死在德國人手中，也會死在俄國人手上。”

有一次海倫娜差點就慘遭毒手。那天早晨，她騎著自行車出門，“騎得特別帶勁。我從小就特別喜歡騎自行車，我喜歡那種自由和安靜的感覺。”她在那個明媚的春日騎車來到郊區，之后在一間廢棄的倉庫旁停下來休息。“一個俄國人騎著一輛摩托車跟了上來。他看見了一個年輕女人，是不是猶太人對他來說并不重要。他把摩托車一扔，我們開始撕扯起來。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擺脫這個殘忍的俄國士兵的，這個兇徒。他有很長時間沒做愛了，沒辦法強奸我。我又踢又咬，大喊大叫，他一直問我是不是德國人。我說：‘不是，我是關在集中營里的猶太人。’我給他看我胳膊上的編號。就在那一刻，他放過了我。也許他自己也是個猶太人。我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他翻身站了起來，然后跑掉了。”

我們無法確知，在蘇聯士兵剛剛踏上德國本土，以及之后那段戰爭剛結束的時期，到底發生了多少起由蘇聯士兵實施的性侵事件。但這個數字肯定有幾十萬。近幾年，很多人在關注柏林等城市的德國婦女遭受的摧殘，然而，奧斯維辛女犯更加悲慘的經歷——她們先是在集中營里忍受種種虐待，后來又被解放她們的人強奸——讓這段歷史的面目比之前更加可憎。

蘇聯紅軍強奸集中營犯人的做法無疑已經非常惡劣，而他們“解放”集中營時給自己的同胞帶去的，則是另一種特殊性質的折磨。斯大林曾說過，被德國人扣押的沒有蘇聯戰俘，只有“祖國的叛徒”。當紅軍部隊到達波蘭南部的集中營時，這種態度得到了最為明顯的體現。一個名叫塔季揚娜·納尼耶娃[[13]](#_13__BBCFang_Tan_2)的犯人就關在這里。1942年，她在一家醫院做護士，這家醫院被德國人包圍后，她落入德國人之手，開始了兩年半的囚禁生涯。在此期間，她親眼目睹很多蘇聯女犯被德國人強奸。1945年1月，她聽到蘇聯紅軍“聲勢浩大”地抵達集中營，這些士兵高昂著頭，齊唱著愛國主義歌曲。“我們感到非常開心，非常振奮。我們都以為勝利就在眼前，我們馬上就可以過上正常的生活了。我特別思念我的祖國，思念我的家人。”在獲救的那一刻，巨大的幸福感涌上她的心頭，就在這時，兩個紅軍軍官朝她走來。其中一個人喝醉了，大喊著：“你們在這里是怎么逍遙快活的？你們這群婊子！”望著這個軍官搖搖晃晃地站著她面前，摸尋自己的手槍，塔季揚娜感到整個世界崩塌了。她趕緊跑開，找地方躲了起來，直到這些解放了集中營的前線戰士清醒過來。然而，無論他們是醉是醒，她遭到的指控都明白無誤：他們稱她為“祖國的叛徒”。因任由德國人將自己抓捕這一“罪名”，她被判處在古拉格關押6年，并終身流放西伯利亞。

帕維爾·斯滕金[[14]](#_14__BBCFang_Tan_2)好不容易僥幸在奧斯維辛活了下來，此時卻要經受來自同胞的類似折磨。1941年10月他來到達奧斯維辛，是被送去建造比克瑙的1萬名蘇聯囚犯之一。第二年春天，這一批犯人只剩下幾百個。他成功逃到樹林中，并與行進中的紅軍隊伍會合。然而，他們非但沒有像他所期待地那樣歡迎他的回歸，讓他繼續參與對抗德國人的戰斗，反而對他進行了數個星期的審問。蘇聯反間諜組織（SMERSH）經常問的一個問題是：“你是什么時候加入德國軍隊的？”他被送回國內，囚禁在禁閉流放者的城市彼爾姆和烏拉爾，在那里，審訊仍在繼續。“每隔一天，我都會在夜里被叫醒，‘承認這個，同意那個，我們什么都知道——你是個間諜。’他們一遍遍地折磨我。”斯滕金白天工作，晚上被審問，這樣的日子持續了幾個月后，他最終因一項被捏造出來的罪名被判處了數年的監禁。法官草草結束了對他的審判，只因那天晚上他們要去劇院看演出，這充分體現出蘇聯司法系統草菅人命的態度。直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斯滕金才被釋放，而有超過100萬名蘇聯士兵像他這樣被囚禁了兩次——一次被德國人，一次被自己國家的同胞。

帕維爾·斯滕金和塔季揚娜·納尼耶娃的經歷至關重要，因為它們明顯缺少許多西方人眼中的二戰史應具備的救贖意味。對好幾代英國人和美國人來說，這場戰爭被描述為“正義”對抗“邪惡”之戰，具有了近乎神話般的色彩。當然，納粹主義確實被擊垮，這一罪惡之源的消除也確實給世界帶來了無可估量的益處，但戰爭結束后的那段歷史并不像主流宣傳所描繪的那樣簡單。實際上，被紅軍解救出來的蘇聯戰俘很少有人有“幸福的結局”，東部的很多人亦是如此。

在戰爭走向尾聲時，斯大林犯下的罪行至少在某種程度上讓人想起納粹的“最終解決”。與希特勒一樣，斯大林也對不同族群進行了集體迫害。近10萬名來自斯大林格勒南部草原的卡爾梅克人因蘇聯領導人眼中的“罪行”被集體驅逐到西伯利亞，而所謂的集體“罪行”只是沒有盡力抗擊德國人。在戰爭的最后階段和剛剛結束的那段時期，克里米亞韃靼人、車臣人和蘇聯其他許多少數民族都有著相同的遭遇。沒人確切知道有多少蘇聯公民遭到驅逐，但這個數字肯定超過100萬。與猶太人不同的是，大多數猶太人在落入納粹之手后遭到殺害，而被斯大林迫害的少數民族，大部分在他死后得以從西伯利亞回到他們的祖國。盡管如此，我們仍可以肯定，斯大林以個別人的過錯處罰整個族群的做法，給車臣人、韃靼人、卡爾梅克人和其他許多人帶來了巨大的苦難。

1945年5月，大多數東歐國家都在送走了一個殘暴的專制者后迎來了一個新的暴君，這一嚴峻的現實對許多想要返鄉的奧斯維辛幸存者產生了深遠影響。一開始，蘇聯人的占領給琳達·布雷德[[15]](#_15__BBCFang_Tan_1)的感受還是很好的，這些人畢竟打敗了納粹，解放了集中營，阻止了他們對猶太人的滅絕。5月5日，她終于在柏林北部的集中營被解救（她在奧斯維辛關押了兩年半以后被送到那里），紅軍對她和其他犯人都“非常友好”。他們為這些犯人找來新衣服，好讓他們把自己極其痛恨的、已經穿了太長時間的條紋囚服徹底丟掉。而獲得新衣服的方法很簡單：紅軍把犯人們帶到附近德國人的住處，讓他們想拿什么就拿什么。住在里面的女人嚇得大叫：“沒有黨衛隊！沒有黨衛隊！”與此同時，琳達和其他幾個斯洛伐克犯人一把推開她，開始搜尋衣服。她們打開衣柜，發現了幾件黨衛隊制服，顯然，這個女人是一名黨衛隊隊員的妻子。于是，她們“洗劫”了整個地方，把鴨絨被和其他物品扔出窗外，把她們能用上的所有衣服都拿走了。琳達·布雷德聲稱她們幾乎沒怎么碰那個女人，但又承認有個“特別壯的女孩”確實有“抓著她朝她大吼”。

琳達滿腦子想的都是回斯洛伐克。其他一些人夢想在美國或以色列開始新的生活，但她唯一的愿望就是回家。于是，她與其他幾個斯洛伐克人一起踏上了漫長的歸家之路。她們穿行在遭到戰爭嚴重破壞的歐洲，到處都是損毀的鐵路和公路。在柏林，她們看見德國戰俘正在平整道路，修補巨大的坑洞。曾經的“統治者種族”被迫從事體力勞動的場景讓琳達和其他女人興奮不已，她們甚至詢問看守戰俘營的紅軍士兵，她們能否對這些人說幾句話。這名士兵同意了，于是她們開始奚落德國人，大喊：“趕快！趕快！動起來！動起來！”接著她們“真的推搡起那些人來”。這件事比“洗劫”德國人的家更讓琳達·布雷德確信，她再也不用懼怕德國人，再也不用在篩選過程中從心底感到恐懼，迫切渴望自己是那個被選中活命的人。

出了柏林以后，她們一直步行，因為沒有別的交通工具可以選。1945年一個炎熱的夏日，她們正走在德國中部一條塵土飛揚的公路上，幾個紅軍士兵開著車趕了上來，提出可以載她們一程。琳達和其他女人“真的特別害怕，因為他們經常強奸女孩”。但她們已經走了太遠的路，特別渴望休息一下，于是，她們帶著恐懼上了蘇聯士兵的卡車。結果，才開了幾英里，蘇聯士兵就突然停下車，把她們身上幾乎所有東西都搶走了。“他們連我們從德國人那里偷來的東西都拿走了，”琳達·布雷德說，“但至少我們保住了性命。”

這些女人被扔在路邊，身無分文，只得重新開始徒步前進。只有很少的幾次她們搭上了短途火車，得以在火車上歇歇腳。最后她們終于走到了布拉格。琳達和其他幾個女人在市區找到了住處，但仍一心想要回到自己位于斯洛伐克的家中，片刻都不想耽擱。每天有一班列車往返于布拉格和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發之間，坐上這趟車，琳達就可以回到斯洛伐克東部的小鎮斯特羅普科夫（Stropkov），回到她的家人身邊。在離家三年多之后，在被塞進貨運卡車里驅逐出境，歷經奧斯維辛里種種困窘和磨難，最后從德國北部朝著家的方向一路漫長的跋涉之后，琳達終于實現了她長久以來的夢想，那就是站在自己家的大門口。但此時她卻發現，里面住的似乎是別的人。她敲了敲門，很快一個俄國或烏克蘭男人打開門。“你要什么？”他問。“我要回我的家。”琳達回答道。“從哪兒來的就滾回哪兒去！”他邊說邊在她面前重重地關上了門。

琳達陷入震驚。走在自己家鄉的大街上，她突然意識到，所有原本屬于她親朋好友的房子里現在都住著蘇聯人：“我透過那些房子的窗戶往里看，覺得所有的眼睛都在注視著我。”鎮上還能見到的熟面孔只剩下非猶太人，其中很多人曾對琳達一家很友善，因此琳達以為至少他們會歡迎她回來。然而，她錯了。“我認出其中一個人，”琳達說，“但她并沒有走過來對我說：‘見到你很高興。’大家都和我保持距離，仿佛我是某種毒藥一樣。第二天我就離開了，再也沒回去過。回家是我最痛苦的經歷，真是一場災難。”

許多大屠殺幸存者與琳達·布雷德一樣，有著非常痛苦的返鄉經歷，這些幸存者不僅來自奧斯維辛，也來自其他一些集中營。被囚禁期間，他們一直用回家的信念支撐著自己，以為戰爭結束后，他們可以再次回到原來的生活。然而，這是不可能實現的。琳達·布雷德最終離開了斯洛伐克，在加利福尼亞開始了新生活。

瓦爾特·弗里德[[16]](#_16__BBCFang_Tan)是另一個在1945年夏天回到家園的斯洛伐克猶太人。此前，17歲的他與家人一起關在國內的勞動營里。迫于政府內部一小派人施加的壓力，對斯洛伐克猶太人的驅逐于1942年10月停止，因此，一部分猶太人沒有被送交納粹，而是留在斯洛伐克進行強制勞動。瓦爾特的家境相對富裕，他的父親在托樸卡尼（Topolcany）鎮擁有一家餐廳和一部出租車。1939年以前，他們的生活一直很快樂，鄰里之間也很和睦。法西斯主義被打敗后，他們回到家園，期待著可以恢復以前的生活。

他們是少數成功回到家鄉的猶太人，戰前居住在這個鎮上的3200名猶太人，最后只有大約10%回到了這里。然而，他們發現等待自己的竟然是仇恨，這大大出乎他們的意料。他們的家中住著別的人，他們試著要回房子，但現在的住戶拒絕搬出。他們的餐廳也遇到相同的情況，新老板告訴他們，在蘇聯人占領期間，這家餐廳已經“國有化”，由于他是付租金的人，因此由他來經營餐廳是天經地義。

弗里德一家本以為還有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在被驅逐之前，瓦爾特的父親曾拜托他們的好友，信奉基督教的一家人幫忙藏起一些金銀財寶。此時，他們信心滿滿地想要取回這些財物。他們邀請這家人共進午餐，大家一開始都有些拘謹，最后瓦爾特的父親終于提到這個他們一直惦記著的話題：“我們留給你們一個小包裹，你們都知道里面裝的是什么——有金子，鉆石和錢。”他們的朋友卻不這么認為，他們說，弗里德一家確實留了一些東西在他們這里，但只是幾件衣服，現在他們很樂意把衣服奉還。“我們留給你們的是金子和鉆石！”瓦爾特的父親絕望地喊道。但是沒有用，他們最終也沒能拿回自己的財產。

讓弗里德一家心灰意冷的，不光是朋友明目張膽地搶劫他們錢財的行為，還有朋友的背叛。“我們最后一線希望也破滅了，”瓦爾特·弗里德說，“那個曾與猶太人做朋友的虔誠基督徒，那個一直接受猶太人救濟的人，到頭來卻不愿回應我們的要求。他當年身無分文地來到我們餐廳，我們免費給他吃的，結果現在他卻根本不想讓我們回來，這樣他們就不用再翻出那筆舊賬，不用看著我們的眼睛說：‘我們什么也不欠你們的。’戰前最好的朋友現在變成了我們最大的敵人。1945年我們遭到的威脅比1942年我們離開時還要嚴重。仇恨就是這么深。”

1945年夏天的一個夜晚，仇恨變成了實實在在的襲擊：瓦爾特和他父親走在托樸卡尼鎮一條大街上時，突然遇到一群30歲左右的年輕人，其中一個人戰前是瓦爾特的校友，名叫約紹，而現在的約紹變得極不友好。這群人沖到瓦爾特和他父親身邊，開始毆打他們。“猶太人！你這個猶太人！”約紹邊打邊喊。瓦爾特受了傷，倒在地上，這時他想起戰前他與約紹分吃面包的事。他對約紹說：“你吃我的面包吃得還不夠是么？現在竟然跑來打我！為什么？”但約紹只回答道：“猶太人！你這個猶太人！”

這群惡棍中的其他人喊道：“猶太人！是你們害死了基督。”他們不光揮動拳頭，還棍棒齊下，直到瓦爾特父子奄奄一息。這場襲擊就發生在小鎮的主街上，瓦爾特發現，雖然有幾個經過的人與他們相識，但沒有一個人停下來幫他們。“我曾以為我認識很多人，”瓦爾特說，“但突然之間沒有人還認得我們。”接著，這群年輕人把他們拖去了當地警察局，把他們扔在臺階上。“警察也沒好到哪里去，他們沒有追捕那群人，而是任由后者一走了之。然后他們又打了我們一頓。”瓦爾特知道他再也沒法繼續在斯洛伐克住下去了，就抓住機會移民到以色列，直到今天仍生活在那里。

據稱，戰后波蘭的猶太人還遭到過有組織的集體屠殺。沒人知道在整個東歐還有多少猶太人從集中營回到家鄉后面臨著類似的處境，也沒人詳細統計和調查過未歸還猶太人的財物究竟有多少。但瓦爾特·弗里德和琳達·布雷德的遭遇決非個例，而是非常普遍的現象。在戰爭剛結束的那幾年，一片混亂之中，人們都忙著適應新統治者領導下的新生活，就算有人打算為那些從反猶迫害中幸存下來的猶太人伸張正義，這件事的重要性也遠遠排在其他事情之后。

1943年10月逃離索比堡的托伊·布拉特更加深切地體會到，猶太人再也回不到戰前相對平靜的生活了。在抵抗運動后，他逃出集中營，在波蘭東躲西藏回避德國人，希望能從當地人那里尋得幫助。然而他發現，很多波蘭人拒絕伸出援手，不僅因為他們害怕納粹，還因為他們自己也帶有明顯的反猶主義傾向。最后終于有一個農民同意把他藏在農場外一個小屋的地下室里，但這純粹是本著賺錢的目的——藏他是要收費的。由于戰爭并沒有如預想的那樣迅速結束，這名農民的一個親戚有一天走進托伊的藏身之處，打算殺了他。托伊最后通過裝死才奇跡般地逃過一劫。

戰爭結束后，托伊·布拉特回到了位于伊茲比卡的家。與琳達·布雷德和瓦爾特·弗里德一樣，他發現鎮上原來的猶太人社區已經遭到徹底破壞。后來他離開伊茲比卡，想在波蘭其他地方開始新的生活，卻也過得不開心：“我人生的大部分時光是在波蘭度過的，”他說，“（但）我仍然覺得自己不屬于這里。我想要結婚，但有一個問題，我的女友知道我是猶太人會有什么反應呢？多半是負面的，我不得不說。”由于在自己出生和成長的這片土地上感到格格不入，1957年，托伊移民到以色列，后來又去了美國。他說自己可以感受到波蘭共產黨的反猶主義傾向，因為他覺得波蘭共產黨將猶太人視為“第五縱隊”[[17]](#_17__Di_Wu_Zong_Dui__Fifth_colum)。

托伊·布拉特最后在美國打拼出一片天地，但他總覺得自己有一部分是屬于波蘭的，于是，他在20世紀90年代初重訪伊茲比卡。那個曾住著近4000名猶太人的小村莊，現在里面一個猶太人也沒有了。村里有一個波蘭天主教徒是托伊的朋友，他常說如果托伊回來就住他那里。然而，等到托伊真的回到村莊，這位朋友卻把他拒之門外，沒有給任何理由。當然，托伊很清楚原因：“他不想讓鄰居知道有個猶太人睡在他家里。”

就連那些曾在戰爭期間幫助托伊·布拉特藏身的波蘭人，也不愿承認他們是朋友，甚至不愿承認他們互相認識。托伊指出，在他從索比堡回到波蘭的漫長路途中，一些勇敢的波蘭人曾為他提供過食物和住處（近期關于華沙的研究表明，這樣勇敢的波蘭人有數千名之多[[18]](#_18__Gunnar_S__Paulsson___Mi_Mi)），但到了今天，他們中的一些人對自己的行為不但不引以為傲，反而感到羞恥。當托伊與一名天主教神父一起走在附近的一個小村莊里時，他指了指一幢房子，說住在里面的人曾在戰爭中幫助過他，邊說邊朝大門走去。結果，那個人躲在窗簾后面，不愿為他開門。對托伊來說這背后的原因也不難猜測：“很多曾經藏匿過猶太人的人不愿意讓鄰居們知道，因為鄰居馬上就會說：‘哦，他藏過猶太人，肯定掙了不少錢。’”

而令托伊深受打擊的一件事，發生在他去拜訪自己伊茲比卡舊居的時候，它生動地表明，反猶主義觀念和思想到現在依然陰魂不散。托伊敲了敲門，問住在里面的人能不能讓他進去，說他想看看這個他從小到大生活的地方，這個他躲避德國人的“行動”時的安身之地，這個他最深愛的父母在被帶去索比堡之前，度過生命最后一段時光的住所。一開始新住戶不愿意，但在托伊把三美元塞進他手里之后，這個人同意了。托伊走進屋，馬上注意到客廳里的一把椅子，他說這是他父親的椅子。“哦，不，”新住戶說，“這不可能。”于是托伊拿過椅子，把它翻轉過來，可以看到椅子底部刻著他家的姓氏。見到這一幕，那個男人說：“布拉特先生，你何必拿這把椅子來演戲？我知道你為什么來這里。”托伊不解地望著他。“我知道你是回來找你藏起來的錢，”那個男人繼續說道，“咱們可以分了它，你一半，我一半。”托伊·布拉特憤怒地離開了，一次也沒有回頭。

這個故事還沒有結束，后來發生的事更具諷刺意味：托伊再次回到伊茲比卡，他經過原來的家，發現那里變成了一片廢墟。他跑去問隔壁的人發生了什么。他們說：“哦，布拉特先生，你走了以后，我們根本沒法睡覺，那個人沒日沒夜地找你藏起來的財寶。他把地板拆了，把墻推了，把所有東西都拆了，結果發現沒法復原，因為那得花好多錢。所以那里就成了一片廢墟。”

雖然托伊、琳達和瓦爾特在戰后的遭遇反映出人性中令人失望的陰暗面，但來自歐洲另一個國家的故事多少令人欣慰。在戰爭結束前，丹麥猶太人大部分漂泊在瑞典，少數關在納粹的特萊西恩施塔特集中營，他們在戰后回到家鄉，受到當地人的熱烈歡迎。“我們這里不一樣，沒人霸占猶太人的財產，”本特·梅爾希奧[[19]](#_19__BBCFang_Tan_1)說，“這里的人沒有動我們任何東西。”梅爾希奧一家人剛回去，他們的房東就通知了當時住在他家的房客。在不到三個月的時間里，他們又過上了和被驅逐前完全一樣的生活。他們的房東甚至幫他們把家具仔細地打包和存放起來，好讓他們回來以后繼續使用。

回到丹麥的住處，魯迪·比爾[[20]](#_20__BBCFang_Tan_1)和他的家人發現家中“一塵不染”。他們不在的這幾年，朋友一直在幫忙支付房租。“那種感覺真是太好了，”他說，“就是那種大家都覺得我們還會回來的感覺。”他記憶中最可怕的一件事發生在他妻子家：他們被帶走時家里有一只未煮熟的鴨子，結果18個月后他們回到家時，發現鴨子還在，但已嚴重腐爛，從那以后他的岳母再也不吃鴨子了。

大體上來說，丹麥的猶太人回到家鄉后受到的待遇要好于波蘭或斯洛伐克的猶太人，造成這種差別主要是外部環境因素。那些想在蘇聯統治下的新國家建設新生活的猶太人，面對的是一個全新的政治體制，這個體制宣揚的是一切財產國有化，禁止個人擁有住房或工廠，在這種情況下，猶太人想要回自己在戰前擁有的財產幾乎是不可能實現的。一些非猶太人在猶太人遭到驅逐期間搬進了他們的房子或公寓，而這些人現在只需要說，房子是國有的，他們不過是租住，就可以不必歸還（這也正是弗里德一家在斯洛伐克試圖要回自己的餐廳時遇到的情況）。此外，對這些國家的許多非猶太人來說，他們最不愿聽到的，就是別人討論納粹占領他們的國家并迫害猶太人期間他們自己都做了些什么。當然，考慮到屠殺的規模，能成功回到家鄉發起這樣一場討論的猶太人少之又少。蘇聯力圖淡化納粹滅絕行動中的種族要素，強調受害者都是“反法西斯主義者”的做法，也完全符合東部一些非猶太人的愿望，這樣一來，納粹殘忍的“最終解決”將與他們的國家毫無干系，否則實在有太多令人難堪的問題需要回答。

在這段歷史上，一個又一個事例表明，對大多數人來說，違背社會的主流文化觀念行事是極其困難的。瓦爾特·弗里德的老朋友約紹之所以與他反目，并不是他獨自一人的決定，而是由于他所處的文化環境發生了改變，而造成這一變化的，一方面是蘇聯人的占領，另一方面是少數猶太人在戰后的回歸，讓很多人被迫面對一段自己努力想要遺忘的過去。選擇永遠存在，但隨大流總是更容易一些。如果大家都持有反猶主義觀點，都想要迫害猶太人，那么跟大家一樣就可以了。

但在丹麥人那里則不存在這樣的困境。他們覺得1943年秋天納粹想要驅逐猶太人時，自己做出了英勇的反抗，因此丹麥猶太人在戰后回到家鄉是一件值得慶賀的事，不必視而不見。在戰爭剛結束的那段時期，無論從經濟、政治，甚至是道德上來看，做個丹麥人都比做波蘭人或斯洛伐克人更容易。但這并不是說所有西歐國家的猶太人在回到家園以后都過上了舒適的生活，事實上生活一點也不輕松。盡管有聯合救濟委員會（Joint Distribution Committee）的資助，盡管有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在20世紀50年代依照《盧森堡條約》支付給以色列的賠償金，但許多猶太人始終沒能得到他們應得的補償。直到今天，爭取合理賠付的努力仍在繼續。

相較于那些在戰爭結束后命運迥然的受害者，迫害的實施者則在德國投降的那一刻都清楚地知道，等待他們所有人的將是拘捕和起訴。與努力隱瞞自己真實過去的魯道夫·霍斯一樣，奧斯卡·格倫寧，這個奧斯維辛大機器上的小齒輪也采取了相同的做法。[[21]](#_21__BBCFang_Tan)1944年，他要求調往前線的申請終于獲得批準，于是他加入了在阿登高地作戰的黨衛軍部隊。后來因負傷被送去一家戰地醫院，傷愈后他重新回到部隊，直到1945年6月10日向英國投降。他們被俘后，英國人給所有人發了一張問卷，格倫寧這時意識到，“提及在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工作經歷一定會帶來不好的結果”，于是他“決定盡量隱瞞這件事”。他在表格中寫道，自己曾在柏林的黨衛隊總部工作。當然，他這樣做并不是因為突然對奧斯維辛里發生的一切產生了羞恥之心，而是因為“勝利的一方永遠是對的，我們知道那里（指奧斯維辛）發生的事也有違反人權的地方”。但格倫寧依然覺得，“我之所以會成為戰俘，是因為我的黨衛隊身份，我加入組織在先，它被定義為一個犯罪組織在后，我就這樣不明不白地成了罪犯。”

格倫寧與其他黨衛隊成員一起關在一個昔日的納粹集中營里，這段經歷“令人不太愉快，這是對待罪之人的報復”。1946年，他被轉到英格蘭，從此生活條件得到了極大的改善。雖然需要進行強制勞動，但總的來說他在那里“過著相當舒適的生活”。監獄里的伙食不錯，還能掙到零花錢。他甚至加入了基督教青年會（YMCA）唱詩班，在四個月的時間里輾轉于英格蘭中部地區和蘇格蘭各地舉辦演唱會。他會唱德國贊美詩，也會唱傳統的英國民謠，如《一個情人和他的姑娘》（A Lover and His Lass），演出深得英國觀眾喜愛，他們爭相邀請唱詩班里的德國人到自己家中過夜，睡個好覺，并為之準備早餐。

1947年，格倫寧獲釋回到德國。由于他過去的黨衛隊身份，他原來工作的銀行拒絕接受他。他在一家玻璃制造廠找到一份新的工作，展開一步步向上爬的漫長職業生涯。關于他在奧斯維辛的經歷，格倫寧依然踐行不去引起“不必要關注”的原則，甚至要求他最親近的家人也抹除相關的記憶。他回到德國沒多久，有一次與自己的父親及岳父母共進晚餐，“他們對奧斯維辛發表了一句特別愚蠢的評論”，暗示他是“潛在的甚或是真正的兇手”。“我氣炸了！”格倫寧說，“我一拳重重砸在桌子上，說：‘以后但凡有我在，誰都不許再提這個詞，不許把它跟我聯系起來，否則我就搬出去！’我的聲音特別大，他們后來都照我說的去做，再也沒有提起過。”就這樣，格倫寧一家在戰后的德國安頓下來，努力為自己創造新的未來，并成為德國“經濟奇跡”的受益者。

戰后發生的另一件大事是以色列建國，它也催生了一支資金充裕、組織有序的情報機構，其成員齊心協力地追查納粹行兇者的蹤跡。他們最著名的成就便是在阿根廷抓獲了阿道夫·艾希曼，將他秘密轉移至以色列，并于1961年在特拉維夫市對他進行了審判。摩西·塔沃爾[[22]](#_22__BBCFang_Tan_1)是抓獲艾希曼的成員之一，他固然對這次廣為人知的行動感到自豪，但更有成就感的，是他在戰爭剛結束的數個月里秘密進行的“報復行動”。

1941年，20歲的摩西·塔沃爾加入英國陸軍，隨后效力于“猶太旅”，這是一個由5000名猶太士兵組成的隊伍，負責指揮的是一位在加拿大出生的猶太人，布里格迪爾·歐內斯特·本杰明。他們把大衛之星當作自己的徽章，而這個標志現在出現在以色列的國旗上。巴勒斯坦猶太人最早于1940年被征入英國軍隊，1942年，巴勒斯坦軍團參與了北非戰場的作戰。英國政府內部多年來一直有人反對單獨成立一支全部是猶太人的部隊，反對者就包括內維爾·張伯倫，但溫斯頓·丘吉爾對這種做法持更開放的態度，因而“猶太旅”在1944年得以組建完成。

猶太旅在意大利北部一路挺進到戰爭結束，在這個過程中，摩西·塔沃爾和他的戰友們越來越多地了解到納粹如何對待他們的猶太同胞。“我們很生氣，”他簡潔地說，“我們當中有很多人覺得僅僅參與作戰還不夠。”于是，摩西·塔沃爾和他的戰友們討論出“報復”德國人的方法。他們首先動用各種資源，聯絡上部隊情報部門以及其他猶太組織的人，從他們那里要來一些德國人的名字，這些德國人據稱全都參與了對猶太人的屠殺。接著，他們對自己的車進行偽裝，蓋住大衛之星標志，換成某個非猶太人部隊的標志，并在自己的手臂上套上英國憲兵的袖章。等全部準備工作就緒，他們就驅車來到某個涉嫌殺害過猶太人的德國人家中，把他帶出來接受“審問”。“他們沒有懷疑，”塔沃爾說，“他們沒認出我們是猶太旅的，還以為我們是英國士兵。我們把那個人帶走的時候他也沒有反抗。但從那一刻起，他再也見不到他的家。”

摩西·塔沃爾和猶太旅其他成員開著車，把他們的德國俘虜帶到一個四下無人的地方，在那里“對他進行審訊”。他們會把自己聽到的有關他的指控說給他聽，然后，“也許我們會給他個機會說點什么”。在這之后，他們無一例外地“把他解決”。他們十分小心，沒有留下任何殺人的痕跡，沒有血也沒有尸體。“具體方法是讓我們當中的一個人勒死他。”后來他承認他親手勒死過一個有嫌疑的德國人。“我并不是說我有多樂意做這件事，但我確實做了。我不需要靠酒精讓自己興奮起來，我總是有足夠的熱情。我不是說自己很冷漠，只是我在做自己的工作時很冷靜。甚至你都可以拿我跟那些做相同事情的德國人相比較，他們也是在做自己的工作。”在殺死有嫌疑的德國人后，他們處理掉尸體。“接著我們會把車開到一個我們提前選好的地點。我們把一些重物綁在他的腳上，比如發動機的某個零件，然后我們就把他拖進河里。”

摩西·塔沃爾一點也不后悔他以這種方式親手殺死德國人：“我做這件事的時候感覺很好。我的意思是，我不是在殺人的那一刻感覺很好，而是在那（整個）時期。我不能說我現在對這件事感到抱歉。你可以說我殺了人，但我知道我殺的是什么人。我既不自豪，也不歉疚。我不會在半夜突然從噩夢中驚醒或怎么樣。我睡得好，吃得好，日子照常過。”

摩西·塔沃爾承認，他所伸張的“正義”與法官和陪審團判定的“正義”有很大差距，他也承認，“在那之前，我一生中也做過不少不那么體面的事”。此外，他和同伙們得到的“證據”有些是禁不起推敲的，這些指控是否合理，永遠都沒有機會在法庭上得到公正的裁決。因此，塔沃爾殺害的有可能是無辜的人，而且這種可能性還不小。然而，強烈的憤怒讓塔沃爾和他的同伙覺得值得冒這個險。他甚至曾親眼目睹猶太旅成員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殺死德國人：“有的人做起這些事來沒什么理由，他們的兄弟或母親被（納粹）殺死了。記得在德國還是奧地利，他們看見一個騎著車的德國人，司機直接把他撞倒，從他身上碾了過去。”

摩西·塔沃爾說他自己參與了“大約五起”報復性謀殺，并稱猶太旅的同伴們加起來“大約進行了20次處決行動”。由于他和同伴們的行為是違法的，因此我們很難確定塔沃爾所描述的細節是否屬實。他謹慎地略去了被害者的名字，也沒有提及實施謀殺的具體地點。也有可能塔沃爾夸大了殺戮行動的戲劇性，現實情況或許是他們只在偶然間殺死過某個被他們懷疑為納粹分子的人（雖然他聲稱對處決對象的選擇都基于可靠的“情報”，但我們不可全然相信）。不過，其他一些證據也證實了猶太旅成員確實進行過“報復性”殺戮，其中就包括以色列前陸軍參謀長哈伊姆·拉斯科夫的目擊證詞。[[23]](#_23__Tom_Segev___Di_Qi_Bai_Wan_G)另一個已經得到證實的事件是，一些猶太“復仇者”曾試圖給一個集中營的供水系統投毒（但最后沒有成功），那里面關押的都是黨衛隊隊員。[[24]](#_24__Segev___Di_Qi_Bai_Wan_Ge)

摩西·塔沃爾和其他猶太旅成員所采取的這些行動背后似乎有著單純而明確的動機，那就是報復納粹對猶太人（其中包括他們自己的親人）的屠殺。然而，實際情況沒有這么簡單。他們的內心深處還藏著另一個揮之不去的念頭，是這個念頭讓他們變得如此殘酷無情：他們認為那些被德國人折磨的猶太人沒有進行足夠的抵抗。“我不明白，”塔沃爾說，“6個或8個德國士兵怎么能把150個猶太人趕上車然后把他們送走呢？我想我應該會攻擊某個德國人，讓他們殺了我，一切就都了結了。但我跟那些住在波蘭小鎮子里的猶太人不一樣，我們小的時候就會假裝自己是古代猶太英雄，假裝我們在打仗。我特別認同兩千年前在這個地方（指以色列）戰斗的人，但對那些像待宰羔羊一樣的猶太人就沒那么認同了，我沒法理解他們。”

摩西·塔沃爾的態度并非個案。一些戰后在以色列定居的集中營幸存者稱，他們隱隱可以感到周圍的人對他們的批評，認為他們沒有做出足夠的努力反抗納粹。這些人沒有意識到，讓那些婦女兒童做出更多反抗幾乎是不可能的。他們失去了家園，住在東歐的社區里，那些社區直到今天仍對他們缺乏同情心。盡管如此，仍有不少人嘴上不說，心里卻認為集中營里的猶太人不該像摩西·塔沃爾描述的那樣，做個“等待被宰殺的羔羊”。如果說塔沃爾們從納粹的“最終解決”那里只得到一個教訓，它就是：猶太人再也不能不加反抗地屈服于敵人，而在塔沃爾們看來，這也是新成立的以色列應當具備的民族精神。

在摩西·塔沃爾對德國人展開非法報復行動的同時，盟軍的其他成員則努力在法律范圍內抓捕行兇者。起初他們沒什么進展，大部分曾在奧斯維辛工作的黨衛隊成員，在戰爭剛結束的那段時間都人間蒸發。門格勒博士和魯道夫·霍斯這樣的大人物一開始被盟軍拘留，但后來也都被釋放。門格勒的腋下并沒有黨衛隊的血型文身，這就意味著他從來沒有被納入黨衛隊，而霍斯偽裝成德國海軍的做法使得從來沒有人檢查他的文身。

但到了1945年秋，魯道夫·霍斯已經成了第21集團軍戰爭罪行調查部以及英國情報隊（British Intelligence Corps）的審訊對象。[[25]](#_25__Xiang_Guan_Kai_Chuang_Xing)英國人能詳細了解霍斯的工作主要得益于貝爾根-貝爾森的解放。在對幸存者進行系統詢問后，他們發現了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許多人充滿恐懼地講到他們在上西里西亞地區另一個營地的遭遇，那個地方就是奧斯維辛。英國人這才決定抓捕這個屠殺機器的指揮官。情報隊已經找到了尋找行兇者最有效的方式，那是通過他們的家人，因為納粹分子可以改頭換面，甚至逃到國外，但他們通常難以割舍對妻兒的感情，而家人幾乎永遠更容易找到。海德薇格·霍斯夫人和她的孩子們也不例外。英國情報隊查到他們住在距貝爾森6英里遠的一個小村莊里，馬上對他們進行監視。霍斯夫人于1945年3月8日被拘捕。在幾天的時間里，英國人反復逼問她丈夫在哪里，但她每次都回答：“他已經死了。”最后，情報隊官員通過一個計策誘使她說出實話：這個監獄的后部緊鄰一條鐵軌，一輛列車呼嘯著開到霍斯夫人牢房的正后方，停了下來。第92戰地安全營指揮官威廉·克羅斯（“維克托”）上校說：”我們對霍斯夫人說，火車已經到了，她的三個兒子馬上就要被送去西伯利亞，除非她告訴我們她丈夫在哪兒以及他用的別名是什么。如果她不配合，那么她只有兩分鐘時間跟兒子們道別……我們給了她十分鐘左右的時間，還給她留了紙和筆，好讓她寫下我們需要的信息。幸運的是，我們成功唬住了她，她寫下信息，然后我們把她和她的兒子們送回了家。”[[26]](#_26__Rupert_Butler___Si_Wang_Jun)

據霍斯夫人透露，她的丈夫住在弗倫斯堡附近的一家農場里。情報隊立即動身前往德國北部。與當地第93戰地安全營取得聯系后，他們于3月11日那個周一的晚上11點到達農場，在一個既是馬廄同時也是屠宰棚的房子里找到霍斯時，他正穿著睡衣躺在床上。一位英國軍醫迅速撬開霍斯的嘴，檢查有沒有毒膠囊——他們都知道希姆萊在一年前就是用這種毒膠囊成功自殺。臉上挨了一位英國中士四拳之后，霍斯才終于承認自己是誰，隨后他被按到屠宰棚的一張桌子上，據在場的一位英國士兵說，“毆打和喊叫聲沒完沒了。”直到軍醫對克羅斯上校喊道：“快讓他們住手！否則你們帶回去的就是一具尸體了！”霍斯被裹在毛毯中塞進車里，汽車載著他駛向位于海德的安保總部。

第二天凌晨他們到達時，天上正飄著雪，但霍斯被迫赤身裸體地穿過營房的院子，走到自己的牢房中。在接下來的三天里，英國人始終沒讓他合眼，每當他打瞌睡，士兵就用斧柄戳他。按照霍斯的說法，他們還用他自己的馬鞭抽打他。3月14日，他在一份8頁的供認書上簽了字。

一些大屠殺否認者總愛提及霍斯剛被逮捕時在英國士兵手底下遭受的虐待，并稱他的供認書是屈打成招的結果。誠然，霍斯最初的聲明是否有效確實存在爭論的空間，但在其后的囚禁和審訊中（他先是被送到了代號為“番茄”的二號戰犯拘留中心，隨后出席了紐倫堡審判和在波蘭進行的對他本人的審判），沒有證據顯示霍斯又遭受過任何虐待。正是在后來的這段時期，他寫就了自己的回憶錄。事實上，他在回憶錄里寫道，他非常感激抓捕他的人能給他一個機會讓他寫下個人的歷史。他始終沒有推翻他最初的供認，無論是在撰寫回憶錄期間，還是在證人席上，而當時他是有機會公開反悔的。正如他后來沒有顧慮地寫下了自己最開始被英國士兵毆打的經歷。

1947年4月，魯道夫·霍斯回到奧斯維辛，回到了他當年工作的那棟大樓，但這一次，他沒有坐在他位于一層的辦公室書桌前，而是被關押在黨衛隊行政大樓的地下牢房。大家認為，讓這個背負著奧斯維辛一百多萬條人命的兇手在他的罪孽之地被處決，是他最好的下場。然而，在原定實施處決的那天，現場卻出現了一個問題：當天有數千人前來圍觀，其中很多是原來的犯人。結果，氣氛變得非常緊張，激動的人群向前推擠著擋在他們身前的圍欄。曾被關在奧斯維辛的斯坦尼斯瓦夫·漢茨[[27]](#_27__BBCFang_Tan_1)當時在場，他說他真的覺得“他們會當場用私刑處死霍斯”。他聽見人群中一陣陣騷動。如果一大群人突然向前沖，站在一旁的士兵該怎么做？他們要開槍嗎？鑒于情勢太過危險，霍斯并沒有按原計劃從他的牢房里被帶出來。有人想出一個辦法：他讓士兵們全部離場，并派出一個車隊護送一輛小轎車離去，于是大家自然認為霍斯在車里。但實際上，霍斯并沒有出來，那天晚上他仍留在自己的牢房中，直到第二天早上才被帶出來。這一次，魯道夫·霍斯面對的只有寥寥數人，而不是前一天怒吼著的群眾。霍斯已經做好被處死的準備。目睹處決過程的人為數不多，當中就有斯坦尼斯瓦夫·漢茨。他說：“我以為他爬上絞架以后會說點什么，因為我知道他是納粹主義的堅定擁護者。我以為他會高聲贊美納粹的理念，畢竟他愿意為這些信條奉獻自己的生命。但沒有，他一句話也沒說。”

霍斯死得很“痛快”，這完全不是曾在集中營里飽受折磨的漢茨希望看到的。“我認為應該把霍斯關在一個籠子里，然后拉著這個籠子在全歐洲跑，讓大家都能看到他，讓大家都能朝他吐口水，這樣他才能明白他都干了些什么。”但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是：霍斯真的能“明白”他都干了什么嗎？在他被處決前剛剛寫就的自傳中，所有的線索都指向同一個結論，那就是無論霍斯遭到什么樣的羞辱和虐待，他都不會發自內心地認為他所做的一切從根本上是錯誤的。當然，他確實在自傳里寫道，他“此時此刻”認為滅絕猶太人是一個錯誤，但這只是一個策略上的失誤，因為它讓德國成為全世界仇視的對象。

根據我與一些前納粹分子接觸的經驗，我認為霍斯的回憶錄中有一段話可以明白無誤地揭示出霍斯最后一刻的真實想法。他提了一個問題，而這個問題他在紐倫堡審判中也提過，那就是：如果一名飛行員拒絕朝一個小鎮投下炸彈，因為他知道這個鎮里住的主要是婦女兒童，那結果會怎么樣呢？霍斯說，這個飛行員肯定會被送上軍事法庭。“人們都說，這兩件事沒有可比性，”霍斯寫道，“但在我看來，它們就是一回事。”[[28]](#_28__Lu_Dao_Fu__Huo_Si____Ao_Si)

霍斯想用這個簡單的類比來證明他的行為是合理的，也就是說，盟軍用炸彈炸死婦女兒童，與納粹用毒氣毒死婦女兒童是一樣的。直到今天，許多當年的行兇者（以及為納粹辯護的人）依然支持這種觀點。曾有一位拒絕接受正式采訪的前黨衛隊成員在一次閑談中對我說：“比起你們轟炸德國城市時炸死的孩子，那些死在我們毒氣室里的孩子受的苦要少多了。”奧斯卡·格倫寧也曾更坦率、更認真地解釋道：“我們看到炸彈落在德國的土地上，婦女和兒童在爆炸聲中死去。我們看到這些，就會覺得，這場戰爭之所以變成后來那個樣子，雙方都有責任。我們之所以要進行大屠殺，一方面是為了打壓挑釁的人，另一方面也是為我們的自由而戰。”在格倫寧看來，盟軍“不考慮軍事上是否必要，就用磷彈炸死婦女和兒童”，這種做法在戰爭結束后卻沒有被追究責任，這讓他覺得，把關注的焦點全部放在黨衛隊犯下的“戰爭罪行”上是非常虛偽的。

當然，這種比較讓我們從直覺上就感到厭惡，而關于盟軍轟炸德國城市與納粹滅絕猶太人之間區別的討論也不在少數。舉例來說，只要德國領導人投降，轟炸就會立即停止，而對猶太人的滅絕則是由意識形態決定的一項政策；盟軍轟炸的對象不是德國某個特定的人群，而納粹迫害的對象則是帝國內部一個特定群體；盟軍想要摧毀的是城鎮里的設施和建筑，而不是德國人；納粹對猶太人的迫害（比如艾希曼殘忍的尼斯科計劃）在時間上先于盟軍對德國城市的轟炸，因此用盟軍的轟炸來為納粹對猶太人犯下的罪行辯護根本不成立；最后，把講求實效的盟軍戰略規劃者與希特勒、海德里希和艾希曼這些狂熱的反猶主義者相提并論，無疑十分荒唐。除了以上這些區別，還有一個非專業人士最愛使用的論點：“是德國人先挑起來的，是他們先炸了英國的城市，然后英國人才轟炸了柏林。”但其實它是所有論點里最無力的一個，我們很難單純因為敵人先做出某個舉動，就證明后來采取相同行動的一方是合理的。

盡管二者有如此多的區別，霍斯和其他納粹分子進行的對比依然讓我們感到不安。其中一個原因很容易想到：眾所周知，盟軍領導層內部對是否轟炸德國城市存在分歧，不說別人，丘吉爾本人在戰爭接近尾聲時就對轟炸方案提出過異議。此外，近幾年被披露出來的一則內幕消息，更加深了人們的不安：在1945年春天，盟軍決定轟炸德國哪些城鎮時使用的標準之一，是它們的“易燃程度”，這一標準導致烏茲堡（Würzburg）這樣的中世紀古城成為轟炸的目標。給我們造成困擾的還有一個不那么容易想到的原因：轟炸機的發明使得從高空投擲炸彈的飛行員對他的殺戮行為產生了“距離感”。“那跟我走到外面一刀捅在一個人的肚子上是不一樣的。明白嗎？”保羅·蒙哥馬利[[29]](#_29__BBCFang_Tan___Yin_Zi_Lauren)這樣說道，他是美國B29轟炸機飛行員，在戰爭期間參與了對日本多個城市的轟炸。“你確實殺了他們，但你是遠距離殺死他們的，所以你不會像在一場搏斗中把刺刀插進一個人的肚子里那樣有什么負罪感。那是不一樣的。那種感覺有點像在電子游戲里打仗。”

蒙哥馬利的證詞令人聯想到，納粹也是通過建造毒氣室，在行兇者與他們的殺戮行為之間制造距離感。這種聯想讓人感到不適。用炸彈炸死一個人比用刺刀捅死一個人要來得容易，同樣的道理，對納粹來說，用毒氣毒死猶太人也比開槍殺死他們更簡單。20世紀的技術手段不僅使被戰爭奪去性命的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也讓實施殺戮的兇手承受的心理負擔和傷害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小。

然而，這并不意味著納粹對奧斯維辛一百多萬名犯人的殺戮可以與盟軍對德國的轟炸相提并論。出于前文提到的原因，我們可以看出這兩個行動在概念上是完全不同的。但在霍斯和其他許多納粹分子看來，二者有著相同的性質，轟炸和毒殺只不過是殺死敵人的兩種不同方式。這也就意味著，無論用什么樣的方式處置霍斯，無論他是否如斯坦尼斯瓦夫·漢茨希望的那樣，被“關在籠子里”游街示眾，他都不會真的對他的所作所為感到后悔。事實上，霍斯在登上絞架的過程中很可能在想：“我并不是因為自己有罪才死的，而是因為我們輸掉了戰爭。我是作為一個被誤解的人而死的。”說到底，這也是為什么霍斯這個看起來如此普通的人，實際上卻非常可怕。

霍斯于1947年被處死后，他一手建造起來的奧斯維辛營區也迅速土崩瓦解。比克瑙的部分營房被住在附近的波蘭人拆毀，因為他們需要木材修復自己的房屋，但與他們相比，另一些人對集中營進行的洗劫則讓人心里更不是滋味。一名波蘭年輕人約瑟芬·杰林斯卡與她的家人在戰后回到奧斯維辛，卻發現他們沒有地方可以住，因為納粹對這個地區進行大規模重建時拆了他們的房子。于是，他們只好住進過去養雞用的屋棚中。為了賺錢，約瑟芬和朋友們會到比克瑙的焚尸場附近“淘金”。他們翻動土地，挖出埋在地下的人骨碎片，把這些碎片放在一個碗里，裝上水以后從中找金子。“大家都覺得很不舒服”，約瑟芬說，“無論自己有沒有親人死在集中營里，大家都覺得不自在，因為這些畢竟是人的骨頭。沒人樂意干這種事，可是貧窮逼著我們不得不這么做。”從比克瑙地下挖出來的金子，最后讓約瑟芬·杰林斯卡一家買到了一頭牛。

波蘭人揚·皮夫奇克當時也被迫住在比克瑙附近的一個雞棚里，他承認他也曾在焚尸場附近搜尋貴重物品。“我記得我找到一顆金牙，一枚猶太硬幣，還有一個金手鐲。我現在肯定不會這么干了，對不對？我不會再從人骨堆里刨東西，因為我知道干這種事的都該遭天譴。但那個時候我們沒別的辦法，只能這么做。”除了搜尋貴重物品，揚和他的朋友們還會賄賂那些偶爾在附近巡視的蘇聯士兵，以便從比克瑙的營房偷些木料回去造房子。“你知道嗎，戰后的生活很艱苦，一切都得從零開始。”

戰爭剛結束的時候，曾目睹魯道夫·霍斯處決過程的波蘭政治犯斯坦尼斯瓦夫·漢茨得到了一份工作，即在比克瑙做守衛。他的職責是看守營地，一旦當地人想從焚尸場偷東西，他就朝他們上空開槍警示。“我們管那群人叫‘墓地土狼’，”他說，“我們不明白這些人怎么會愿意從墓地里找東西。”他有一個簡單的方法可以從遠處就覺察到這群人的靠近：“你可以通過氣味認出他們，他們離得很遠的時候你就可以聞到一股味道，那是一種腐爛的尸體特有的惡臭。這種人走在街上你一下就能知道。”

直到很多年以后，奧斯維辛這個大屠殺發生地才得到應有的保護和關注，而直到蘇聯解體，博物館的標示牌才終于被替換，從而以一種更恰當的方式體現猶太人遭受的苦難。

在此過程中，曾在奧斯維辛工作過幾年的前黨衛隊成員奧斯卡·格倫寧則在玻璃制造廠步步高升，當上了人事部主管。最終他被任命為勞資仲裁委員會榮譽委員。奧斯卡·格倫寧表示，在黨衛隊和希特勒青年團的經歷幫助他成為一名更稱職的人事主管，因為“從12歲起我就開始學習什么是紀律了”，而他在說這番話的時候，沒有表現出任何諷刺的意味或不自然的感覺。

盡管格倫寧曾在奧斯維辛負責清點和處理從到達營地的犯人身上搜刮來的各國錢幣，從而間接為滅絕過程出了力，但他從不認為自己“有罪”：“我們對直接參與屠殺的人和沒有直接參與的人是分得很清楚的。”此外，他也用到了納粹分子在戰后最愛使用的辯解之詞，那就是他只不過是在執行命令。他用這樣一個類比為自己開脫：“一群士兵不會在第一次見到槍林彈雨以后就都表示：‘我們不認同這件事，我們要回家。’”

令人頗感意外的是，德國檢察官在戰后決定誰犯有戰爭罪、誰沒有的時候，采用的也是類似的原則。如果一名黨衛隊成員既沒有身居要職，也沒有直接參與屠殺，那么他基本就不會遭到起訴。因此，當奧斯卡·格倫寧做過的事情最終敗露——這也是在所難免的，因為他從沒打算改名換姓或是躲起來——德國檢察官卻并沒有對他提起訴訟。[[30]](#_30__2014Nian_9Yue__Ta_Bei_De_Gu)他的經歷也表明，即使一個人加入了黨衛隊，被派到奧斯維辛工作，見證了滅絕過程，并以某種具體的方式為“最終解決”的實施做出貢獻，比如負責整理從犯人那里掠奪來的錢財，在戰后的西德，他仍有可能被判為“無罪”。事實上，據估計，1940—1945年間在奧斯維辛工作過的黨衛隊成員，大約有6500人活到了戰后，但只有大約750人受到過任何一種形式的處罰。[[31]](#_31__Lasik__Dui_Ao_Si_Wei_Xin_Ji)最有名的一次審判當屬1963年12月至1965年8月在法蘭克福進行的“奧斯維辛審判”，22名被告中17人被判有罪，但只有6人被判處無期徒刑這一最重刑罰。

大量在奧斯維辛工作過的黨衛隊成員沒有遭到起訴，這情況不僅發生在德國，全世界都有類似的問題（或許只有波蘭除外，在789名奧斯維辛工作人員當中，多達673人被送上法庭接受審判[[32]](#_32__Lasik__Zhua_Bu_Yu_Cheng_Fa)）。起訴這些奧斯維辛工作人員之所以很困難，首先是因為不同國家缺乏統一的標準來界定什么樣的行為構成“犯罪”，其次是因為冷戰造成了兩個陣營的對立，最后，我們不得不說，還因為人們缺乏足夠強烈的意愿。在紐倫堡審判中，黨衛隊作為一個整體已經被定義為一個“犯罪組織”，但沒有人進一步強調，每個在奧斯維辛工作過的黨衛隊成員都犯有戰爭罪，而這樣的判決無疑將會得到大眾的支持。如果能夠給他們每個人都定罪，那么無論判罰有多輕，它都是向后人表達的一個明確態度。然而，沒有定罪，也沒有判罰。曾在奧斯維辛工作并活到戰后的黨衛隊成員約有85%沒有遭到任何處罰。當希姆萊在火車上想出建造毒氣室的方案，以減輕他的手下因殘忍射殺猶太人而承受的心理“負擔”時，他一定不會想到這個意外的收獲：這種屠殺方法幫助大部分黨衛隊成員在戰后逃過處罰，只因他們宣稱自己沒有直接參與滅絕過程。

我們已經看到，許多犯人在離開奧斯維辛以后陷入了更艱難的處境，與此同時，奧斯卡·格倫寧卻享受著（并且后來一直享受著）舒適的生活。這種反差并沒有給格倫寧造成片刻的困擾。“這個世界上的事就是這樣的，”他說，“每個人都有權利盡最大努力去改善生活。我所做的也是每個正常人都會做的，那就是為自己和自己所愛的人、比如自己的家人創造最好的生活。只不過我成功了，有些人沒成功。這跟過去發生的事沒有關系。”

令人驚訝的是，對自己的過去滿不在乎的奧斯卡·格倫寧，卻在生命快要走向終點時，突然決定公開談論自己在奧斯維辛的經歷。促使他改變心意的原因很耐人尋味。戰后，格倫寧迷上了集郵，并加入了當地的集郵愛好者俱樂部。在一次俱樂部聚會上，在距離戰爭結束已過去40多年之后，格倫寧跟站在他旁邊的一個人談論起政治。那個男人說：“簡直太差勁了，這屆政府竟然規定，任何懷疑幾百萬猶太人死在奧斯維辛的言論都是違法的。”他繼續向格倫寧解釋道，焚燒這么多尸體是多么“匪夷所思”的事，他還堅持認為，要想毒死那個數量的犯人，納粹需要使用的毒氣劑量足夠殺死附近“所有活物”了。

格倫寧當時并沒有反駁這些說法，但他后來經一位票友推薦，買到了這位大屠殺否認者的一本集郵冊，在上面寫下了充滿諷刺的評論之后，又把集郵冊寄給了他。結果，他突然開始接到陌生人打來的奇怪電話，這些人對他提出質疑，不相信在奧斯維辛，納粹真的用毒氣進行大屠殺。原來，他對大屠殺否認者的譴責在一本新納粹主義雜志上登了出來。此時，他接到的電話和收到的匿名信有“90%來自那些質疑我的人。他們想向我證明我自己在奧斯維辛親眼所見、親身經歷的都大錯特錯，都是我自己的想象，說那些事從來沒有發生過”。

于是，為了反駁那些對他親眼所見的事實提出質疑的人，格倫寧為他的家人寫下了他個人的歷史，并最終同意接受BBC的采訪。現已年過八十的格倫寧對大屠殺否認者只有下面這幾句簡單的話要說：“我希望你們相信我。我親眼見過毒氣室，親眼見過焚尸場。我見過熊熊燃燒的火焰。我曾站在坡道上，篩選就在那里進行。我希望你們相信，這些暴行真的發生過，因為我就在現場。”

這個悲慘的故事進行到最后，留給我們的是什么樣的結局呢？可以肯定的是，在奧斯維辛工作過的大多數人沒有遭到任何處罰，而集中營里的大多數犯人在經歷了如此深重的苦難之后，卻始終沒有得到足夠的補償，非但如此，很多人在戰爭結束后還遭受到更多的偏見和傷害。這樣的結論自然會讓人感到不快。人類從內心深處需要這個世界有公道存在，需要無辜的人最終得到補償，有罪的人最終受到懲罰。但奧斯維辛的歷史沒有給我們這樣的慰藉。而這段歷史最虧欠的，就是比克瑙那些得不到救贖也無法安息的冤魂。作為人類歷史上最大的墓地，比克瑙的土地在戰后被尋覓貴重物品的當地居民一遍遍翻動。這個墓地以及附近的維斯瓦河就是一百多萬人的最終歸宿——許多犯人的骨灰傾倒在這條河里。這一百多萬人的證詞我們已永遠無從聆聽。

大多數曾在奧斯維辛遭受折磨的人，似乎再也無法找到精神層面上的慰藉或救贖。雖然有埃爾澤·阿布特這樣的耶和華見證人，感到上帝始終在集中營里陪伴著她，但絕大多數是像琳達·布雷德這樣的人，他們認為“奧斯維辛沒有上帝。那里的條件太可怕了，上帝決定不去那里。我們根本不會祈禱，因為我們知道根本無濟于事。很多幸存者都成了無神論者，他們無法再相信上帝”。琳達·布雷德這樣的幸存者得出的結論是，她能活命很大程度上靠的是運氣，而當一個人認為主宰命運的是完全不受個人控制的偶然因素時，他很難再有任何宗教信仰。

據估計，被送到奧斯維辛的130萬人中，110萬人死在了那里。其中大約有100萬是猶太人。對那些依然沿用蘇共思路，把所有死在奧斯維辛的人都說成“法西斯主義受害者”的人來說，這是個重要的數字。我們必須記得，超過90%的受害者之所以在奧斯維辛被奪去生命，只因他們在納粹眼中犯有一種“罪”，那就是生為猶太人。

以國家為單位來看，向奧斯維辛輸送猶太人人數最多的國家是匈牙利——在1944年初夏的高峰時期，共有43.8萬名匈牙利猶太人被送到那里。其次是波蘭（30萬），接下來依次是：法國（69 114）、荷蘭（60 085）、希臘（55 000）、捷克斯洛伐克和摩拉維亞（46 099）、斯洛伐克（26 661）、比利時（24 906）、德國和奧地利（23 000）、南斯拉夫（10 000），意大利（7422）。[[33]](#_33__Zhe_Xie_Shu_Zi_You_Ao_Si_We)當然，我們也不該忘記死在集中營里的非猶太人，他們是7萬名波蘭政治犯、2萬多名吉卜賽人、1萬名蘇聯戰俘、幾百名耶和華見證人、數十名同性戀者，以及其他出于種種荒謬的原因（或者根本沒有任何原因）而被送進集中營的人。

用不了多久，最后一批奧斯維辛幸存者和最后一批奧斯維辛行兇者都將追隨那些集中營受害者而去。屆時，世界上將不再有任何活著的奧斯維辛親歷者。等那一天到來，這段歷史將有可能變成又一段遙遠的過去，變成許許多多可怕的歷史事件中的一個。在奧斯維辛之前也發生過許多可怕的暴行，比如獅心王理查在十字軍東征過程中對阿克（Acre）穆斯林的大屠殺，再比如成吉思汗在波斯進行的屠戮。或許我們的子孫后代將用同樣的眼光看待奧斯維辛，認為它不過是發生在過去的一件可怕的事，只存在于人們的記憶中。但我們不應該讓這樣的事發生。我們必須在特定的時代語境下評判某種行為。而在20世紀中葉的語境下，在歐洲文明高度發達的背景下，奧斯維辛和納粹的“最終解決”代表的是人類歷史上最卑劣的行為。納粹犯下的罪行讓世人認識到，只要足夠冷血，一群受過高等教育、擁有先進技術的人也可以做出如此齷齪之事。他們的所作所為既然已為世人知曉，我們必須從中吸取教訓。丑惡的事實就擺在眼前，等待每一代人重新發現它的價值。這段歷史對我們、對后人將永遠是一個警示。

[[1]](#filepos729627) BBC訪談。

[[2]](#filepos731647) Andrzej Strzelecki，“清空集中營”（The Liquidation of the Camp），載于《奧斯維辛1940—1945》，第五卷，第45頁。

[[3]](#filepos735185) 引自Robert Jan van Pelt，《奧斯維辛之辯》第159頁。另見第158—165頁對奧斯維辛解放后媒體相關報道的討論。

[[4]](#filepos735905) van Pelt，《奧斯維辛之辯》，第164頁。

[[5]](#filepos738014) 《大屠殺百科全書》第一卷，第350頁。另見Yehuda Bauer，“死亡行軍：1945年1月—3月”（The Death Marches, January—May 1945），載于《現代猶太主義》（Modern Judaism），1983年2月，第1—21頁。

[[6]](#filepos740674) BBC訪談。

[[7]](#filepos743186) BBC訪談。

[[8]](#filepos748740) BBC訪談。

[[9]](#filepos754268) 同上（見2000年1月19日播出的節目《時代的瞭望：希姆萊、希特勒與帝國的終結》）。

[[10]](#filepos757018) 摘自《時代的瞭望：希姆萊、希特勒與帝國的終結》。

[[11]](#filepos757741) 摘自《時代的瞭望：希姆萊、希特勒與帝國的終結》。

[[12]](#filepos759203) 摘自《時代的瞭望：希姆萊、希特勒與帝國的終結》。

[[13]](#filepos766260) BBC訪談。

[[14]](#filepos767632) BBC訪談。

[[15]](#filepos771065) BBC訪談。

[[16]](#filepos776435) BBC訪談。

[[17]](#filepos783148) 第五縱隊（Fifth column），指在內部進行破壞，與敵方里應外合，不擇手段意圖顛覆、破壞國家團結的團體。現泛稱隱藏在對方內部、尚未曝光的敵方間諜。

[[18]](#filepos784235) Gunnar S. Paulsson，《秘密花園：躲藏起來的華沙猶太人》（Secret Garden: the Hidden Jews of Warsaw,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2）。在28 000名成功逃離（或從未進入）華沙隔離區的猶太人當中，11 000名活到了戰后，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非猶太裔波蘭居民的協助。

[[19]](#filepos787084) BBC訪談。

[[20]](#filepos787600) BBC訪談。

[[21]](#filepos791455) BBC訪談。

[[22]](#filepos794802) BBC訪談。

[[23]](#filepos800374) Tom Segev，《第七百萬個》，（The Seventh Million, Hill and Wang 1994），第147—149頁。

[[24]](#filepos800648) Segev，《第七百萬個》，第140—146頁。

[[25]](#filepos803407) 相關開創性研究是由BBC歷史組的David List進行的。

[[26]](#filepos805138) Rupert Butler，《死亡軍團》（Legions of Death, Hamlyn paperback 1983），另見Cross上校寫給Felix Robson上校的一封信；這封信現存放在Chicksands的軍事情報博物館內。

[[27]](#filepos808186) BBC訪談。

[[28]](#filepos810768) 魯道夫·霍斯，《奧斯維辛指揮官》，第166頁。

[[29]](#filepos814209) BBC訪談。引自Laurence Rees，《東方恐怖》（Horror in the East，BBC Books 2001），第119頁。

[[30]](#filepos820593) 2014年9月，他被德國的檢察官指控，在集中營的期間涉嫌幫助謀殺。2015年7月15日，他被判協助殺害至少三萬名猶太人的大規模謀殺罪，處有期徒刑四年。

[[31]](#filepos821158) Lasik，“對奧斯維辛集中營工作人員的抓捕與懲罰”（The Apprehens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Auschwitz Concentration Camp Staff），載于《奧斯維辛：1940—1945》，第五卷，第99—119頁。

[[32]](#filepos821730) Lasik，“抓捕與懲罰”，第116頁。

[[33]](#filepos828516) 這些數字由奧斯維辛-比克瑙國立博物館的Piper教授提供。

# 致謝

本書基于由我編寫和制作的一部電視系列片。我要感謝的人有很多。這組電視系列片（以及這本書）之所以能夠面世，首先要感謝時任BBC總裁的馬克·湯普森（Mark Thompson）先生給予的熱心支持和大力幫助。這個系列節目自取得馬克的準許，到終于在BBC電臺播出，整個經過可以很好地說明資助、籌備和完成這樣一個項目需要花費多少時間（在此期間，馬克離開了BBC，擔任第四頻道總監，隨后又回到BBC，擔任電臺總裁）。BBC電視臺的其他很多人也為這部電視系列片提供了大力支持，特別是時任BBC第二頻道總監的Jane Root，事實類節目委托制作部總監Glenwyn Benson，以及事實類節目專家組專員Emma Swain。我要特別感謝我的直屬主管、事實類節目專家組總監Keith Scholey先生，謝謝他給予的理解與提出的大量寶貴建議。

許多杰出的學者對這個項目做出了重要貢獻。例如，本系列片的歷史及腳本顧問伊恩·克肖（Ian Kershaw）教授為這個節目提供了大量深刻的洞見。他同時也是一位備受尊敬的學者。對于他給予的專業指導和深厚友情我無以為謝。David Cesarani教授和Christopher Browning教授是另外兩位對我個人以及這部電視系列節目產生深刻影響的專家。在納粹“最終解決”這個課題上，很難找到比這兩位更出色的研究者。Robert Jan van Pelt為我們提供了大量指導，幫我們了解集中營的建筑。此外，波蘭奧斯維辛-比克瑙國立博物館的專家學者和工作人員也提供了鼎力支持，其中特別要感謝的是Igor Bartosik，Edyta Chowaniec，Adam Cyra， Jadwiga Dabrowska，Dorota Grela，Wanda Hutny，Helena Kubica，Miroslaw Obstarczyk，Krystyna Oleksy，Jozef Orlicki，Franciszek Piper博士， Wojciech Plosa，Piotr Setkiewicz博士，Kazimierz Smolen，Andrzej Strzelecki博士，Henryk Swiebocki博士，Jerzy Wroblewski以及Roman Zbrzeski。為我們在波蘭的調研提供大力幫助的還有Kazimierz Albin, Halina Elczewska，Abraham Frischer和Ester Frischer，Jozef Geresz博士，Bernadetta Gronek，John Hartman，Jozef Koch，Edward Kopowka，Alicja Koscian，Aleksander Lasik博士， Anna Machcewicz，Mariusz Jerzy Olbromski，Lucja Pawlicka-Nowak，Hubert Rogozinski，Robert Rydzon，Jacek Szwic，Marian Turski博士和Michalina Wysocka。

在海峽群島，我們從Frederick Cohen那里學到了寶貴的歷史知識。在法國，Serge Klarsfeld 和Adeline Suard給了我們很多幫助。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以色列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Yad Vashem）的Gideon Greif博士為我們提供了大力協助。此外，在以色列，Nava Mizrachi的幫助也使我們獲益頗多。在斯洛伐克，我們得到了Ivan Kamenec 和Eduard Niznansky博士的幫助。在德國，我們得到了下列人士的幫助：Andrej Angrick博士，Martin Cueppers，Wolf Gebhardt，Niels Gutschow，Peter Klein，Michaela Lichtenstein，Bogdan Musial博士，Dieter Pohl博士，Volker Reiss博士，Robert Sommer，Frank Stucke博士和Peter Witte。在俄國，Sergey Sluch博士為這個項目提供了大力支持。在匈牙利，Krisztina Fenyo博士的配合對我們非常有幫助。在烏克蘭，我們要感謝Taras Shumeiko。在美國，Adam Levy幫了我們很多。

這部電視系列節目的制作團隊也給了我莫大的幫助。我要特別感謝Detlef Siebert，他不僅出色地完成了對整部節目的畫面指導，還對內容提供了許多敏銳而深刻的批評建議。他是個有大智慧的人。兩名紀錄片導演Martina Balazova和Dominic Sutherland交上了一份令人非常滿意的答卷，與他們密切配合的是我們盡職盡責的攝影師Martin Patmore和Brian Biffin。才智過人、眼光獨到的Dominic指導了后期制作過程，并在Moving Picture Company和John Kennedy的幫助下完成了對圖像內容的審定。電視界最優秀的剪接師Alan Lygo在剪接室里為本片做出了巨大貢獻。我們的助理制片人Tanya Batchelor和波蘭研究專家Anna Taborska也都表現得十分出色。Declan Smith負責檔案收集工作，Rebecca Maidens和Cara Goold是本系列片的制片協調人，他們都做出了重要貢獻。制片人Emily Brownridge的工作做得讓人無可挑剔，Anna Mishcon和Laura Davey兩位監制也給予了大力支持。我的個人助理——先是Sarah Hall，后來是Michel le Gribbon也幫了我很多。

我還要特別感謝我們的聯合制片方——美國KCET電視臺，他們的指導讓我們獲益匪淺。Karen Hunte，Al Jerome，Mary Mazur，特別是Megan Callaway都為本片做出了貢獻，提供幫助的還有美國PBS電視臺的Coby Atlas。BBC Books的Sally Potter和Martin Redfern這兩位模范出版人對我們的工作非常支持，紐約公共事務出版社的Peter Osnos，Clive Priddle 和Kate Darnton也是如此。Andrew Nurnberg照例給了我們很多很好的建議。

我無法用只字片語來表達我對家人的感激，他們是我的孩子Benedict，Camilla和Oliver，以及我的妻子Helena。跟一個滿腦子都是奧斯維辛和納粹的人生活在一起并不總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但他們包容了這一點，也包容了其他許多。

然而，我最想感謝的還是近百名同意接受采訪的當事人。他們的回憶是無價之寶。希望他們能原諒我在此處的籠統謝意，因為他們每個人的名字連同各自獨到的見解，早已貫穿于全書的每個篇章。

# 圖片出處說明

BBC Books感謝以下個人及機構提供照片，并授權我們使用這些作品。我們已竭盡全力查找出處并標明版權所有者，如有錯誤或遺漏，在此深表歉意。

第一部分

1．以色列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2．Walter Frentz（納粹帝國攝影師）檔案；3．普魯士文化遺產圖片檔案館（Bildarchiv Preussischer Kulturbesitz）；4．漢斯·弗里德里希； 5．烏爾斯泰因圖片（Ullstein Bild） ；6—10．法蘭克福猶太人博物館（Jewish Museum, Frankfurt）；11—12．以色列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

第二部分

1—2. 奧斯維辛博物館；3．以色列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4．奧斯卡·格倫寧；5. 卡齊米日·皮耶霍夫斯基；6．溫蒂·達文波特（Wendy Davenport）；7．海倫娜·斯特洛諾娃；8—12．以色列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13—15. 奧斯維辛博物館；16．以色列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

理想國譯叢

001　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

　　　[南非]德斯蒙德·圖圖 著

002　　漫漫自由路：曼德拉自傳

　　　[南非]納爾遜·曼德拉 著

003　　斷臂上的花朵: 人生與法律的奇幻煉金術

　　　[南非]奧比·薩克斯 著

004　　歷史的終結與最后的人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05　　政治秩序的起源：從前人類時代到法國大革命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06　　事實即顛覆：無以名之的十年的政治寫作

　　　[英]蒂莫西·加頓艾什 著

007　　蘇聯的最后一天: 莫斯科，1991年12 月25日

　　　[愛爾蘭]康納·奧克萊利 著

008　　耳語者：斯大林時代蘇聯的私人生活

　　　[英]奧蘭多·費吉斯 著

009　　零年：1945，現代世界誕生的時刻

　　　[荷]伊恩·布魯瑪 著

010　　大斷裂：人類本性與社會秩序的重建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11　　罪孽的報應：德國和日本的戰爭記憶

　　　[荷]伊恩·布魯瑪 著

012　　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從工業革命到民主全球化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13　　檔案：一部個人史

　　　[英]蒂莫西·加頓艾什 著

014　　布達佩斯往事：冷戰時期一個東歐家庭的秘密檔案

　　　[美]卡蒂·馬頓 著

015　　古拉格之戀：一個愛情與求生的真實故事

　　　[英]奧蘭多·費吉斯 著

016　　信任：社會美德與創造經濟繁榮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17　　奧斯維辛：一部歷史

　　　[英]勞倫斯·里斯 著





